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外名人看邓小平

eBOOK
网络资料 非同凡响

前 言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指挥着中国这艘航船绕开暗礁，克服险阻，驶向胜利的彼岸，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引起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神州大地焕然一新。……与其他历史伟人一样，他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并引发了世界格局的变化。

他具有卓越的领导艺术和非凡的人格魅力，他对信仰的坚定追求，他的求是务实精神，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他的果敢，他的达观，他的幽默……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正因为如此，他的杰出才能和历史功绩，不仅得到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国大陆名人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而且也获得港、澳、台同胞，甚至外国首脑、显要、记者等名流的称赞。美国《成功》杂志将邓小平选为 1988 年的成功者，具有全球影响的《时代》周刊两度评进他为封面人物。他是世界性的历史伟人。

为了宣扬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讴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编著了此书。本书共有海内外名人的评论近 100 篇，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多角度、多层次地介绍了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虽不十分全面，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的标题大部分系编者所加，其内容有的是从公开出版物中编（译）的，有的是根据有关材料撰写的；前面列人物简介部分，对名人的身份、经历以及与邓小平同志的交往及其他背景作简明介绍。由于海外名人所处立场不同，他们观察和分析问题难免带有一定局限性，甚至夹有错误，对此，编者作了必要的删减，并在简介中扼要点明，以便读者正确阅读。

编 者

1994 年 5 月

中外名人看邓小平

[美]尼克松：

邓小平，20 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第 37 任总统（1969—1975），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舞台上，曾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中国人民熟悉他的名字，主要是因为他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起，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尼克松初登政治舞台，是在 1946 年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时，尼克松是他的副总统。以后几经荣辱兴衰，终于在 1968 年登上总统宝座，并于 1972 年赢得连任。正当他权极位尊而踌躇满志的时候，尼克松却卷入“水门事件”的丑闻，为避免遭国会弹劾，翌年他被迫辞职。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以一个顽固反共的政客身份起家的。他成名于整肃美国国务院中无辜的较有进步思想的官员阿尔杰·希斯。反共反社会主义是他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一贯本色。不论在台上或台下，他始终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效力的一名重量级角斗士，他离开白宫后，仍是美国后来各届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咨询者之一。同时，他潜心著述，其著作内容侧重于外交政策。尼克松先后发表了 10 本著作；他的《六次危机》（1962）、《尼克松回忆录》（1978）、《真正的战争》（1980）、《领袖们》（1982）、《真正的和平》（1984）、《越战不能重演》（1985）、《超越和平》（1993），大部为中国读者所熟悉。

1988 年 1 月 9 日，尼克松 75 岁生日时，写成了《1999：不战而胜》一书，这是他的第 7 本书，他自称，本书是他“40 年来在职学习外交问题并研究国际事务的毕生经验的总结”。目的在于对美国及西方在今后将面临的重要挑战作出分析，提出对策。由于他是美国战后各届总统中最擅长于外交事务的，由于他具有从全球战略角度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因此，他主动打开了关闭 23 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由于中国在全球的国际战略地位被美国所倚重，又由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尼克松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需要而不得不赞扬中国及其领导人。他敬重邓小平，在《1999：不战而胜》这本书中，他称赞邓小平是“20 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他高度评价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认为，这应归功于邓小平。

1990 年，尼克松又发表新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不仅从新的角度回顾了他自己多次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情节的经历，而且根据他近年的亲身感受纵谈当今世界风云，进一步发挥了他先后在《领袖们》、《1999：不战而胜》等著作中提出过的判断和主张，本书一开卷就回顾了他 1972 年初访华，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这一段往事，视此为自己政治生涯中风光无限的顶峰。同时，他详细叙述了 1989 年秋天，在中国发生“六四”风波以后，他第 6 次访华，力主维护中美关系的情况，披露了与邓小平会晤的一些重要的细节。他在该书中说，通过这次与邓小平会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1993 年，尼克松写了《超越和平》，这是他的第 10 本著作，也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专门写了关于中国的一章，在这一章中，他用大量的篇幅描写邓小平，称赞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佼佼者”。

尼克松和邓小平于 1979 年初次见面，这年 1 月，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访问美国，卡特举行正式宴会欢迎中国客人时，尼克松也应邀莅临。在宴会桌边，他和邓小平相见了。卡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虽然他不认识中国的现领导人，但是他很高

兴在这个短暂的招待会上同他们谈自己以前的访问。从中国人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始终是他们敬重的朋友。”此后，尼克松访华时，多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下面的两段文字是分别从《1999：不战而胜》、《角斗场上》和《超越和平》中摘译的。虽然，尼克松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且力主维护中美关系，但有必要指出，尼克松主张维护中美关系，是企图利用这条渠道对中国的局势发展施加影响，也就是继续搞“和平演变”。他对我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的论述，渗透着他的反共本色。凡此种种，相信读者在阅读时，不难识破。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设计者、指导者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大熔炉，它充满着革命与苦难、贫困和希望，政治和意识形态剧变，从混乱走向有序以及在井井有条时却被强迫投入混乱之中。它在60年里历经了从古老的王国转变为幼稚的共和国，又成为共产主义专政。它在两种情绪之间摇摆：愤怒地拒绝任何一点一滴的西方影响或谨慎地受益于与西方的良好关系。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民族社会之一，然而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在与自己作战。

在60年代我尚未当政的时候，我自己对于中国的看法就已开始改变。这是由于中苏分裂和康拉特、阿登纳这样的国务活动家的忠告。这两人部对我说，美国与中国建立关系是极为必要的，不过，我也永远下会忘记赫伯特·胡佛1963年在纽约市与我的谈话，那是我为他的80寿辰而去拜访他。他给我的是相反的忠告。

然而，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经历了20世纪最惨重灾难的中国，却注定要在21世纪成为世界领导力量之一。拿破仑在160年前说过：“那边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因为当他醒来时，他将震撼世界。”这个巨人醒了。他的时代到来了，他在准备震撼世界。

在与别人及与自己打了半个世纪仗以后，中国统一了。只经过40年，它的人口从4亿增加到10亿多。在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的领导下，搬开了绝对官僚主义的计划的压力，从而释放出世界1/5人民的潜力。如果中国沿邓的路线继续走去，我们的子孙等将生活在不是两个而是三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美国、苏联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长远看，中美关系将是持久的，这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基于希望。只要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或其盟友不抱领土野心，中美就不会疏远。友谊关系不会使我们失去任何东西，却使我们双方受益。在1949至1972年间，中美贸易几乎为零。现在，仅过了16年，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发展速度异常之快。自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至1983年，中国的8亿农民（改革的最先受益者）的人均收入增加了70%。有些专家预计，下世纪初，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西德。

中国的经济革命来自于其领导人在两个方面的戏剧性变化：他们对西方的新态度及邓小平的1978年经济改革。1972年中美建交为中国打开了进入西方世界和获得西方技术的方便之门，邓小平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使它能充分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中国认识到，中国需要找到一种途径抵消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这就带来了第一个转变，中国认识到，中国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取代那种有可能将中国人民永远置于贫困境地的苏联经济模式，这就带来

了第二十转变。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这次革命使中国摆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教条，邓小平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前的长征途中，一直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一起。他为 1949 年创建新中国及巩固新政权所作的贡献使他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个值得信赖的部下，但是，他对毛泽东搞的“大跃进”感到苦恼。他在 60 年代第一次试日提出改革建议，但却引起了极端的毛主义者对他的猜疑。1967 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 1973 年，又重新成为周恩来的可靠接班人，前者向经济现代化迈出的谨慎的第一步也遭到毛泽东的阻挠。1975 年，邓小平和即将去世的周恩来开始继续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指导方针。很快，激进派又反掌一击，再次使邓小平下台，留下周恩来一人在权力的边缘度过了他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但是不久，国家建设者们战胜了狂热势力，粉碎了“四人帮”，两次下台的邓小平又成了中国的“最高领袖”。

戈尔巴乔夫落后于邓小平

我见过邓小平 4 次，1979 年在华盛顿，1979 年、1982 年和 1985 年在北京。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中国人对西方和美国充满好奇心。1972 年我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候，为我们担任翻译的一位女士身着宽松的灰色毛式服装，留着朴素的短发。中国共产党人对亨利·希金斯的讽刺极为认真，并且指出，“一个女人为什么不能像男人呢？”1985 年，当我访问广东时，有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陪同，她脚穿高跟鞋，身着时髦的彩色旗袍，我的东道主指出：“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服饰有了更多的花色，我们的思想观念也是如此。”

但据此就断定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将是天真幼稚的。中国领导人仍是共产党人，不是资本家。尽管他们热情好客，并且似乎渴望与西方接洽，他们广泛进行经济改革的目标不是改革中国的本色，而是为了引进那些能应用于中国的东西，以使中国强盛，而又不改变她，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多少世纪以来，无论是外来侵略者还是外来思想，都没能永久地征服中国，而是被它所吸收、同化……

直到 1978 年邓小平掌权之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是要每个中国人在贫穷中享有平等的一份。今天，已允许一些人先设法脱贫致富，邓认识到，他必须在以贫穷为代价的平等与以不平等为代价的进步之间作出抉择。当他把中国极其贫穷的困境与新加坡、香港及台湾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之后，他选择了带有某些不平等的进步，而不要没有进步的严格平等。

我在 1972 年第一次看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忧郁气氛中的中国。自那以来，表面上的改观是惊人的。中国依然是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看得到电视。大城市的街道上挤满了穿着西式时髦风衣和套衫的人群，青少年看美国电影，听西方摇滚乐队音乐会，吃肯德基炸鸡。过去把短发塞在毛式帽子里的妇女，如今在北京的美容院里预约登记烫发。从中国各省迢迢而来的游人遍布北京，带着日本造的照相机，游览卜城和故宫。

1972年，大多数北京人只能安步当车，如今他们骑着自行车，有些人已有了汽车。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正在起飞，1986年的年增长率为11%，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年增长率的3倍。农业方面的成就最为惊人。在邓的改革的头两年内，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毛时代的20年。新的鼓励制度允许农民把超过政府定额的农产品留存和出售。这使中国现在能生产足以养活其10亿人的农产品，还有剩余以供出口。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最近对我说，中国以其仅占世界6%的可耕地，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对比之下，仍然在斯大林式集体农庄劳动的俄国农民不能生产出足以养活2.5亿苏联人的农产品。

西方一直满怀期待地注视着戈尔巴乔夫的每一个行动。对人权的每一个微小让步及公开性的每一点迹象都被西方公认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对于渴望每一位苏联新领导做出伟大事情之故。苏联正在发生的事确实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但是，迄今为止，戈尔巴乔夫只显示出愿意给斯大林建造的这台失灵的发动机加点润滑油。邓小平则已开始彻底重建中国的发动机，制定了有条有理地使农业、工业和科学现代化的计划。所以，至少就目前而论，尽管戈尔巴乔夫年轻，精力充沛，衣着入时，谈吐侃侃，他仍落后于84岁的、穿着毛式制服、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笑声带有喉音。脚边放着痰盂的邓小平。邓小平已经在做的笋，戈尔巴乔夫迄今还只能梦想。

改革深得民心

邓小平的果敢行动冒极大风险。削减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威胁到共产党机构中利用这种控制作为自己权力基础的人。改组中国武装力量则威胁着军界集团。玩弄西方自由经济概念可能会危险地激发中国人性格中固有的强烈排外情绪。这种情绪曾导致义和团暴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短暂统治。

然而，正如其他的伟大领袖们一样，邓小平对于未来的看法高于专家们，他能看到专家们不可想象的东西，的确，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从未做过的；但是，从未做过的事决非是做不成的事。假如最后结果表明上述关于邓的改革的政治后果的推论错了，那只能归结为一条简单的原因：邓的改革途径行得通。姑且撇开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不谈，邓正在打赌的是，中国不会背弃好东西。

当邓在1987年被迫撤掉他选定的接班人、共产党首脑胡耀邦时，西方的一些人惊恐地认为，中国发生的正是他们所预料的事。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更多的政治和学术自由，以适应新的经济自由。强硬路线分子指责胡，认为他在维护严厉的思想纪律方面有失误，邓本人表示要无情地回击那些纵容游行示威的人。

邓小平的态度引起西方报刊的尖锐批评：社论撰写者均表失望，认为他显然在走回头路，背离了有希望走向民主新中国的长征。这些批评家完全不理解邓小平的目标和困境。邓的权威的源泉是共产党。他需要这个权威以治理中国。邓知道，他的改革决不能过分挫伤党的权威，以免受到党内的反对而遭致命打击，或者更糟的是，使党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西方的某些超级鹰派人物希望中国最好再来一次革命痉挛，殊不知这要造成多少人死亡，并使中国和亚洲陷入混乱。

到 1985 年底，改革派重新牢牢地掌握了控制权。显然，许多人低估了邓小平。他的改革对于政府内那些年迈的强硬派保守分子可能不中意，但却深得民心。许多人自革命胜利以来第一次有能力购买电视机和冰箱等高档消费品，这在毛时代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流通领域内金钱增多也造成了腐败现象和通货膨胀。由于工业部门不能生产足够产品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城乡矛盾加剧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需要扭转改革的总方向，永远不可逆转的是中国人民对未来的新期望。历史的不愉快教训之一是：从未体会过繁荣和自由的人，没有这些也能长期生活下去；然而人们一旦得到了它们，就不会善罢甘休地放弃它们。邓的改革所产生的政治混乱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假如北京的强硬派废弃了改革，那么政治动乱就不得了。

在去年的党代表大会上，邓移交了中国政府的日常控制权。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一位共产党领袖体面和自愿让位，让精心选择出来的年轻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是极不寻常的。这些评论家没有认识到，这对于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府，都是极下寻常的。戴高乐不肯让位给他的显然的接班人乔治·蓬皮杜；丘吉尔不让位给艾登；阿登纳粗暴地拒绝他的能干的财政部长鲁德维格·艾哈德。当艾哈德对我谈到阿登纳对他的轻蔑态度时，眼泪夺眶而出。日本首相吉田茂是少有的例外。他仔细地准备了几个人（池田勇人、福田纠夫、佐藤荣作）作为他离开政治舞台后的接班人，从而使日本在约 1/4 世纪内一直遵循吉田茂的亲西方的保守路线。

这个问题下仅与政治体制，而且与领导人本身有关。以有条不紊地、庄严移交权力著称的西方国家仍然有可能使政策陷于一片混乱。在集权主义国家，有可能强迫领导人下台，但国家的基本政策却不变；例如，去年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被废黜，就是如此。邓小平退居一旁，留下了他所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这样，他表现出了他的高超灵巧的政治奇技。

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迟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一个尚未有答案的问题是，在邓小平最终离开舞台后，究竟准有代替邓小平的实力和远见卓识。在共产主义国家领袖只能有一个。

已经沿着邓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远的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倒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是在已试验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方开始试验经济局部自由化的。当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徒时，中国曾是国际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赖苏联的赏赐。在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未能在国内发挥，而中国的国家潜力则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毛和周的最伟大遗产之一是，他们终于转向西方，把中国领进了 20 世纪。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下面的

年轻人，而是他周围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为他们想象中的国家后果而担忧，而邓则欢迎和鼓励出现这个后果，他们仍怀念着他们和邓小平一起曾为之而战斗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则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国的体制，否则，10亿张饥饿的嘴会把这些理想化为灰烬。16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在他生命垂危时曾绝望地写道：“若少已知之，则老可行之。”84岁的邓小平不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知和行的结合产生巨大威力，它推动世界1/5的人为新的繁荣和成为世界领袖而奋斗。

西方有许多的幼稚的观察家坚信：邓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中止共产主义统治。邓的改革确实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21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尽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好不过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时间。今天中国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亲身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年轻领导人将成为继续改革和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威望。中国将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于自由。

我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在我从1976年到1985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4次访问中，我见到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在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方面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拿破仑曾经把中国叫做“沉睡的巨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觉醒的巨人，它永远抛弃了它在60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

1989年春天，同时发生了两个事件——中苏最高级会谈和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这使中国将来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改革方面执行的方针的关键问题鲜明地显露出来。这两个事件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这一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

虽然莫斯科和北京在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不相信西方需要担心50年代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中苏集团会恢复。1982年，齐奥塞斯库曾经对我说：他相信这两个主要的欧亚大国会消除它们的分歧，因为它们有“同样的意识形态”。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实际上，它们之所以完全恢复关系，不是因为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长达几千英里的共同边界，而且戈尔巴乔夫已经采取行动来满足中国对关系正常化提出的3个条件：即苏军撤出阿富汗，苏联减少驻扎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带的军队，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

许多人错误地得出结论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把在中国进行了10年的进步的改革一扫而光。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对西方开放已经使他的国家发生了无法扭转的变化。强硬路线领导人无法把时钟完全倒拨过来，当中国

的领导人看了世界上的其余地方。特别是亚洲大陆的周边地带时，他们对他们国家的落后感到震惊和羞愧。特别使他们不安的是，共产党大陆的中国人生活的贫困和在资本主义的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生活和劳动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之高形成强烈的对比。当中国人民观看邓小平 1979 年访问美国的电视报道时，现代化城市，先进的工厂和高技术奇妙产品这样一些背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由于中国人习惯于认为中国是中央王国——文明的中心，因而由于他们猛烈觉醒过来而感到痛苦，然而，这种觉醒是必要的。虽然单是这一点不能使任何事情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这的确使他们不想回头走老路，并且促使他们的想法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在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时，曾经同他们坦率地讨论了改革的进程，既谈到变革的必要性，也谈到变革引起的问题。1982 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曾经提出这些问题……他说，虽然邓小平年纪很大了，但是有“成百、甚至成千的人”准备把他的进步的政策执行下去。

在 1985 年同邓小平会晤时，我注意到同我们先前在 1979 年和 1982 年见面时相比，他显得不那么紧张，而且更加健康，我曾经听外交部长说，82 岁的邓小平每天游泳一小时，散步两英里。这使我想起 78 岁的毛泽东在 1971 年拍摄的有名的照片，据说那是他在长江中游泳时拍的。

在我们广泛进行的交谈中，邓小平既谈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谈到国内的改革。他首先照例提出官方的说法，说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同样的威胁。但是，他后来说的每一句话都同这种立场大相径庭，我不禁想到，如果邓说的话反映了实际情况，怎么中国没有为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提出“三项条件”，这是多么奇怪啊！无论如何，邓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仍持怀疑态度。他把这种政策说成是“雷声大雨点小”。他还强调说，美国永远不必担心转让给中国的技术最后会落到苏联手里。他说：“我们同苏联的分歧远比美国的分歧大，但是，我们不想把自己拴在一个战车上。”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时，邓小平的语调远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绝对化。他说，中国将对这种改革进行认真的试验，如果这种改革行得通，就继续进行下去。他接着说：“如果这种改革失败，我们将放弃它。我们在三五年内可以决定我们未来的方针，改革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策略是可以改变的。”他说，反对改革的势力是存在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但是，只要改革行得通，这些势力将仍然是无足轻重的。由于最初实行的农业改革已经改善了 90% 的农民的生活，邓相信改革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在我们的会晤快要结束时，我说，中国的改革由于得到成功，也许可以威为第二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模式，特别是因为苏联的模式已经名声扫地，而美国的模式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也许过于先进。邓用很响亮的语调说，他下赞成输出经济模式，苏联永远下会承认中国的做法优越。他强调说：“他们想使大家仿效他们的模式。”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一些观察家要求美国惩罚中国领导人，断绝一切关系，实行广泛的制裁，并孤立中国人。然而，如果破坏中美关系，那将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在 1989 年对中国进行的第 6 次访问可能是在我 17 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

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1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作为中国“老朋友”的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调我的访问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离开以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10月31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17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说我们两国关系冷淡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该下台。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3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识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紧缩措施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必然会重新出现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例如能干的教育部长李铁映、出色的宣传部长李瑞环（原文如此——译者注）和才华卓越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他们都知道走回头路再搞教条主义只会走进死胡同。

邓小平不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

我清楚地记得1989年会见邓小平的情景，那时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刚刚过去4个月。他在人民大会堂迎接了我，我对他说，对于我们两国关系的批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中国应当采取行动平息文明世界的愤怒。当着世界各地的几十名记者，他如背新闻稿似他讲了一通不会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话。

当摄影记者走了以后，他变得活跃了许多。当时，这位中国身经百战幸存下来的年长的领导者已几乎完全失去听力。他谈话有一种超现实的性质，

翻译把我的话翻成汉语，对着他的左耳大声喊，而他的女儿又用尖噪音把这些话传进他的右耳。尽管他在听力上有困难，但作为他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却毫无困难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告诉我说，中国在经过若干年对外国人卑躬屈膝之后，现在是团结的和独立的，中国人民永远下会饶恕他们的领导者向另一个国家道歉。紧接着，他提到了方励之问题——当时，方励之正躲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里，并对结束这一僵局提出了非常建设性的意见。

邓小平的意思明确无误：我们的分歧能够通过幕后谈判加以弥合，然而公开的、激烈的论争只会使它们更趋加深。几个月之后，方励之获释（原文如此——译者注），但这是中国做出的主动行动，而下是对美国的要求做出反应。

中国由于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那时，我们需要中国作为我们的朋友。

[美]卡特：

邓小平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

吉米·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在他当政时期，由于他毅然决然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轰动世界。他卸任之后，在其回忆录《忠于信仰》中，追述了同邓小平会晤的情况，披露了邓小平当时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

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月29日至31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应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30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高级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对邓小平这次来访十分重视，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他。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是由卡特亲自主持的，机场上的红地毯长达一公里，鸣礼炮21响。不仅如此，卡特在3个星期前就详细审阅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包括国宴的菜单在内。美国国务院则发出了多达2000余张的特别记者证，以使两国关系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能够最充分地为人所知晓。

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正式访美，他受到了美国朝野的空前欢迎，但隆重程度远不及此次邓小平访美。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把丘吉尔当作英雄崇拜，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他已卸任首相的情况下，他并不代表什么。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时，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当时，美国政府为他安排了访问节目，其高潮是游览迪斯尼乐园，鸟瞰公路上密如蚁群的私人轿车，以及享受一天纯粹美国式的农村生活。在美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但邓小平的情况却与此绝然不同。他富有传奇般的政治上的经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国代表和雄心勃勃的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

在华盛顿，邓小平同卡特总共进行了三次会谈，并且一起出席了白宫的欢迎仪式和美国国宴。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算特别长，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邓小平的言谈举止却给卡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卡特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曾详细记述了他同邓小平的会谈情况和他对邓小平的印象。他把接待邓小平来访视为其总统任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在卡特看来，邓小平是一位极其令人愉快的谈判对手。他认为在这位身材矮小却十分健壮的中国领导人身上，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

邓小平和卡特第一次会谈结束后，邓在美国国务院的休息室里撞上了一大群记者。记者们蜂拥而上，纷纷询问他同卡特谈论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幽默、诙谐地回答说：

“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记者们对邓如此回答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亲自领略到了邓小平的灵敏反应、幽默和智慧。

卡特总统和夫人为邓小平夫妇的来访举行了盛大国宴。在宴会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是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特意运来了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一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厅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宴会桌上还摆放了中国竹筷，菜单和座位牌也是由精通中国书法的美籍华人用中英文书写的。这些细致的安排，显示了主人的匠心独运，反映了卡特总统及其政府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

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莱恩对邓小平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风趣地对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他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夫妇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一场耗资50万美元的文艺晚会。

一次，邓小平与卡特闲谈，邓笑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没有”，卡特回答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听了这一回答，邓小平非常开心地掏出一支“熊猫”牌香烟，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

邓小平在美国的8天时间里，除了在华盛顿同卡特及其他人士进行必要的会谈和接触外，还访问了著名的工业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休斯敦国家宇航中心，波音飞机公司和休斯工具公司，并同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们共进了晚餐。他每到一处，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给当地人民带来愉快和欢乐。许多人都想见一见他，同他握手，向他欢呼、问好，请他签名留念。在象征着美国民主制度的国会山上，那些自以为是见多了世面的议员们，也纷纷拿着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他签名留念。可以说，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美国引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对美国的这次访问，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是中美两大民族传统友谊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世界论坛报》称“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杠杆”。下面的段落是从卡特总统的回忆录《忠于信仰》中摘录的。

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为了准备我同邓小平的会谈，我对电视记者发表了谈话，为的是在中国广播。我在谈话中向中国人民强调了 this 新关系对我们，对太平洋地区和对全世界的价值。我告诉他们，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决定感到何等的高兴，并说，届时对邓小平副主席、他的夫人和随行人员的热烈欢迎将会证明这种心情。我说，我的共和党前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以及以前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我们的新协定奠定了基础，这本身就表明，这次协定在我们两国领导人中间是得到广泛支持的（这个电视节目曾在中国反复播放，因此在我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一见面就认出了我）。

邓小平的访问是我在任期内愉快的经历之一。在我看来，一切都很顺利，这位中国领导人看上去也同样高兴。

“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摘自1979年1月29日日记）

我们计划一起举行三次工作会议，并决定从分析两国对世界事务的态度开始，邓让我先谈，我根据一个简单的提纲谨慎地讲着，每讲完一个要点就停一停，以便译员向邓和其他官员复述我的话。我特别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从东南亚经印度洋北部直到非洲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形势和一些外部强国想利用这种形势的倾向；另一个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我还谈到了指导我国同别国关系的信仰和价值标准。

我说，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强大和有益的影响是我的职责。我国同情全世界人民想改善生活、更多地参与政治、摆脱本国政府的迫害和不受任何外部强国控制的日益强烈的愿望。我们还认为，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将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们相信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保护我们今后的安全。

邓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

当我们的话破翻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领导人有力地点头。

然而我请邓谈谈他的看法。他谈了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指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有多少共同的利益。邓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很久以前就指出了战争危险，发动战争的很可能不是苏联就是美国。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这两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十之八九会扩大它们的影响……

他接着说，在过去5年里，他认为中东形势没有根本好转。在那个地区，一些因以色列的存在而拒绝和平努力的国家，长期以来同苏联接近，某些态度暧昧的国家已进一步向苏联靠拢。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色列这个实体，不否认以色列的存在。但是当我后来问他中国有无可能同以色列建立关系时，他回答：“没有，目前没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以色列如果退回到1967年边界，解决了约旦、约旦河西岸和让巴勒斯坦人建立家园的问题，就能得到1亿阿拉伯人的支持，否则中东问题很可能扩大到沙特阿拉伯等国……

当我们在午餐后继续会谈时，我对他说，我也对苏联势力的扩大感到关切——但是我要他看到苏联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尼日利亚、几内亚、北朝鲜、日本、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索马里、中东和特别是在中国的倒霉经历。我说，在南部非洲，如果我们把目前倾向于苏联的国家如扎伊尔、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等置之度外，那将是严重的错误。甚至安哥拉现在也在审慎地接近西方。我讲述了我们为在纳米比亚实现多数人的统治而进行的工作，并对他说，中国人也可以在非洲进行同样的和平努力。

我扼要叙述了我们为中东实现和平所做的工作，强调了我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关心。我说，关键是要实现全面的和平解决，而且从战略上说，需要沙特阿拉伯、约旦、苏丹、埃及、以色列、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样一些温和派国家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只要埃及仍然屯兵苏伊士运河东侧以对付以色列，只要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其他邻国仍然对以色列怒目相视，我们就不大可能制止苏联对该地区的进一步入侵，这个论点显然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听得很仔细，问了我几个有关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的问题。

至于其他多事地区，我简要他讲了我们正在伊朗做些什么，并对他说，我们希望那里有一个根据伊朗宪法组成的稳定的、爱好和平的政府。我说，我们认为，对待越南这个侵略者的最好的办法，是使它在世界其他国家面前处于孤立地位；联合国里的发展中国家最近第一次在谴责苏联和古巴的同时也谴责了越南。我试图鼓励中国人利用他们在北朝鲜的影响帮助安排南北朝鲜政府当局之间的直接会谈。我不敢说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多大进展，但是至少邓明白了我的立场……

然后，邓回答了我提出的请他利用中国对北朝鲜的影响来维持和平的要求。他说，许多人向他提出过北朝鲜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北朝鲜发动进攻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不可能同南朝鲜建立贸易关系或直接联系，但是他希望南朝鲜接受北朝鲜关于举行会谈和选举以达到合并的建议。他说，苏联和北朝鲜的关系从来不是很牢固，近来，苏联人试图影响北朝鲜政府的政策，两国关系已削弱了，如果中国试图对北朝鲜施加压力，也会失去影响。

他令观众倾倒

时间不早了，我向他建议次日上午再继续这场谈话，邓同意了。过了大约 1 小时，我们又共聚一堂参加国宴，开始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席间，他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与他为伴使人觉得高兴。在整个宴会期间，他喜欢谈论他自己国家的生活和他认为他们的生活正在如何如何改善。我们就我从幼年就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展开了一场心平气和的争论。他勉强承认，到中国去的传教士有些是好的，然而，他坚持说有许多人那里去只是为了把东方的生活方式改变成西方方式。我向他提到他们建立了很多医院和学校，他也说其中许多医院和学校至今尚在。他强烈反对恢复任何外国人去传教的活动，并说中国的基督徒同意他这个意见，但是，当我向他建议应当允许不受限制地散发《圣经》和让人民有做礼拜的自由时，他听得很留神，答应研究此事（后来，他的行动表现出考虑了这两个建议）。

看来，邓对改善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颇感兴趣，并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的宗教方面。他说，中国的穆斯林也许有 700 万之多，他的政府不干涉他们的信仰。我问他中国让不让这些信徒去麦加，他说不让，但是他说如果到麦加朝圣是意义重大的事情的话，政策可以改变。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转告给沙特阿拉伯人。

关于人权，邓说中国人正在努力改善他们的司法制度，国为对严重罪行的惩处现在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没有几个律师，但是他还拿不准中国律师多一些是否情况就会好一些，他注意到其

他国家的法庭里没完没了的争论、拖延和明显的等级歧视，所以不知道该不该让这些问题也在他的国家里出现。他显然已决定让地方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也在纠纷和犯罪行为发生的地方由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就地解决，律师要增加，……他说，中国赞成让任何离散的家庭重新团聚，不实行新闻检查，最近还在很大程度上允许言论自由。他还说，在中国的制度下，对待这些自由必须非常谨慎。

我们邀请了美国的两位前总统参加这次正式宴会。华盛顿报界对尼克松总统出现在白宫十分感兴趣：这是可以预料的。虽然他不认识中国的现领导人，但是他很高兴在这个短暂的招待会上

同他们谈论他自己以前的访问。从中国人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始终是他们敬重的朋友，他们认为有关水门事件的指责算不了什么大事。

在正式的祝酒词和私下的谈话中，人们都心情愉快兴致很高、好像有意要打破常常使这种场合气氛沉闷的正式的外交客套。我特别高兴的是，看到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当面探问他

们以毕生精力研究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代的风俗习惯。

“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表演，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他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激动。他吻了许多演员，报纸后来说许多观众流下了流泪。

“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贝拉克索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摘自 1979 年 1 月 29 日日记）

也许因为他充满活力和个子矮小，邓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别的儿童最喜

欢的人，而且看来这种感情是两方面的。

邓小平说话生动幽默

第二天早晨，邓小平和我国助手们一起举行的会谈比前一天的会谈要轻松愉快得多。我们讨论了两国彼此的一些产权要求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1949年中国革命时两国互相没收了一些财产），并保证争取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邓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具体细节相当熟悉。

我简要地谈了有关最惠国待遇的立法问题，谈到如果我们把他的国家包括在内而不给苏联这种待遇，就会造成不平衡。邓对我说，在移民问题上中国同苏联不能相提并论。

我就互派留学生的计划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不喜欢他的决定，就是所有美国人得自成一体，生活在与外界相当隔绝的环境里，不同中国学生或中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他解释说，中国没有足够的住宿条件来满足美国人所习惯的最低标准，我认为他的理由不够充分，因此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你们同意可以有多少学生去中国以后，我们希望你们不要限制谁能去谁不能去。”他微笑说，中国的力量还顶得住几个学生，中国人不会根据意识形态来审查学生。他说，对美国驻中国记者的旅行范围会有一些限制，但是不会实行任何新闻检查。

“我要求他（在他在美国期间公开发表谈话时）提一下台湾问题并用上‘和平方式’和‘耐心’这两个词。他说，他希望美国和日本规劝台湾谈判，并且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他们才下会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或失去耐心，一是迟迟不能谈判；二是苏联人进入台湾。他要求我过了今年以后在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时要慎重。他还表明，他们不赞成出售任何武器。”（摘自1979年1月30日日记）

我把我们在出售武器问题上给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告诉了邓：我们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苏联出售武器，但是我们不谋求影响我们的拥有主权的盟国的政策。他回答说：“对，我知道这是你们的立场。这很好。”

在几次既愉快又富有成果的会谈中，我们还讨论了另外一些问题，有几个是非常机密的问题。邓小平在访问国会时，谈话生动幽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来中国人懂得如何既表现出沉着的自信心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又不显得骄傲自大。兹比格纽在自己家里设晚宴招待邓，席间，兹比格纽评论说，中国人与法国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别的国家。邓想了一想，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谈时，我们签署了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等协议。当时，有人问他：“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当邓回答说：“有”时，人人都侧耳听他怎么说。他停了一停之后说道：“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愉快的仪式过去了。现在我们得从事在国会通过立法使我们的协定生效这个困难的工作了。支持我们的力量不小，但是也有一批积极活跃的右翼政治集团仍然坚持美国无论如何应当帮助蒋介石的后代夺回大陆。在他们看来，台湾就是中国，毫无办法说服他们改变想法。他们要想制订一个法律来

改变我已采取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行动，或者在这个法律中写进一些中国无法接受、以致中国会拒绝整个协定的条款。幸好，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我们。

“我指示万斯在关于台湾的立法上坚决把住关。如果把这项法律改得违反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诺，或者，如果同台湾的安全有关的措词超过了条约本身的措词，我将不得不否决这项法律，那时，再要与台湾实际打交道就一概不合法了。（摘自1979年3月7日日记）

虽然我说要否决并非虚声恫吓，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对台湾采取负责态度，因此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不得不为同国会一起确定最后的法律而努力。有些议员慷慨激昂，哗众取宠，在新闻界和家乡选民面前大出风头。但是，我们终于占了上风，这时距离终止与台湾的条约，开始实施同中国的正式协定只剩下几天了。

事实证明，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有几项任务比我在就任之初所预料的要令人愉快和满意得多，中国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当初认为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也许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可能对我们涉及的台湾的问题上的一项或几项重大原则拒不让步，我们可能在亚洲其他地区遇到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可能同中国发生某种关系更重大的对抗，或者，可能在我国人民中间和在国会遭到无法解决的政治上的反对。

恰恰相反，一切都很顺利。无论是在建交之前还是建交之后，中国人对我的其他职责，对我们国内的其他现实都表现出十分了解。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关于我们新建立的外交关系在西太平洋的稳定作用，以及我们同日本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他们的言论都是有益的，而且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没有给我们同他们建立的新关系加上反苏色彩。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美] 布什：

邓小平，一位来自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乔治·布什是继罗纳德·里根之后的美国总统。70年代初，在杰拉尔德·福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在美国政坛显要当中，恐怕没有谁比布什更熟悉中国。在驻华期间，他和夫人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来来往往。他为促进两国之间的交往，加强中美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因为如此，1989年12月10日，已担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派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时，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仍破例接见了布什总统的这位特使，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并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1975年10月1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北京，与中国方面磋商福特总统访华事宜。当时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参加了这次预备性的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主要是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布什

随基辛格一起，与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3次长时间的会谈，使他有直接了解邓小平，领略他的风格与风采。虽然此前他已几次见过邓小平，但这次与邓小平的长时间的会谈显然给他留下了特殊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传体回忆录《白宫：我的目标》一书中，在叙述基辛格这次先遣访华的过程时，用较多的笔触记述了他和基辛格等人与邓小平会谈的情况。在他看来，当时，邓小平“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和周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

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布什特别注意到：“邓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词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他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

乔治·布什曾多次访问中国，邓小平曾多次会见他。1989年2月布什访问时，邓小平亲自会见他，发表了题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重要谈话，这一谈话已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下面是从布什的回忆录中摘译的。

1975年10月19日，国务卿基辛格到达北京，为福特总统在这一年早些时候访问北京做准备。像以往一样，他的议事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要在2天内与邓小平副总理举行3次长时间会谈，以拟出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之后要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世界上这2位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会谈中会谈些什么？没有人能拟出计划。通常的做法是在来访的领导人到来之前就要由双方外交首脑把会谈结论的轮廓或者条款准备好。这样就可以确定会谈的议程，并且减少在重要问题上产生误解的风险。

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中方人员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有国务卿的助手及副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小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问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他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听上去叫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抱怨说，苏联对世界和平造成了重大威胁，而美国在这一威胁面前却显得过于软弱。除了语言的不同，我简直就像在听巴里·戈德华特于 1964 年发表的那篇演说。

像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邓小平对美国推行的与苏联缓和的政策表示关切。他指责说，美国对俄国人的政策与英国和法国 1938 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相似。邓小平说，这是一种“绥靖”政策。听到这里，基辛格猛然扬起头来，但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他回答说：“一个每年花费 1100 亿美元用于防务的国家不应被说成是在搞什么慕尼黑主义。让我提醒一下，当你们两个国家基于自己的理由结盟时，是我们在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他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分歧之后，基辛格说：“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不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小平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前苏联]赫鲁晓夫：

邓小平这个人很厉害

尼基塔·谢米盖那维奇·赫鲁晓夫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自1960年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以来，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赫鲁晓夫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9年到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1934年起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9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年任苏共

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和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1964年10月，前苏联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赫鲁晓夫被迫“辞职”，此后，靠领取退休养老金生活。1971年因病逝世。

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曾先后访问苏联，赫鲁晓夫也曾三次访问北京。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与邓小平曾有多次接触。随着中苏两党论战全面展开，冲突日益升级，赫鲁晓夫与邓小平之间有着正面的交锋。

1974年，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和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据这本书的英译本编者称，赫鲁晓夫生前曾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用了4年时间录下了长达180小时的谈话录音。1971年9月，赫鲁晓

夫逝世后，他的家属和朋友通过秘密途径把这部分录音带和录音记录稿送到了西方。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报道，这些录音带在美国经过音图鉴定后，证实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声音。自该书于1974年在西方出版后，苏联官方始终都没有发表正式评论。这部回忆录的内容包括1954年至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年代的苏联政治、经济、外交等情况，特别是涉及国内外政策的演变。在该书的第一章《中国》中，赫鲁晓夫详细谈到了中苏两党分裂的由来，谈到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谈到了他的3次访华，谈到了他对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也谈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当然，他的回忆录当中不乏对中国内外政策，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和诬蔑，这是不足为怪的。

值得提出的是，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交往当中，毛泽东曾多次提到邓小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有一天晚上，毛泽东把翻译李越然叫到他的房间里。毛泽东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信封，他口述，要李越然写。写完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了李越然一个信封，这回，李越然写成了俄文，内容是：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说。我们俩不谈了，好吗？”

李越然写完，毛泽东在这个信封上签了“毛泽东”3个字。

原来，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第一次共同进餐时，毛泽东将手一划，像分清职责一般，说：“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毛泽东考虑，他和赫鲁晓夫这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不能谈崩了，必须留有余地。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先谈，这样回旋余地大。

在赫鲁晓夫看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他的同事中“独树一帜”，将头发剪得很短，这种发型在中国恰恰又是被称为“小平头”。然而，在欧洲，圣保罗早已肯定这种发式是“给上帝的荣耀”，象征着男性的力量与雄伟。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前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和波斯别洛夫，面对他们的谈判对于邓小平，亲身感受到了邓咄咄逼人的才气和勃勃向前的进取精神，不得不报告说，“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话下多，专抓你要害和漏洞……。”

后来，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当面对毛泽东苦笑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下面的段落是从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摘录的：

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我还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现在说一说邓小平。前面我已经说过，毛把他看作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他后来出席了在罗马尼亚党代会前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印度]拉吉夫·甘地：

邓小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拉吉夫·甘地是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印度国大党政府总理。1988年12月，拉·甘地应中国政府总理李鹏的邀请访问北京，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84岁的邓小平握着44岁的拉·甘地的手说：“欢迎你，我年轻的朋友。”邓说：“从你的访问开始，我们能够恢复朋友关系。两国领导人将成为朋友，两国将成为朋友，两国人民将成为朋友。”随后，邓小平问拉·甘他说：“你同意这样看吧。”甘地回答说：“我同意这样看。”在甘地看来，他同邓小平的友好会见标志着他的访问达到了高潮，这显然是他期待的一种象征。美联社记者当日报道说：印度年轻的总理21日会见了中国年迈的政治家。新德里同北京麻烦的关系突然间似乎成了过去的事情。政治僵局已经打破。

邓小平与拉·甘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亲切友好的谈话，谈话的一部分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为题，发表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下面是拉吉夫·甘地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对谈及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

我发现，他谈到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是我们过去40年中为之努力的事。那就是努力争取建立不依附于任何集团，不把对抗作为解决办法的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努力争取建立一种比较公平合理的新经济秩序。

我们一致同意，我们能够也应该向前走。我们已经奠定了两国建立和平、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础。

[英]撒切尔：

邓小平非常执着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战后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担任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政治家，是国际政坛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

1982年9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的北京迎来了撒切尔夫人。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英关系，扩大双边贸易。此外，还为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即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

22日下午，撒切尔夫人乘英国皇家空军专机来到北京，西方报纸报道说：“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正值主张‘和为贵’的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诞辰2463周年纪念之时，她在丈夫丹尼斯及一大批政府官员和16名记者陪同下，来到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义之邦——中国。”

早在来华之前，撒切尔夫人就事先声明：“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依然有效。”她在国际上大造这种舆论，目的在于试探中国方面的立场。24日上午，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身穿蓝底红点丝质西装裙，脚踏黑色高跟鞋，手挽黑色手袋，颈项上戴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雍容华贵，艳光四射。她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邓颖超交谈片刻，随后前往福建厅，与邓小平进行会谈。

撒切尔夫人一见到邓小平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邓小平弦外有音地回答说：“是啊，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对中英最高级会谈，卫星进行了现场直播，全世界许多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会谈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人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撒切尔夫人向邓小平一再强调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仍然有效。

对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主权、尊严和威信的问题，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接着，邓小平坦率地对撒切尔夫人说：香港问题很简单，我看一、二年能解决。并向撒切尔夫人讲了中国政府的3点原则性意见，即：

第一，主权不容讨论。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二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外电评述说：撒切尔夫人尽管受英国前首相、政界元老丘吉尔的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尽管她信奉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坚持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面前，她毕竟还年轻……。还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

撒切尔夫人原本不想在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权上退让，但交锋中发现她手上的牌实在太少，最后不得不决定，不但要向中国交还主权，而且也要交出治权。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政治家虽然执迷于过时的大英帝国的侵略理论，但大英帝国的威风在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代表者面前已经失灵了。于是，这位一向注重仪表、举手授足极有分寸的铁娘子随之产生出一种不安和紧张的心理状态，以致脚下乱了方寸。当脸色凝重的女首相落寞地从门口走出来，步下人民大会堂北门石阶，走到倒数第二级石阶时，其高跟鞋与石相绊，身体顿时失去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下，以致皮鞋、手袋也被甩到了一边。在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一名军人及一名穿灰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马上在最短时间合力将铁娘子扶起，自然，这很快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不久前，撒切尔夫人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她以一种失败者的无奈和依依不舍，追忆了中英谈判的全过程，表达了她对邓小平等中国决策人物的钦佩。

下面的文字是从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摘译的。

1982年9月22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1842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上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9月23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已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制安排达成协议，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开始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下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泡汤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1983年1月28日早上，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6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进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人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下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了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3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信的内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让步。

尽管作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3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9月22日和23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市汇价大跌。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利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德]施密特：

邓小平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

赫尔穆特·施密特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曾担任原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政府总理，1975年10月和1984年秋，他曾经两次访问中国，并都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他第二次访华时，邓小平曾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纵论了天下大势。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中，记述了他再次访华期间与邓小平会晤的情况以及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式的感想。

施密特两次访华，两次印象绝然不同。初次访华时，中国的“文革”尚未结束，他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深感厌恶，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对以及对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竟然肆无忌惮地、残忍地进行迫害和破坏。”他再次访华时，中国的历史已揭开崭新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古老的大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腾飞。他在谈到第二次访华时的印象时说：“1984年我第二次访问中国参加35周年国庆时，我有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我高兴地看到，人们已经结束了这一犯罪的瞎胡闹，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路线。我又一次会晤了邓小平……再次见到邓小平使我感到特别愉快。我知道，他是对经济开放不断给予推动的人。”

施密特重访中国时，邓小平已满80岁，但在施密特看来，邓给他的印象却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

施密特当了8年联邦总理后，离开了波恩政治舞台。但是，他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政治家、演说家和评论家，他的政治判断，尤其是他的经济政策分析，在全世界深受重视。下野后的施密特喜欢办报，搞新闻工作。当有人问他谁是当今最重要的政治家时，他回答说：中国的邓小平在他眼中是“最成功的政治家”。在“四人帮”造成的动荡之后，邓小平把“10亿中国人的庞大队伍引导到速度并不慢的改革之路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完成了这一杰作，而没有某个人被枪决，或者像在莫斯科那样，某个人通过自然死亡让开了路，“邓通过自己的示范使老一代自愿退下来”，原联邦德国著名的报纸《世界报》以“施密特谈谁最伟大”为题发表了他的这一谈话。

下面是从施密特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中摘录出来的。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1975年10月，我作为联邦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发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了异议。我虽然不想排除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在西方保持足够的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我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大可能的。然而，毛泽东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赞成他的观点。

4年以后，即1979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继承人华国锋来到波恩，他对上述预言有分寸地作了补充：“中国将尽一切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

几乎是我访问毛泽东10年以后，1984年9月~10月，我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邓小平以回忆我们几年前的谈话作为开始会谈的引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说：“你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你是对的。”

我从1969年出任国防部长以来，就经常研究这些问题。1971年我曾敦促维利·勃兰特建立波恩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1972年秋，早在美国采取

这一步之前很久，这种外交关系就建立了。在我被任命为联邦总理之后，周恩来邀请我访问中国。但当 1975 年秋这次访问成行时，周已重病缠身，我已不能见到他。副总理邓小平代替他作我的东道主。

邓小平在机场以仪仗队迎接我，一群身穿彩色服装的孩子欢快地呼喊口号，挥舞黑、红、黄三色小旗。姑娘们佩戴着纸做的大条飘带和花，千里拿着整把的花束，另一些姑娘们在头发上别着颜色各异的花夹。关于邓小平，《科隆市导报》当时写道：“人们认为，邓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联邦总理按理应当喜欢这位已 70 高龄、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却是很有权威的人物。”不错，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毛泽东的空前支配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我的每一位谈判伙伴都援引毛此前不久对我讲过的话，他们讲话时——邓小平也如此——没有一次是讲自己的思想，而仅仅是解释和详细说明毛的木刻般完整谈话的中心和背景。显然，这在世界各地组织严密的政府中都是相似的，但除了礼萨·巴列维国王和另外一个人之外，我还从未在任何地方见到过如此无条件地遵从国家元首的情况。

在毛泽东和我谈话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一言未发。他坐在沙发椅上将近两小时，没有表示他对整个谈话是如何看的。但是，第二天，他多次提到毛泽东的谈话。在我拜会毛泽东之前，邓小平和我已经进行过一次详细的会谈；此外，我们还一次或两次宴会上会晤过。在这些会晤中，邓小平请我谈谈我对世界战略形势和经济形势的看法。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我对欧洲形势所作的分析。

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

在所有的私下谈话中，包括在首都以外的私下谈话中，1984 年使我们几乎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把改善生活状况的希望寄托于谁，第一位是邓小平，第二位是邓小平，第三位还是邓小平，他自己下搞个人崇拜，他大概鄙视个人崇拜。他也不需要为贯彻其政策而推行个人崇拜，因为他是深得人心的，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

邓小平是在人民大会堂里，即 9 年前会见我的同一个地方见我的。在此之前不久，即在 8 月 28 日，他已满 80 岁，但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他在谈话中对答如流，富有幽默感；对谈话的情况了如指掌，思想集中。在一次延长了的午宴上，几乎整个时间都是我们两人坐在一起。这次宴会是小范围的，中国和德国的客人在其他几桌就坐，只有邓的出色的英文女翻译坐在我们的旁边。翻译对邓必须大声说话，这对我倒很有好处。

开场白之后，我感谢他亲自促成邀请我访华，并对他的 80 大寿和他显然是极好的健康状况表示了恭维。邓回忆起 9 年前我们的谈话，然后回过头来谈他的生日：“说到年龄。你知道，老化一直是中国领导的一个问题，也是苏联领导的一个问题。但 10 年至 20 年之后，中国将有比较年轻的领导人。我们很清楚，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领导人。需要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在 1975 年的谈话，那次谈话之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我回答说：“可是，你又回来了，这是你的幸运，特别是

中国的幸运。你到底被打倒了几次？”邓微微一笑说：“当时是第三次，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他严肃起来，并且很快地言归正传。“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是更加坚决地独立于超级大国，这一点也适用于你们的国家。当然，这不是要反对西欧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但你们不应该把德国独立的战略丢掉，戴高乐懂得这一点，欧洲同美国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肯定没有改变他最近 10 年中的看法。我承认，自从 1974 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深刻地打击了欧洲国家，以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受到了损害，从而也使欧洲对美国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

邓把话题引到苏联，“中国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障碍。苏联实行的政策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欧洲形势怎样？”

我回答说：“自从 1976 年以来，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也恶化了。这部分地与针对欧洲的 SS—20 导弹有关。但入侵阿富汗这件事也使欧洲震惊。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也希望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我们正在敦促限制军备。”

邓说：“我估计，就撤走他们的导弹而言，苏联会不断制造新的困难。不过，美国人也不很明智。他们言行不一。”

“苏联和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破裂了呢？因为苏联不断企图干涉中国的事务，因为莫斯科竭尽全力想控制中国，俄国人想当老大哥。当我们表示反对时，克里姆林宫干脆就撕毁两国的合同。最后苏联完全站在公开反对中国的一边，并企图煽动东南亚国家反对我们。”

我问苏联在越南所起的作用。邓回答说：“你知道，对莫斯科来说，越南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苏联在那里奉行的是和美国在台湾奉行的相同战略。人们一直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的政策同社会主义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多少关系。”

“我感到，就其政治目标和在地球上的进攻方向而论，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按社会主义的理想行事，毋宁说是按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大国扩张主义传统行事。”

“大概是这样，”邓说：“因此我还不信，领导人的变动会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你看，中国在越南的独立战争中始终支持越南，先是抗日，而后是抗法，最后是抗美。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价值 200 亿美元（按当时的价格）的物资，而且是在我们自己需要每一个美元的时候。但几年以后，越南在苏联影响下站到了反对中国的一边，他们把数十万中国人从越南赶出来，以后，又在中越边境一再进行新的侵略。”

“后来，在波尔布特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它们占领了柬埔寨。越南这次侵略的目的是要建立大越南联邦，中国不愿意看到越南在这一地区称霸。因此，我们在 1979 年不得不给越南一次教训。为了使我们正确地被理解，我们重复了几次小规模教训。如果越南继续拒绝从柬埔寨撤军，我们保留再次教训越南的权利。越南这样做受到苏联的完全支持，因此越南占领柬埔寨是我们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我们同越南的关系可以从撤军后的那天起正常化。”

接着，邓谈到老挝，但他一再回头来谈柬埔寨问题。很自然，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我从西哈努克那里知道，他的作用很多取决于中国。就此，我问了邓，回答是：“我们劝西哈努克，柬埔寨从越南占领下解放以后不要回到社会主义。希望他建设一个和平的、不结盟的国家。如果

柬埔寨愿意参加东盟，我们也丝毫不反对。”

当谈话转到日本以后，我说：“按照你们的想法，日本也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正因为日本人懂得，他们在苏联面前是无力自卫的，所以，他们对美国的依赖还要增长。这反过来又必然使苏联恼火。在我看来，日本人似乎面临一个长期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想减少自己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做得太过分，以便使其他亚洲国家不因日本自我武装而感到不安。”

邓表示，中国同日本有良好关系。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是因为日本有一些人想把经济上的强大变为政治和军事强国。“中国对此并不十分不安，但你说得对，这使其他国家感到担忧。”

我表示异议，说：“我经常去日本，但我却并未发现有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如果你原则上主张日本更多地独立于美国，那么合乎逻辑的是，应当允许日本在防卫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性。”

邓表现激动，并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说：“不，不！如果日本想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因素，这没有问题，它已经是一重要的经济因素。但如果日本要在军事上寻求更大的影响，那只会在亚洲引起人们的忧虑。简而言之，对日本来说，谦虚一点好。”尽管邓头脑冷静，对世界形势作了完全切实的估计，但日本过去占领中国的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显然也是一个创伤。最后我问邓中国对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相似的弱点。他们的实际行动同他们口头上说的往往不相一致。没有平等的伙伴关系怎么能起作用呢？中美之间对台湾有分歧，里根有一次说过，台湾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华盛顿在上海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政策一如既往，仍然是摇摆不定的。国会通过一些决议，这些决议所指的方向与上海公报完全相悖。实际上他们还总是以两个中国为基础，把台湾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另外，华盛顿视台湾为自己的基地，他们坚持‘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这是指台湾、以色列、中美洲和南非。

我问：“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有朝一日能否也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邓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也这样希望。”

谈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我把话题转向中国的军人和邓在军队领导中的作用，他当时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虽然他不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也不在政府任职，但他是400万军队的事实上的总司令。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正准备举行建国35周年的大规模阅兵式。

邓表示，军队没有问题。不过，很多军队领导的年纪过大。“但是你看，军队需要一位像我这样一位年纪更大的老将作总司令。”但他考虑几年后摆脱这一任务。如果高级军事领导岗位由70岁的人，总司令甚至由80岁的人担任，这是不好的。团长应当由30岁以下的担任，师长也不应大于40岁。

我觉得他说得太年轻了。我插话说，我想像50岁的人当师长也可以。邓反驳说：“不，这不行。否则师长以上还有更高的职衔，这些更高级别的人就太老了。就是集团军的首长也不应大于50岁。当然，这只能慢慢来。”

我问将领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军队不愿意再有文化革命……我们要使军队现代化，但我们暂时不想为此拿出太多的钱。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再抓军队。”

“其实，我们的核武器目前也只是象征性的，无论如何我们的核武器下

多。我们注意到，苏联的经济失灵同它过高的军事开支有着密切的联系。”

邓最后谈到即将举行的阅兵式，这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阅兵。在庆祝建国之际向公众展示一下中国军队的效能，战士们是高兴的。几天以后，我看到，在阅兵出色地完成以后，将军们是如何互相庆贺。我们从观礼台上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在观礼台一侧——观众看不到的地方——相互拥抱。……

然后是一片寂静。邓小平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走到麦克风前。

他的讲话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所有政治目标。邓只讲了七八分钟，同时发给我们的英译稿总共 63 行。国家重新统一的目标在讲话的第一句中就会出现，在结束的三句话中又重复了一遍并作了阐述：这个目标“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值得注意的是，讲话结束时要求承认教育。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总的来看，邓精力充沛地发表了一篇自信的、坚定的讲话。

随后，邓站在一辆敞篷车上接受司令员的报告。接着，他检阅了集合在长安街上的队伍；他大声呼喊致意和接受雷鸣般的回答。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时，阅兵式开始了，世界上恐怕没有别的平队能比这次阅兵表演更加精确。

我承认，中国这出自我表演的壮观场面也使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正处在他的生涯的顶峰。也许他感到满足的与其说是这一事实本身，倒不如说是他经过不断的斗争的 60 年之后，终于能为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中国的事业服务了，而且是在各方面都身居最高领导地位。在外交方面，和日本已取得和解；香港正处在重新统一的进程中；同美国的关系已经正常化，里根访问了北

京，邓也去过华盛顿。在内政方面，邓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并从而把它引上了发展经济的道路。毫无疑问，按照邓的意志，中国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美]斯诺：

谈谈邓小平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外国朋友之一。1928年来华，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特约记者。后兼任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评论员。曾在燕京大学任教2年。1936年他秘密访问延安，回北京后写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后汇编成书《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轰动国内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39年再次去延安，和毛泽东等交谈。1941年因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报道，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迫离华。解放后他多次来华访问。他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72年逝世于瑞士，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

1970年下半年，斯诺夫妇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和他作了亲切而又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谈到了为什么要开展“文化大革命”，谈到了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分歧，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斯诺依据与毛泽东的谈话，依据他当时到中国各地的参观访问，写成了介绍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名著《漫长的革命》，下面的文字就是从该书中摘译出来的。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时，中国仍处于十年动乱当中，刘少奇、邓小平的冤案尚未昭雪平反，许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现象仍未改变，因此，斯诺当时的报道，不能不带上时代的局限性。然而，尽管如此，通过阅读斯诺的下述文字，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宝贵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有了雏型。遗憾的是，斯诺先生在尼克松总统初次访华的同一个星期里就不幸去世了。如果他活到今天，看到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他一定会更加欢欣鼓舞，写出一部更有份量的反映社会主义中国新长征的新的《西行漫记》来。

从1961年起，刘少奇和毛泽东常常分开，毛本人长时间不在北京（这是他的习惯），而是去访问农村和部队。在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工作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没有同他商量就贯彻实行了。对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和政治局5人常务委员会委员（原文如此，八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5人，而是7人——译注）的邓小平，毛泽东后来这样抱怨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

邓小平可能没有向毛泽东汇报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在中国话里简称为“三自一包”的政策。“三自一包”的意思是：“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增加小企业，自负盈亏，在‘公社’搞包产到户，搞‘个人的企业’。”它的含义是倾向于采取“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接发生矛盾，最后终于阻碍了作为“四清”的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四清”就是在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整风。

到了1964年，经济已经恢复，因此新实用主义干部企图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毛泽东反对他们这样做，在军队的帮助下进行反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军队和农村地区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后来变得更加激进，终于成了在1966年8月宣布的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宣言的基础。

[美]理查森：

10 年风云人物——邓小平

埃利奥特·理查森是美国《世界报》国际版的负责人，曾在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 3 位总统手下担任过内阁部长，是美国政界和新闻界有影响的人物。

1988 年，《世界报》月刊要世界各地的伙伴刊物的主编、撰稿人和发行人评选该刊创刊 10 年（1978～1988）来最代表时代精神的名人，理查森先生经过反复考虑，郑重地投了邓小平一票，并对记者发表了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的谈话。投票结果，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同样多的票数当选。他们两人各得 16 票，里根总统得 8 票，南非大主教图图得 4 票，阿基诺夫人得《世界报》月刊 5 号的文章指出：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最代表时代精神。这篇文章这样评论：“邓小平则给中国共产主义重新定下了定义，采用资本主义方法把中国从毛泽东文化革命引导到‘市场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希望到 21 世纪能使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空前繁荣富强。”

值得提出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被国外有影响的报刊列为新闻人物或给予其他荣誉称号。例如：

1978 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列为当年的新闻人物。

1985 年，美国《时代》周刊再一次把邓小平列为当年的新闻人物。同年，美国《成功》杂志将邓小平选为 1985 年的成功者。

下面是埃利奥特·理查森在投邓小平的票，选邓小平为“10 年风云人物”对的谈话、原文载《世界报》月刊 1988 年第 5 号。

他（邓小平——译注）以自己的远见，魄力和技巧发动了一场新型的革命。他逐步地放下了权力，这种做法是前所未有的，其潜在的影响同样空前深远。

[瑞典]卡尔松：

他是一位声望很高、很有魄力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卡尔松是瑞典王国的首相，1987年，他应李鹏总理的邀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在他访华的第4天，邓小平会见了她，双方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邓小平对他说，“瑞典是个工业国。中国是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指出，瑞典是最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对此，卡尔松高兴地回答说，“我认为，这对我们两国的关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邓小平的谈话给卡尔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见后，卡尔松对记者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我遇见了一位能掌握住国家局势的领导人。

毫无疑问，尽管他年事已高，他是一位声望很高，很有魄力的著名国际政治活动家。邓小平能够代表他的整个国家说话，他流露出绝对的信心，胸有成竹和意志坚强。

[美]洛克菲勒：

他是本世纪的伟人之一

戴维·洛克菲勒是世界著名的大银行家，曾担任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1898年5月，他率领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访华，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据新华社报道，邓小平当时对他们说：“现在要迎着困难前进，保证政策和发展的连续性。”美联社当时也报道说，邓小平在会见他们时表示，在实现现代化和吸引外资方面，中国必须作出更大胆的努力。

会见邓小平后，洛克菲勒谈到了对邓小平的看法，下面的文字译自美联社北京5月24日电。

他（邓小平——译注）言谈举止非同寻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极为坦率富有远见地谈了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证实了我和其他许多人的如下看法：他是本世纪的伟人之一。

[美]哈默：

邓小平将作为一位伟人而名垂青史

亚蒙·哈默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美国石油巨头。他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1898年，他生于纽约，父亲是一位医生。当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时，他不仅拥有医学博士学位，而且已拥有百万家产。1921年，哈默大学毕业后，前往苏联，成为38家美国第一流大公司在苏联的代表。他在苏联居住了9年，其间多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哈默的商务活动对当时困难中的苏联提供了难得的帮助。此后他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届苏联领导人都保持了一种极为友好的关系。

哈默与邓小平相识于美国，1979年2月，邓小平夫妇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在休斯敦西北部的西蒙顿，在当地为邓小平举行的盛大的烤肉宴会上，邓小平见到了来自于加利福尼亚的哈默。当译员按惯例向邓小平介绍哈默时，邓小平止住了译员的话，对哈默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访问。”邓小平的这个表示使哈默非常高兴，他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太大了，坐一般民航飞机我可受不了，可是中国又不让我的民航飞机降落。”邓小平听后大笑起来，说：“这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作出安排的。希望你多带专家来。”

哈默自从在宴会上受到邓小平的赞许之后，对中国市场的向往之情与日俱增。1979年5月。他乘坐自己的波音727专机首次降落在北京机场，并迅速同中方签署了关于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方面的初步协议。此后，哈默几乎每年都要前来中国一趟，并同邓小平见面。其间，邓小平对哈默在中国的活动多次给予方便与照顾。

特别使哈默感动的是，邓小平在1984年帮助他扫除了障碍，让哈默把中国的大熊猫带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原来，1982年3月26日，哈默的美术收藏品展览在北京开幕以后，他在会见邓小平时首次提出了空运大熊猫的想法。哈默说，大熊猫伴随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体育队伍，出现在奥运会上，会使洛杉矶人民感到高兴，并且对中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大有裨益。当时中国的法律禁止大熊猫向国外输出，各种各样的美国代表团来到中国洽谈，要求中国同意把大熊猫送到奥运会上去，也都碰了钉子。但当哈默向邓小平提起这一建议时，邓小平立即看到了这个主意的价值，所以答应将指示让大熊猫出国，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一架波音747飞机将大熊猫和它的饲养员从北京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并受到了如同国家元首所受到的那种隆重热情的接待，在奥运会之前，哈默还牵头为大熊猫赴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

下面的段落摘自哈默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材料来源于第9499期《参考消息》。

中国现领导是本世纪少数几个伟人之一。而他目前在中国城市进行的改革必将成功。

正像上次旨在改善乡村与农民生活条件的农村改革一样，中国这次的城市改革也一定会取得成功。这些改革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之国民经济，给予各级管理部门更大的行动自由，并将大大提高城市工人的收入。这些改革在三十领域产生积极影响，即把管理知识、外资与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这正是西方石油公司目前在山西煤矿做的三件事。

中国偿还了其全部债务，并一向在履行契约方面很守信用，西方石油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将会证明是明智的。

邓是一个卓越的人，他将作为本世纪所产生的一位伟人而名垂青史。
邓将率领中华民族走向富裕之路，并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共和国。

邓正在向中国引进许多健康的东西——所有资本主义的优点而不是缺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所有的银行、铁路及大工业还属于国家所有。

[美] 索尔兹伯里：

我敢打赌，他能使中国腾飞

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是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曾任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现为全美作家协会主席，1908年11月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1925年中学毕业后，曾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后退学，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30年至1948年，担任合众国际社记者、编辑。1949年3月，出任纽约时报常驻莫斯科记者，达5年之久。1961年以后，历任纽约时报编辑、助理副总编辑、副总编辑等职。二次大战期间曾深入前线，遍访前苏联广大地区，著有《列宁格勒被团九百天》等作品，闻名于世。曾获得国际普利策新闻奖等奖励及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1972年以后，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1977年，他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1985年10月，索尔兹伯里在美国出版了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立即引起全美轰动，并在欧洲、亚洲一些主要国家被翻译出版。该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后，成为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为了写作此书，他于1984年专程来到我国，不顾年迈有病，怀揣心脏起搏器，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并访问了胡耀邦、李先念、杨尚昆、肖克、姬鹏飞、肖华、杨成武、伍修权、余秋里等老一辈革命家。索尔兹伯里在写作此书时，采用了他最擅长的叙述个人轶事见闻的方法，详尽而生动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倾注了他对中国革命和长征精神的崇敬之情；形象地描绘了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精神风貌和各异性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邓小平同志，在题为“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一章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中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久前，索尔兹伯里又发表了新著《天下风云一报人》，在读书中，他专章介绍了邓小平，邓小平“三蹶三起”的政治生涯使他感慨万端。他说：“没有谁在政海波澜中沉浮得如此频繁的了。”他断言，邓小平“能使中国腾飞”。

下面的两段文字分别选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和《天下风云一报人》。

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赣北新建县一处从未启用过的军校校长住宅的小院里，每逢夕阳西下，梧桐树开始投下长影时，邓小平就走出红砖瓦房，开始散步。他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脚步在红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从窗口看着他散步。邓小平当时正被流放，时刻都在看守者的监视之下，她也受到同样的监视。

她后来说：“看着他那坚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一定更明确、更坚定了，他为今后的战斗做好准备。”当年，那些穿着灰褐色制服、身负行李背包、肩挂粮袋、腰挎驳壳枪、脚穿草鞋、目光坚定的人们，为了自己向往的前景而艰苦跋涉，翻山涉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自那时起，漫漫的长征岁月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

看来，他们当时所向往的这种情景在思维敏捷的邓小平的头脑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邓小平这个最不可能（或许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领袖的人，现在却已成了中国的领袖。

当时，邓小平在贵州的五岭、川滇边界的金沙江江畔和陕北的黄土高原并不驰名。1969年他困关在新建县的营房的日子时，邓小平这个名字也不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有气魄。邓多年来稳步地、几乎出奇地上升。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长征后，他曾担任刘伯承师长的第一二九师政委。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战，后作为第二野战军，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下显眼的地方。随后，邓成了毛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总管。1952年，他来到北京，他参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书记、政治局委员。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都不在话下。1957年，他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摊牌。在国内，他的工作是主管农业、工业和教育。

邓小平没有变。他还是襟怀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实实。他察觉到了大跃进的灾难，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他不像另一些人，上庐山时口袋里揣着两份不同的发言稿——彭德怀得势时用一份，毛泽东取胜时则用另一份。

麻烦就在后来。毛泽东后来说，邓小平（和刘少奇）“见了我就像如丧考妣那样”板着面孔。或者像“文化大革命”的一位领导者陈伯达所形容的那样：“要与邓小平平等地讨论问题，比架梯登天还难。”

这就是邓小平，他反击了，他采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麻烦时所采用的办法，作了自我批评，但没有奏效。他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刘少奇。1966年9月以后，邓小平销声匿迹。他被软禁在家中，不许与外界联系。他的孩子们都各奔一方，挨批挨斗，并被送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他的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断了，下肢瘫痪，还不许就医，造成了终身残疾。1968年10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后扶养他成人的继母都被送到江西。在江西，邓小平住在南昌郊外的一所空着的步兵学校里的一幅两层楼房里，那里曾是校长的住房。像当时中国的所有学校一样，这所步兵学校也因“文化大革命”而早就关闭了。

像许多参加过长征的人的遭遇一样，邓小平过了3年这样的软禁生活，他当时65岁，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炉子取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曾在雷诺汽车厂里做过工。此刻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机工手艺。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机厂里劳动，他操作机器，她则擦洗电线线圈。在来回20分钟的路上，每次都有武装看守监护。这条路很滑，邓有时滑倒。他们不许说话，除非得到许可。下午，他们在自己园子里劳动，养鸡，种菜。他们把钱省下来，希望能把孩子们接到身边来。他们最小的女儿毛毛（榕榕）和幼子邓质方（他因皮肤黑而得绰号“小黑人”）在陕西农村劳动。

邓小平没有受过拷打，还获准从北京带些书来。晚上，他看书，有时看马列的书，有时看中国历史书籍，有时看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他的继母做针线活，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晚间新闻。

他们与一起干活的工人们逐步建立了友谊，在这段漫长的监禁期间，邓小平打过桥牌吗？看来不可能。要打也只能3人打，他与疾病缠身的妻子和年迈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继母一起打。像延安时期许多人一样，邓小平逐渐喜欢上了桥牌。一些国际桥牌手认为，邓小平打的牌具有世界水平。上台后，他几乎天天打桥牌，万里是他的牌友。万里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他的老朋友，“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成了斗争对象。据说，

邓小平有时还与杨尚昆将军打牌。另一个牌友是人大副秘书长丁光禄。纽约的桥牌冠军杨小燕与邓打过桥牌，称邓是桥牌好手。他告诉她：“打桥牌使我思维保持敏捷。”他打牌争输赢，但从不赌钱。谁输了就钻桌子。邓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他总是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了起来。由于他的身材矮小，钻桌子对他来说比较容易。

在“文化革命”中，邓小平首先考虑的是他残废的长子的身体和切身福利。1971年，他获准把受伤的朴方带到江西。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条件很差，躺在床上，编织铁丝篮子，挣一点钱。接到江西后，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邓小平夫妇和邓的继母尽力照顾这个年轻人。卓琳尽管自己身体不好，却亲自看护她的儿子，邓给他按摩，并帮他洗澡。以后，邓小平开始请求当局把儿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适当的治疗。直到1973年，邓朴方才获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后，邓小平终

于通过中国当时在纽约联合国的代表黄华的帮忙而得以将邓朴方送到美国去诊治。美国医生说，邓朴方的治疗耽误太久，下肢已无法康复了。他现任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长。

1971年11月5日，邓和夫人被召去参加会议，听政治报告。

自1966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时，邓朴方和毛毛都已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当邓和夫人由武装警卫送到家时，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着母亲来到厨房。在厨房里，母亲悄悄地在女儿手上写上4个字：“林彪已死。”

1974年2月，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长的毛泽东时代行将告终。“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它的破坏性甚于一场战争，工业濒于崩溃，教百被取消，党被搞得四分五裂。刘少奇等许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思维和情绪不稳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帮”同伙暂时受挫，但准备卷土重来。周恩来患了癌症。

毛泽东再次求助于这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本来，毛泽东完全可以像对待刘少奇那样把邓打得稀巴烂，或者像贺龙那样，最后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把邓找回来，说邓“人才难得，思想政治强”。说他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就直接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毛泽东还说，邓是个好战士，懂得如何与俄国人斗。像邓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

随着周恩来的体力逐渐衰弱，邓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事务。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他们说，邓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太缺乏耐心了，邓希望中国走上正轨。他感到时间紧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国已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谁已被害，谁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干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了解人们已付出的代价。正像他自己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一样。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产这种荒唐的做法对经济的破坏，他知道军队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潜伏在毛身边的“四人帮”正在用他们的恶毒思想来影响这位老人的意识。邓深知这一切的危害。

尽管邓小平聪明能干，但他无法拨快时钟。由于1976年1月周恩来的去世，以及后来人们为悼念周而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再次把邓拉下马来。但时隔不久，1976年10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倒台

了。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说服和激烈争论，他再次掌了权。

这就是掌握中国前途的人。他顺平天意、人心，为履行他的职责，他不仅花了精力和发挥了独创精神，而且实践了他在新建县步兵学校院子里一晚又一晚散步时所构筑的完整思想体系。

这些思想说来也很简单。首先，使国家重新走上轨道，把“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压制下去。整顿军队，使工厂恢复生产、让年轻人正常上学，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来，为他们平反昭雪，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有益的作用。

然后，再争取实现最中心的目标：到 21 世纪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中国之外的许多人，中国之内也有一些人都认识不到这项目标的艰巨。靠小窍门和“大跃进”一类的口号是不可能实现这项目标的。中国什么都需要：技术、科学、教育、消费品、食品等等。它还必须制止人口增长，才不致淹没在婴儿的人海之中。它必须使农业增产，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这些任务，邓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网，使他看到了——他带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个没有旧框框的中国真相。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但是此时他们开始公开说，共产党宣言已发表 100 多年了，马克思研究的社会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而且马克思也从未研究过中国，他怎么可能对一个他所处的 19 世纪无法想象的技术高超世界提供答案呢？列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沙皇俄国，而那与 1985 年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呢？毛泽东了解 1927 年前后的中国封建农民社会，那也过去很长时间了。

然而，现在已是 1985 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进。中国也必须有超音速的解决办法，中国必须寻求现实的答案。它再也下能靠口号和空话过日子了。正如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心须随着时代发展。”

这是令人兴奋的想法，仓促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很容易的。老一辈的党员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总书记所说的“新长征”。随着邓小平让那些参加过长征的杰出老人退休运动的开展，军方也越来越急躁不安了。

但是，年复一年，邓小平的劲头越来越大。他在位于中国渤海海滨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会儿，接着对他的朋友说，他感到精神抖擞。他说：“我的任务是设法活得长一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中国。

邓小平在他的新长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这就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像他家那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中国的年轻一代与老一辈人之间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因共同的经历而变得如此密切。不仅像邓小平这样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年轻一代引进了新思想、新见识，他们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识出乎意料地来源于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美国留学。如果现在中国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业、利润刺激、个体化和企业家精神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国后，向他们的父母亲介绍了他们对西方的亲身感受。

在进行新长征的同时，中国实行了邓小平所说的“开放政策”。政治、技术的贸易实行开放，学习外国文化和其他思想体系，学习外国技术，使中

国得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洋为中用的方法。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不像中国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事实并非如此。在唐朝（公元 618 年 ~ 907 年），当时中国的首都还在长安（今天的西安），中国号称有多达一万名外国人。这个大帝国的繁华首都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专家、艺术家、商人、学者等等。随着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衰败，孤立主义、闭关自守、排外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来都不是内向的。它向中国境外，向海外——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吸取各种思想和启示。

正如历史学家李锐所指出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毛“对西方不感兴趣”，他的社会比较封闭，更符合前清的传统。邓则相反，他如饥似渴地渴求新思想，对中国从西方得到新东西非常感兴趣。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

想当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邓小平”当时并不是响当当的名字。诚然，此人我听说过，深知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目标：刘少奇主席被称为“头号走资派”，邓小平是第二号人物，两人被指控为台谋要将中国从共产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等等。

情况就是这样。在我几十万字的访华笔记中，竟没有关于邓小平的一项，我过去从未问过一句邓小平的事。偶尔提及，也只附在刘少奇名后罢了。在我那本《去北京及以远的地方》书末的《索引》里连“邓小平”三字也没有。回首 1953 年 3 月时，我怎么也料不到尼基塔·赫鲁晓夫会继承斯大林；同样，我在 1972 年 5 月，当然也无法预见邓小平会接毛泽东的班。

此后，每当我见猎心喜，又想要发表预言时，就提醒自己记起这个教训：高层政治绝无规范板眼可循。偶然性往往致科学的民意测验为之失灵。谁在 1978 年就能知道 1988 年谁会被选为美国总统？

在 1972 年的中国，没有人愿意谈论毛泽东百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而我的结论是，可能由周恩来继承，因为当时周恩来正精力旺盛，没有谁听说他已身患癌症；毛泽东当时则步履蹒跚，形容呆滞，衣衫弛漫，只是张口对天坐在扶手椅里。我想，周恩来一定已把全国的日常工作大部分接过去了，而毛泽东不久则将撒手而去。但是，毛泽东后来竟掌权达 4 年之久，而周竟先于他 8 个月作古。

我原以为周恩来会有时间从容地收拾“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烂摊子，然后，长征一代的事和人也随而终结。我当时认为，接班的一代势必来自有很大能量的上海领导层，因为这些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随后，我在上海见到了一位叫朱永嘉的；更加强了我的上述看法。他长一头黑发，一身剪裁合体的毛式制服，风度翩翩，思路敏捷，谈锋犀利，我估计他年约三十二三岁。他的头衔很多，其

中一个看似平常却很重要，这就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换言之，他是上海高层领导之一，地位仅次于日后被称为“四人帮”的一伙。

朱永嘉谈话时，眼睛直视着我。看得出来，他由于身居要职，所以能直言不讳，熟悉情况。我们在公园饭店（现名和平饭店）的米黄为底、金碧为饰的餐厅里吃饭。1949 年前，这家饭店是上海一流的英式公寓饭店，如今虽不免有些迟暮的感觉，仍不失为四星级的标准。我们吃得很好，餐巾洁白，

银器照人，侍者来去无声，一盘接一盘上菜。最精彩的要数一道素菜，上面摆着两只用冬瓜雕成的野禽，这种手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上海就是绝技。宴会过后，套间小坐，摆着新鲜水果、上等雪茄、白兰地酒。朱悄悄对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上海的一些事，我一直在这里活动，没有到过别处。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从这儿开始的，这话千真万确。”

他回顾历史说，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是1870年巴黎公社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场革命。

朱永嘉说的是想入非非的那老一套。倘若接受他的基本前提，即刘少奇早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起就是“潜伏的内奸”，那么，其他问题自然不在话下。但是，这个前提也和斯大林式幻想的前提一样离奇，可以说是同一块料子上剪下来的。朱的故事充满《奥赛罗》悲剧的味道，我在莫斯科时对这种病态性妄念已充分领教。那就是斯大林和他那伙杀人刽子手雅哥达、叶苦夫、贝利亚之流拼凑出来的一幕黑暗惊险剧，而此刻朱永嘉却又一本正经地向我介绍他这个令人屏息的故事。

据我回忆，朱永嘉的谈话没有涉及邓小平，证之笔记亦然。

朱和他的上海同伙的野心终未得逞，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却与当时人不在沪的小个子邓小平有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谁能走赢这一局难分难解的残棋呢？结果终以“上海帮”和江青的就缚了事。而朱永嘉本人却是在“四人帮”覆灭一幕中演完了压轴戏才下台的。

毛泽东去世之初，局势发展奇速。谁都清楚：问鼎政权，现在正是时候。毛的遗孀江青于此觊觎日久，早已纠集力量作好准备，但是，那批老革命家，那些长征过来仍然身居要职的少数人，广大军人及一位叫华国锋的态度模棱的政治人物，也在积极准备，不敢怠慢。

北京的老革命家们借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里的谋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于1976年10月7日晚一举将江青和她的3个上海同伙逮捕归案，其行动机密，除核心老革命家外，绝无人知。此时，上海的第二梯队的头头们正严守岗位，待命行动，虽不无疑虑，却蒙在鼓里，他们随即一个个被看来可信的种种借口召到北京，随后被置于老革命的控制之下。

关于朱永嘉最后情况的细节，大部分是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罗杰·加赛德综合各方消息告诉我的。我说不准朱永嘉随后的命运如何，很可能仍在北京狱中。

这个妄图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篡夺权力的大胆妄为集团的野心就此破灭。中国政治的复杂高深莫测，我的观察力只能到此为止。但我早已看出朱永嘉一伙是狂妄之徒。我幸而言中。

不过，我心中设想的情况一件也未出现，他们的设想也没有兑现。真正出现的乃是一出中国式的歌剧《埃伊达》。谁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不是上海的那群野心家，不是想当中国的新女皇的江青，也不是那个行动迟缓、缺乏魅力的华国锋，听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其时实已颠三倒四），曾莫名其妙地指定华为接班人（给他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

当时一跃而登最高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即1972年时众人绝口不提的那个人。

对于1972年我的人物相册上没有邓小平这一页我无须感到歉疚，因为有好几年（自邓小平1966年蒙受侮辱离开北京以来），中国的报纸上就没有提过他一个字。邓消失了，如同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除

了中南海官府禁苑之外，谁也不知这两人的消息，他们从地球上灰飞烟灭了。刘少奇死了，但人间尚不知道；邓小平还活着，人间亦不知。

当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可说无知到了家，甚至连问题也提不出来。只是在1984年我沿着长征路迹采访时，见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的许多敌人，才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其离奇变幻，即使通查中国的古籍也找不出第二件。1972年暮春我刚到北京时（以下是邓小平的女儿——小名毛毛1985年向我透露的），邓的精神开始振奋。回忆他1966年以在囚忍辱之身，和妻子卓琳在北京，日夜受到严讯，备受折磨，接着便不容分说将邓夫妇连同邓的衰年继母塞进一架飞机，武装押送到江西省会南昌，到后，经省长一番训话，随后被送到附近的新建县一所“文革”以来被废弃了的步兵学校旧址。

邓小平一家被关进一栋砖房，这里原是步校校长的住宅，在这穷乡僻壤，他们不准同卫兵以外的人说话，和上级也不通气，几乎不名一文，唯有挺着活下去。邓在附近一家拖拉机厂担任技术工作，这是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到的手艺；妻子干普通工人的工作，清洗电线。他们在屋旁开了一场菜地，养鸡、卖蛋，计划攒点钱把孩子们接到身边。为给锅炉添煤，邓小平动辄要砸碎10公斤左右的大煤块。

邓小平的5个孩子这时分散在四面八方。长子邓朴方聪颖过人，原在北京大学学物理，4年级时，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从四楼推下致伤，腰以下全瘫，当时不给治疗，关在北京北郊一个破招待所里。他每日仰面躺着，用细铁丝编篮子，以此卖钱度日。

1971年朴方奉准来到父母身边，但仍不给医疗的方便，于是邓小平便自己动手给儿子洗澡，按摩腿背。这年，小女儿毛毛也来同住了。邓家永远不会忘记1975年11月5日。这一天，卫兵把邓夫妇带去出席一次党员会。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说不定又是一次批斗会。孩子们等得心焦如焚。中午，父母回来了，一言不发，表情严肃。毛毛看到妈妈递了个眼色，就跟着走进厨房，虽有卫兵们守在屋子里，妈妈还是抓住毛毛的手，在手心里写了4个字，“林彪已死”。接着，她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上。卫兵走后，邓小平极为兴奋，说：“林彪不死是无天理，老天也容不得他。”

局面开始松动了。看守邓家的林彪一帮的官员们被换走了。新来的人来访时彬彬有礼，对过去官方的粗暴表示歉意。他们撤走武装警卫。1972年4月，朴方被获准去北京治疗，毛毛同行。

邓小平一家人就这样生活在这所红砖房子里：自己种园子，邓每晚读一点允许他带来的书，有时是马克思主义的书，有时不是；他从收音机里听晚间新闻，留心时事，十分细心。

1972年12月，他们有一段假期——到新建县西南200里的井冈山去参观旅行，那是朱德和毛泽东开始聚集衣衫褴褛的队伍的地方，后来形成了第一支共产主义红军部队。邓小平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最终打败蒋介石的战斗，1949年10月1日，他和毛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

参观井冈山之后，邓小平和家人又回到新建县旧营房里，重度安静的生活，黄昏时分，落日在院子里照出长长的人影，毛毛从窗户里看到父亲又出来散步了，他绕着院子来回走，每次40圈，他微微低头，背着双手，走在已为他的足迹踩平了的红土小径上，日复一日，不断地沉思。

毛毛回忆说：“看那种又快又踏实、急速的步子，我心里想，他的信念、

想法和决心也许变得更明确、更坚定了，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

毫无疑问，邓小平当时是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如何使国家拨乱反正？一旦他重上领导岗位，应该采取哪些步骤？

1973年4月的一天傍晚，人民大会堂里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宴会。宴会并无特殊之处，这样招待西哈努克是常有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给他打气，一方面也是对付越南和柬埔寨复杂的政治局面的一种策略。宴会一如往常，只是多了一位客人：邓小平。这个小个子（邓身高约5英尺）又出来了。没有如何解释，对以前曾宣布的他是叛徒、坏人、毒草之类的结论也没有撤销。邓只是走了进来，坐在桌边，就好像长住乡居一朝回转似的——情况正是这样，不过另有别义而已。除去周恩来，也许再没有人对中国问题了解得比邓小平更深的了。自从他在老家碑坊村呱呱坠地以来，中国地方很少有他不曾到过的。那个村子距四川广安县郊几英里，在重庆以北60公里。

也没有谁在宦海波涛中沉浮得如此频繁。邓小平身材不高，但1977年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我想象得出他在心爱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子，恐怕连六七英尺的大汉也能对付。几年以后，一个俄国人告诉我邓小平和苏联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身材高瘦）在50年代后期的一次邂逅。两人就苏联式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孰优孰劣发生了争论。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辩士，可是邓小平也很熟悉马克思。事后，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了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邓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两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蒋介石的失败成为定局。

轻视这位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如果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立即改观，如遭电击。1973年我见到他时，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每次邓小平在政治上被击倒之后，他总是重又站起身来——此事屡见不鲜。许多人都谈到邓小平曾三次被打倒。1926年他从法国到达莫斯科（他一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是同班同学；60年后邓追忆此事，说蒋经国“这人不错”）。回国后，他被派往靠越南边境的一个很棘手的地区。他两次卷入党内斗争，但终于无事，于是又逐步得到提升。

长征前夕，邓因受诬告被捕（其真实原因是他支持毛泽东，但控告邓的人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挨了打，受到监禁，每天只给一碗饭，一杯水。他不承认有罪（30年后“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于是又打。一天，他回牢房途中偶遇一位熟悉的女共产党员，便对她说：“我快饿死了”。她买了两只鸡，煮了让卫兵送给他吃。迫害邓的那伙人剥夺了他的职务，派他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执行任务，想借此害死他，诬告邓的主谋劝邓的妻子和邓离婚，改嫁他人。

邓小平多次被打下去，以这一次最危险。然而他还是活下来了，当时他的敌人怕他投靠蒋介石，因此又把他当作普通士兵让他归队了。长征开始时，邓和其他士兵一样，扛着背包，20磅重的粮袋，40磅的子弹，外加步枪，传说邓曾编入5000人的挑夫队，负重200磅行军，看来不准确。但无论如何，邓那一路的负担是够重的，幸好当年巴黎雷诺工厂和法国火车上司炉的劳动早已锻炼了他。毛毛所看到的父亲在兵营院子里迈着一圈又一圈轻快的步

伐，正是长征锻炼的结果，那些年里他学到了很多。

1974年我听到有关邓小平的第一个评论是：他行动迅速。我的中国朋友对我说：“有时他的行动过快，我目前担心的正是这个，他可能会出问题的。”当时，邓小平刚刚成为周恩来的第一副手。

果然，他不肯像蜗牛那样爬行，正像他改不了他的四川辣子脾气一样。毛泽东批评说，邓是聋子，却故意坐在房里后边，为的是不听他的指示。但毛泽东也说过，邓是“绵里藏针”，尖锐、温和兼而有之，是“少有的能干人”。邓很有主意，遇到难题他总能找到可行的办法。他是一个好战士，对抗苏联的好战士。“人才难得嘛”，毛泽东这样说。

邓小平的确行动迅速，这可能和他的身材有关，他认为在法国留学那几年使他生长受影响，当时他当工人，每天往往只有一杯牛奶、一个羊角酥充饥。不过，他从此爱上了羊角酥。1974年他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归途经巴黎，买了上百个羊角酥，带回国分赠周恩来和其他当时和他同在法国的同志。

我逐渐知道了更多关于邓小平的事情。他是在很不得意的时候参加长征的。不过，后来又走运了。1935年，毛泽东取得领导权时，把邓从基层提拔了上来，使他重新登上个人升迁的漫长道路，1935年10月，长征结束时，他已经是毛泽东所信任的年轻助手了。1944~1945年，他在著名的一二九师任刘伯承的政委，在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师扩为第二野战军，准备与蒋介石作战。1949年，毛泽东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提名邓为中国南部广大地区的地方长官。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一路的一再升迁，反而使他1966年一跤跌得更重。1974年，他东山再起，从生病的周恩来手上接管了政府。1976年周恩来逝世，他再次坠入深渊。要不是毛泽东刚好逝世，他肯定早就完蛋了。

夏洛特曾问一位中国官员，他们为什么如此尊重邓小平这位上上下下那么多次的人？那位官员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信任他的原因！”

1976年是他的生死关头；他像启明星一样坠落了，他能否活下来，谁也不能肯定。他有一个有利条件：跟红军老战士关系都很好。邓小平重新掌权后，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当中央军委主席，曾谦让说：“应该由你们军人来当！”但是军人们笑着说：“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嘛！”当邓备受江青迫害时，曾受到广东和华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许是红军中最强悍的司令员之一。在军中被称为铁甲车。邓在广东时，还得到省委书记韦国清的支持。不过，如果江青获胜，这一切也就没用了。军队暂时保护了他，他在北京时，得到叶剑英的暗中支持。叶在军队里的地位仅次于卧病的朱德。其他坚定分子也秘密站在邓一边，包括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

1976年，中国的三大领袖相继去世——周恩来逝世于1月，朱德元帅于7月，毛泽东于9月。邓不搞个人崇拜，走遍中国，看不到邓的画像和塑像。邓的老家旧居住着3户人。没有关于邓的纪念馆，没有邓主席的小红本语录，不在墙上题词，也不写诗。他不接受采访，拒绝别人为他写传记，他不愿引人注目，不喜欢别人像对毛那样吹捧他。他天生平易近人，他喜欢玩桥牌，从延安时代就养成了这种癖好，这都是由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些美国人传进去的。不过，邓不是一般的玩角儿，他可是世界级的，每战必胜。他每周和一些老朋友，如万里，玩上两三次桥牌。

邓说过：“我玩桥牌时，思想集中，这样，脑筋就可以得到休息。”邓

还喜欢游泳。他对朋友说：“我能游泳，尤其在大海里（北戴河的黄海），这说明我身体健康，我能玩桥牌，说明我还头脑清醒。”他在法国时，爱上下足球，有一次曾把上衣当了，去买一场大赛的门票。近来就只在电视里看比赛了。75岁以前，他每天都洗冷水澡。毛泽东也喜欢游泳，冷水浴和体力锻炼在中国是和革命活动紧密相连的。毛泽东早期写过一篇谈体育锻炼的文章。邓小平出身于健壮的客家血统，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个小分支，许多世纪以前，从北方移民到南方，散居香港和广东一带，人数很多。他们一般身材都很矮小，皮肤偏黑、面色红润。客家妇女头戴有边的灯罩形帽子，邓出身中农家庭，父亲领导过一支地方自卫部队。

以上就是1972年时无人提起的那个小个子的背景。这个人绝不是一个可以常处人下的人物，毛泽东逝世后，他用了大约两年时间上升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他当日在兵营院子里每天散步40圈时推敲出来的实用而大胆的计划，现在要付诸实现了。那是一种快行道计划，打破了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常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两者中更近于中国式，也就是中共传统所谓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即按照中国的需要而实践的共产主义（这正是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不喜欢、不信任中国的原因之一）。

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的意思是：为了使中国在2000年达到技术合理化，准备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如果这样做要放弃毛的蓝蚂蚁式的公社而代之以个人耕作和个人利益的办法——好，那就这样做吧。我在循着长征路线深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看到了效果：兴旺的市场城镇，雨后春笋般新盖的私人房屋，密如柳枝的电视天线，涂红嘴唇的姑娘匆匆来往于稻田之间运谷子，5000年来，农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如今的口号是：“让农民富起来——让中国强起来”、“致富光荣”。

邓向外资敞开大门，搞私人企业、合资企业、“经济特区”（中国和外国企业家可以自由贸易的地区，经营方式颇像香港，而与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作法大不相同）。

上海、天津、沈阳出现了新的股票市场，私营贸易、私营商业、私营餐馆、私营美容室、私营船舶公司，与工厂工人们订立生产合同。形势发展之快大有使中国喘不过气来之势，甚至邓小平自己也可能没有料到。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上刊登股票市场的消息，还有桥牌栏目、美容指导、高级国际型饭店、十三陵附近的高尔夫球场等等，说实话，这也使我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出现了贪污、腐化、卖淫、黑市场、走私外国色情书籍、录像带等现象，不一而足，我初次看到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新面貌时，不禁为之眼花缭乱，我发现蓝蚂蚁般成百上千的农民弯腰在稻田里远看分不清男女的现象已经不见了，江青的8个粗糙的样板戏（包括《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的哀伤调子谁也听不到了。

我想不出有谁比邓小平更合适来领导中国通过捷径来克服“文革”造成的破坏，激励11亿中国人完成“新长征”了。

我不敢说邓小平是否能完成所有的目标，但我敢说中国没有人比他更胜任这项任务。1986、1987年这两年，中国发生了动荡，邓小平精选的主要助手胡耀邦被迫辞职，几位自由思想、较有才干的作家受到一些冲击，对青年也进行了约束，并对经济过热现象刹了车。当时我并不觉得邓受到威胁，更可能的是，邓和他的红军老同志们决定，在中国猛地腾飞之前把它往回拉一

把。

我有点相信新的模式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的。尽管邓在政府中发言权最大，但他领导的毕竟是各方人士共同参与的政府。我无须担心老党员们在深圳看了在中共清教主义庇护之下的港式夜总会、舞厅生活之后，会起而反对邓。相反，在我看来，他们是替邓完成了任务，他们支持邓，不反对他。

因此，我认为中国将继续走邓的路线，这是他在江西被软禁时于庭院散步时精心规划出来的。这条路线使他近年来 3 次被选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其中一次摘用我写的《长征》书中片段作配合文字），还出现在《成功》杂志颁发的 1985 年杰出人物奖的名人录上，后者是美国的年轻经理们办的。为此，我替《成功》写了一篇短文介绍邓，标题是“中国的首席行政负责人”。

他确实有成就，是一位地道的首席行政负责人，我敢打赌，他能使中国腾飞，走向某种新型经济，仍称社会主义，却吸收了很多自由贸易成分，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得以稳步跻于那些蒸蒸日上的太平洋流域经济诸强之列，如日本、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而 21 世纪正是属于他们的。

[美] 卡尔逊：

“思想像芥末一样辛辣”的政委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海军武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从此揭开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序幕。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9月6日，朱德总指挥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邓小平与任弼时、左权等一起，与之同行，经陕西蒲城、澄城、全阳，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

这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第三次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在此后的18个月里，他对中国各个抗日战场进行了认真考察。

当时，八路军总部过太原时，周恩来把邓小平找去，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邓小平受命后，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人，单独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太原失守后，从太原城外围溃退下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沿着大路、小路，仓皇逃跑，以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就在此时，在邓小平的率领下，一支佩带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带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地总会的干部队伍，仍然挺进在太原西南方面的大道上。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领这支劲旅驰骋在抗日战场上。从此以后，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不久，刘、邓一起共同指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他们指挥的部队，也发展成百万大军。

1937年冬天，卡尔逊第一次来到华北：1938年夏天，他从延安出发，又一次进入华北敌后。两次巡游历时数月，足迹遍及5省，他这种置生命危险于不顾，纵横奔波于敌后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卡尔逊仰慕八路军的抗战精神，为了使他进一步了解抗战实况，毛泽东指示刘白羽、欧阳山等人陪同卡尔逊巡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卡尔逊等一行到南宫后，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前去看望，并进行了座谈。这位个子瘦高、脸被晒得黝黑的上校军官，问了许多有趣而又奇怪的问题，邓小平都十分巧妙、准确地作了回答。邓小平的精明敏锐、犀利谈锋和领导魅力给卡尔逊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40年，卡尔逊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该书所记述的就是18个月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游历中国的见闻”，堪称抗战初期中国各战场考察实录。在该书《孔夫子故乡的战斗》一章中，卡尔逊以简练、明快的笔墨描述了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这是西方人撰写的首次介绍邓小平的书籍。

经过5天的艰难旅行，我们来到了南宫。很高兴再次见到徐向前，他还像我们在辽城见面时一样的谦和、笑容可掬，但是他瘦了，看起来很疲倦。

这是一个水果之乡。我们停留两天时间，在谈话时，小鬼们就端来桃子、梨子和苹果。朱德的副政委邓小平（邓小平在抗战期间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一二九师政委——译注）正在这里视察，他也参加了谈话。

这里有冀中地区缺少的一种沉着的信念，我分析其中的差别，断定这是由于这里的领导者不露声色的自信。这些八路军坚信自己，在为生存而斗争

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考虑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盘问题。他们的想法明确、清晰，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运用它的能力深信不疑。

徐向前告诉我说：“那是在9月，这个地区一些城镇的代表来到我们师在辽城的司令部，请求帮助他们组织游击队。当时我们在山西正忙得了可开交。仅派了3个受过训练的人员同他们一起回去，但没有携带武器。几周后，又派了24人，到了1月，又调去了4个连的部队。这些力量足以把巨鹿和南宮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我们在这一带建立一个根据地。3月，宋任穷带来了一个骑兵团，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4月，在上党堡打败了日本鬼子之后，我带着主力部队来到了这里。”

“你们怎么在上党打败日本人的？”我问。他回答说：“那是3月31日，大约3000名日本鬼子的一个纵队随同一列载有180辆卡车的火车向前推进，通过一个关口进入山西。我们向其侧翼突然发起攻击，打死了近千名日本兵。最精彩的是我们烧毁了他们的全部卡车。”……

在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吃着水果。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对外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到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开始了，持续两天的瓢泼大雨延误了我们的行程。这也使我有更多的机会与徐向前、邓小平二人交谈。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原文如此——译注）。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身材矮小，胖墩墩的，身体很结实，头脑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熟悉情况的广度令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我问道。我了解，美国人的情况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8个月当中，当考虑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的无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心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杀戮和蹂躏。

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我向他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

“日军只占据铁路沿线的城镇和我们南边的大名。这一带的土匪已经消灭。但是南面情况不大妙，不过还好，大名与黄河间的5个具有个不错的领导人。他叫丁树本。我们给了他一些帮助。”

他想知道我打算如何回到汉口去。

“我想在山东了解一些情况，”我回答，“然后希望能找到一条穿过黄河和郑州以西地区的路线。”

“如果你难以找到护送部队，就再回到这里来，”他说，“我总能找出办法让你通过的。”后来，我用上了他的许诺。

[美]布热津斯基：

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

兹比洛纽·布热津斯基是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中美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由于他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起的杰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坛上声名遐迩。他又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反共理论家，他因发表《大失败》一书，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全面攻击而在国际反共舞台上声名大噪。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就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有关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

布热津斯基是在5月下旬来到北京的。在访期间，他会见了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宾主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阐述了本国的立场。卡特高度评价了布热津斯基的北京之行，说他“对北京的访问是十分成功的”。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权力与原则》中，生动地论述了他同邓小平会晤的情景。他写道：“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邓小平在京宴请布热津斯基时，布热津斯基曾希望能在华盛顿他的家中回请邓小平一次，以答谢邓的宴请。邓小平当时愉快地接受了。

随后，不到一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并果然信守诺言，一下飞机便到布热津斯基家里作客。

邓小平到布热津斯基家里作客，是在他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

第一次到美国是在1974年4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资源大会，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引起了全场轰动。在那以后刚好两年，他再次蒙受冤屈，被撤销职务，中国也随之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第二次到美国是1979年1月28日。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也是对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回邓小平抵达美国后，受到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等的热烈欢迎。风尘仆仆的邓小平稍事休息，便驱车来到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参加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庭晚宴——吃烤牛肉。

宴会上，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却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布热津斯基又对邓小平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这是一个敏感而颇有些难度的问题，然而邓小平哈哈一笑以后，马上带着巨人的幽默与智慧答道：“是的，我也碰到了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这样的回答，自然是布热津斯基所料想不到的。他如果先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话，他极有可能会避开这个“愚蠢”的问题。

头年春天，由于国务卿万斯抱怨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公开言论妨碍了自己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卡特总统一度让布热津斯基躲在幕后，从而降低了他的形象。此种情况直到布热津斯基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后才有所改变。邓小平到布氏家作客，分明是在公开赞扬布氏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给布氏一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几天后，他在办公室会见记者时，激动地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宴！”“我是说，这的确相当惊奇！”下面这段文字，是从《美中建交前后》一书中摘译的。

1977年1月初，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罗斯福室设宴，招待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联络处负责人。席间，中国客人直截了当地邀请我访华（我曾悄悄地通过迈克·奥克森伯格促成这次邀请），并且在记者面前重复了这一邀请。我回答说，我会高兴地加以考虑。这个答复引起了国务院与我之间发生了一场我应否访华的拖沓斗争。席散之后，当时在场的霍尔布鲁克和哈比卜立即打电话给奥克森伯格，就此提出了一些问题：万斯打电话给我，情绪相当激动，认为我去中国会削弱我们在同中国谈判方面所作的努力。我听了很恼火……指出，中国人以不拘礼节的方式邀请了我，我以同样不拘礼节的方式作出友好而肯定的反应，但又不定日期，这是恰当的。他最后同意了关于我感到高兴并愿意在某个时候访华的若干提法。

1978年5月20日中午，我抵达北京。我们一行10人，包括我的夫人在内，为了使中国参加到我想要推进的关于建立更广泛关系的会谈中来，我们中的4个人准备向中国人广泛地介绍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专谈我们对苏美均势的估计及由此产生的战略问题；国防部的莫顿·艾伯莱莫维兹，全面介绍军事情报，并提出两国军事代表团互访的建议；国务院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专谈扩大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在费兰克的新闻班子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本·休伯尔曼，专谈扩大科学合作，包括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博士可能访华的问题。我在中国事务方面最亲密的顾问米切尔·奥克森伯格则直接与我一起准备我所要作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全面介绍，这一介绍是我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更为直率的讨论的序幕。

当天晚上，外交部长为我举行正式晚宴，席间互相祝酒——我们祝酒时措词谨慎，以示我们意图的严肃性。

星期天早晨，我们先去参观毛泽东的纪念堂。看到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学俄国人的作法，将他们的革命领袖的遗体作了防腐处理并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对于所谓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风格，这个上午余下的时间用于与中国外长进一步交换意见，他介绍了中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下午，我参观了紫禁城。这种宫殿与手工艺品卓越非凡的组合，使人们理解到中国本身一直就是一种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比，相当不同寻常而富有特色，然后，我与邓小平副总理第一次会谈，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顿精致的便宴，仿膳饭馆设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园，前面有个小湖。饭罢，去听京戏，上演的都是传统的京戏，显然与最近对外宾的做法不同。

真正的协商和确实重要的交换意见主要是在与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会谈时进行的。5月21日下午4时零5分至6时30分，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邓。会见后不久，如上所述，他把我带到一家饭店，在那里我们继续讨论，气氛更加无拘无束，一直讨论到很晚。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在会见中国外长时，双方代表团在长桌两边相向而坐，但在这次会见中，邓与我却并排坐在扶手椅中，邓在我左边，他那照例必备的痰盂在他左边。伴我前往的只有迈克·奥克森伯格，他能讲中国话并做详细记录，在座的还

有伦纳德·伍德科克大使。代表团其他成员对未能列席都没有意见，只有霍尔布鲁克因未能参予这次会见而就个人特权问题大作文章。然而我受到总统明确指示的限制，要使会见保持在小范围内，并保守机密，那么大使显然应该排在他的前面。

会见是从邓的一句关怀话开始的。邓说：“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说：“我感到振奋。”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情绪。在继续寒暄几句以后，邓就言归正传了：“中国方面直截了当他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我回答说：“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然后，我便一头栽入我在与外长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问题。我对邓说，总统要我转告他，“我们准备不仅就国际形势，不仅就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推进同样的目标或抗拒同样的危险等方面认真进行会谈，而且准备开始就两国更直接的关系问题更加积极的会谈。”

邓小平待怀疑态度。他说，“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他又说，“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到什么呢？”回答时，我试图让邓了解我们对盟国的义务，也了解到我们在国内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困难。我谈得相当长。我说：

“在和阁下讨论以及在这小范围内保密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说，总统本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延迟解决……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某些国内问题和某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必须加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复杂、困难，在某些方面相当带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找到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种方式的原因，尽管我们承认这是你们的国内事务，我们是按照上海公报的精神这样做的。

“总之，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美国是可以信任的，尽管我们正在继续并加紧自台湾作军事撤退，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将以不致造成我们共同的敌手可能加以利用的不稳定状态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在解决正常化问题以及在规定我们与台湾人民在此历史转折时期的全面关系时，都必须将这一情况牢记在心。”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试图将交换意见变为朋友问的真诚对话。我即席发言，将全球性、战略性和双边问题交织在一起，逐渐接近正常化问题，以便探索中国的灵活性，然后，再回到不致引起重大争论的全球问题上来。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向邓讲清楚，在这个“历史转折时代”（我有意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字眼来描述台湾在以某种方式最终重新统一之前所处的分隔状态），即使在正常化以后，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在进一步交换若干意见之后，我继续说：“我受命向你证实：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点，并再次重申上届美国政府向你们作出的五点（承诺），我愿意再次重复自我来到北京已说过好几次的話，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已下。”

我接着提议下个月双方就正常化问题开始高度机密性磋商。邓立即代表

中国接受这个建议。尽管他忍不住最后挖苦了一下：“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些。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随后，我们的话题又回到国际形势上来，邓粗线条地重申前一天他的外长的意见。他强调中国对得到更多美国技术怀有兴趣，尽管他对美国不像会给予合作表示关注。……

我们继续讨论战略关系问题，邓小平坚持说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对美国没有好处。我指出，会谈旨在实现战略稳定，它是与重振防务的努力并用的。邓没有被说服。他说，“坦白地对你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们去跟苏联缔结条约，总是美国方面作出让步，总是讨好苏联的产物。”我觉得，这该是我们稍微讽刺一下对方的时候了，因此我说：“在对付苏联方面我们并不天真无知。过去 30 年来，反对苏联霸权图谋的一直是美国，其时间大致相当于你们的两倍，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要是从上面这番概述便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交换意见时言语尖刻或互相攻击，那就错了。交换意见过程中确有争吵，但整个趋势是积极的。邓关于正常化的评论也不像外长那么僵硬，他并没有作实质性让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灵活性。邓没有驳斥我关于美国和台湾的某些说法，自那以后，我们更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尽管我们的谈话更多有个人性质。我们在谈到各自的家庭时，邓不住地往我的盘子里放引人开胃的美味佳肴，我们频频举杯祝酒，邓对他有兴趣访美作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还作了一项神秘莫测的评论，大意是说他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 3 年的时间了，他这样说时，似乎在强调美中关系的进展有某种迫切性。我告诉他，我希望能 在 华 盛 顿 的 家 中 回 请 他 一 次，以 答 谢 这 次 宴 请，邓微笑着接受了。

[俄]巴拉赫塔、库兹涅佐夫：

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革命生涯述评

巴拉赫塔与库兹涅佐夫是前苏联知名的学者。他们合写的《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革命生涯》一文，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邓小平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对邓小平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对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前苏联，曾经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榜样，中国的先进分子正是通过十月革命的影响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向前苏联模式看齐。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大胆开辟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使中国在短短的时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使邓小平的名字为全世界所注目。前苏联的许多有识之士反过来开始向中国学习成功的经验，希望能从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的文章是这些前苏联有识之士的代表作。文章成于 1989 年邓小平—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晤之后、前苏联解体之前。文章的作者希望中国的经验能为苏联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然而，文章发表后不久，前苏联就解体了，这是文章的作者始料未及的。

本文是从 1989 年莫斯科出版的《人们在议论他们（国外活动家的政治肖像）》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周恩来的战友，是中国改革的倡导者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者。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目的就是消除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后果，使中国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前进。

中国的大规模改革令全世界瞩目。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验实验已经进行 10 年多了，不同寻常的探索仍在继续，并且正在克服在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邓小平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不会有成效，因为会遇到人为的障碍。他认为，党政机关的关系问题和在维护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划分两种机关的职能问题，应当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

一个国务活动家的英明之处和现实主义态度恰恰表现在，他能在自身中找到勇于放弃自己过去那些不正确的并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意见的力量。显然，在邓小平的身上，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品质是融化在一起的。1988 年苏联出版了他的选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贯主张中国要革新，他不怕承认失误，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奉行旨在巩固世界和平的方针。

无论过去和现在，邓小平不同意夸大他个人在中国大规模改革中的作用。几年前，这位中国领导人在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些事情，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实际上，邓小平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是一位具有坎坷经历的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有过上升和下降，有过胜利和失败。他关于中国改革的构想并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的。看来，作为具有务实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的一位大政治家，这一构想是在合乎规律的过程中产生的。

作出一项战略决策是很难的，特别是当这项决策同被神化了的领袖的指

示背道而驰的时候，更是如此。作出这种决策已经很不简单，更何况随后在 60 年代初期，继而在 70 年代中期，最后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又要在中国贯彻它呢？更加困难的是，他提出的政策不仅与领袖的方针不一致，而且甚至与他自己不久前还深信不疑并且是在中国革命的旗帜下为之奋斗的东西不一致。

由于这种“离经叛道”，邓小平这颗巨星看起来似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天空中永远陨落了。然而，与这种估计相反，他又重返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岗位，并且一次又一次使中国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摆脱了“兵营式共产主义”思想和以“大跃进”来克服长期落后状况的唯意志论的计划。

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的内外外交路线的基础是什么呢？要知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始终不渝地走自己选定的路，而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在几年内就使一个拥有 10 亿人口的大国彻底改变了面貌，并且展示出完全可以实现的前景。是在什么时候他第一次看到并意识到：靠大跃进和行政命令的方法不能使中国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使半饥半饱的 10 亿人有吃有穿？是在什么时候他突然意识到：绝不能指望步枪万能，而原子弹也绝不是“纸老虎”？

应该对这位中国领导人作出公正的评价：他敢于抛弃僵化的教条，给予那些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批评改革的人以坚决的令人信服的回答。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可能是在革命斗争中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年代中磨炼出来的。

1920 年 12 月，法国的“波尔托斯号”轮船停靠马赛码头。在抵达马赛的旅客中，有一群中国青少年，其中 16 岁的邓小平以其个子矮和年龄小而显得十分突出。看来，他迈出这一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20 年代初，中国正值动荡不安的时期，伟大十月革命的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传播。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已开始出现。这一时代及其脉搏不可能不在邓小平的心中引起反响。知识是需要的，于是，邓小平决定到西方去求学。

在遥远的巴黎，这位青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从家中带来的钱和政府发给的助学金只够一个短时期的费用。所以，他下得下靠自己的汗水去挣钱糊口。邓小平在“雷诺”汽车厂打过工，双手挥舞过司炉的大铁锹，在小餐馆当过服务员。在那个时代，邓小平洞察了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之后，作出了一项决定他后来整个命运的选择。1922 年，他在巴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于 1924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当时，他和周恩来来往在一起，他们结下了牢固的友谊。这一友谊后来不止一次地使邓小平得以摆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到的挫折，成为他坚持自己观点的强大支柱。

邓小平开始在旅法中国工人中间散发传单，由此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绰号，并且不久就显示出他决不是一个“小小的”组织者和地下工作者。

1926 年 1 月 20 日，法国当局决定把邓小平驱逐出境。他被指控组织谋杀另一个旅法中国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何鲁之。警察搜查了邓小平及 2 位同乡的住所。搜查记录表明，警察发现了油印机、报纸和一些书籍，其中有布哈林的著作。

驱逐令还没有到达被驱逐者手中，邓小平就已取道柏林前往莫斯科了。

邓小平开始了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自 1926 年起，他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后来转为中山大学的学生。他在争论时言辞激烈，加上个

子不高，因而同学们都叫他“小钢炮”。他在莫斯科的时间并不长，1926年，邓小平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邓小平开始了一个地下工作者——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在那火热年代的斗争旋涡里，他走过了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道路，取得了政治、军事和外交工作的经验。在国内战争时期，邓小平参加红军的伟大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和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一起指挥过许多胜利的战斗。总之，邓小平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战斗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邓小平担任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邓小平尽量维护毛泽东在党内和国内的威信。1951年，他在为纪念中共成立30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党与中国人民建立这样深厚的联系，是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他们（人民群众——作者注）把毛主席当作他们的大救星。”

后来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从世代代沉睡中醒来的人民迸发出的冲天的革命干劲，苏维埃国家兄弟般的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所有这些，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他们幻想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了“赶上和超过英国”，幻想在短期内使社会生产增长许多倍。“大跃进”及其产物“人民公社”，意味着在组织居民劳动和生活方面广泛推行军事官僚主义的方法，意味着过早地抛弃传统的社会心理习惯。在人民公社中，按照劳动质量和数量而领取报酬的做法已经被取消，平均主义在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

众所周知，“三年辛苦，万年幸福”这一口号的实践结果到底如何。1961年的工业生产与1960年相比，几乎下降了50%。粮食收成低于1952年的水平。作为旧中国化身的饥饿，已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遍现象。

今天，中国对于50年代末的这场唯意志论的实验已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在国民经济中贯彻与之完全相反的路线，在极“左”的口号下绝非易事。看来，正是在那个时期，邓小平开始批判地思考领袖的“指导”，并且越来越看清楚，必须以现实主义态度来解决国内的紧迫问题。

据说，60年代初，在贯彻“调整方针”的过程中，作为这一方针制定者之一的邓小平，就讲了那句著名的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成为在经济战线支持贯彻执行务实方针的人的一个宣言，但是在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在70年代中期（第一次力他平反之后），这句话成了一些人憎恨他的原因。

“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层中引发了严重分歧。在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分歧的产物。邓小平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1966年底，北京一些建筑物上，出现了“北京大学红卫兵”书写的大字报。邓小平一家人遭到了迫害和审查，并被流放到全国各地。

然而，逆境并没有摧毁邓小平的身心，也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理想的信念。邓榕写道：“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1973年，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帮助下，邓小平从流放地回到北京，重

新担任领导工作。1975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当时实际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开始积极而彻底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国内的形势使他深感不安。他对形势的评价是“今不如昔”，作出这一评价是有充分根据的。邓小平亲自到各地去了解农业和工农生产情况。为了扭转国内局面，他提出了“三自一包”计划：扩大自留地，扩大城乡自由市场，扩大自负盈亏小企业的数额，包产到户。

邓小平概括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应当成为中国的主要任务。但是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应该居于首位。

应当承认，并非每一个人在经受迫害之后都敢于坚持曾经被领袖批判过的观点，况且这种批判就像咒语一样，通过大众的传播媒介已为每个中国人所知晓。可是邓小平却在自身中找到了重新奋起捍卫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捍卫市场、自留地和个人积极性的力量。他对国内形势作出现实主义的评价和为使国民经济摆脱严重危机而提出的务实的建议，是同毛泽东及其亲信（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上台掌权的）的极“左”的唯意志论路线背道而驰的，其实，在邓小平重新任职的第二天，他们就掀起了反对他及其改革路线的宣传运动。

那时、中国领导层中的尖锐的思想冲突，常常可以从发表在报刊上的用隐讳的语言写成的重要文章中透露出来。1976年4月，一场政治风暴又降临在邓小平头上。4月5日，清明节，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悼念变成了一场政治大示威，出现了骚乱。制造骚乱的罪名强加到了邓小平头上。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中国首都“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是在全面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声浪中进行的。号召打倒“资产阶级白猫黑猫论的作者”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席卷全国。这场运动就其猛烈和狂暴程度而言，与“文化大革命”很相似。这位被贬黜的领导人往中国南方某地躲藏起来，避开了兵营式共产主义支持者们的怒潮。

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0月，以坚持极“左”路线而著称的“四人帮”，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一年之后，在一批党内老干部的支持下，邓小平又回到了积极的政治生活中。他又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在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78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作出了一项战略性的决议：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此取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中国开始抛弃了唯意志论的路线，走上了在落后的半封建的国家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之路。

这一转变是不容易的，是经历了阵痛的。为了说服自己的反对者，甚至邓小平的权威有时显得不够用，因为在他的反对者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几年前曾经帮助他免遭“四人帮”的迫害，并且为使他重返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出了不少力。其中的一些人指责他“复辟资本主义”，另一些人则恰恰相反，要求他在国内外政策上向自由化迈出更大的步子。

生活已经证明，在与平均主义和兵营式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的多年争论中，邓小平提出的建议是合理的、正确的。在他的直接参与下，1981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彻底否定了给国家造成10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 error，同时对他在中国革命中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正确而全面的评价。

对于那些企图使中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邓小平给予了坚持回击。在他的直接参与下所通过的文件都一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思想是贯穿中共“十三大”（1987年）所有文件的一条红线。

那么，中国当前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邓小平在与什特劳加尔谈话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在中国，人们把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不能不同意对过去10年改革作出的这种评价。的确，眼看着中国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改革触及到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10年改革的经验还证明：改革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矛盾。

从1979年到1988年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将近10%，工业总产值为12%，农业总产值为6.5%，对外贸易额为17%，这种速度高于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问题是有的，显然，在通向21世纪的道路上，问题也不会少。须知，新事物是在困苦中产生的。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严肃实验已经开始。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报刊指出，未来的5年对中国来说，是从旧的经济体制向新的体制转变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解决对外政策问题方面，中国所采取的全新姿态，是与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70年代末，他重返政治舞台后，为解决台湾和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问题，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一构想已经具体化并取得了进展。

邓小平十分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考虑如何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不止一年了。他认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方式，就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解释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需要顺利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这位中国领袖并不是只顾眼前，他明确地提出了今后几十年的构想。为了加强国内建设，中国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环境。

在这20年内。预计年生产总值将翻两番，人均总产值达到几千美元，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今后50年内，使人均产值达到4000美元。考虑到中国人口数量的因素，这将意味着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邓小平认为，用偏袒式的或者用投票表决式的方法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是根本不行的。邓小平批评了那种认为只需要同两个方面加强外交关系的看法，他主张从三个方面扩大对外联系，即扩大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扩大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联系，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

目前苏中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是贸易。尽管近年来遇到了一些困难，其

中包括世界原料价格下跌，但是两国 1988 年的贸易额还是比 1987 年增加近 30%。近几年来，就像边境贸易这种富有前景的交往形式，获得了特别迅速的发展，当然，这一切还没有到头。我们合作的潜力还很大，一些经济贸易的重大问题待我们去解决。

中国领导人对于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持肯定态度，并且相信，这方面存在的一切障碍都会克服。邓小平指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应该建立新型的关系。中苏政治和经济的新型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并且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邓小平曾经说过：“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他认为，中苏关系完全正常化是中国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一部分，是中国为巩固和平和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的一个新贡献，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部分。1989 年 5 月苏中的高级会晤为此开创了广阔的前景。

[英]霍林沃思：

邓小平是“活着的周恩来”

克莱尔·霍林沃思是世界著名的政治新闻作家。1939年9月1日，她最早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新闻，因而闻名遐迩。她长期担任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负责报道世界上重大的政治的军事新闻，霍林沃思多次访问我国。1973~1976年，她担任《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其间曾多次会见和访问过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她现任香港大学教授，同时兼任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1985年，霍林沃思完成了《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由于该书用以观察、分析、记述问题的基本方法比较科学，态度也比较客观，并且占有作者大量亲身采访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在国际学术界和我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不仅明确指出了“毛泽东还将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世人心中”，而且对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彭德怀等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巨大贡献，对他们卓越的智慧才能和优秀品格都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钦佩；同时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表现了明显的贬斥和厌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霍林沃思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述邓小平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在政治上的沉浮；记述了邓小平在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期间，人民群众是怎样同情、拥护邓小平的；记述了邓小平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下面的内容是从《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中摘译的。

毛泽东热烈支持邓小平复出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在政治上有分歧，因为江比毛更“左”。毛泽东知道江青的长期策略是不让邓小平“上来”，或者最好是仍然“不进来”，以便使张春桥在周恩来逝世后继任总理，而她自己则逐渐升往为党的主席。事实上，毛泽东和妻子的关系，是从1973年8月党的“十大”结束到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这段期间，使负责内政外交的中国部长们最感棘手的问题，虽然部长们当时没有明说。在周恩来总理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乎长期住院后，这种状态更加严重。

1975年1月，权力斗争出人意料地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据说，这是“党指挥枪”的又一措施，但更耐人寻味的则是56岁的上海极“左”派头子张春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或者叫总政委。这两个人——务实派邓小平和极“左”派张春桥——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毛泽东“去见马克思”之后党的主席这一职位的主要竞争者。推迟很久才干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党的主席同时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此前，一直由红军时期的老将们组成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也由党的主席兼任。

最近一些年来，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张春桥都没有统帅军队的经历。著名的1934至1935年的万里长征开始以前，邓小平曾在红军中从戎5年，他在战争时期主要是当政治委员。但在解放战争的最后时期，他成为第二野战军的指挥员之一。1949年春天，这支军队在长江两岸广阔的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运动战，打败了统治者，尽管直到1954年以前，邓小平在名义上仍是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的政委，负责指挥军队，但解放以后，他实际上主要是负

责党务、政务和经济建设。

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以后，有了组织制造和试验核武器的权力，并逐渐从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手中接过了政府权力。毛泽东强烈支持对邓小平的任命，但江青却极为恼火，拼命反对。主席家中的服务人员后来谈到，毛泽东和江青就邓小平问题发生争吵。江青不无理由地认为，邓小平的上台将使张春桥不可能在军队中坚决贯彻坚持“红”而反对“专”的路线。到1974年底，邓小平又接过了周恩来在负责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包括接待所有重要的海外来宾。人们还注意到，邓小平在1974年春天访问法国以后，信心显得更足。这种信心自1973年4月复出以后不断增长。此前他因被包括张春桥在内的极“左”派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罢免，随后整整6年未在公众面前露过面。重要而有趣的是，邓小平对张春桥政治史上的劣迹虽然了解，但在当时他却未曾披露。这些肮脏的内幕直到审判“四人帮”时才揭露出来，其中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邓小平进行的纯粹“莫须有”的诬陷。

尽管如此，仍然难以想象这两个人怎么能在一起共事。后来，一位政治局委员告诉我，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恳求”下大乐意的邓小平为了党的团结和张春桥一块工作。邓因而同意让步，开始与这位新的政治部主任共事。毫无疑问，周恩来总理认为，邓小平坐在总参谋长的办公桌上，自然能对张春桥在军队中支持极“左”派的活动起到遏制作用。当时，许多消息灵通的外交家们一再说，只要极“左”分子们公开表示同意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中的“开放”政策，极“左”分子们就会真心实意地参与。事实证明，这些外交家们是大错特错了。

早些时候曾采取措施，以便在周恩来和国防部长叶剑英生病时进行重大军事决策，处理核武器研制工作以及确保“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于是成立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的三头机构，由党内第三号人物王洪文、副总理邓小平和极为重要、很有希望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组成。但是，这个机构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周恩来毫不隐讳地希望邓小平接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这对压抑了两年（1974~1975）之久的权力斗争的公开爆发起了催化剂作用。尽管他已78岁高龄，尽管他的去世早在预料之中，但举国上下对他的去世依然无比悲痛。江青抓住周恩来卧病之机，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种措施蒙蔽毛泽东主席，以竭力阻挠对邓小平的提升。然而，邓小平提升是在预料之中的自然而然的事。在过去的一年里，邓小平实际上起到了总理的作用。

当时主席本人也疾病缠身，但“内部人士”透露，是因为江青的阻挠，他才没有参加任何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包括向遗体告别、火化以及把骨灰撒在“他热爱的祖国的各个角落”的仪式。并且，人们还注意到，毛泽东没有公开说一句悼念“老战友”的话，尽管可以肯定，他从他常看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失声恸哭。从长安街到八宝山的送葬行列里，中央领导集团的代表仅有极“左”分子王洪文和毛泽东生前的警卫员汪东兴二人。对此，外文官和外国记者们大惑不解。但普遍感到欣慰的是，应总理生前的请求，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了悼词。周恩来总理生

前曾毫不隐讳地希望邓小平接任。

在北京的外国人对邓小平没有被任命为总理、没有公开露面这个情况十分关注。他们相信毛泽东主席最终会任命邓小平担任总理，因为邓曾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悉心栽培。1月末，在一个偶然的机，我忽然发现邓小平又一次失宠了。当时，我想买一张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出版的照片，那是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邓小平与周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在休息室的合影。我查到了这张照片的索引号码，但柜台里面的人硬说没有这张照片，还说他从未听说过邓小平这个名字。尽管我猜测这是告诉我邓小平又一次被清洗了。但我还是想：可能因为我是“好奇的外国人”，没有把名字念准他才对我无礼。于是，我把我的翻译领到这家商店，可店员仍告诉她：“从来就没有叫邓小平的这样一个人。”（直到现在，我仍希望这个人应该受到一些责备，因为他竟如此撒谎）。那天晚些时候，我写了个报道，说邓不会接任总理，他已经失宠，到农村某个地方去了。（不幸的是，这条消息没有吸引住新闻编辑，他们把这条消息大删大砍，然后用到插页里，因而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

1月末的最后几天里，国防部长叶剑英、“财政奇才”李先念继邓小平之后也消失了。这两个人都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密友。同时，高等院校中贴出的大字报也抨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甚至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字），理论刊物《红旗》也大骂“极右分子”。这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引出了一个折衷的结果：公安部长、来自毛泽东主席家乡的农业专家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2月8日，《人民日报》在关于华国锋接见委内瑞拉新任驻华大使的报道中首次使用了这个称谓。在华国锋被宣布由第五副总理跃升到第一位之后，报刊和大字报开始猛烈地批判邓小平及周恩来的其他朋友。大字报指控邓小平“肆无忌惮地分裂党中央”，有一张大字报甚至公开要求“把邓小平拉下马来，打倒在地”。但是，有远见卓识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却连忙用飞机把邓小平接到舒适安全的华南，让他住在广州附近的一个温泉宾馆里。邓小平在那里可以乘坐救护车或警车到处走动，看望朋友们和他的支持者。

江青依仗权势，在北京怂恿人们张贴反邓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报道，对邓小平对她的极“左”政策和样板戏所作的尖刻评论开展口诛笔伐。同时，对邓小平关于强调生产、要求削减工厂和农村中专事政治灌输（称之为“学习”）的专职工作人员的主张开展批判。极“左”的教育方针主张学生要“红”而不要“专”，选拔教师和干部要看他们是否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取决于是否具有专业知识。邓小平对此针锋相对，他在这方面的主张也遭到无情批判。

在报纸和广播上，邓小平是主要的受批判的对象。张春桥甚至说：“要人头落地……，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首先把邓搞下来，然后再对付华。”“四人帮”不无根据地把手中无权归咎于已故的总理。中国人民对总理的崇敬和怀念使他们忐忑不安、忧心忡忡。

众所周知，已故总理的遗孀邓颖超是邓小平的好友和支持者。她在这段时期日子非常艰难。记得3月份在庆祝妇女节时，我在招待会上见到过她。她的朋友们对允许她露面并配给她一辆汽车表示欣慰，但当时没有几个中国人敢同这位即将成为政治局委员的著名孤孀交谈，因为他们怕被人看到她接近而遭受“四人帮”的迫害。

华国锋当上总理以后，三角权力斗争仍在继续。他试图既安抚极“左”

派，又不得罪“老将”们，他还要依靠这些“老将”。

非常奇怪的是，群众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他们在4月初的情明节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毛泽东主席没有到场，但据后来透露：他建议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然后华国锋升为副主席，仍任代总理。很明显，官方认为向周总理献花圈的活动是邓发起的，把天安门广场的骚乱归咎于邓小平。但北京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罪名，因为众所周知，邓小平已经失宠，住在南方某个地方。

江青早些时候曾在党中央里发起了一场要求把邓小平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人民的敌人”“永远”开除出党的运动，由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因而没有得逞。

尽管江青没有能够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极“左”派分子们的权力还是扶摇直上。天安门事件过后两天，江青下令组织一场反对邓小平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普遍认为，只有江青才能使毛泽东改变对邓小平的看法，因为毛泽东曾公开请回邓小平，欢迎他作为周恩来总理的接班人。尽管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许多高级官员相信，江青确曾利用她手下人伪造的假证攻击邓小平。

“召回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比比皆是

仅仅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前，领导集团还尽量做出非常团结的样子。但没有几个北京人为这种表象所欺骗，尽管谁也说不清楚谁将在这场继任斗争中获胜。与此同时，几百万人云集天安门广场，无言而又不安地默哀。一连几天，电台一直播送国歌和关于毛的讣告，讣告念得非常缓慢。

这时，邓小平在许世友将军的帮助下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是对“四人帮”的公开进攻，我们决不能让党和国家“变质”，被“那四个人”毁灭。他和许世友要求他的支持者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与他们斗争”，并说如果胜利了。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万一失败了，可以再拉到山里去，他最后说他们——务实派——至少有广州、福州和南京三个大军区作为后盾，并要求他们千万不要拖延，拖延会使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逮捕“四人帮”后，华国锋主席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但是，也许是性情宽厚，他没有看到与政权俱来的全部危险（尽管他知道政权会带来喜悦），因为他非常缺乏做党和政府领导工作的经验。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觉得，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显得沉着镇静，然而一旦听到不好的消息，他就变得生硬、粗暴、不可接近。十分明显，他缺乏毛泽东那种超凡的魅力和周总理的风度与智慧。这位新主席永远也不会成为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孩子们永远也不会像对毛主席那样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邓小平的支持者——务实派们，原指望逮捕“四人帮”后邓小平马上就能重新上台。可是，当他们听到华国锋号召群众“深揭狠批邓小平”时，都深感沮丧。这个号召没人理睬，到1976年11月——毛泽东去世两个月后，反对邓小平的运动自然而然烟消云散了。许多党的干部说，华国锋将陷入无法克服的严重困难。因

为华当政治局委员只有3年之久，几乎毫无经验，而邓小平在政治局里

已干了 21 年。当时，华国锋的支持者都害怕这位个性坚强、经验丰富的人的影响。

大字报开始在北京街头出现，开始是表示对已故周总理的崇敬与怀念，接着便开始呼吁邓小平复出。“我们要求华主席给邓小平同志一个工作”、“召回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比比皆是，大字报遍布全城的大街小巷、工厂和大学。

北京的 12 月，严寒彻骨。但仍有上千人继续书写大字报，成千上万的人冒着零下气温看这些大字报。大多数看大字报的人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党员，他们想从中得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这种消息从报纸和广播中是得不到的。这些人担心，如果不执行周总理提出的国家现代化的方针，如果不立即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国内就会出现令人担心的局面，这种局面会恶化为危机。“四人帮”的支持者们当然不吃香了，但工、农业生产仍在下降，主要是因为缺乏鼓励和刺激。尽管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们支持邓小平，但许多的年轻士兵却深受极“左”派政委们的影响，那些政委是张春桥任政治部主任时安插的。

不断有消息传出，说邓小平“下星期”或者“下个月”就会要恢复职务。这些消息是中央委员们同一些外国大使谈话时透露

出来的。但是，邓小平却依然没有露面。

1977 年 2 月初，显然是在“凡是派”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强调：“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必须照办；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必须坚持。”这使越来越多的邓小平的支持者深感震惊。特别是在广州，一批高级干部写信给华国锋主席和中央委员会，要求“检讨、批评毛主席犯过的错误”。他们警告说，如果“继续掩饰毛主席的错误”，党就会失去人民的尊敬。

1977 年 3 月，华国锋主席召集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为中央工作会议——译注），参加人员包括各大军区司令员和约 20 位各省的中央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邓小平的问题。会上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但总的来说都同意邓小平回到北京，恢复权力。但邓小平将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形成决议。以国防部长为首的政治局常委们最后同意让各省委领导同志知道，最终将恢复邓小平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也许（也是最重要的），还将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叶剑英和老将们担心（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放出邓小平复职的消息，到天安门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将会出现全国性的大乱。他们安慰“凡是派”说，无论如何，在中央委员会同意邓小平复职之前，邓不会公开露面，而且组织召开中央全会也至少需要 3 个月的时间。人们越来越急切地盼望邓小平的平反复职。3

月 30 日晚 8 点，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了邓小平复职的消息，顿时，整个北京城里，爆竹烟花直上云霄。第二天，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各省领导人也兴高采烈地欢呼邓复出。邓小平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是观看一次足球比赛，当大喇叭宣布邓小平来到时，巨大的北京体育场里，8 万名观众起立欢呼，几乎没有人观看比赛，所有的眼睛都凝视着邓小平。但是，人群也注意到，陪同他的是以前曾公开批评他的北京市市长吴德。

邓小平逐渐掌权

1977年，华国锋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但是，对部级职位的一系列调整已经削弱了他的权力，同时，每次调整又都显示出增强了邓小平在各方面的权威。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以后，叶剑英和他的伙伴们已完全与邓小平同呼吸共命运了。邓小平的政治影响虽然不断增长，但他仍然停留在政治舞台的幕后，不大露面。事实上，他在准备开放“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一直关闭着的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此前，这些院校即使开放，也只是招收激进的学生，按照“四人帮”宣扬的要“红”不要“专”的条件来选拔。邓小平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立即着手加强科技人才的训练，将缺乏工程师和专家去实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

此外，邓小平一直对毛泽东主席关于“赤脚”医生的提法不满，认为这些医生应“接受一些医药知识的训练，穿上草鞋”。起初，这些医生的职责是分发避孕病和治疗一般感冒的药品，但后来他们不经任何训练就开始治疗复杂的疾病。邓小平还进一步起用在“四人帮”统治下蒙受冤屈的人。

当邓小平提升他的忠实支持者赵苍壁取代华主席任公安部长时，许多外交官们认为华国锋和邓小平那时就已私下里达成协议：华不干涉邓为提高教育水平、为实施现代化计划做准备所做的尝试；而邓则同意放慢政治步伐，暂不对毛泽东主席，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做批评性的评价。

华国锋“放弃”了他接替毛主席时得到的“最高统帅”的称号，请求人们称他为“同志”而不称“英明领袖”。他的权力在“内部人士”中迅速削弱。邓小平在讲话中批评了“凡是派”，但调子不大激烈。他说，自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奠基人以后，政治界已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恩格斯没有乘过飞机，斯大林没有穿过涤纶，同样，毛主席以后时代也变了，死守他的指示去“做或不做”每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1977年，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开始出现大字报，称邓小平是“活着的周恩来”。邓因他的务实精神而受到赞扬。大字报说许多工人的上资长了40%之多，工厂还恢复了物质刺激和奖金。有的大字报的作者感谢邓小平允许他们从农村回到北京或其他城市，这些人是“文化大革命”武斗阶段后期下放到农村去的。

有几个月华国锋一点权力也没有，最后，在1980年9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辞掉了总理职务，这是党政领导集团的第一次大改组。为了给老干部树立一个好榜样，邓小平从副总理位置上退下来了。不过，应该强调的是，他的卸职对于他的权力来讲没有任何影响。然而，至今仍有一些中国干部认为，邓小平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坐政府的第一把交椅——哪怕是短时期的。

自“解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戏剧性变化。因此，只有大胆的人才能预言她的未来。但是，目前可以看出的是，邓小平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团结一致，就很有希望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计划。

[法]夏泰宁：

邓小平教授上社会主义课

费朗索瓦·夏泰宁是法国知名的记者。他在担任法新社驻中国记者期间，曾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报道。

1988年6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前往中国访问。22日，邓小平会见了，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费朗索瓦·夏泰宁对邓小平与门格斯图的会见以“邓小平教授上社会主义课”为题及时作了报道。

邓小平在会见门格斯图时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对埃塞俄比亚客人说：“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谈话已以“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为题，编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

下面是费朗索瓦·夏泰宁关于邓小平会见门格斯图的报道，材料来源于第9162期《参考消息》。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半退休了的中国强有力的人物邓小平又出来了（22日），向一位外国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发表了一通关于社会主义的讲话。

邓小平这次是向埃塞俄比亚主席门格斯图谈话。他向客人——一位莫斯科的盟友谈到中国人民从1956年到1976年20年“吃了苦头”，观察家们认为，对于一个还不到40年的政权来说，20年已经很长了。

邓小平谈社会主义的教训，看来目的在于提醒那些已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领导人，要防止在执行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出现严重僵化的危险。

观察家们认为，他要求那些领导人要选择最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同时，远离某种模式（意指苏联模式），也不要模仿中国的作法。

在这方面，邓小平从意识形态上为中国的发展努力进行了辩护，他说，“按需分配”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只有在产品极其丰富的先决条件下才有可能实行。

邓小平不只是向非洲国家元首上了这样的课，在间断了很长时间之后又重新访问中国的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也听说过邓小平这些赞扬社会主义方面的实用主义的大段讲话。

但在观察家看来，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在国内应用。面对由于他当权时提倡经济改革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这位中国强有力的人物认为，不时地提醒一下毛泽东逝世之前以及他本人重新掌权以前的情况比这更糟是有益的。

[保加利亚]内佐娃：

邓退休了，但仍发挥重要作用

玛丽娅·内佐娃是保加利亚知名的记者，她曾写过不少关于中国的报道。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他最后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在信中说：“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随后不久，邓小平辞去了他最后担任的军委主席的职务，并推荐江泽民继任。1989年11月12日，他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说：“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邓小平辞去一切职务，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国外许多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发表评论。下面是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后，保加利亚记者玛丽娅·内佐娃于1990年3月28日发表在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报》上的文章。

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实力人物、国家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和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邓小平，宣布辞去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自愿引退，是为了给比较年轻的一代让位，并为老一代作出榜样。

这位性格刚毅的四川人作为中国党和国家最著名的活动家之一，他的命运真可谓复杂多变。他凡遭诋毁和贬黜，被打入社会的底层，但他像游泳健儿一样，又浮出了水面。

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种求实精神、理智的现实主义，构成了他的信仰。他信守这样的思想，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先于其他政治家而意识到，中国50年代的大跃进，其基点是唯意志论和头脑发热。因此，他成了第一个调整政策的设计师，这就是打破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邓小平是怀着这种思想进入中国近代史的。为了使国家摆脱混乱局面和走向稳定与现代化，他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的大胆的经济改革计划使10亿中国人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使他们有衣穿，有饭吃。他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兴趣，并保证他们享有较大的自由。邓小平在直接或间接地回敬那些指责他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时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果对他的论断加以补充，这就是“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贫困”。很明显，这位众所周知的伟人不是在闭门造车，而是在探索使人得以充分发挥才能的道路。观察家们认为，邓小平退出政治生活，“并不意味着他不再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位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在中国进入21世纪这个历史性转折时期所起的巨大作用，邓小平是这样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是有雄厚资本的。

[美]费正清：

邓小平决心彻底铲除腐败

费正清，本名 John King Fairbank，他的这个中文名字是梁启超的儿子、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替他取的，意为“正直清白”。他从 1932 年起就以学者和外交人员的身份在中国呆过 7 年，并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达 40 余年，是该校弗朗西斯·李·希金森讲座功勋历史学教授，也是公认的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1979 年 1 月 29 日晚上，卡特总统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和夫人访问美国，费正清应邀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美国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等，在宴会首席作陪。他所以能获得参加国宴并在首席陪同卡特和邓小平的殊荣，是与他长期以来卓有成效地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并积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分不开的。他对此感慨万端，如沐春风，觉得这一盛会终于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 50 多年来的奔走呼号。

宴会上，邓小平与费正清有过一段颇有意味的谈话：

“贵庚？”邓小平问。

“72 岁。”费正清答。

“我今年 74 岁。”

“但你仍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

“这证明你脑筋用得太多。”

下面的段落是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 ~ 1985》一书中摘译的。

1981 年 6 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在中国新闻界和高层官员中，逐渐形成了反对低效率、反对唯利是图和官僚主义的势头。……邓小平 1979 年以后的努力是为了制定法律制度，取代现存的“封建家长”和官僚专断的做法，由于权力往往被某些官员用来牟取私利和搞裙带关系，邓小平公开号召取消全国各级干部的特权。中国新闻媒介指出：

某些同志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独断专行，不许别人说一句反对自己的话，甚至打击报复那些敢于批评和反对其特权的人，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荣妻贵，父位子袭，亲朋好友也跟着沾光，这是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

为了防止高级干部的终身制、官僚机构的僵化和宗派主义，邓小平及其同事们决心彻底铲除干部人事制度上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必须使干部退休制度化。1980 年初，中共中央号召建立起任免提拔干部的“严格奖惩制度”。许多老同志的退休和党政分开的实行大大减少了互相提携和包庇的现象。比如，包括邓小平在内的 7 位副总理，由于年迈宣布辞职，同时，5 位人大副委员长也提出引退。1981 年高级干部的引退，使年轻的一代较为顺利地走上了党政领导岗位。党政分开，无疑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在党中央少数人手中。1982 年初，邓小平前往广东视察，发动了罢免不称职的省级和地方上的高级干部的运动。国务院进行了机构改革，将 90 个部委压缩到 50 个，当时中国的新闻界也呼吁严惩高级干部的腐败行为。当年的重点似乎是反对官僚主义。全党在胡耀邦主席的个人号召下动员起来。胡耀邦还组建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腐化案件。1982 年 2 月，中央派了大批干部深入各省，查处地方上的违纪案件，并协助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提高工作效率。

邓小平和胡耀邦发动的运动，把机构改革的任务提到了关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高度。不少高级干部在未到 60 岁退休年龄之时便被要求离职培训，另外一些则被调到没有决策权的管理岗位，那些不适应高效率新标准的人则必须退休。无论如何，现在预言其效果尚为时过早。据报道，抵制力量非常强大，不少腐败官员与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官员有裙带关系，有的还是平反不久的干部。1949 年至今，中共领导层始终未能彻底根除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

自从中国以毛个人为最高领袖之后，现在的领导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邓仍然是一个副总理，但运用他的长期的经验，并利用（当然是非正式地）他的资历和与别人合作。经济学家陈云的思想重新受到重视了。著名的早期领导人、以前北京市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一个受害者彭真，又回到舞台上。保守派和改革派政策的矛盾，仍然同个人权力斗争交织着（改革派将有一天同 100 年前建立日本现代国家和经济的日本元老相比拟）。摆脱了毛泽东的难以预料的滥发脾气干扰——这种自由，为邓小平的改革铺平了道路。这些改革政策，人民是欢迎的。

中共的政策从阶级斗争到经济改革的大转变，是中国革命手段的（如果不是目的）重大改变。确定邓小平的最高领袖地位，经两年过渡时期，到 1978 年底才实现。究竟是在什么形势下邓小平的改革程序才开始呢？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亦步亦趋地按照苏联浑身筋肉都高度紧张的极权主义模式运行着。官僚主义的控制窒息着首创性，但是还有一点进步。因此，邓小平在 1980 年初期开始的作法，在加快中国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速度方面，不能不做得看起来很像 1958—1960 年间毛泽东的大跃进那样。毛（以及邓）并不是很喜欢造成颠三倒四的官僚主义的。1978 年所不同的是：邓现在要走的是一条既要扶持首创精神，又要重建党和政府的新路子。他意识到中国的进步必须通过一个有训练的官僚机构，而不能绕过它。这是一种比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要更切乎实际的想法，但同时也是复杂得多的任务。

第一步改革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又向外看了，欢迎和外界来往了。1972 年开始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到 1979 年 1 月完成。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说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幸存者部下会同美国政治中的调皮捣蛋分子发生麻烦。1 万左右中国学术界、技术界的专家来美国学习，美国 10 万旅客带着美元在中国旅游。不管好歹，有点像老时候的样子。

邓小平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技术转移成了一个重大目标。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设新机器，开设新工厂、新生产线，修建旅馆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等，还同时引进资金和技术。

邓小平政权的第一项需要，是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即用承认自己错误的方式，来确认统治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它给 1957 年及其以后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平反”后，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刘少奇已于 1969 年含冤死去，所以对他和许多别的人的改正，只能是“追认”。这种“虽然晚些，但总比没有好”的做法，表现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关切。

毛泽东是一个问题。作为中国的列宁兼斯大林，仅仅谴责他，是大简单了。解决的办法是把毛的一生分为前半生好、后半生坏这么两截。大体说来，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对他用“三七”开，即百分之七十好，百分之三十坏，

是够公平的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早期的思想，仍然可以用来指导未来，尤其是经过精明的辩证法学者的解释后更是如此。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党中央对于集体领导的破坏“负有部分责任”。这使人回忆过去一个皇帝为意外事故颁布的“罪己诏”，以表示他仍在尽他的职责。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被揭露为一场重大的灾难，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破坏性的。为了加强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还追溯了19世纪末期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称颂了孙中山。两者都强调过外国技术和机器的重要性。

为了争取公众的信任，党员必须加以筛选并提高素质。在4000万党员中，估计有大学学历的只占4%，有中学学历的不过14%。4000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党员中，半数虽然具有强烈的毛式的群众思想意识，但很少经专门业务训练，甚至识字能力都很低。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毕竟只是攻击现行体制。这一套现在已没有什么可取的了。最需要的事，是重新确立党的纪律和服从党的一切指示，而党的这种改革是一件微妙的事。邓小平政权试图通过加强程序的正规化和恢复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来消除派系纷争。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决定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不过它完全限于党内，和群众舆论无关，同时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和有专才的技术人员入党。这种一反毛泽东传统的作法，当然也遇到了抵抗，但是加强生产和现代化，毕竟在物质方面产生了直接效果，以至于老一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派，也都渐渐地默不作声了。

到1985年为止的5年中间，有100多万老的中共党员已经“离休”。1985年9月，131名高级干部辞去职务。一般地来说，他们作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身份，保留了待遇。

整顿军队是比较慢的工作。但是1985年财政预算和人员都大大缩减了。40名总参谋部的官员离休，还有10%的军官开始离退。1985年6月，人民解放军的11个军区减为7个，高级军官减少一半。军人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占优越地位了。

[美]杨小燕：

邓小平的牌技够得上专业水平

杨小燕是世界桥牌女皇，美籍华人。祖籍湖南。193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杨开道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大片领土沦陷，杨小燕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18岁时，她离开上海赴美学医，后定居美国，她的丈夫魏重庆曾仕美国桥牌队队长和教练，因研究出风靡世界的“精确体制叫牌法”而名重一时。杨小燕受家庭影响而学习桥牌，终成大器而声名遐迩。有一次，在学习打牌技艺时，她丈夫半开玩笑地问她学习桥牌是不是想当“世界桥牌女皇”，她回答说：“当然愿意啦！”她丈夫鼓励她努力学习，并预言不出10年她定能摘取世界冠军的桂冠。为了潜心研究牌技，杨小燕毅然辞去了纽约一家医院院长的职务。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杨小燕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世界各种桥牌大赛中，共荣获100余个冠军称号，并作为主力队员，为美国奥林匹克女子队登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立下殊勋，她本人登上了“桥牌女皇”的宝座。

1981年，上海举办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共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城市20余个队报名参加。美国的旧金山、纽约、休斯敦3个城市，在翁心梓先生的鼎力促成下组成4个队，由杨小燕任总队长，于3月3日乘飞机抵北京。准备参加这次邀请赛。翁心梓是国民党元老翁文灏的侄子，在纽约万源公司任董事长。在京期间，翁心梓、杨小燕提出：希望能够与邓小平会面，或打一次桥牌，以慰平生仰慕之情。中国桥牌协会会长荣高棠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请求，邓小平欣然允诺，并定于3月4日晚上与他们一起打桥牌。获悉这一喜讯，翁心梓夫妇和杨小燕都兴奋无比，其中最为兴奋的是翁夫人。翁夫人辛道基是晚清时期重臣李鸿章的曾孙女。她花费了整整半天时间寻购《邓小平选集》。可惜的是，当时《邓小平文集》尚未出版问世，尽管她跑遍了北京的几乎所有书店，却未能如愿以偿，不得已，只好买了《周恩来选集》上、下集。同行的人对她为何迫不及待地要得到《邓小平选集》而结果买了《周恩来选集》大惑不解，翁夫人对自己的行动也守口如瓶，谁也不肯告诉。3月4日晚，邓小平会见了杨小燕和翁心梓夫妇，并同他们一起打了3个多小时的桥牌。翁先生对邓小平说，“久闻您牌艺很高，今天有机会和您同桌打牌，感到万分荣幸。”邓小平笑着回答：“太夸奖了。你们才是世界名将，与你们一起打牌，我的身价也高了。”荣高棠随即安排邓小平与翁先生结对、杨小燕与当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北京知名桥牌选手丁关根搭档。不料，杨小燕微微一笑，说：“我提个意见好吗？”邓小平听了，温和地说：“行！”接着，杨小燕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更不容易，能不能我与您结对？”邓小平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杨说：“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艺。”喜上眉梢的杨小燕便问邓小平使用何种叫牌法。邓回答说：“当然是精确叫牌法啰。”当晚，大家牌兴很浓，一直打到晚上11点多。打牌结束后，正当邓小平将要向大家告别时，预先有准备的翁夫人这才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连忙从包内取出《周恩来选集》上集，双手递到邓小平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敬请邓小平在扉页上签名留念。邓小平欣然在书的扉页上写上“邓小平”三个大字。此时，杨小燕恍然大悟，但又后悔不送，连忙手忙脚乱地在提包里寻找开来，看她急成那样，大家都替她感到惋惜。幸好杨小燕找出了一份她丈夫开设的轮船公司的介绍书，邓小平也高兴地在这份介绍书的反面为她签了名。

邓小平是50年代在四川时学会打桥牌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个业亲爱好。晚年，工作之余的邓小平对打桥牌更是情有独钟，打牌的技艺也随之日益精湛，一些外国人称誉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1984年，《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桥牌专栏作家艾伦·图

斯高的一篇权威性文章，其中这样写道：“世界上许多历史伟人都是桥牌迷，例如，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等待盟军北非登陆的消息时，也没有忘记挤出时间玩一局桥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二次大战爆发后英军参战时，仍念念不忘打桥牌。中国的邓小平主任更不例外。”此前，世界桥牌记者协会给邓小平颁发了桥牌荣誉奖，称他为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的人。

邓小平在谈到他打桥牌时的感想时，曾经这样说过：“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充分地休息。”显然，对于日理万机的邓小平来说，把打桥牌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是桥牌女皇杨小燕与邓小平结对打牌时和打牌结束后发表的谈话：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够得上专业水平了。

桥牌就是一座桥，通过这座桥，把成千上万的海外赤子之心与伟大祖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

这是一位令人感到非常有趣的人物。在牌桌上，我们之间像普通的朋友。他和气得不得了，和他相处，不会感到他是大领导。他为人很谦虚，很热情，生活习惯也非常简单。如果与里根相比，邓小平最怕出风头，里根最喜欢出风头。

[美]施拉姆：

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

斯图尔特·施拉姆先生是美国人，现在英国任教，担任伦敦大学教授。他是西方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当代政治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有多种著作行世，且多次来华访问。他的《毛泽东》一书，很早在中国翻译出版，且发行量很大，因而，许多中国读者都熟悉他的名字。他同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在学术交流上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1986年4月，施拉姆教授访问日本，于30日作了题为“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的演讲。在演讲中，施拉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了比较。他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对发展经济采取排斥态度，晚年也强调过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也一再提到要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他采取了激进政策，致使中国陷入危机。邓小平并不是像欧美和日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实用主义者”，而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奉“延安精神”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施拉姆认为，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应当说，施拉姆教授从政治上对邓小平和当代中国的改革事业所作的分析研究，对于启发我们的思维，不无参考价值。

本文是从日本《中央公论》1986年10月号上摘译的。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

首先，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毛泽东和毛泽东的遗产。毛泽东在原则上并没有对发展经济采取排斥态度，也不反对“现代化”这一概念。相反，从4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一点也不吝惜地使用那类语言（现代化、近代化）。即使在他晚年的20年间，也强调过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是，毛泽东对随繁荣和不平等而来的腐败日益忧虑，以致采取一系列激进政策，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大跃进造成了经济上的灾难和饥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出现分裂，这样，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陷入危机。他的接班人华国锋，继而邓小平，为了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国家，不得不解决这些问题。

华国锋的解决办法，是采取“两条腿”政策。……他想要党内的“左”、“右”两方都满意。

华国锋想用著名的“两个凡是”来概括他的政治观点。……1978年开展的3次大辩论，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次是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展开的辩论，第二次是……围绕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的正确性而展开辩论，第三次是为反对毛泽东那种只要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动起来，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任何物质上的困难都能战胜的观点，围绕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展开的辩论。

到1978年底，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意在经济工作中实行“责任制”，这成为后来中国改革政策的基石。这个原则在1979年的农村工作中具体化了，它的两个目标如下：一是单纯反对平均主义；二是扩大市场作用。华国锋的主席职务在1981年年中被撤换。从此，开始了邓小平时代。不过，邓小平同毛泽东和华国锋不一样，他不当主席。不久，主席这一职务被取消。

邓小平想渐进而又彻底地改革中国经济。为了这个改革，他坚信需要“解

放思想”，打破“禁区”，需要加强民主和法制。他在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这些要求。尽管邓小平认为创造更加自由的氛围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但是在他所允许的自由与民主范围内，也难免摆脱来自“内部”与“外部”的一些限制。所谓来自“外部”的限制，是由于共产党内，特别是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制衡带来的。我下打算用明确的派系间的政治力学去研究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但可以看到在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而且也可以看到建立在这种分歧基础上的联合。当邓小平的不少同僚们对他的政策所推行的结果表示担心时，邓小平就不可能毫不妥协地执行他的政策。我说的来自“外部”的对改革的限制就在这里。

但是，并非像欧美和日本有时所说的那样，邓小平是一种“实用主义者”。他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并在延安时期学到了若干道德标准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所以，当他看到自由讨论和地方比较自由的选举开始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认为必须中止这样做。于是，我把邓小平自身和其他党员对改革所表露出来的想法和本身的反应叫做来自“内部”的对改革的限制。

1983年春，中共的路线是根据三个前提制定的，这些前提代表了当今中国政治的方向。第一是“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的口号。这个口号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两个部分都很重要，而且，即使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即不允许改革后退，也不允许失去控制。第二是强调知识。号召学习进而超越现代化的高级技术，不是把知识分子单纯看作顾问和专家来使用，而是把他们放在有权力的岗位上。第三，“极左主义”是主要危险，“极左”分子或是被改造，或是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这是1983年初以后一再强调的。

1983年9月至10月，邓小平和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共同提出为清除“精神污染”而全面加强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这次“工作”立即发展成像毛泽东时代开展的“运动”那样。它有两个目的，即在中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反对非正统思想，特别是反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化；在社会各阶层中，对国外的影响和一切“堕落”行为进行批判……

……邓小平是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延安“革命精神”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他讨厌由于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其他错误想法的狂热而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精神持怀疑态度。这个运动是和以清除“极左分子”即文革派为目的的共产党内的“整党运动”同时开展的，这并非偶然。在批判“极左分子”时，邓小平不想被“极左”人物看成是“为资本主义评功摆好的分子”。

……1984年2月，他访问了深圳……邓小平一回到北京，就同高层干部谈话，十分赞赏、“开放政策”和经济特区。他说，特区是引进国外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窗口。他支持特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他说，像深圳这样的地区先富起来是对的，“平均主义不好”。

随后，在3月和4月，不仅再一次确认了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而且出现了把这个制度一举推广到工业和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变化。同时，再次肯定主要的敌人不是极右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是“极左”。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性地确认掀起改革的新高潮。同成为改革起点的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与其说这次会议决定了明确而详细的政策，不如说它所通过的政治路线更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中国经济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那以后，讨论

商品和市场的作用已不被视为离经叛道，这个时期，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并且再次强调反对平均主义和继续推行开放政策。

坚定走改革的道路

1984年底，对自由讨论和教条主义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批判。1984年12月7日的著名社论《理论与实际》（载《人民日报》）在中国国外被看成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给予大量报道。这篇社论只不过讲了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以来几次提到了的事项。即马克思是古人，老参照他的著作并不能解决今天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关于这一点，12月7日的社论讲得非常清楚，说这决不是抛弃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是灵活地领会。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必须使这种新看法得到发展。

1984年下半年，物价猛涨，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不计后果的银行贷款急剧增加，被称为“不正之风”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也非常突出。据后来解释，党中央于1984年12月已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于1985年2月和3月已着手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主要问题是社会阶层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的威胁，存在投机和黑市，最重要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来捞取金钱。

1985年2月和3月，邓小平等人尖锐地批评了这一现象，反对这些“不正之风”。强调指出，如果不消除这些消极的方面，那么邓小平在1985年2月所说的继1949年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即改革本身就面临夭折的危险。

实践与理论

既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又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新的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主要倾向。

邓小平最近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对香港代表团说。

我们现在步子放慢一点，这是为了巩固、消化改革的成果，以便在以后实行更大的改革，改革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这几年的改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七五计划的中心是改革”，再经过三、五年，就可以把我国经济体制中的重大关系理顺。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取得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所谓长期，就是六七十年，一直到下个世纪前50年。

1986年4月23日，邓小平对福田纠夫说、这个五年计划将决定改革能不能成功。他断言，“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必须走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要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尽管出现一些摇摆和在意识形态方面作些调整，但中国走改革之路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改革，至今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有许多因素保证改革延续下去。首先是1984年10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认为，商品经济能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现在正是形成系统理论框架之时。从这些因素中，我得出以下3个结论：1.舆论；2.领导机关的力量均衡；3.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领导机关的位置，然而中国人民的态度同样也很重要，因为再不能

像过去那样摆布他们。因此，我想就舆论对改革的反应谈点我自己的印象；

中国的舆论并不是单一的，现在已形成几种不同的价值观。即，1.（中国人称为封建式的）传统式的前近代文化。2.中国在1949年前和1978年后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3.在毛泽东晚年的20年间所宣扬的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风尚。首先，在传统上蔑视“商人”和毛泽东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对从商人员的轻蔑态度。例如，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对我说，在市场上买菜时，必定到那些把菜运到北京来的农民那里去买，而决不到那些把农民的菜收购起来自己在城里再卖，以便赚钱的经纪人那里去买。他认为农民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得到报酬是正当的。另一方面，“投机”的人不能认为对社会有贡献。不过，报纸上说，商人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与此相反，舆论反映出了彻底的反封建思想。现在最令人不满的是高干子弟多半当了官，这就是一般人所指的“第三梯队”。这样的选拔接班人的方法继承了毛泽东的方式，它本身带有封建性。反对现行政策的人们的动机，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方面，物价上涨虽对农民有利，但却是以牺牲城市居民利益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对“不正之风”的关注。所谓“不正之风”，这是人们几年来一直在谈论的问题。它带有十分暧昧的特征：就反对投机和追求利益而言，是反资本主义的；就反对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而言，是反封建的。

一般来说，我的印象是，多数中国人对改革是赞成的，因为整个生活水平提高了。

下管中国领导人将来是谁，在根据情况确定自己的方针时，都必须考虑到现行的开放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邓小平1979年访美以来，中国同西欧和日本进行了交流，下仅获得了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从善意这点考虑，也得到了不少优惠。如果回到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模式，这一切大概又将丧失。相反，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现在这样良好的关系，将会带来知识分子的交流。在共产党人内部，尽管有人把开放政策视为“精神污染”的根源，但从总体上看，是持肯定态度的。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将继续进行。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不继续推行开放政策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是否成功也很难预料。

[德] 弗兰茨：

25 岁的军政委

马利·弗兰茨是德国的历史学家，他写作的《邓小平》传一书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在读者的声誉。

继我们党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邓小平同志又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这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舞台上首次独立扮演重大的角色，他为发展红军队伍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领导武装起义，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和红七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年仅 25 岁。

下面一段文字选自弗兰茨的《邓小平传》，作者对邓小平领导上述两次武装起义，作了生动的记述。

1927 年以后，由于党既无军事上的优势，又无后撤的地方，在莫斯科举行的党代会决定，在农村建立农民协会，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把田地分给佃户。共产主义者打算采取这样的措施在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推行这个战略方面走在前面，他在江西省交通闭塞的井冈山建立了“他的”据点。

在上海的党中央认为，南边相距 1800 公里远的边界省份广西省——今天的广西壮族昏台区——正适合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抢劫财产的国民党士兵追捕共产主义者时，他们常常问在田里的农民：“你见过苏维埃吗？”农民们害怕地摇摇头。

在靠近印度支那边界的省份建立红色根据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那里定居的壮族提供了充足的造反人员的来源。数巨年来，这群今天有 1200 万人的壮族受到汉族的驱逐。壮族曾经和其他民族一起，分布在华南的大部分地区。然而他们却不断被挤向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终点。生活在左江和右江富饶的河谷中的壮族特别勇敢和具有反抗精神。他们的领袖韦拔群，即使在其他省份也被看作是令人可怕的造反分子。在他及他的原始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共产主义者可以发展自己的军队，正如在 1927 年广州起义失败的同志的基础上建立军队一样。第二十理由是，两个地方军阀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未遂政变，使一名共产主义者掌上了省政府主席的舵。

这两个因素促使了这位在党中央办公室的干部首次到遥远的地方去独立执行党的任务：邓小平受命到右江和左江的山谷里建立两个“苏维埃”根据地。

在巴黎时，邓小平已掌握了一名地下战士所用的手段：进行隐蔽的宣传，摆脱暗探的监视，启用已废弃的信箱。然而，与他在上海的造反活动相比，在巴黎的活动只像是一种捉迷藏的游戏。与在沙皇俄国的革命斗争相比，在经济危机年头的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更具有危险性，检查身份证、盯梢、逮捕——邓小平必须时常想到他会暴露身份。

像他这样一名干部，要是离开了上海迷宫一样的街道将是非常危险的。他应当怎样到达广西呢？难道乘火车穿过“白区”去广州？再乘船沿江而上去南宁？太危险了！那么应当怎么去呢？邓小平善于去寻找帮助。他拜访了在巴黎结识的一位老熟人，同样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胡志明，他给邓小平

出了个起决定作用的好主意。这位越南共产主义者建议他走海路，并给了他一个在香港的联系地址。现在，邓小平可以旅行了：在树木成荫的江边，他打扮成一名商人，登上了去英国皇家殖民地的轮船。

从英国管辖的九龙出发，越南地下战士领着他继续海上航行，因为对他这位已知名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沿水路穿过广州、梧州去南宁显然是下明智的。结果，这位党代表只能绕道印度支那边界。邓小平乘船去北部湾的海湾。

多亏他的法语知识，他顺利地乘火车到达了河内。这里离中国边界只有约 200 公里。他在凭祥偷越国界，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商业边境城镇龙州。从这里出发，他得以乘旅行帆船顺江而下去南宁。

在省会作了首次调查之后，他让后卫人员跟随在后。他的部下很善于瓦解敌方，在他到达后不久，就成功地争取了南宁警察局的局长。起初，“苏维埃”的“火种”们都在门卫那里碰头。当这一碰头地点变得危险起来以后，共产主义者就在中山北路 96 号租了一个小店。只有知情人才知道，在这个租来后修理煤气灯罩的店铺里，上海来的代表、政治委员邓小平接待来访者，并传达指示给两大河谷的联系人。

俞作豫同志是这个封闭省省长的弟弟，利用这个关系，共产主义者很快就瓦解了省政府机构。一个月以后，有 300 名隐瞒了身份的干部被安插到了军队里，并接管了军官训练团。

邓小平到达 3 个月以后，局势迅速发生变化：省政府主席和他的亲信突然转向左倾，转而支持国民党中无势力的可怜的一方，并向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宣战。邓对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丝毫不感兴趣，他与省政府主席及其下属建立关系只是为举行革命起义做准备。这次孤立的、仓促的反抗蒋介石的行动很快就失败了。省政府主席逃到上海躲藏起来，他的亲信则投向共产主义者一边。

在此期间，邓小平又发挥了政治委员的作用，邓觉得，蒋的胆大的对手受挫，正好是发动进攻的时机。他发出紧急命令，袭击南宁卫戍部队。他把投奔过来的士兵进行整编，并把充足的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包括 6000 支各类枪械和炮、步话机以及大量的子弹，都装上了船。

当军长张云逸率领两旅改编过来的士兵沿右江向上游推进时，政治委员邓小平正保卫着装在一艘没收的帆船里的武器弹药。1929 年 10 月，这两位军政领导人按照预定计划，在右江上游的小镇百色会合了。

与此同时，前省政府主席的弟弟也离开了省会，和红五军一起，沿左边的一条江左江向龙州方向开进。

到达百色以后，邓住进了这座有 1 万居民的城镇外的一户农家家里。为了不致引起大多人的注意，他租了一位广东人的房子。

直到今天，百色仍为众人所知，因为百色是连接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的要塞，该城建在风景秀丽的山上。数百年来，连接广州和云南省会昆明以及老挝、缅甸的贸易线就经过这里，谁要控制了位于右江上游的这个城镇，谁就控制了整个广西西部。这个地区有 270440 平方公里，只比罗马尼亚的领土小一点点。

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看中了这块地盘，选定百色为起义的地点。11 月初，信使送来了在上海的党中央对邓小平计划的指示，同意，地点合适，时机也有利，国民党领导们正陷入内部的权力争斗之中，所以分不出精力。

尚无经验的政治委员和他的军卜以惊人的自信心，把在左江的军队改编成红军第八军，把在右江的军队改编成了红军第七军。现在，反抗反动的卫戍部队和地主们的起义可以沿两岸发动。邓选择 12 月 11 日作为起义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广州工人起义失败了。

一位当时的指挥员回忆道：“在 12 月 11 日的清早，天气很冷，云层很低，下着蒙蒙细雨，还不到 8 点钟，我们让士兵、居民们到广场上集会。集会开始了，会场上悬挂着有镰刀和斧头的旗帜。邓小平讲话以后，张云逸也简短他讲了话。并宣布建立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宣布各负责人的名字。”

真正的斗争现在开始了，即“推翻国民党，消灭贪官污吏和残暴的地主，建立工农兵政权”的斗争。集合平静地结束以后，革命者们在百色张贴了布告，布告上简要地概括了两个讲话的内容。就在同一天，在下游 50 公里远的平马城（今田东）的墙上，也见到了同样内容的布告。布告上署名的是邓斌和张云逸。张云逸我们已知道了。那么邓斌是谁呢？难道是一名新的干部吗？实际上，邓斌就是政治委员邓小平。

建立百色苏维埃政权以后，邓小平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及组织武装力量。他把第六军分成 3 个师。起初共有兵力 5000 人，后来发展到 3 万人。反政府的武装力量的司令部就设在他住宿的地方。壮族领袖韦拔群被任命为第三师师长。

邓小平从百色出发采取军事行动，他的联络中心设在右边一条江的岸边，他偶尔去左边那条江的山谷中进行调查。

1930 年 2 月 1 日，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左江苏区，并把 3000 名士兵改编成红八军，这样，25 岁的政治委员邓小平便指挥了一支有 8000 人的军队，除此以外，他还领导了在右江的 11 个、左江的 6 个苏维埃政权机构。

尽管靠近左江的据点又小又弱，但意义极大，因为法国在龙州镇派驻有代表机构，这个机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时被共产主义者占领了。在印度支那边境内约 30 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每天都有越南游击队的活动。

1930 年 2 月 9 日，在中国同志们的支持下，越南革命者发动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1936 年，邓小平对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龙州苏维埃政权和 1930 年发动工农起义的越南人有着关系。法国飞机轰炸了龙州，我们打下了一架飞机。”法国人在数月以后对此进行了报复。

当革命军人和农民们在河谷收割庄稼的时候，邓匿名前往上海汇报。经过近 2 个月的旅行，他正好赶上了政治局召开的名声不好的整风会议，所有重要人物都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领袖李立三发挥了他关于“极端革命形势”的论点。但是，那是十足的荒谬的理论！李立三认为，在中国以至在全世界，革命已全面展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只需要进攻几个大城市，这样，其他地区就像撞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轻易攻下。他要求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武汉。根据他的指示，所有的红军都应向这个长江中游的大城市进军，并沿途解放其他城市。后来，在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党的领导也宣布了这个自杀性的行动计划。所有来自各苏区的 94 名代表都没有提出反对。

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以后，邓小平又乘上了去香港的轮船。两个半月以后，邓带着新的指示返回了右江苏区。

此时，反革命开始嚣张了，法国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摧毁了左江苏区，消灭了红八军。在危急的情况下，邓小平立即召集他的指挥员，并且宣布：红

七军转移出左江苏区，接着进攻广西省第二大城市柳州，然后朝东向邻省广东进军，攻击广州。根据极“左”路线，党交给邓的第一个任务是：解放华南。带回的党中央的指示引起了强烈的抗议。邓的指挥员们把这份“左”倾激进的人在办公桌上杜撰出来的计划说成是让人升天的命令。受人尊重的那位壮族领袖请求会议别把剩下的右江苏区作为牺牲品。在邓还在沉默时，其他人都赞成向西、向邻省贵州进军。在那里可以继续开创苏区，危险也少。

静听了一段时间以后，邓仅仅承认反对者的一个意见是正确的：向西进军问题要少些。但是，他在伺机又强调，向东进军将有更大的革命意义。结果就这样定了，政治委员的话最有权权威性。干部们最后一致决定，壮族领袖留下来，率领1万名士兵保卫百色苏区。

然而，保卫苏区的斗争只持续了6个月，然后就如裂开的大堤一样崩溃了。上千名勇敢的壮族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右江河水，反革命在军事上占了上风。1931年：月，继左江苏区之后，右江苏区也被摧毁。两块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

1930年夏末，在邓小平的率领下，2万名战士开始执行一项自杀性的命令：第一旅和第二旅从平马开始运动。第三旅则开始近2000公里的长途行军，指向在北部的小镇东兰和风山。10月初，这里山区的夜晚已相当寒冷。此时，第七军在百色以北400公里的河池会合了。领导者们在这里把军队结构最后定了下来，把3个旅扩编成3个师，邓斌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李明瑞为参谋长。

一位同志在1978年回忆道：“我们离开了右江根据地，从河池和怀远出发向柳州挺进，沿途，我们进攻了村镇四把和长安。战斗十分激烈，我们的战士打得十分英勇。侦察队发现，敌人派增援部队去柳州，以加强防守。我们的党委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决定下去进攻柳州，而由长安转向湖南方向。我们决定，去江西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师。”

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之后，邓小平意识到，国民党“白狐狸”的军队在军事上远远地占有优势，即使红军攻占了柳州，几天以后的结局也会与南昌一样。

至迟在这个时候，对邓小平来说已明确了：他的军队不可能沿途再攻占任何一个大城市了，对中央交给他的“解放”华南的任务，他开始沉默，这样，邓命令避开柳州，实际上是违反了党的纪律。

然而，即使不与“白狐狸”发生战斗，在继续行进中也受到追兵的袭击。每一次散兵战，每一次小战斗，都消耗了军人，更严重的是牺牲了战士。邓小平的部队越来越小，在沿湖南边境的撤离中，第七军进行了整编，政治委员把他的军队编成了第55和第58团。

当军队抵达三省（广西、湖南、广东）交界的连江时，冬天已来临，气候又潮又冷，隘口成了滑雪道，淌水处成了冰冷的过道。国民党军队又时常突然出现，比这更糟糕的是行军路上的山峰、森林和江河难以越过。

在广东，乐昌江（今天称为武水）洪水暴涨。从南方来的人进入江西必须在这条江的上游处横渡过去。这里，从2000米高的山中泻下的江水奔腾汹涌。一位指挥员写道：“东昌江又深又急。翻起的波浪溅起浪花，若要涉水过江是绝对不可能的。在陡峭的对岸，我们发现了两只小舟，这使得我们有了唯一的横渡的机会。政治委员邓斌登上了一个山岗观察地形。他和张云逸军长一起决定，第55团在他的率领下首先渡江。第58团在张云逸的领导下，

和后勤队一起随后过江，下午3点钟，邓和他的部队渡了过去，并占领了对岸，没有遇上敌军。5点左右，第58团的大部已到达对岸。等待渡江的还有一个警卫连，两个步兵连，一个带有战地医院的卫生队和后勤队——约600人。突然，响起了枪声，当船回转开过来时，我们已知道，敌人沿韶广公路向我们追来。”

岸边的战斗异常激烈，张云逸和他还剩下的600名战士不得不撤离阵地，后来在另一处地方横渡了乐昌江。邓小平和剩下的部队则独自向江西进军。

在损失惨重的江边战役的两个多月后，在江西省的小城崇义，两支队伍的红军又会合了。幸福和悲痛的泪水融合在一起，因为2万名战士只剩下6000人。政治委员让精疲力尽的士兵们首先休息，他则带上几个随从出发到村镇界坝，与驻扎在附近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军取得联系。在回程的路上，邓小平的侦察员突然听到距离不远的崇义传来交火声。不久就确定了，邓的团受到敌人自背面的进攻。

邓小平要来一张纸条，他在上面写道，他估计遇上了袭击，因此无法回去，军队应当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继续向毛泽东的井冈山前进。他把纸条交给一名通信员，然后动身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他的悲壮的使命。

邓斌独自一人经过庙下关口，长途跋涉进入沿海的广东省。在南雄，他登上了一艘开往上游去的客轮。像以前一样，这位受过训练的干部进行了伪装：在登上去广州的轮船时，他又装扮成了一名商人。4月中旬，他悄悄地越过了英国殖民地的边界，从香港再乘船回到了上海。

他想通过报告在上海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他要提出放弃心然导致灭亡的李立三路线？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已晚来上海好几个月，因为在1930年9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结束厂激进的“左”倾冒险。当邓小平乘船进入这座海港城市时，布尔什维克人已控制了党的领导权。他们的掌权时间整整持续了4年，造成的损失远比李立三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

邓小平在广西的使命，以上千人的牺牲而告终。如果党给他的第一个任务给他带来了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有了终身都要吸取的教训，在广西的使向给他带来了力量，使他在后来能对付战争年代的挑战和克服物资的匮乏。

[美]特里尔：

邓小平在 1973 年东山再起

罗斯·特里尔原系澳大利亚人。1979 年加入美国籍。他长期在哈佛大学执教，讲授中国政治，是在国际上享誉较高的中国问题专家。

确立特里尔在学术界地位和声誉的是他的长篇传记著作《毛泽东传》。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作者曾多次访华、并采访了许多会见过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同时参阅了 40 多种重要文献，特里尔的这部著作，记述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重要活动，涉及当代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书中穿插了对毛泽东周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描写，特别是描写了邓小平在毛泽东晚年的不少重大活动，分析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特里尔认为：“病中的周恩来想让邓小平重掌大权……，毛泽东同林彪殊死搏斗的结果，在逻辑上必然让邓小平复出。”特里尔还指出，毛泽东与“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他多次主动向外宾介绍邓小平，赞扬他是“实干家”。毛泽东对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作风不满，但“四人帮”却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气愤，火上加油，横加篡改，以达到他们更大的目的。”特里尔的文章还向读者描述了邓小平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细节。

下面的段落是从特里尔的著作中摘译的。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使来宾们大吃一惊——那不是邓小平吗？

他与中国领导人站在一起，迈步时略有点不稳，但看上去并未因 6 年的磨难而损害健康。

这位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过去总是远离毛泽东坐着，如今，他又在那里微笑了。他礼貌地点头向记者们打着招呼，他很高兴能重返工作岗位。

他透露说，他曾在江西省的一个干校里劳动。

现在他是副总理了。几个星期后，毛泽东表示他现在认为，1966 年以来批判邓小平、撤邓的职“太过分”了。

看来，人民大会堂里的气氛是和谐的。

病中的周恩来想让邓小平重掌大权，很可能是他让毛泽东接受这个建议的。毛泽东同林彪殊死搏斗的结果，在逻辑上必然让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曾经依靠地方部队的司令员们击败林彪，这些精明而讲究实际的老军人大多数都是邓小平的好朋友。毛泽东已经为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的高级军官打开了大门，邓小平当然是他们中的主角。

邓小平重返工作岗位不单是“左派”与“右派”间斗争的一个结果。毛泽东下稳定的健康状况，他那对真理的追求，这一切都使本来已经拟定的计划不得不经常变化。……

1973 年 11 月寒冷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里，澳大利亚总理正和周恩来讨论孟加拉的问题，一位礼宾人员走过来，递给周恩来一张条子，周恩来立即对高夫·惠特拉姆说，“我们能私下谈句话吗？”

“可能是毛泽东吧？”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一张便笺上草草地写了这几个字，然后递给坐在身旁的外交部长。当然他猜对了。

那天下午 4 点半钟，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飞驰过长安街，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一位中国助手站在车旁，平伸出手掌，挡在车门框上，以防贵宾

出车门时碰着头。

在随后的 100 分钟内，毛泽东一面用瓷杯子品着茶，一面将自己的人生观和政治观点坦率地谈出来。他此时已近 80 岁了。

在向惠特拉姆解释中国的军队与其他国家的军队有所不同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有军事经历的平民。”

惠特拉姆对毛泽东说，这位副总理曾告诉澳大利亚来宾，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和“十大”，但是，没有参加“九大”。为什么邓小平没有参加 1969 年的“九大”呢？

外宾们很少问毛泽东政治局的事务，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毫不介意。他答道，“因为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毛泽东和极“左”派分子在解放军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

1973 年末和 1974 年初的那个冬天，毛泽东使各大军区司令惊得目瞪口呆。在 11 位军区司令中，竟被他调换了 9 位。这种举动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把事情办得干脆利索，只能听到一些牢骚，却没有听到枪炮声。

但是，假如在行动之前毛泽东没有恢复邓小平的高级职务的话，假如不是由邓小平把调动职务的消息告诉每一位怒气冲冲的军人的话，人们可能会怀疑毛泽东是否调得动这批人。

1974 年 5 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入毛泽东的书房。礼宾司长引导客人各就其位。按照迎接外宾的惯例，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手一侧。但在毛泽东的右手一侧（除译员外），坐在“周恩来座位”上的却是邓小平。周恩来出席作陪，却坐在布托一侧稍远的座位上。

紫禁城内新的座次格局，与许多国家政府的内阁改组的座次相当。摄影留念亦如新闻报道一样。

4 天前，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时，周恩来还是坐在毛泽东右侧的“自己”的座位上；那些次要的官员通常均在外宾的左侧方向就座。

这种方式历来如此。多年来，当毛泽东与某一外国政治家进行官方会晤并摄影时，周恩来从未坐在另外的地方。而现在，他永远不会再坐在“自己的”原位了。

满载 2885 名要人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向人民大会堂。街上的行人猜测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开会日期一拖再拖，以致成了海市蜃楼式的幻景。

全国人大看来好像又重操旧业。周恩来重新露面了，并且给人一种权威人物的印象；公布了一部新的国家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和农民有少量自留地的权利；宣布新政府中的人事任命几乎没有极“左”派分子；邓小平的地位上升了；会议的文件强调秩序和经济任务。

这难道不是周恩来观点的胜利吗？难道不是极“左”派分子“批林批孔”得意时刻的告终吗？难道不是为邓小平鸣锣开道吗？

几个星期以前，毛泽东和王洪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王洪

文这个“直升飞机”强烈要求毛泽东给极“左”派分子更多的工作。他暗示——这是江青的主意——周恩来的病情并不像所“假装”的那么严重，而且在医院外面忙着策划今后的事态发展。

毛泽东不赞同王洪文的计划。

此后不久，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搞宗派活动是当前一个严重问题。他微笑着说：大家都有错误，我本人也不例外，因为当时我跟林

彪就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嘛。他又插了一句话，赞扬邓小平是个实干家。同时，他向同事们提出要警惕再次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危险。

周恩来的逝世，使邓小平试图安排毛泽东以后的权力阵线时失去了一个关键的支柱。

极“左”分子看见绿灯便往前闯，试图组成一条完全不同的权力阵线。江青在这场赌博中，要下最大的赌注。张春桥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又诡计多端，胜过江青一筹。他在幕后可能支持江

青，也可能不支持江青。

毛泽东本人突然采取完全不同的作法。他所注意的核心并不完全是组成“毛泽东以后的权力阵线”，他还在世，他觉得尚有许多事情要做。

毛泽东在隆冬又宣布了一条格言：“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安定团结并不是说不要阶级斗争。”毛泽东的又一条新年指示传出来了，举国上下为之震动。“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而邓小平从1975年中期（在周恩来即将去世之际）着手巩固权力时，“安定团结”这4个字恰恰是他执政的象征。

当政治局又一轮紧张疲劳的会议开始时，这些指示就如一团浓雾弥漫在空中。争论不休的两派就毛泽东的每一条指示进行发挥，令人惊叹不已。

在福特访华前不久，广为人们喜爱的古典小说《水浒》突然被谴责为毒草。毛泽东认为，这个农民造反的故事在精神实质上是“投降主义的”。

水泊梁山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毛泽东断言。这将以往的观点颠倒了过来。

有人要向莫斯科“投降”了，这种看法在北京政界的走廊里开始悄悄流传。说是某某像宋江，一面假装抗击到底，一面又要向皇帝“投降”。

邓小平藐视这些牵强附会的类推和匆匆做出的批判《水浒》的结论。“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他对此嗤之以鼻。……

《人民日报》第一次攻击邓小平是个“从来不讲阶级斗争”的人。才过一星期，就有人禀报毛泽东：一场沉默但却气氛紧张的示威游行正在半英里外的天安门广场形成。

时值清明，正是祭奠先人之际。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和诗词已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人群涌来观看这一宏伟的场面。这似乎是天真无邪的举动。

但那里气氛紧张。其中有些诗词超出了怀念周恩来的范围，是在向极“左”分子猛烈开火——因为他们在周恩来去世后的3个月中手伸得太长了。有些诗词颂扬毛泽东的前夫人杨开慧，指责江青。还有些诗词提到牛鬼蛇神，采用“妖魔”一词的谐音来影射姚文元。这是巧妙的，但却具有爆炸性。

人群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二十目的是对中国的整个局势表示焦的不安。有一个人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那里通常是不让上去的），面对人群呐喊，“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在向何处去？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得到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消息之后，毛泽东接连做出若干个决定，犹如连声爆响的鞭炮，一个接着一个。

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年轻学生，无疑是极“左”分子的仰慕者，发表了一通简短的讲话，其内容大意是说周恩来曾几次“反对毛主席”，话音刚落，

愤怒的人群便将其双手用电线捆住，在纪念碑台阶上拖来推去，直至血肉模糊。

政治局在一片惊慌中召开会议。投票表决解除了邓小平的职务，并正式提升华国锋任总理兼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新设的一个职务）。

邓小平因政局不稳，因我行我素，因不合时宜地搞实际工作而被撤职。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次事件的幕后人是邓小平。

毫无疑问的是，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分成了两大派，将这两派意见统一并形成决议又迫在眉睫，政府必须向全国发出紧急信号。澄清政府的意图。

毛泽东本人在决定解除邓小平职务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虽然明显因重病在身而未能出席政治局的紧急会议，但还是通过毛远新授意解除邓小平的职务。

据说政治局撤消邓小平职务的决议是全体委员的“一致意见”。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解放军领导人——叶剑英、许世支等人——都赞成吗？邓小平也投票解除自己的职务了吗？

有迹象表明，极“左”分子赢得这个胜利几乎得不偿失。

——极“左”分子未能制服邓小平；邓的朋友们成功地为邓争得了保留党籍的权力，“以观后效”。

——邓小平退出了最高领导层，但极“左”分子却未能进入最高领导层。

——解放军领导人对事态的发展不满，他们几乎毫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耗时间，等待时机（镇压“四·五”事件的是“左派”民兵，而不是解放军；如果局势需要的话，解放军很快便会解决那类事件）。

——1976年春，公众舆论在中国已渐趋成熟，人们不完全赞同毛泽东解除邓小平职务的作法；人们开始悄声议论毛泽东或许已不再清楚自己所干的事了。

官方点名批判邓小平时，道出了实情，说他“拒不改悔”。他没有尽力反驳毛泽东——只不过想保留观点，日后再论——但他确实抢白了几句。

有一天，毛远新告诉毛泽东，在上海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贴出了令人不安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邓小平在悼词中把周恩来赞颂得过分了，“结论应该推翻”。且不管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这张大字报时抱有什么动机，据说毛泽东给予了明确的答复：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不会答应。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其结论是不能改变的。要推翻这个结论，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手中又多了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其含义模棱两可。

这条语录是：“翻案不得人心。”可是天哪，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中国公众不知道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的内容，他们只被告知毛泽东指的是“人民不赞成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仍然同情邓小平，但极“左”分子却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气愤，火上加油，横加篡改，以达到他们更大的目的。

甚至在有毛泽东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的激烈辩论中，他的名字都敢被抛来甩去。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批评中国引进一些关键工厂是背离自力更生的原则的。华国锋大胆地说，“所有这些大的引进项目，都是经毛主席批准的。”张春桥大声回答道：“你总是用毛主席压人！”

显然，在许多这类斗争场面，毛泽东自始至终只是静静地坐着（或躺着）不时用手轻轻地拍打一下，在当天晚上写下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并召见某个

与会者，以示他站在哪一边。

[英]加德纳：

1975年，他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

约翰·加德纳是英国知名的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史，特别是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历史学家，他发表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在读者当中受到普遍的好评，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且受到研究中国政治，中国历史的国际学术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由于作者生活在英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阅历必然影响他的分析与判断，因而，书中的某些提法难免不妥，甚至错误，某些事实也不准确，但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能在比较深入地分析、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大量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现象的基础上，把握往中国当民政治发展的基本脉搏与走向，展示出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伟人的基本活动和政治品格，高度评价邓小平为振兴中华、拨乱反正所作的各种艰辛的努力，从而折射出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这在西方学者当中仍然是罕见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由于对中国当代政治十分了解，因而，使用了许多当时中国的特有词汇来叙述情况，而不是使用某些西方的惯用语言来对中国当代政治妄加评述，使读者感觉他的书就好像是一位中国人写的一样。由此可看出，约翰·加德纳这位英国研究中国当民政治历史的大家手笔。

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到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千方百计把中国从“文革”灾难中挽救出来，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为此，他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主持制定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为全面整顿工作指明了方向。按照约翰·加德纳的说法，这些文件“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对‘四人帮’的主旋律”。然而，“四人帮”千方百计干挠和破坏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在他们的策划下，1975年底，又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使全国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下面的一段论述，摘译自约翰·加德纳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它描述了邓小平在1975年是如何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任命了新的政府官员，通过了新宪法，这时，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的邓小平，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他采取果断措施，希望实现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1975年夏秋，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从许多草案中产生了三个政策性文件。“四人帮”倒台之后，我们了解到包括华国锋在内的许多中国领导人都积极参与了这件事

情。但是，毫无疑问，邓小平是为首的人物。1976年，“四人帮”宣布这些文件是“三株大毒草”，邓小平被作为攻击的目标；1977年，官方宣布这些文件是“香花”，邓小平又受到了热烈的赞扬。

这些文件的正文从未公布过，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各种草案的片段以及讨论草案的会议记录。第一份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论总纲）一般性地分析了中国存在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第二份文件《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二十条）完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第三份文件《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中国“四化”的重要意义。要求改变这一领域的现状。

这些文件（很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完成或不予公开的文件）揭露和谴责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行为及其危害。其内容同官方报纸上宣传的大好形势以及专供外国人参观的驾歌燕舞形成鲜明对照。文件详细列举了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加以整顿的办法，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对“四人帮”的主旋律。

文件探索了种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总的来说，困扰着中国的这些问题都是由“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造成的。邓小平非常聪明地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小心翼翼地批判了刘少奇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他非常明确地指出：1975年制造种种混乱的人都是“继承林彪衣钵”的人，是“左”倾分子把“思想搞乱”，把“党组织搞乱”：他们“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指出，这些制造混乱的分子，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与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与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

他们步林彪的后尘，“把政治与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他们给那些敢于抓经济的人“扣帽子”，把他们打成“修正主义”。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从事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被指责为“脱离生产，脱离政治，脱离工农”。“左”派把“群众”看成是智慧的源泉，任何方面的专家都遭到他们的蔑视。

“四人帮”的做法使得到处人心惶惶，秩序混乱，许多干部都开始相信“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革命非常重要，生产无关紧要”，“抓革命吃得开，抓生产活倒霉”。邓小平指出，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混乱、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事故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

在科研方面也存在大量类似的问题，在调查中，邓小平发现有些地方撤销了不少专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长期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还有许多专业机构多年来没有补充新生力量，研究人员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邓小平详细列举了管理不善、人员素质低、纪律松懈等各方面的情况。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因此改变现状十分必要。首先，必须降低“斗争”的重要性。自从60年代以来，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斗争事实上成了中国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邓小平号召人民：“把团结看作党的生命，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他提醒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就说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要求大家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其次，邓小平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绝不能只看他们口里说些什么，而要看他们实际上做些什么。例如，对于“造反”，绝不可以马上引起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而要看他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又比如，对于“反潮流”，要看他反什么性质的潮流。“反潮流”是“左”派分子在十大通过的党章中奉苦神明的一条原则，是他们攻击1973年后建立的各级政权时的一种借口。因此，要看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邓小平说，一定要注意，不要天真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方

法就是真正革命的方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在邓小平看来，“斗争”往往是流氓恶棍的“护身法宝”。

邓小平着重指出了对待经济工作的正确态度：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糟，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有人认为搞科学研究是“远水不解近渴”，主张多搞应用科学，不必搞理论研究。邓小平严厉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这是“临渴掘井”，是极其荒谬的想法。如果忽视了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国的工业就会落后几十年。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左派总是把解放全人类看作是革命的中心任务，而邓小平却强调“解放生产力”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左”派相信“群众”是解放全人类的主力军，而邓小平则坚持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生产力，党的任务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和社会上的一切组织机构。经济部门及一切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邓小平引用了恩格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一段话：“要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气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在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没有卢德分子(英国1811~1816年以捣毁纺织机械为手段向资本家抗议的团体的成员)的地位。对他来说，现代经济只有在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样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邓小平坚持认为，中国必须向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学习，不管它们的政治如何。他鼓励科学工作者和各国的科学家并肩前进，既要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也要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强调从国外引进技术和知识是使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的一条途径，引进的费用可以通过煤炭、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出口来偿付。

当然，不能轻视我们自己的专家。邓小平强调党对专家的领导，同时又把党的领导同“群众”的过分干扰区别开来。他认为有些事情最好让专业人员自己去做。谈到科研工作时，他甚至走到赞扬“白专”的地步。所谓“白专”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下大相信的知识分子。邓小平指出，“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就比“占着茅房不拉屎”的那些政工干部强得多。他认为必须明确认识到：科学院毕竟是科学院而不是白痴院。当时，杰出的科学家、半导体研究权威黄昆被送到工厂参加劳动，邓小平认为应该允许他回到自己的专业上来。邓小平不仅要求提高专家的地位，而且还进一步采用了物质刺激的方法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文化大革命”后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呼声，其理由是如果“不顾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就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邓小平再次提出了一个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党要爱护和引导那些学有专长、技术精湛、工作努力的人们，不要太强调“政治”和“群众”的作用。虽然邓小平力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术语来表达他的意见，但是他对这些术语还是十分反感。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待毛泽东1974年下半年提出的“三项重要指示”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试图悄悄改变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论总纲》中，虽然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也占着“最突出”的地位，但是随即说明三项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必须以“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的目的在于强调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不是要挑起阶级斗争，而是要“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文件是在对各种草案进行汇总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派他的追随者、杰出的宣传家胡乔木对文件润色，使文字适合“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时代，邓小平的一些同事曾经担心这些文件会引起麻烦。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指出这些文件中有许多“辫子”。在中国，被“抓辫子”就是指被人抓住把柄而受到指责，邓小平对此毫不畏惧，他很风趣地说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维吾尔族的风俗是姑娘每长一岁就在头上留一条辫子。邓小平以他大无畏的精神，鼓舞了他的同事。他们该说就说，什么也不怕。

这些文件尚未完成时，邓小平就已采取行动抑制“左”派们的过激行为了。例如，1975年春，有人试图改变工人的“八级工资制”，邓小平坚决抵制了这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做法。“左”派想通过提高低工资和降低高工资的办法来缩小差别，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做法是“平均主义”，并且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处理“杭州问题”上，邓小平也触犯“左”派的利益。1974年

以来，整个浙江省，尤其是杭州市，一直受到派性斗争的严重干扰，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劳动秩序十分混乱，生产遭到空前的破坏。同时，“自由经营”、黑市交易都相当猖獗。由于情况十分严重，从1974年冬开始，杭州对外国人实行关闭。1975年，中央派

王洪文到杭州去做工作，没有解决问题。同年夏天，邓小平抓杭州问题，派解放军去恢复秩序，逮捕了制造混乱的“左”派头头翁森鹤，在所谓的“三株大毒草”中描写的经济混乱状况很可能就是邓小平在杭州所看到的情况。

同年春夏之交，政治局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严厉批评了“四人帮”，据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这很可能与杭州局势有直接的关系。在教育方面，邓小平采取了同样果断的措施。

当他了解到科研与教育水平下降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之后，他立即解除了—批负有责任的“左”派分子的职务，并对有些人作了降职处理。

1975年夏季以前，邓小平一直处于进攻状态，“四人帮”处境不佳。但是，当邓小平制定的几份文件在秋季呈递给毛泽东及中央以后，“四人帮”反守为攻了，然而，遗憾的是，1975年8月至11月的进展情况至今还无法弄清楚。不过，下列事实也许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转变。

第一，1975年秋，周恩来病情恶化，各派人物都很清楚地知道周恩来将不久于世。一方面，毛泽东将要失去最杰出的同事，他再也听不列温和派的意见了，这就使得他更有可能受到“左”派的影响了。另一方面，对于邓小平等人来说，则失去了周恩来对其下属提供的保护。

第二，邓小平的3个文件的实质就是要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局面。尽管胡乔木做过一番润色，但仍会被“左”派们指责为“修正主义”的纲领，更何况邓小平等人的言论比起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小心翼翼保持平衡的讲话来看，显然要右倾得多。

毛泽东早就应该从这些文件中发现问题了。第三，毛泽东对事情的判断力很可能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他没有参加 1976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周恩来的追悼会，这一点如果不是由于病情严重的话，是很难做出别的解释的。即使病情不重，他也一定非常虚弱，很可能要靠身边的工作人员向他传递信息。这样一来，“四人帮”就可能对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任意歪曲，向毛泽东告状了。毛泽东也许已经神智不清，不管“四人帮”说些什么他都表示同意了。可以相信，1975 年秋以来，他就不能做出合乎理性的决定了。像许多衰老病笃的人一样，他肯定是好一天、坏一天的。他有很多时候可能任人操纵，这种情况必然会被“四人帮”加以利用。“四人帮”会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趁机向邓小平发起进攻。当然也不排除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不需“四人帮”的煽风点火，毛泽东本人对邓小平拟定的政策本来就不赞成。

[美]泰韦斯：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教授是西方著名的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学者。他 60 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 1976 年起，他应聘去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任教。泰韦斯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大陆党的省级干部》（1967 年）、《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合著，1968 年）、《中国的省级领导人》（1974 年）、《中国的上层纪律》（1978 年）等。他还是英国剑桥大学

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的重要作者之一。他曾多次来华访问。

早在 60 年代初，泰韦斯博士就开始了他对中国当代政治现象，特别是高层政治的研究生涯，著述甚丰。1984 年，美国 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译本时，更名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作了独到的剖析，泰韦斯博士通过研究惊喜地发现。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时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于世。新的领袖集团，努力

消除人治因素，建立新的政治运行模式和机制，使中国逐渐走上法治的健康轨道。在该书中，泰韦斯博士多次指出，邓小平是“经历奇特的人物”，是“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上的长期合作者”，是“老一辈革命家中的头面人物”，是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事实上的领袖”，他“作为一个公正的统治着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泰韦斯博士《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出版后，西方学者对这部专著评价甚高。例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A·巴尼特认为它“是一部杰出的研究专著……不管人们是否同意泰韦斯的所有论述和判断，都应该极其重视这些论断，因为它们极具启迪意义。对于所有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严肃学者来说，这部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好书，值得竭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也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本书仍旧是一本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学术著作。”以下这些泰韦斯博士关于邓小平的言论，是从该书中重新摘译、编排的。

一个真正的具有领袖地位的领导人

1975 年 1 月，由于周恩来健康状况恶化，邓小平曾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副总理（同时，邓还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尽管周恩来曾给邓小平的任命披上了法定——理性的外衣，但他去世以后，邓小平仍然被剥夺了权力并再次遭到宣传媒介的严厉批判。这一切当然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的，毛泽东对邓小平作出的结论是：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这表明，邓小平的法定地位首先必须取决于毛泽东，毫无疑问，当初在周恩来的极力主张下，毛泽东不仅批准了邓小平在 1973 年复职，而且也批准了四届人大对邓小平的人事安排，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虽然周恩来的个人威信不再能够保护“四个现代化”和邓小平本人，但传统的影响仍然起到了减弱毛泽东的权威这样的作用。在周恩来去世后的一个月里，毛泽东虽然能够把邓小平从当时的领导岗位上摆开，并任命华国锋作代总理，但他毕竟没有取消邓小平的头衔，也没有任命华国锋为正式的总理。据报道，政治局的一些重要成员，例如叶剑英和李先念，对“批邓”都

消极对待。只是在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人民群众的抗议浪潮震动了领导阶层），华国锋才被正式任命为总理，同时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然而，阻力仍然存在。尽管毛泽东一再指示批邓，但仍允许邓留在党内，而且，邓小平的亲信也没有完全遭到清洗。据说，许世友在天安门事件后曾陪同邓小平去华南，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曾会见过许多领导人，随着毛泽东即将去世，这些领导人开始酝酿同“四人帮”最后摊牌。但这些成员中都没有一个人打算对濒临死亡的领袖本人采取行动。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越来越公开化了，一些要求入党的人甚至受到讥讽。党政机关中也出现了那种只图个人享乐的剥削阶级观点，而且那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象越来越多。由于腐败现象进一步蔓延，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同样严重影响到党政机关。其结果是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邓小平曾带着依恋的口吻说：“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話，全国照办，非常顶事。”然而，这种早年的合法性基础并没有迅速得到恢复。

1976年10月初，“四人帮”被捕之后，华国锋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毫无疑问，这是政治局其他成员做出的决定。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是与整个高层领导的政治需要相吻合的。出于稳定大局和连续性的考虑，高层领导在选举华国锋为新的党中央主席时采取了合作的态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彻底承认了华国锋的合法性，也不意味着他们对华国锋被选为接班人不再抱怀疑态度。

从许世友和韦国清的陈述中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许多高级干部都认为，1976年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这种情绪导致了他们在毛泽东生前抵制他的愿望，在毛泽东死后不久就在党的正式会议之外同“四人帮”直接摊牌。“四人帮”倒台以后，对邓小平受迫害一案，只是给予了平反，恢复了邓的工作，但并没有赋予他作为领袖的地位。然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当初曾被慎重地安排接替了周恩来的位置（后来甚至接替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这一安排具有合法性。相比之下，华国锋却显得有篡位之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邓小平的真诚与信任从一开始就威胁着华国锋的地位。

总之，各种合法性的原则虽然包含有支持华国锋领袖地位的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相反的因素，从而削弱了他的地位。然而，威胁华国锋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邓小平1977年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并重新发挥重要作用，随着邓小平重返政治局，华国锋作为领袖的正式地位很快便由于邓小平以事实上的领袖身份出现而蒙上了阴影。华国锋在高层领导中努力寻求支持以维持他的领袖地位，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以及在华以后的时期里，一个真正的具有领袖地位的领导人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了。

卓越的邓小平

当邓小平做了必要的自我批评之后（这种自我批评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安抚反对他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应当适当地维护毛主席名誉的人），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重新选出，从而掌握了他在周恩来逝世后所失去的全部权力。更为重要的是，是邓小平而不是华国锋在新的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很快就明朗化

了。甚至在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停止的时候，根据一些观察家得到的有关这两位领导人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人们看到华国锋对邓小平这位老同事采取了一种谦恭的态度。后来，当华国锋被解除主席职务时，绝大多数高层领导人都希望邓小平担任这一最高职务。

高层领导们接受邓小平作为主要决策人的基础是什么？显然，邓小平的地位依赖于整个领导层内多数人联盟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即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年代里，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开创新时代的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专横的领袖，而邓小平恰好是这样一位领袖人物。对邓小平的这种支持直到现在依然存在，然而，如果邓小平的政策失败，或者过分的损害高层领导的利益，那么这种支持就可能消失。一旦形成这种广泛的支持，就能使邓小平在履行其领导责任时，具有合法的权力去处理重大事情，调解争端并指明总的前进方向。由于高层领导人非常希望稳定，以及缺乏正常的更换领导人的调节机制，使得对邓小平合法性的支持不容易取消。对邓小平合法性的承认，与其说是承认他的权威性的命令，不如说是承认他的地位和作用。早在邓小平复职之前就已重申集体领导的原则，邓小平复职之后又坚决支持了这一原则。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能够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在邓小平领导时期，不仅明显强调了重大决策应当经过充分讨论才能决定，而且规定如有不同意见“就采取慎重态度，往往暂时不作决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或是其他领导人）缺乏足够的权力作出指示。不管如何强调集体领导，为了保持这种体制的运转，还是需要行使领导者的决定权，而且，许多证据表明，邓小平拥有很多得到认可的这样的权力。不过，就总的情况来说，邓小平必须以策略的、劝说的方式（或者采取妥协的方法）来取得优势，而下能直接采取命令的方式……。

显然，邓小平从其值得尊敬的功绩中取得了政治支持以及合法性的承认——他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巨大的才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这种才能被称为“活的百科全书”）。但这些也只能部分地解释邓小平做为领袖而被接受的原因。不管邓小平的声望和实际才能究竟怎样，从韦伯的观点来看，他还不能产生真正的超凡魅力，因为邓小平在以前的革命斗争中还只是一个配角。并且，从法定——理性的角度考虑，虽然邓小平后来担任了特殊角色（例如他成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领袖，他还缺少一个正式的头衔，而且个人崇拜也已受到很大的限制。

关键在于传统因素方面的影响。首先，正如早已指出过的那样，邓小平被认为是周恩来的合法继承人。1975年，周恩来提议的对邓小平的任命，显然得到了党和政府中绝大多数高级干部的普遍支持。毛泽东去世后，墙上贴出的标语无疑深刻地反映了高级领导层的观点，即认为在捍卫周恩来路线方面，邓小平是一个英雄人物。甚至是“活着的周恩来”。但是仍更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虽然毛泽东曾两次罢免邓小平，但邓小平的支持者们都能够指出毛泽东在1973年曾赞成邓小平恢复工作。而且，当1980年对“四人帮”的罪行予以起诉时，曾指控“四人帮”在1974年企图阻挠毛主席批准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当然，更加重要的是，作为“文化大革命”之前被称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同志”的那少数最高领导层中的一位幸存者，邓小平享有无可置疑的威望。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地位和资历——这是传统的合法性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邓小平在毛泽东生前就已取得极高的地位；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作为一个公正的统治者，邓小

平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现在，他的这种地位随时可以转变为得到承认的正式领袖的地位。

支持邓小平的传统色彩，由于高层领导人赋予邓小平领袖地位这一特点而更加显得突出。直到 1966 年，正式的权力与建立在威信基础上的个人影响一直是重叠在一起的。那些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们具有革命家的地位和身份、而在这个政权中占据主要位置，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这种传统和法定一理性模式的发展。当时，大批有威望的干部被贬职或者是被彻底罢官，许多高级职务由那些后来地位很低的人来接替。直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甚至在局势已经恢复之后，仍有不少享有威望的老干部处在政治生活的边缘，不过，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况且，在推倒了“四人帮”这样的情况之下，高级干部阶层有正当的理由要求更新领导班子。邓小平的东山再起，不能用 1976 年底时中央政治局中大多数人的政治利益来解释。这些幸存的政治局成员有理由害怕邓小平复出，而不是欢迎他。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毫无疑问，中央委员会中有更多的人把他们的利益与邓小平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复职产生的效果，不过是反映了政治局的政治需要，即政治局想确保从那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老干部们那里赢得支持；而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对邓小平的复出，并没有起到什么重要作用，有影响的那些老干部们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时期（那时邓小平已有很高的职务和地位），看做是使中国恢复固有的发展道路的样板。因此，他们对邓小平的支持，既反映了高层领导们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尊重，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传统和历史上的等级观念。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虽然必须用传统的因素来解释邓小平的杰出作用，但邓小平本人却非常重视法定一理性原则的完善，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和加强党的稳定性。如同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在分析毛泽东的随意行为时，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封建意识以及缺乏法治传统等方面。而且，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自己的一套准则，但中国官方对此的正式评价却是：“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邓小平极力主张必须把过去过分依赖于个人的情况转变为依赖制度和程序。

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一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其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已在某些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8 年，邓小平采取了几个重大的步骤来削弱人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那种类似于宗教式的崇拜。步骤之一，是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命题。经过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到年底，对毛泽东和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就完全停止了。在随后的 4 年里，法治问题一再被强调并且得到了加强。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的体制同真正的法定一理性体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文化传统、政治斗争需要以及现行体制所固有的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邓小平的努力遇到了阻力，从对以下三个主要问题的处理过程，可以看出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这三个主要问题是：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国新宪法对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某些新规定。

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已经成为近年来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直到 1981

年6月，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才最终产生。这个官方评价积极肯定毛泽东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在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之后，决议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对华国锋接班的安排上。甚至还在这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中，1980年9月，就有人公开批评毛泽东的这种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封建式的。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华国锋在履行领袖职责中存在的不足，并且对他刚上任就搞个人崇拜进行批评。到了11月，政治局对华国锋的压力增大了，因此华国锋提出了辞呈，并建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这一职务。当时，邓小平虽然几乎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但他仍然主动拒绝担任这一职务，并提名他的长期下属胡耀邦担任。毫无疑问，邓小平选择胡耀邦是为了胡能继承他的事业。这一提议显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几天以后，“所有的人都最后同意了”。

邓小平是出于要选择一个忠实的接班人以便能够将他的路线贯彻到底这一目的而力王胡耀邦当选的，但高层领导们显然是很勉强地接受了胡耀邦。这既表明胡耀邦的政治力量还很薄弱，也引出了胡的合法性的问题。据报道，一些高级领导人对胡耀邦当选持消极态度，不仅因为他们对华国锋同情，而且因为他们对胡耀邦的主张也有疑问。还有一些人暗自将胡耀邦的功绩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所立下的功绩相比较，并且他们担心邓小平在党内形成他自己的派系。邓小平不得不做大量工作说服政治局成员赞成他的提议。从这一点来看，胡耀邦的当选一方面有点像刘少奇，另一方面又有点像华国锋。就刘少奇的情况而言，他既是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也是高层领导们一致拥护并经过一定程序确认的接班人。考察一下高级将领对选举党中央新的主席所抱的态度，对人们的思路会很有启发。据报道，他们宁愿拥护邓小平做主席，原因是邓的资格老，而当初他们同意华国锋当主席是因为华同毛泽东的关系具有象征意义。然而，要是按传统观念行事会引起不安定后果的话，那么，他们终究会支持邓小平的选择。胡耀邦的当选是对一个领袖人物所作的特殊的让步，这位领袖人物具有公认的地位，并且他成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毫无疑问，这里反映出的是邓小平的合法性，而不是邓小平后面的胡耀邦的合法性。

在改组高级领导层的同时，邓小平继续为完善党和政府的各种准则而努力，如前所述，这些努力的目标是要防止个人专断并且明确地规定出各种职能机构的权限。

自从1980年邓小平提出应结束领导职务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以来，已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国务院已替换下年迈的高级干部，并且开始说服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放弃自己的职位，而进入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虽然邓小平的一些符合法定一理性原则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些设想毕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防止个人专断尽管还有，一些阻力，但已被官方反复地强调并且已深入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像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还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权力的正常更替问题——即怎样才能使领导人以及高级领导层的选举规则化、程序比。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最重要的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已不复存在，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随意地发号施令并让别人绝对服从了。

华国锋无法与邓小平抗衡

邓小平的政策确实引起过毛泽东的怀疑。此外，周恩来逝世后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使毛主席下了清洗邓小平的决心。但邓的下台不是为“四人帮”扫清道路，而是导致华国锋被指定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尽管老革命家们在猛烈的批邓运动中处于防守地位，但他们对行政机构的控制并没有被打破。9月，当毛主席终于与世长辞时，“四人帮”便完全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伞。10月初“四人帮”的被捕，不仅是他们再三违反正统原则的报应，而且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清除“四人帮”是一个夹定性的转折点。“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一系列不同性质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返回领导岗位的条件和时机，为1966~1976年间其余受迫害者平反昭雪的速度，对“左”倾分子清洗的程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性评价，对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判断，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毛泽东采取何种态度等等。到1978年底，另一些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例如政治自由化到何种程度以及是否需要重新评价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分歧。重新评价以往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从相对正统的方针向改革方针的转变，这种改革涉及到下放权力，市场机制和恢复私有成分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同邓小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力图与过去腐化的、正统的东西决裂。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毛去世后不久的联盟出现解体。到1979年初，反对向毛的象征性地位提出任何疑问的汪东兴的“凡是派”开始全面退却，1980年底，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最后，1981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新的主席。

某些领导人（特别是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无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紧张局势和灾难怀有什么样的个人感情，但他们都缺乏兴趣去贬低“文化大革命”或“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他既是本来意义上的受害者，又是受害者的保护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乎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受益者个人的特别的行动，怀有痛苦的记忆。介于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是1966~1968年间运动的幸免于难者，这些官员以叶剑英和李先念为首。总的来说，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在1968年以后，他们的地位有升有降，呈现出不同的情况。作为一种类型，这些幸免于难者猛烈地抨击“文化大革命”。但是，比起“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来，他们受到的个人迫害当然很少，在推动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政策尽可能顺利地进行转变方面，他们抱有一定的兴趣。新时期刚开始时，人们普遍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为邓小平平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试图阻挠邓小平重新掌权。“文化大革命”的幸免于难者怀有不同程度的感情，要求重新启用邓小平，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帮助制定肯定华国锋地位的妥协方案。虽然在1980年~1981年期间，人们指责华国锋在启用邓小平的问题上起了不良作用，但是，下管怎么说，随着邓小平于1977年7月正式复出，领导层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如果把对毛以后中国的分析集中在华与邓之间所谓的继承斗争上，就无法抓住领导集团中新的力量对比的实质问题。两人之间无论存在何种程度的紧张状态，他们之间都下可能存在势均力敌的斗争；无论怎样斗，邓小平都会取得胜利。对此，双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尽管华国锋的正式职务是主席，

但许多事情很快表明：邓小平是事实上的领导人。邓所提出的政策和建议，总能变成官方的路线和人事任命。虽然并没有建立狭窄的邓小平集团，然而遵循邓小平方针的人的权力，却不断地得到加强。对此所作的最好的解释也许是：邓小平可以经受得起政策的挫折，而不必担心对他的地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威胁。

有多种原因使邓小平事实上的领袖地位得到保证。关键的因素是：他拥有“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领导核心圈子中主要幸存者这一身份。作为经历奇特的人物，使他既被毛泽东两次清洗，又得益于他曾经是这位主席晚年的“亲密战友”之一。最热情支持邓小平的，是那些同样挨过毛泽东整的人；而更根本的支持则来自那些认定邓小平是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上长期合作者的更加众多的人。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其说他形成了一种战略策略，不如说是在早期耕作中结出的果实，首先，人们普遍认为他能够“不负众望”。他不仅在1949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获得了作为政治家的很高的威望，而且在1975年形成了基本的经济纲领，这一纲领被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立即付诸实践。这一纲领允诺给大多数部门和人们带来利益。华国锋把这个纲领当成他自己的纲领，并在官方的秘密会议上宣布官。但是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是这一纲领的设计师。况且，从1956年到1966年，作为老革命家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经历，使邓小平在毛以后的中国上层机构中，布满了与邓有着重要联系的人物，以及更加众多的习惯于把邓小平视为最高权威的官员。由于“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削弱了制度模式，这些广泛的联系必然加强邓小平的地位。同华国锋这样的官员相比更加如此。

鉴于邓小平强有力的地位，自从1977年年中（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以来，谨慎的中国政治家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适应他，以便赢得他的信任。取得他们对他的纲领的支持和他们的利益的维护。然而，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领导时期的那种形势。首先，正统原则，特别是集体领导的要求——更有约束力。邓小平下仅缺乏只有像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领袖才能真正拥有的超凡魅力性权威，而且，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所强调的毛泽东滥甲权力的教训，也成为限制过分的个人权力的强大障碍。此外，几乎拥有与邓小平差不多威望的其他领导人——也许最著名的是陈云——与邓小平同在政治局，他们也有自己十分广泛的个人和机构支持的基础。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只能依谨慎原则行事，即尊重主要领导人的利益，必要时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妥协让步，努力建立一个支持他的纲领的联盟，以及把他的支持者放到关键的职位上又下忽视其他集团的利益。1980年2月重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选出的书记，以及1977年党的代表大会以后增选的政治局委员在职业、经历上的多样化，表明了邓避免在人事任命上过分插手干预这一需要。

尽管邓小平在权威上存在所有这些限制，他仍然是一位调解各种利益的强有力的领袖，而不是一个依赖任何特殊基础支持的脆弱的人物。相对来说，在有些重大的问题上，华国锋对维护他的地位几乎无能为力。无论如何，他的领导才能是无法与邓小平的能力相提并论的。除了新的政治局以外，在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前9月份的省级领导大改组过程中，所任命的大多数官员，在经历方面更多地是与邓小平而不是与华国锋有关系。华国锋的长期合作者甚少，且资历太浅，不能胜任许多重要的职务。然而，有足够资历的官员，即使与邓小平缺乏亲密的个人关系，至少也与邓小平有过交往。

在建立联盟方面，华国锋面临一些令人不快的抉择。如果他过分地站在他的“自然”支持者即“文化大革命”受益者伙伴一边，这就意味着他依靠的是上层人物中最脆弱的力量，并且要冒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和幸免于难者两方面人士愤怒的危险。但是，如果他全心全意地认同邓小平的所有政策，那么，他又会失去所有独立的支持。一种更有吸引力的选择就是，加强他与“文化大革命”幸免于难者集团的联系。这个集团以保持连续性的名义支持他，并且对邓的某些政策明显心存疑虑。但是，这个集团最终必定会支持邓小平，并且视邓为老一辈革命家中的头面人物。况且，在这种情况下，与邓小平相对照，华国锋的大胆的进取心往往要冒重大风险。这一点也很不利于华国锋。但是，邓小平却由于他的地位，由于整个领导层指望他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因而，他可以提出并且实施不受特殊利益集团欢迎的改革措施，这样做又不会招致对他地位的严重威胁。华国锋内在的缺陷意味着，他提出的任何创新措施，都会引起他不能与之疏远的集团的愤怒。

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国锋只能采取小心谨慎的策略，避免与任何集团过分的认同，同时，又试图利用他的主要资本——他明显作为毛的接班人的地位以及政权和统一的需要，等等。但是，不论华国锋有何长处，或者作为政治家的技能如何，都无法与老练坚定的邓小平相抗衡。

[法] 贝热尔。

邓小平真正把四个现代化付诸实践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是法国知名的记者和政治评论家。1985年7月6日，她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作了专题评论。她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目标是要纠正从苏联抄袭来但又不适合中国需要的经济体制”。她还认为，“邓小平也和毛泽东一样具有辩证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灵活性”，邓小平的目的之一就是“使经过革新的党既是政权和国家统一的保证，又可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工具”。下面的段落是从玛丽—克莱尔·贝热尔的文章中摘译的。

1964年，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1975年，邓小平又重新提了出来，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才真正把它付诸实践。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要纠正从苏联抄袭来但又不适合中国需要的经济体制。

起初，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好像是一种短暂的、有限的、随时可以改变的解放措施。但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明朗了，这不仅仅是要改善体制的运转情况，还要通过市场法则来改造基本的结构，由于经济结构的改革，在这项现代化政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应特别注意：第一个是改革的经济效益问题，第二是改革与政权能否相容。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其领导人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实际上，没有任何增加耕地面积的可能性，而且投资率已经很高了。因此，现代化要靠已投资的资本、生产机器和劳动力收益的增加，由于目前生产率水平很低，所以提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改革得以提高生产效率吗？农业的非集体化已经实行好几年了，它可以使我们作出一些回答。改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好处是惊人的。据中国的统计，80年代初，农业生产效率平均每年提高4.8%。然而，这些好处将减少。因为通过提高农民积极性和使用物质刺激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基本结束。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农业的继续增长只有靠技术进步了。但是，农业技术的现代化需要有大量的投资，而国家只能提供很有限的一部分投资。因此，北京的领导人打算把这一技术革命提供资金的任务，交给目前正在中国农村出现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这样一来，政权不仅仅是按改革的经济逻辑来办事，而且也是按社会逻辑来办事了。

但是，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使得纪律松懈了，并且损害了政权赖以表明它的权威的思想基础。尽管中国报界曾大力谴责过“资本主义污染”，但这种污染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外来的传染之外，还有另一种危险，这就是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颠覆。

作为共产党人和爱国者，中国领导人只能尽力防止改革中出现的这些反面东西。他们认为，现代化的目标是加强中国的实力和使之富裕。如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和民族被瓦解掉了，那么，这个现代化就是错误的了。邓小平也和毛泽东一样具有辩证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他赞成一项大胆的改革政策，又不断呼吁：“要有理想和纪律。”因此，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打算把长期管理改革的任务交给党来负责。通过整党运动和大量吸收新人（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富裕农民）入党，使经过革新的党既是政权和国家统一的保证，又可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工具。

[美] 迈斯纳：

邓小平得到了人民的爱戴

莫里斯·迈斯纳是美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知名学者。1986年，纽约自由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大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立即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好评，莫里斯·迈斯纳也被人们看成是这方面的权威而随之声誉倍增。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书评说，“有关当代中国的书籍已是浩如烟海，但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却寥寥无几，而本书当然属于寥寥无几之列。这本由迈斯纳所著的书，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中肯地评判了人民中国在本世纪四分之一多的时代里所发生的那些天翻地覆而又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它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著名刊物《图书馆杂志》也发表文章说：“在迈斯纳的这本书里，几乎没有放过人民中国的任何重要问题或任何重要的历史时期，而且其观点新颖，评价公正，并常常闪现出令人吃惊的真知的见……本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政治冲突……都进行了富有条理的分析，对那些想要了解当代中国的人来说，本书会使他们受益非浅。”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莫里斯·迈斯纳在该书第23章《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自“四人帮”倒台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指出“已经取得的许多积极的成就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的政权”。他还指出，“邓小平的政治抱负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基础之上的”，“邓小平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的力量和机敏的策略，他得到了大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得到了军方将领的广泛支持”，“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赢得了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的千百万人的同情和支持”。西方不少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使中国逐步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莫里斯·迈斯纳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既要使中国现代化，同时，又要建设起社会主义”。在西方学者当中，他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真知灼见。

下面的段落是从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

邓小平是最后一位著名的“五四”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早在20年代初期，他就是党的积极活动家。他对于毛泽东漫长的革命所作的巨大贡献使他在解放后身居要职。在1956年的中国

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刘少奇一起分别向大会作了主要报告（1949年以后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其精神及其成就在后毛泽东时代又得到重新肯定并倍受推崇）。邓小平还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这加强了他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密切联系。但是，在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却被定罪为“中国的第二号赫鲁晓夫”，并被送到江西省的一个拖拉机厂劳动。1973年，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恢复了他的高级职务；不久，他又被作为病危的周恩来的当然接班人。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邓小平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次被解除了职务。在毛泽东政权的最后几个月的阴暗岁月中，由于“四人帮”的迫害，邓小平来到了中国南方。他在人民解放军中的老战友给他提供了保护。邓小平的政治意志从未泯灭……1976年9月毛泽东的逝

世和其后

的“四人帮”被粉碎为邓小平东山再起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复出并独掌大权使他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外国记者喜欢用的一个微妙字眼），这一状况要求结束粉碎“四人帮”时结成的政治联盟。这一政治联盟是由华国锋领导的。他领导了1976年10月的政治行动，并在这一进程中使自己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班人。导致邓小平权力上升和华国锋下台的进程持续了两年多时间。邓小平无情而又老练地实现了这一转变，并且这一转变并没有引起带来“大规模动乱”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所有这些，是邓小平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邓小平之所以能成功地掌握权力，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的力量和机敏的策略，而是因为他得到了大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他的老朋友，他还得到军方将军们的广泛支持，这是他在战争年代与红军将领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的结果，邓小平经常陈述的共产党应该坚持其传统的列宁主义准则的观点，他关于提拔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时的“四人帮”及华国锋那样，坐“直升飞机”上）等看法，都迎合了老干部和党的领导人的利益及其观点。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其灾难性后果之后，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行和社会安定对文职和军方的高级官员似乎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越来越把邓小平视为自己当然的领袖。

除了老干部和军队将领之外，邓小平还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自从1958年党的“八大”以来，邓小平一直维护知识分子的利益。在1975年制定的政策文件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并允诺要给知识分子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业务上更大的自主性。因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邓小平看作是受人尊敬的周恩来的当然的接班人。

因此，邓小平的政治抱负是以强有力的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政治支持为基础的。但是，给予邓小平领导的政治联盟以强大动力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严惩邪恶的强烈要求。邓小平本人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一（实际上他曾两次受害），这个事实使他赢得了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的千百万人的同情和支持。在“文革”中受到清洗和侮辱的党的干部、遭到批判和迫害的知识分子、1700万被送往农村的知识青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受到政治批判因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到摧残的普通群众——所有这些人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上。

邓小平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而华国锋则背负着沉重的政治负担。如果说邓小平获得了中国军方和政府机构领导层的强有力的支持，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跃居高位的华国锋只能代表政权机构中不太重要的那部分人，即绝大多数是在1966年及以后的政治事件中受益的、由基层干部组成的乌合之众，不过，他们缺乏在中央一级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能力；邓小平保证要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这使他至少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华国锋既不拥有政府机构的可靠的权力基础，也得不到整个社会有意义的公众支持。实际上，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危急关头，也正是由于他缺乏权力和声望，才使他成为一个可以为政权机构不同利益集团都能够接受的人物，并使他得以领导对“四人帮”的清除。但无论是作为一个革命家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的策略都使他不具备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暂时空出来的职务的资格，为了保住他已经占据的最高职务，他只能维持毛泽东的遗产和“文化大革命”的遗产。当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受到公开批评时，他除了这样做以外也别无选择。毛泽东时代的后期遗产既是华国锋的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也是导致他不幸的政治命运的媒介。他既不能放弃这份遗产来巩固政治权力，也不能依赖这份遗产来使自己在政治上生存下去。

华国锋本人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也加速了他在政治上的不可避免的倒台。直到1976年12月，他还坚持由“四人帮”煽动起来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在这场运动已成为一个时代错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仍坚持这样做。打倒“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发动了清洗“四人帮”“隐藏的帮派分子”的运动，从而破坏了他本来可以聚集的支持自己的力量。华国锋的“百花齐放”政策促进了城市中强大的反毛泽东主义（拥护邓小平）的舆论的形成和出现。他错误地制定的10年规划反映了他的无能。华国锋本人平庸的个性和政治上的优柔寡断更使他难以巩固自己继承的最高职务和权力。因此，面对党的高级领导层和日益强大的公众舆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要求，他无力加以拒绝。1977年夏季，邓小平正式恢复了他在1976年初第二次被打倒前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久，他与华国锋、国防部长叶剑英一起成为中国三位最高领导人之一。

一旦重新获得了近乎最高领导权力的地位后，邓小平便不再愿意与华国锋平分权力，这是毫不奇怪的。人们没有忘记，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最高政治权力层的时候，正是邓小平遭到清洗和蒙受耻辱的时候。如今，邓小平决心确保自己及其军队盟友们的最高权力。在通常公开的“安定团结”的口号下，政治局内的邓小平的“实践派”与被讥讽为“凡是派”的人展开了新的斗争。前者打着尽管有些迂腐但在政治上却十分重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后者则以华国锋为代表（即使不是必然由他领导）。在整个1978年，邓小平的权力和威望不断上升，由于在官僚机构中不断清除掉了“极左分子”，这就为邓小平的新旧政治盟友提供了许多空缺。邓小平成功地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保证给知识分子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结束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下信任的状况，迅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给知识分子以业务上的自主权，在现代化的高教体制中给知识分子更多的机会并扩大他们的权威。他还暗示要实行开明的改革和政治民主化。“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代老干部的地位持续上升（由于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被打倒的毛泽东的老对手们实行“平反”，因而扩大了老干部们的队伍，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又进一步加强了邓小平的权力。被平反的还有10万政治犯，其中有知识分子、党的干部和其他人，他们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被关押或在政治上被打倒的。

在1978年的“拨乱反正”中，政治意义最为重大的莫过于党对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结论。当时，官方曾谴责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行动”，这一事件成了第二次打倒邓小平的借口。但是，在1978年秋季，曾在1976年下令民兵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市市长吴德被解除了职务，天安门的示威被宣布为“革命事件”。官方的舆论工具如今大张旗鼓地歌颂两年半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示威者们的英雄主义。在党作出这前后两次结论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天安门事件作为群众反对专制的民主要求的表现而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当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周围不断发展时，党的领导人在俯瞰广

场的会议厅里集会，准备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于1978年12月18~22日正式召开。事实表明，这次全会是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三中全会是邓小平及其“实践派”的一次决定性（即使还不是完全的）胜利。一大批邓小平的支持者进入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使邓小平能有效地控制这两个机构。多次被称为“凡是派”的成员暂时还没有被正式解除党内职务，但是，他们负责的比较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已转手他人。华国锋依然是党的正式主席，但是在全会上他除了这一头衔之外已没有任何实权。在全会上，华国锋被迫作了“自我批评”，此后他便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仅仅行使一种形式上的职能。1981年，华国锋不得不交出他的政治头衔和权力。

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最受到颂扬的决定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久，经济改革就成为后毛泽东时代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

继1978年12月在北京的三中全会上获得胜利之后，邓小平又于1979年1月底成功地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它标志着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是邓小平在政治上交的好运，才使他得以完成毛泽东和周恩来在7年前开创的这一外交历程。这使邓小平本来就十分引人注目的形象又在国外增添了光彩。

但是，邓小平很快发现他在国内有着对手。1979年初，曾经在1978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帮助过邓小平巩固权力的民主运动，无论在成员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在增长。……他们表现出一种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并否定党的政治领导。一些人还重新提出了过去的极左主张，认为中国存在一个特权“官僚阶级”的统治。1979年春季，政治开始作出反应，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组织，逮捕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如今，牢固地确立了自己作为国家“最高领袖”地位的邓小平，谴责这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犯罪分子，指责他们恢复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有害的政治方式，因此，他要求取消“四大”……

在控制下层民主运动的同时，邓小平也在上层巩固他对党和国家机构的领导，他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所有被认为是“凡是派”的人从权力位置上撤换下去，并换上他所信任的人员。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凡是派”的多数成员被撤了职，其中有汪东兴。直到1976年逮捕“四人帮”时，他一直是中央警卫部队的首脑。还有原来大寨大队的领导人陈永贵，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跃居政治局委员。“极左分子”担任的职务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右派分子”的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接替。为刘少奇平反，最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潮流，这位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上最突出的列宁主义者在死后又被恢复党籍，“文化大革命”对刘少奇的清洗被指控为“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不久，在一种彬彬有礼，但却十分重实效的气氛下，华国锋正式在政治上倒台。……1980年9月，他正式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以让位于邓小平亲自选定的继承人赵紫阳。而在同年年初，决定恢复党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曾领导过这个机构，后来被毛泽东废除），华国锋本来就没有实权的党中央主席职务已纯粹成了一个空名。邓小平最亲密的追随者胡耀邦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默默地放弃了党的主席职务这一空名。在这次会议上，党还作出了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一

年后，华国锋又失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随后便仅仅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348名委员中默默无闻的一员。这是安排给这位毛泽东的第一位也是十分平庸的一位接班人的荣誉位置。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已有4000万之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将邓小平一手创造的政治新秩序奉为神圣。邓小平称这次大会是自1945年以来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批准了邓小平的新经济政策、改革（很快便开始了部分改革）及党的人事变动。胡耀邦总书记被确认为党的领袖，废除了党的主席一职，这使中国共产党的结构与苏联共产党十分相似，……大会指责许多基层党员具有极左倾向，极左一词现在被广泛用来指对执行邓小平的政策缺乏热情或缺乏效率。尽管邓小平宁愿在幕后领导党，安排自己的信徒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但是，在1981年，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也确实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怀疑。

毛泽东评价问题

邓小平建立后毛泽东的秩序不仅需要清除他的政治对手，启用忠实于人民共和国的新领导人，而且还需要破除对毛泽东的神话。……毛泽东曾预言，未来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而他的继承人则决心证明，决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

然而，要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历史评价，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业。这不仅因为，已故的主席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对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不管他们对这位他们与之长期共事的前领导人个人怀有什么感情，他们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回溯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正是出于这些历史的和政治方面的考虑，1980年夏，当党的高级领导人起草关于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在一次很能反映邓小平心境的讲话中，邓小平谈到，要对毛泽东的功绩作出“适当的评价”，同时提醒人们说，否则，“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过。”……

但是，邓小平的目的并不是把毛泽东与“四人帮”联系起来对待。邓小平恰恰是要通过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区别开来以拯救历史上的毛泽东，尽管他现在所拯救的是一个声誉已大大降低并且也像普通人那样犯过错误的毛泽东。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分开是通过区别“错误”与“罪行”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区别是1980年夏天由邓小平决定的。……邓小平的许多意见都强调要“肯定”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并批评他的政治思想错误。虽然有一些党的干部（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对毛泽东抱有怨恨，但是，邓小平和党的其他老干部却意识到了把毛泽东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象征在政治上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大多数后毛泽东时代的党的领导人私下里对毛泽东的评价要比1981年6月通过的决议的评价要低，但是，官方决议在批评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同时，又对他作出了赞扬，这决不只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

要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它还反映了现在的领导人对早期毛泽东的真正的尊敬和由衷的钦佩（如果不是装模作样的话），即对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中华民族的解放者的毛泽东，以及在受“错误的‘左’倾”观念影响前曾经（一度）是一个杰出的经济现代化论者的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那些蒙受过多年耻辱，有时还遭到过迫害而现在又重新获得权力的党的老干部，十分留恋地怀念在自己的早期革命生涯中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以及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领导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毛泽东。他们把50年代前7年视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邓小平及其伙伴来说，他们对毛泽东的赞扬决非仅仅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他们还力图恢复1957年前，即在毛泽东还没有陷于有害的极左和乌托邦观念以前的“纯粹”的毛泽东主义。正如老资格的经济决策者陈云所评论的那样：“如果毛泽东在1956年去世，那么，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

[美]布莱：

邓小平第一个洞察到“两个凡是”的错误

杰斯·布莱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在他的《胡耀邦传》一书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特别是作者根据他所掌握的大量材料，怀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对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刻意进行了描述，对于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粉碎“四人帮”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坚持照搬毛泽东晚年的“左”的一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坚决拥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于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第一个站出来抵制，1977年5月2日，他同胡耀邦与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978年11月，他在听取胡耀邦汇报说在复查、平反“文革”的冤案、假案过程中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感到为难时说，“怕什么！‘文革’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有困难找我，先斩影响大、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冤案。”说着就给汪东兴打电话说：“我提议，明天下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要不要推倒‘两个凡是’，每个委员都要表态，这关系到究竟要不要拨乱反正、国家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电话挂了，邓小平又对胡耀邦说：“一定要从组织上解决‘两个凡是’的问题，不能再待了。十几年来伤了多少人？谁坚持‘两个凡是’，谁就必须离开领导班子。”1978年春天，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组织党校理论动态组改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发表后在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这场大讨论的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高度评价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下面两段文字摘译于杰斯·布莱的《胡耀邦传》，文字虽然不长，但仍可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背景材料”，更加全面地了解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78年5月，邓小平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提法发出挑战。中共中央随之引起不安。当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他虽然得到消息，却并不在意。

12月，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安排在“工作会议”（即预备会议，例称“打招呼会议”）上发起总攻，以压制主张“两个凡是”观点的华派人物……三中全会举行大辩论，邓派取得压倒性胜利。邓的领导地位正式被确定。

香港一些小道消息对此事的报道颇为精彩，现摘录如下：

1979年夏，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执掌大权。是年底，胡耀邦、胡乔木两人得到重用，胡耀邦接替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长，胡乔木则出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在随之而来的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中，他们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事先得从杨西光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说起，杨是中共为数众多的

笔杆子之一，对理论问题素有研究。“文化大革命”前，杨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地位次于张春桥。“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蜂拥而起，翻江倒海，差点把杨斗死。

“四人帮”垮台前，杨已获解放，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胡耀邦任组织部长时，正好《光明日报》缺总编辑，胡急需选调一位有理论水平者担任此职，以为臂助。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调杨西光担任此职。杨上任后不久，正好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以前是政教系讲师）写了一篇文章投到《光明日报》，杨看后认为可以刊登，就送给胡耀邦看。最后，经过胡、杨商量，征得邓小平同意，《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决然首先发表此文。接着，《人民日报》，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由此引发了“实践派”与“凡是派”的全面交锋。这场争论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自不待言，至今仍能感觉到它的余波。……

后来，《人民日报》公开透露：1978年4月上旬，“他（胡福明）到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光明日报社、中央党校的同志，当面给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最后定稿的这篇文章，既保持了作者的原意又加强了现实的针对性”，“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它针对什么？向谁战斗？这是不言而喻的。鼓励他写这篇文章的也不只是光明日报社，还有邓小平和胡耀邦。

“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毫无察觉。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发表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此事，并认为此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因而向华请示应付的方什，华接报后，力主慎重态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中心论点，就是否定“凡是派”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说的话，都是真理”这样一种观点。由此推而论之，毛泽东也难免有错误，既然毛泽东也有错误，那么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这个推论出来的结论符合绝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的老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因而得到普遍支持，华国锋想压也压不住了。

邓小平、胡耀邦联手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掌握了宣传上的主动权以后，接着便团结和分化华国锋左右的元老实力派。

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于1978年11月安排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他请陈云带头讲话。陈云在会上首先驳斥“凡是派”关于全盘肯定“毛泽东路线”的理论。

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我认为毛主席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遵义会议起到全国解放，也就是1949年止，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从1950年新民主主义时期至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蛮干，到1965年止，其间毛泽东从1961年起退居第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转机。但在他当政的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化

大革命”悲剧，他是最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陈云作了评毛泽东的发言后，在工作会议上，“凡是派”与“实践派”的交锋十分激烈。据后来传达报告说：“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主动找胡耀邦商量，认为会议上群情激昂，踊跃发言，应该让大家把话讲完。”由此看来，胡耀邦很可能是会议期间主论派的头面人物。等到华国锋察觉才去找胡耀邦讲话时，一切都已太迟了。

这次工作会议，为邓小平领导的实践派铺好了以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的道路。……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了实践派的路线和方针，决议今后全党都要遵照执行。

由于三中全会决定华落邓起，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要实行一条与以往 30 年完全不同的改革道路，因而，邓小平将此视为一生中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美]米切尔：

邓小平主张改革制度化

费朗兹·米切尔是美国知名学者。多年来，他密切注视中国的改革进程，悉心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1990年，威斯特维欧出版社出版了他和其他人共同撰写的《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一书，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米切尔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变化，对邓小平推行的许多方针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与评价。当然，作为西方学者，他的一些用词、提法，他的某些主张难免有我们不能苟同的地方。

下面的文字是从《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一书中摘译的。

在邓小平看来，党本身要在经济、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秩序的转变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毛泽东却把党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走向共产主义。邓小平则将党视为驾驭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朝同样目标有秩序有纪律前进的手段。在坚持全部目标的基础上，必须承认，这些看起来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矛盾的作法是合情合理的。

为了使党员群众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力图把贯彻党的总路线与政府和地方权力机关的具体管理区分开来。他谈到，在党和政府的横向分工上，在中央和地方的纵向分权上，要将权力分开。尽管这样，由于所有的人都是党员并要服从党的纪律，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因而，从理论上讲，难以超越这种在民主集中和权力分开之间的困境。

关于党政分开，邓小平在1980年8月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现在常常作为给政治改革提供了根本方向的经典原则而被引用——“一切在政府权限内的事情都将由国务院和各有关地方政府讨论。中央和地方党委将不再在此类问题上下达指示和作出决定。”他们仅行使“政治上的领导职能”。这种权力分开将扩大到地方工厂。邓小平建议，在一个工厂当中，厂长在党委领导下承担一切责任，党委仅处理重要的政治事项和原则问题，所有与生产、管理有关的事情将留给厂长处理。

邓小平采用一些新的法律秩序应用于党，目的不过是为了制定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以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干部们对法律应遵守到什么程度？这仍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党的领导地位妨碍了对法律的真正服从，不过邓小平的本意就是清洗党本身。正如同他刚开始复职时所说：“正像国家必须有法律一样，党必须有规章制度。”

邓小平的整党运动和以前的区别在于，邓小平是逐渐把运动推向深入，以便避免毛泽东时期那样，给党内生活突然带来一场混乱。正式的整党像以前一样，是建立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之上的。党员必须读书，对掌握有关文件内容的情况要进行测试。但事实上，他们以前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的活动对他们能否度过这一关很可能十分重要。那些在红卫兵组织中曾经很活跃的人物，那些在“文革”中曾经捞到权力的，或者那些曾经参与“打、砸、抢”的，或被逐出领导岗位，或至少降级使用。4年后发表的有关这次运动结果的最后报告表明，20余万党员被开除，32.5万余人被降级。尽管这一数字不到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这种情况对党的影响仍是深远的。和邓小平实行的总政策相一致，这次整党与毛泽东时期的政策应该有所不同，实际上，那些被解职的人只是从有关岗位上撤下来，并没有像毛泽东统治时期那样，

对个人予以法办。那时，被清洗的干部遭到人身侮辱，甚至丢掉了性命。

为代替那些被除名的人，补充新成员时，强调了要吸收知识分子和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在 1980 到 1986 年吸收的 600 多万人当中，22% 的被看成是“专业技术人员”。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旨在把中国军队的根本地位改变过来，从制定政策的力量转为专业的陆、海、空军力量，必须使军队服从改革后的党的指示。把军队转变成为一个能够在海、陆、空主体战争中对付装备已现代化的敌人的武装力量。使军队不是支配，而是执行党的政策，是邓小平改革方案中最难实施的一部分。

1975 年，即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周恩来把流放中的邓小平调回北京任副总理，邓当时考虑并且宣称必须进行军事改革。邓恢复了军委副主席职务，并兼任总参谋长。

邓小平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解放军将缺乏战斗力。那时，中共领导人经常担忧的是苏联进攻的危险。在邓小平的改革计划中，军队要巩固，首先须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开始。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所谓军队高级将领中存在的山头主义。

1975 年 7 月 14 日，邓小平对中央军委本身提出了同样的批评。邓直言不讳地用五个字概括了军队的缺点：肿、散，骄、奢、情。邓小平建议抓好军队的党支部，训练陆海空军联合部队，把干部从一个单位、部队调到另一个单位、部队，从高级将领到下级官兵、都给予在军校受教育的机会。为处理部队超员问题，邓小平建议过剩的军官转业。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了军队改革的整个计划方案，正像后来所实行的那样。

1977 年，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终于在最后再一次获得权力。他向军委发表讲话，在 9 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官们几乎涉及军队工作的每一个方面，显然十分重要。

邓小平想干的，确实是一次大清洗，清除所有“四人帮”的继承者，参加过“打、砸、抢”的人，和所有政治上不健康的人。必须把这些人撤下去，至少部分地撤下去，由右翼青年干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取而代之，因为这也是为了改善军队的低水平教育状况而进行的清洗，因而这也同样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其次，邓小平建议在现代战争中，要实现武器装备和训练的现代化。因为，在边界线上，已不再存在与苏联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因而，邓小平认为，对军队从根本上进行改组的时候到了。

再次，根据文件，军队必须得到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为军队服务，而且为官兵转业、复员到社会上作准备。官兵将为以后在工业、农业、科技等领域工作而接受训练。

最后，邓小平列举了在军队中实行严格纪律和消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任人唯亲现象的必要性。

尽管采取这些措施时，在提法上小心避免使解放军高级将领疏远起来，但还是和毛泽东过去的政策分道扬镳了。不过，这为建立现代化、专业化的陆海空军力量打下了基础。该计划于 1983 年开始实施，在 1983 年到 1987 年之间：裁减了 100 万军队，7 到 8 万军官或退休，或转业到地方单位工作。

[南斯拉夫]兰契奇：

邓小平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

兰契奇是南斯拉夫驻北京记者。他曾采访过中国许多党政军领导人，并写过不少关于中国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兰契奇来自于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他看问题的立场与态度与一般西方记者相比，自然有他的独特之处。下面的文字是从他 1985 年 8 月 24 日发表在南斯拉夫《政治报》上，题名为《邓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文章中摘译的。

中共中央的一位代表在同南斯拉夫驻北京记者谈话时说，中国目前正在为下个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准备，会上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改选的实质并不在于扩大党的最高机构，而在于使最高机构的成员年轻化，年纪大的成员将退出繁忙的政治生活，代替他们的将是比较年轻的人。

前提是，这些新上来的人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又有更多的知识和受过更多的教育，尤其重要的是，具有更大的决心和热情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实行宏大的现代化计划。

自毛泽东逝世后近 9 年来，党的领导机构更新过两次，一次是在十一大上，一次是在十二大上。

虽然从 1978 年到 1981 年，政治局选入了比较多的比较年轻的人，但是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直至今日仍是邓小平主要操心的一件事。

邓小平当时就主张制定干部政策，首先制定出至 1985 年的，然后制定出今后 10 年的干部政策。

在 3 年前召开的十二大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年轻化了。113 名在中央任职的中央委员当中，48% 是第一次选入党的最高机构，在地方上工作的中央委员当中，有一半是第一次选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平均年龄为 65 岁。

这些新人当中，大多数属于邓所说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人，以及“又红又专”的人。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替代年龄大的，而且也是一些致力于改革的人，不过地位越高，属于“第一梯队”的人就越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党的领导面临着“第二梯队”迅速赶上“第一梯队”的问题。许多“第二梯队”的人正接近 70 岁而不是 60 岁。

去年 10 月，邓小平再次告诫说，必须加速党的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的年轻化。他说：“我们总的形势是稳定的、团结的，不过，如果说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障碍的话，那就是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在中国解决这个问题这么难，或者看来比在其他国家难呢？

原因很多。有传统方面的因素，甚至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习惯看法，以及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做法。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年纪越大，越英明，还认为，真正的革命者是决不下台的，而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一生。直到不久前，退出政治地位并不因为年龄关系，而是因为政治上犯了错误，或者不同意现行政策。中国目前尚无具有法律效力的退休法。最后还存在一种普遍的固定看法：有权就好办事，因此通常很少有人自愿下台，领导班子年轻化一事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是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加速进行。

[美] 阚哈叶：

邓小平，推行务实改革的设计师

阚哈叶是美国研究邓小平的知名学者，曾有《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等专著和论文行世，下面的两段文字是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中摘译的。

在第一段文字中，阚哈叶读了他对邓小平的整体印象。他认为邓小平“是一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在第二段文字中，阚哈叶描述了邓小平 1979 年访问美国的情况，赞扬邓小平在美国“显示了他的魅力、智慧和直爽”，说他“立即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心”。

（一）

邓小平这位推行务实改革的设计师，并不是继承毛主席的最合乎逻辑的候选人。邓小平和毛泽东完全相反。毛泽东身材高大，具有超凡的领袖魅力，邓小平则个头矮小，似乎还有些腼腆。毛泽东是个浪漫主义者，一个陶醉于诗词的幻想家；相反，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

毛泽东相信，中国可以先于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苏联，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惰性，旧的习惯，封建的价值观和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些构成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位“伟大领袖”带领红卫兵们向这些人类弱点的堡垒发动进攻，打倒了他以前的同事和自己党内的领导成员。据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有 1 亿人。官方估计，有 3.5 万人死亡，其中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

因而，毛主席的逝世使人们暗暗地松了一口气。邓小平明了而实用的施政方针（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迎合了毛泽东之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他没有高喊什么口号，而大谈提高生活水平。他看不起那些理论家，并批评他们死抱教条的保守主义。他强调中国需要从西方获得知识和技术，以实现国防、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他拨动了无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恐怖岁月的人的心弦。邓小平属于他的时代。

（二）

在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政府制定了新的政策，号召增进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这被称之为对外开放政策。其目的不仅是获得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希望通过与世界经济联为一体来刺激中国停滞不前的经济。

与这一新政策相配合，北京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行动。中美已于 1979 年 1 月 1 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邓小平对美国进行的访问获得了成功，这使中美关系的新的篇章更加富于戏剧色彩。

1 月 28 日，邓小平到达华盛顿，开始了第一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官方访问，邓小平九大之行的目标在于巩固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

1 月 29 ~ 30 日和 1 月 31 日，邓小平与卡特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两人签署了文化和科技交流协定。……

除了这些正式协议之外，北京还原则上同意，允许美国新闻机构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卡特称这些协定代表了中美关系“一个新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两国“将

就关系全球利益的共同的问题定期进行磋商”。但是，卡特也承认：“当然，美国的安全考虑与中国的不完全一致，中国也不会分担我们的责任”。

邓小平称赞这些协定“意义重大”，并提到“这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他补充说：“有更多的双边合作领域和渠道等待我们去开拓。”

1月29日，与卡特进行第一轮会谈之前，邓小平在白宫草坪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讲，他强调苏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问题。邓小平没有直接点苏联的名，但他警告卡特说，战争的危险在增长，“我们两国有关义务共同努力维护和平”。

离开美国之前，邓小平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苏联是“战争的温床”，并警告说，莫斯科的军事力量“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因此，他建议美国不要签订任何限制武器发展的协议。

2月1日，美国和中国就卡特与邓小平的会谈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不指名地批评了苏联。不过，由于华盛顿的坚持，批评的调子放低了。

中国要求把“霸权”一词写进公报中，北京用这个词指称苏联扩张主义。美国则坚持加上“控制他国”一词，概指所有形式的侵略。最后，公报中这样写道，美国和中国“重申它们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

公报还注意到卡特与邓小平签订的协定。

新闻公报是根据中国人的要求发布的。他们认为这要比官方联合声明显得非正式一些，约束力也小些。

1月30日，邓小平在国会上会晤85位美国参议员时，谈到了中国对台湾和越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他说，中国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并“完全尊重”岛上的现实。但这位副总理又说，他不能讲排除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样的话，因为那会使他的政府将来在与国民党就统一问题谈判时，选择的余地缩小。

邓小平还公开提出中国有可能对越南用武，以解决越南入侵柬埔寨引起的争端和中越边界的紧张局势。一位参议员引用他的话说，为了保卫中国边境，“我们需要有适当的举动，我们不能允许越南为所欲为。”邓小平说，越南正在寻求“地区霸权”。

除了与总统会晤和签署公报这类官方事务之外，邓小平的华盛顿之行被大部分观察家看作是显示力量的外交旅行。

在接二连三的会见、午宴和私人交谈上，邓小平显得和蔼可亲，表现了他的魅力、智慧和直爽，立即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心。

2月1~5日，邓小平相继访问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之后，结束了他对美国为期9天的访问，使中国关于要求美国为其现代化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更为惹人注目。

2月8日，回到北京之前，邓小平在东京停留两天与日本官员举行会谈。

2月7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时，批评美国对伊朗问题不够坚定，并说华盛顿对付古巴的措施“是不好的”。

邓小平当时对田中说：“如果伊朗的混乱局面持续下去，将在沙特阿拉伯产生连锁反应。有迹象表明，这种连锁反应已经传到印度。印度似乎已准备好在柬埔寨建立伪政权，如果它被要求这样做的话。”

邓小平还告诉邓小平首相：越南入侵柬埔寨，它必须受到“惩罚”，北京将不得不实行“禁运”。

后来，大平在议会说，他并不认为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國想对越南使用武力。

[美]石池雨：

邓小平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

石池雨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研究中国对外政策问题的知名学者。1990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下面的文字是从该书摘译的。

石池雨认为，“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虽然，“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但邓小平“并没有强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增长”。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充分肯定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的立场上作出上述评论的。

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50年代末，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提倡集体领导，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面对“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邓小平支持刘少奇调整政策，扩大自由地，使单个的家庭对分给他们的2块土地的经营效果负责。邓小平有句很有

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说，他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这些结果是如何得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哲学被称为功利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

邓小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的观点。实际上，提出这种观点是为了不让激进分子们搬毛泽东的思想来阻挠他的现代化计划。另一方面，他积极提倡补充新鲜血液。为确保他身后能平稳过渡，他准备好让第二代干部接替第一代干部。为此，他推行了强迫退休的政策。

邓小平号召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由于裙带关系、懒散和低效，官僚机构变得腐化起来。邓小平千方百计在这些机构中推行制度化，并注意到中国数千年来始终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经过反复考虑，他辞去了副主席职务，而在他选定的接班人背后施加影响，希望这种方式能有助于建立一个法制化的领导体制。他还努力精简机构和军队，并对中级官员强制实行这种或那种专业培训。

邓小平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他把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他认可了对个人实行物质刺激的合法性。他的政策允许个人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经济决策，决策范围远比以前宽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就整个经济来看，他并没有强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增长。他首先在农村推行改革，并取得了成功。1984年起，他开始在城市推行他的改革计划。为刺激工作的积极性，实行了按劳分配，允许存在收入差别。

到1986年，几乎没有人怀疑，邓小平是一位有务实个性的领导人。他为责任制经济奋斗了几十年。他不喜欢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但在1978年前，他未能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80年代初，他几乎获得了制定中国发展政策的全部权力。计划经济的一些信徒们试图使他的步子放慢一些，但他不会轻易作出妥协，国为这也许是他推行自己政策的最后一个机会。

邓小平把谋求平衡运用到了处理外交问题上。他历来以对俄国人态度强硬著称，但他也和刘少奇一样，始终认为与苏联保持和平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在处理对苏联的关系时，他极力把政治与经济分开。另一方面，他毫不犹豫地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自1978年以来，中美关系尽管时有波折，但还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虽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美国帮助，邓小平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暗示美国的新朋友们不要利用这种朋友关系。邓小平时常提醒美国，他对现存的美台关系不满。一位女网球运动员叛逃到美国后，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当时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质问说，美国人怎么能不把他们朋友的女儿送回家，而过继给自己。中国外交界人士多次指出，如果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将遇到危险。按照中国人的理解，既然是朋友，就不应该干涉别人的家事。对中国人来说，朋友关系很容易发生变化。

邓小平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政治前提是，苏联从中国的边境地区和从中国的邻国撤军。朋友就不该包围对方。1979年的中越战争，被看成是由于越南进攻中国的盟友波尔布特，而对越南进行惩罚。越南的作法不可思议。中国曾倾全力援助越商人的事业，但此时却发现这位“小兄弟”背叛了“老大哥”。这两位以前的“兄弟”之争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平息下来。

显而易见，邓小平准备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们的行为像个朋友。不但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提法失去意义，而且关于第三世界的理论也逐渐放弃了。中国只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由于中国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霸权支配的世界的革命领导者，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义务感也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也宣称愿与国民党谈判，只要他们接受中国对台湾名义上的主权，就允许他们维持现状。

[德]魏克德：

邓小平不搞阴谋诡计

埃尔维因·魏克德是德国外交家。1976—1980年，他担任联邦德国驻我国大使，会见过我国不少高级领导人，特别是多次见到邓小平。他出使中国期间，正是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通过拨乱反正，开始进行新的长征的时候。他目睹了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继而第三次复出的过程，目睹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包袱重重的中国开始甩掉包袱，轻装上阵，焕发出新的生机的惊人变化，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的高兴和鼓舞。

魏克德结束在华使命，返回故国以后，写下了《1976—1980年：我在中国当大使》一书，书中披露了作者在华期间亲身经历过的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特别是介绍了他多次与邓小平交往的不少材料。作者用夹叙夹议的手法，谈到了对邓小平的印象、对他的评价。在西方人士谈论邓小平的言论、著作中，魏克德的这部书是材料比较直接、观察比较细腻、立论比较公允的一部代表作。

有必要指出，国外不少人把邓小平看成是所谓“自由主义者”，魏克德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邓是一位名符其实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还特别指出。邓小平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魏克德的这一见解显然是正确的。

下面的文字是从魏克德先生的回忆录《1976—1980年：我在中国当大使》一书中摘译出来的。

他身材矮小，也许他是这个伟大国家的领袖人物中最矮小的一位。但如果国家领导人排列站队时，可以肯定，他不是站在最后，而是站在最前面。

他和其他中国领袖人物一样，很少谈自己的事，但却非常健谈。他不谈他本人和他家庭的不幸遭遇。他遭到过谴责和诽谤。“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对他的攻击是如此蛮横，以至人们为他的生命而感到担忧。他的一位亲密的同志，一位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曾对我说，他当时决定把左轮手枪常常放在身上，以备安全。若有情况，就击毙“四人帮”。我相信，他当时有这种考虑。

在一生经历中，邓小平有过三起三落。第一次是在1933年，他当时29岁，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被毛的政敌打倒了。第二次更为严重，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下去了，7年之后，1973年他才东山再起。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在这一年第三次被打下去了，这一次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在第二年——1977年的8月又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他和客人谈话时从不涉及这些已流逝的岁月，也不谈他的第三次复出。记者却常常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经历像《圣经》上的传奇故事。可是，对记者们的这一提问，他默不作答。

他喜欢谈他老了，谈他现在的的生活。1978年，他在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有人问他，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吗？对这个问题，他作了回答。据当时报纸报道：“我不知道公元2000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无论如何，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还将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邓小平说话敏捷，不乏风趣，富于幽默感，带有讽刺性。他很活跃，口若悬河，但又十分持重，能克制自己。他久久地认真地听完别人的讲话，然后思路后晰地予以思考，对问题做出中肯的言简意赅的回答。如果他对客人

的谈话有不同意的地方，他很客气很礼貌地说出他的看法。我碰到过一次，他笑声朗朗，然后严厉地批评了中东的一个国家。如果对方谈话很单调，讲下出什么内容，他就捺不住了。在接见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齐默尔曼的时候，他常常看他的手表，大家都注视着他，如果客人未意识到的时候，他就冲着茶几前面的痰盂吐两口痰。最后用食指敲打他的表壳。他这样做，我不认为是不礼貌，人们可以很好的了解他。

1978年，一个德国记者团访问中国。当时我说了美国人希望明年就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记者就这个问题问邓小平，他是否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他笑了一笑说，我希望今年有这种可能性。听他这样说，大家都笑了起来。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0月中旬，2个月之后，1978年12月，北京和华盛顿事实上已达成协定，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邓小平喜欢谈一些不顺心的事情。1978年，中国放映了几部日本电影，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放映国外新电影、其中一部片子叫《望乡》，是描写从农村来的少女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她被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把她卖到一个妓院。影片中描写妓院里的暴行的情景是逼真的。北京的观众都为此而激怒了，引起轩然大波，群众将批评信寄到报社。最后，官方决定这部影片停止放映。当时，邓小平从东南亚访问后回国，听到这一消息。他看了这部影片后说，这没有什么问题，于是，这部影片又重新上映，并且还在电视上播出。为什么要放这部影片？他说：“我们的人民必须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的情况，也不能对自己国家的真实情况闭眼不看，国内今天还有暗娼。”

人们也不要吧邓小平看成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对所谓的“民主墙”，即批评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大字报采取压制的办法，压下去了。

1961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出现不少问题，邓小平对人民公社表示怀疑，他没有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就撤销了人民公社。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发火了：“是哪个皇帝的手谕？”

事实上，他既无金钱又无权力。人们没有指责过他与别人同谋争权。他不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狡猾小人。有一次，他的一位同事对我说，有人说邓小平投机自己想当总理，或者说毛泽东逝世后他曾要求出任总理，这是不真实的。他总是说这个职务要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

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在东南亚国家访问时谈到中国革命的目的，他说：“我们不想输出革命，也不愿把我们的贫困向国外输出。”

他知道他的国家落后。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说，中国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20年，这一估计是出于礼貌和客气。事实上我们有些领域落后30年，在其他领域落后50年。”

他说：“中国在本世纪末要接近世界水平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或要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长期与世界隔绝，闭关自守。我们过去总是夜郎自大。像以前有一个小国的国君，他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之最，不理睬周围的王国，昏昏庸庸，最后被别的国家吞并了。因此，我们今天尽可能让中国人到外国去，让外国人到中国来看看。我不知道，在你们德国有没有一些人，他们害怕中国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在政治上影响他们。他们不害怕，我们不会那样做。”

他非常敏锐，不能容忍愚蠢和脱离实际的幻想。他不能容忍那些不能干事或没有多少能力的人。这种人不要占着位子。应该走开。他严厉批评说，

“那些一向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人，走开好了，干别的去。”

我们没有听到过他谈思想教育的目的，以及社会改革、城乡矛盾、不断革命、两条路线的必然斗争。我相信，他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他认为人们判定方针政策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找出前进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实践中通过检验才是有价值的。今天的人们对此无需多加说明，情况已非常清楚。

邓小平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他认为包产到户比人民公社的生产效果好。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并用一句口头语来表达：“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北京的一次大学生的大会上，江青指责他不要共产党的思想教育，说他的思想混乱不堪、偷换概念。他说：“元关紧要。”事情是谁引出来的？毛泽东对此负有责任，他把人民公社搞过头了。要是事情脱离了实际，起不到作用，人们就应该改变它，修改计划。如果我们怕因改变政策而丢了面子，我们不可能有所作为。

人们认为，他对同时代的伟人，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尊敬不够。“文化大革命”中间，人们抨击了他。但是，他对自己不同意的问题，有礼貌地、理直气壮地公开发表意见。他对毛泽东也是这样。在毛泽东手下工作，他吃了不少苦头。

1958年以后，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职务交给他的老战友刘少奇。以后他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负责重要的领导工作。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失去了很多的权力，是刘少奇决定中国的政策。刘少奇当时亲密的同僚是邓小平。人们知道，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是一位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领导人。

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重新夺回权力。“文化大革命”的头首先指向刘少奇。从1920年以来，刘少奇站在毛泽东一边有46年之久。他们曾一起南征北战。现在他被孤立了，被否定了。当时邓小平可以利用一个机会，如果他愿意公开作自我批评，人们能理解他，这样他还可以有惊无险地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

毛泽东逝世以后，重新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消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时也成功地摘下了华国锋的标准像。今天，他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灾难。可以肯定地说，他当初也是这样看的。有这种觉悟的一个人怎么会消极厌世呢？他是否曾经害怕过？人们无从知道，但是看来他不是那样的人。无论如何他不会害怕灾难而屈服。相反，宁可说，他似乎像一些有胆略的人那样，在严峻的环境中以守为攻。

1975年，他和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生争论和分歧。在那次会议上，他以四川省为例，描绘了中国农业形势的黑暗面。江青站起来打断了他的后，她断言，人们今天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对此，邓小平尖锐地予以反驳。他并不害怕对他和他的同志的攻击。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不加理会。他反驳极左派。一些中国人认为，在邓小平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谁代替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工作比他更受欢迎。

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邓小平成了人民的希望，极左派被捕，人民要求邓小平复出，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犹豫不定，也许他觉得自己在经验和才智上比不上邓小平，当然，他还是将邓小平接回来担任领导。华国锋的这一举动仍受到人们的赞誉。人们看出，邓小平是适合很快推进改革的人物。许多中国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冷静、思考缜密

的人。人们不必再担心出现突然转变航向的事。邓小平和拥护他的人不急于上台。1979年夏天，他的作用还不大。当时，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同事认为他最后会靠边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把他们的力量系统加以扩大，同时把那些老式的、讲两条路线的政策代表，也就是说那些认为凡是毛主席所作的、所说的都是对的，即“两个凡是”的人——慢慢地从政治局排出去。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它赢得了人民极大的信任。现在它部分地失去了这一信任。邓小平看到了这一事实，并认为首要的事情是要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美]戴维：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

C.戴维是著名华裔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学教授。曾有多种著作行世。他的两本最著名的著作都是关于邓小平的，一本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中译本书名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和邓小平》），1984年出版；另一本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89年出版。为了写好这两本书，作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了大量材料，特别是来中国实地作调查研究，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学者和普通群众。他是抱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的态度写完这两本书的，他在书中以十年动乱为背景，不仅描写出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而且展示了邓小平的人品和治国艺术，介绍了邓小平的一些基本思想，赞颂了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C.戴维教授的视角和手法新颖独到，看问题比较符合实际，由此可看出C.戴维这位美国研究中国当代政治问题的著名专家的大家手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他说：“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是一个带有传统色彩和务实主义色彩的现代革命家”，他指出，“即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地方工作经验也没他丰富，同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同样比不上他。”他特别认为，近年来，“在物质进步、社会安定、自由民主以及贯彻四个现代化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超过了他前面的任何一位领导人”。他的这些看法，不无启迪思维之处。

当然，由于C.戴维教授生活在美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阅历势必影响他的观察与分析判断，因而他的一些提法观点难免不妥、甚至有错误之处，他引用的某些史料也难免不十分准确，这不足为怪，相信读者能够鉴别。

下面的文字是从C.戴维教授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和《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两本书摘译的。

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

毛泽东去世前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设计出了国家新的领导机构，这一结构毫无疑问会影响到邓小平长期离开政治生涯之后的中国的发展。……林彪的失败使得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上升，从而有可能在仍处于过渡阶段时，构思新的领导结构并在后来确立起新的领导体制。这一新的体制有助于指导中国迈入21世纪。

自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以典型的务实风格发挥自己的作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他能够保持自己的总理职位。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了林彪作为党的未来主席的地位，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周恩来承认了这一点。……林彪叛逃失败以后，周恩来常常代表毛泽东发表讲话，采取行动。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还保护着邓小平。正是他在1976年元月的去世引起了权力争夺的新的风暴。邓小平也随之第二次从公众场合消失。4个月之后的清明节，北京的人民群众以如此庄严动人的方式向他表示敬意，以致导致了“四·五运动”。这场运动进一步使邓小平受到牵连，使得他在党内的高级地位受到损害，同时也再一次受到谴责……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

指责为“第2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常常承认他在历史上的错误。他的一家在红卫兵运动席卷神州之际也遭到许许多多迫害。邓小平本人总是显得敢于犯颜直谏。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是一个理智的、温和的改革家。就像周恩来一样，他不是一个无视现实的“左”的理论家，但是，他敢于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斗争，为此不惜冒险。他是一个务实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有力量的组织家和行政专家。邓小平能做到随时承认可能的错误及纠正的必要。然而，每一次他重新出来工作，他都坚持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即使这使得他看来前后可能不一致。因而，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政治生活充满了风暴。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他重新出来工作之前，他曾经两次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在1977年重新得到任命以来的斗争经历相当多地显示了他的特性、他的决心、他的政治策略、他对精心管理之下的未来中国的展望以及关于在他之后新的领导继承问题的观点。

他献身于使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胜利的事业。邓小平不在乎意识形态上的白猫黑猫之争，只要猫能逮到老鼠就行。在他看来，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是一个没有必要加以争论的问题，只要这种修正是必要的、合理的、实事求是的。1977年他复出后，在党的会议上讲话时，他保证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在过去的几年里，邓小平领导党和国家极大地清除了原来那一套“左”的东西，但并没有背离毛泽东思想。他提出了一条务实的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立场就是把所有思想都拿到实践中去经受检验。他充满风暴的生涯表明他迫切希望为党和国家服务。例如，1971年，他听到林彪倒台的消息之后，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要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毛泽东同意了邓小平的来信，并批示把信印发到全国，向群众传达。邓小平在1973年4月作为副总理重新出来工作之前，作为一名干部，在一个工厂劳动，同时耐心地等待中央重新安排他出来工作。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最后在党和政府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文化大革命”期间接近于毛泽东的一些人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四人帮”被交付法庭审判。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了各种努力重新安置和任命各种干部。最后华国锋辞去了总理和党的主席两项职务。邓小平说服他亲近的温和派的同事们从他们的高级领导职务岗位上退下来，以便允许年轻的领导人在党和政府中负起最主要的责任，这反映出邓小平非凡的能力。对全盘通盘考虑之后，邓小平以其娴熟的政治艺术主动采取行动，完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晚年没有做到的事情。跟周恩来不同的是，邓小平按照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自己的行动。在另一方面，周恩来则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关系，调和与极左派别之间的分歧，同时，不得不注意自己日益虚弱的身体。因而，周恩来在事实上是毛泽东的政治生活的助手，而邓小平自1977年复出以来，他实实在在地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战略。……

正是由于人们衷心地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工业化的民主国家，许许多多的人才欢呼周恩来和邓小平力代表的温和领袖在政治上听取得的胜利。……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剧了领导和群众的分裂。只是由于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继续拨乱反正，才重新赢得了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支持。然而，本书的目的仅仅在于努力了解周恩来和邓小平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自林彪倒台以来所起的作用，这两位温和务实的人在其教育和生活经历上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是在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中国方面，他们的目标都毫无区别，这一点使 they 和“四人帮”泾渭

分明。

例如，周恩来出生于一个饱读诗书的家庭。邓小平作为一个工读学生到欧洲勤工俭学以前，则不像周恩来那样受过这么正规的教育。两人在运用共产主义的艺术方面大不相同。周恩来与其对手打交道时更耐心、更含蓄。另一方面，邓小平向敌人发起攻击时，总是态度明朗、咄咄逼人，一位是调和者，和平的设计者，争论的调停者。另一位是抗衡者，战场的战斗者和独立的计划者。周恩来的大部分经验都集中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方面，集中在共产党的谈判方面和外交事务方面。邓小平则具有更多的国内事务方面的经验；从 1926 年开始担任低级职务到后来担任高级官员：野战军政委、地方党政首脑、党的总书记、财政部长、副总理，还处理了中苏冲突、中美建交这样的高级外交事务。周恩来与邓小平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两人在党政工作中都有丰富的经验。然而，自 1935 年以来，在每一次权力斗争中，周恩来都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由于他自己在党内的影响，由于他自己的才华，他能常常使自己不依赖于毛泽东。邓小平也十分忠实于毛泽东，但是，在政策和党的事务方面，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尽管他从来也不反对毛泽东。这几个重大的差异也许能说明这一事实，即周恩来从未受到过清洗，而邓小平则两次被撤掉职务，受到公开批判。只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党内夺权斗争的特殊环境才使得邓小平作为温和政策的领袖不可避免地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而周恩来在林彪摔死之后曾经更为有力地支持这种温和政策。

华国锋在 1981 年辞去党的主席之后，邓小平的时代开始了。在领导体制方面也许会出现许多变化。周恩来和邓小平曾经一道制止极左思潮。他们两人都要求党和政府稳定化和制度化。自林彪倒台以来，他们的政策倾向反映了通过不屈不挠的和平建设，建设一个现代工业化的强大国家这一基本的革命目标，可以肯定，只要在邓小平的拥护者的领导下，许多教条主义的观点会失去它们的价值。中国同日本、美国和西欧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扩大不仅会迅速地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会很快地影响中国在调整和改革方面的国内政策。如果邓小平选定的领导人能充满信心成功地超越 20 世纪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负担，使中国走上温和、稳步发展的道路，那么，辛亥革命的种种目标，“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也许能够实现。那时，中国也就能再一次成为真正的中国。中国将不必抛弃她伟大的人本主义文明，真正进入现代世界的行列。

在中国和法国的早期生涯

邓小平自己 16 岁时，和在国家危机时代追求“新知识”，寻求个人成就的其他许多雄心勃勃的冒险者一样，来到重庆听课，准备参加去法国留学的资格考试。他考试获胜，是四川省政府保送的 92 名学生中的前 10 名之一。1920 年夏，在去法国的船上，邓小平担任这组学生的领导，这是年轻的邓小平在他学生同伴中首次显示组织领导能力。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留法中国学生要用部分时间劳动，以支付教育费用，但相当多的人不久就开始全天工作了。邓小平也是不单纯追求正规学院学习的学生之一，他在一家橡胶鞋厂全天工作。抵达法国不久，邓小平便发现，他的中国同伴分成了很多派，有些是赞同 1911 年推翻满清统治的国民党，其他一些则是各种各样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17 岁的邓小平，同其他许多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一

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在法国的5年中，邓小平没有把时间用于读书和其他娱乐上，而是用在紧张的思想、工作以及对中国的未来和中国革命道路的辩论上。……欧洲支部的成员们把1923年莫斯科和广东政府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视为中国国共合作这一迫切需要的自然结果。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西欧到莫斯科，接受中山大学的训练。邓小平也毫无例外地抱有同样的幻想，这一幻想也同样吸引了中国国内的许多年轻人。

……正是在莫斯科，邓小平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了解到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他在法国最要好的朋友中，有2位杰出的人物：赵世炎和陈延年，这两人在邓小平回国一年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被杀害。邓小平自己，简单地说，无论在欧洲时还是回国后不久，都并不十分突出。他被中共的中央当局从一处派往另一处，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看到苏联而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并走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倍受鼓舞，希望中国借鉴并引进苏联革命的成果。但那时的中国，和他6年前去法国离开中国时一样，内有分裂，外遭剥削。1926年对邓小平来说，正是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成熟时机，这一运动已得到苏联的有力支持。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似乎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似乎都谋求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谋求国家统一，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尽管他们的根本目标、意识形态以至革命的道路都不相同。

更进一步说，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裂痕，更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同地方反革命军阀的斗争，也为中国各左派进步势力在20年代的合作提供了大好时机。其中一个军阀，冯玉祥，1926年在苏联访问回国后就加入了国民党。冯玉祥统率着约10万人的农民部队，如果派一个精明强干的共产主义者去从事政治和宣传工作，这支农民部队就会受影响，并得到加强，甚至会被争取到共产主义者的行列中。邓小平正适合这一工作，他被派往冯玉祥的部队，进行渗透活动。

在冯玉祥部队中，邓小平担任主管政治工作的领导。他还被冯玉祥任命为中山军政学校的教务长，培训冯的官员。同时，邓小平还在冯玉祥和北伐军的势力中间起着协调作用。当冯玉祥的部队牵制着中国北方军阀的势力时，革命力量于1926年10月进军到武汉。简言之，冯玉祥和邓小平都立下了功勋，他们为推进中国西部革命力量早期的成功作出了努力。邓小平自己虽然在并不宽松的环境中工作，却显得更具独立性，这和他法国时的年长的同志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不同，这3人都被派往广州工作。

不久，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谈和，蒋介石很快就开始清洗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大约50名著名共产党人一起，被冯玉祥驱逐出部队。但是，由于邓小平和他的共产党同僚所灌输的理论的影响，许多非共产党员的党代表和指挥官不久以后都站到了共产党这一边。邓小平被冯玉祥驱逐没多久，国民党人汪精卫在武汉免去了所有苏联顾问之职，并清洗其他共产党员。他还同蒋介石言归于好。

1929年，周恩来派邓小平潜入李宗仁的部队，邓很快在李宗仁的部队中组织起行动委员会。……不久，他就使李的一些官员改变了信仰。对李和邓都不幸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慢慢地却稳步地向李压过来，这一次，邓小平组织起了地下党组织，躲过了蒋介石势力的追捕。他们向西行进，占据了一个敌人尚未进攻的不毛之地……短短几十月，他就为百色起义作好了准

备。这次起义，成功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根据地。他有效地把自己的力量组织成红七军，他担任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

1929年，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在上海通过了城市起义的计划，邓小平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奉命支援攻打城市的部队。邓小平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成立一周年前夕，红七军奉命开赴华中的武汉。在行军过程中，由于给养不足和其他困苦，部队进一步被削弱，不断遭受损失。军长张云逸被迫放弃南方，邓小平则率领一个较小的分队到达湖南，进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穷乡僻壤建立的游击根据地。……

1931年，邓小平在中共领导集团中的地位仍不太高，虽然他在组织军队和地方自治政府方面积累了独特的经验。1929年，他抵达毛泽东的游击根据地时就发现，在对待南京政府围剿的战略问题上，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权力斗争和分裂。同时，斯大林送回的“28个布尔什维克”也同毛泽东抗衡，谋求中央领导权。……邓小平和周恩来一样，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相反，他从那时起，就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政策主张，他和毛泽东都赞成实行土地改革和游击战略。……1933年，当这些新回国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对毛泽东农村游击主义的支持者予以排斥时，邓小平在地方的行政职务被解除了。他被调往红军宣传部，编辑红军的《红星报》。1934年长征开始，邓小平随红一方面军离开了苏区根据地。

邓小平的复职与和平革命

由于邓小平在1949年前后对社会主义革命所做的贡献，由于他的个人威望和影响，他在1977年的复职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以后，许多同事和忠心耿耿的同志都希望他来领导，或与华国锋共同行使权力。而邓小平看来则对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有着终生不渝的追求。早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的1975年元月，他和周恩来就宣布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他还于同年负责制订了奔向这一目标的规划。不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最初看来还是出自1956年邓小平和刘少奇内助起草的中共八大政纲。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甚至包括从孙中山、蒋介石以来的国民党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邓小平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之间，仅仅只有手段的分歧，正是这些分歧使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从政府中清除那些非毛泽东主义的温和派。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来说，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既损害了国家，也损害了他们自己。因此，毛泽东逝世后，人民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欢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并赞颂已故总理周恩来，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邓小平这次复职，似乎还负有一项新的革命使命——进行一场和平革命，以重建一个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国家。

在考虑和实施进一步改革时，在毛泽东以后的这些领导人面前出现了众多的困难和难题。……1977年以来，邓小平主义者才逐渐认识到，在真正开始现代化建设之前，他们必须排除毛泽东极左理论留下的思想障碍和政治局中的极左势力。他们已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人民对实现现代化的愿望，以及国家对此的准备不足。在西方人士看来，这个社会最大的不足，乃是“上层建筑”没法适应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最严重的危机还是中国10亿以上的庞大

人口都需要吃的。不难设想，已经承诺的四个现代化在生活水平、教育、交通。都市化、工业和国防等各个领域全面实现以前，可能需要进行三个、四个甚至更多个十年的努力。在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看来还刚刚拉开和平革命的序幕。

邓小平还提出，要在3年时间内，完成对干部特殊化的整顿。

那些无视1978年三中全会关于干部特殊化问题决定的人必须撤职，那些年事已高、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必须在不减少收入的情况

下退休。同样的腐败现象也存在于解放军内。党的许多出版物都对高级干部中令人不能容忍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批评。但是，政府机关中腐败现象最严重的还是在地方政府部门，在那里，干部最靠近农民和工人，而后者往往不敢对他们进行批评，否则，当地干部便会对农民和工人进行威胁和报复。今后的各种法规必须在地方一致有效地执行，对那里的干部必须进行再教育，以便能认真地落实党的政策，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总之，1981年华国锋辞职后，一场和平革命便开始了。邓小平主义者在领导权和决策权上都已取得彻底胜利。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乃是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尽管在政治思想上互相有分歧，但他们对这一目标有着共同的追求。现在继往开来的任务落到了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肩上。人民终于已能向他们的领导人反映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富裕、自由、民主和安全。新的领导班子应该接过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高度先进的、文明的、不受外国思想束缚的强国的旗帜。

中国已出现过一场接一场革命，一场接一场权力斗争的动乱，现在，是党和政府摒弃个人分歧，在未来几十年里一心一意干四化的时候了。中国人民会有耐心等待和判断一个特定的思想意识或特定的领导班子能否适合于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灾难之后，在毛泽东逝世以来又经过半个10年的斗争与冲突之后，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确实已开始了一场新的“和平革命”。

为顺利而连贯地推进和平改革，在邓小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温和政策获胜4年之后，在华国锋辞去党主席职务一年多以后，期待已久的第十二届党代会终于在1982年9月召开了。邓小平本人宣布了这次有1545名代表和145名候补代表的大会的开幕。……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开创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对外关系中，邓小平强调要独立自主，驳斥了外国希望中国成为其附庸或吞下损害本国利益的苦果的企图。台湾回归祖国和反对外国霸权主义，这突出了他旨在维护80年代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外交政策的重点。……

在推选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和其他领导机构成员时，注意降低了新领导人的平均年龄。在以不同的人为首的几个中央部门中，现在已形成了共同行使领导权、共同负责的局面。但是，总的来看，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在过去五年政策改革与交接班斗争中邓小平个人的全面胜利。对于所有老一代温和派领导人，特别是对于已故的周恩来和刘少奇来说，这也是最后的胜利。随着新领导人在邓小平指引下加速前进，在未来的岁月里，各个领域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邓小平的领导特征

邓小平是现代中国许多不寻常方面的唯一领导人。例如，他两度被罢免，两次给毛泽东和华国锋写信，要求复职。1973年他复职以前，曾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有一个为国家工作的机会。毛泽东把信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传阅。1974—1975年，周恩来住院期间，邓小平卓有成效地管理军务（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党务（担任党的副主席），并担任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日理万机，成为最忙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仅次于毛和周的第三号人物。林彪倒台以后，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全面整顿工作。他和“四人帮”对着干，和他们发生了冲突，得罪了他们，因而这导致在周恩来去世后不久他第二次下台。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邓立即写信给当时的总理华国锋，要求重回政府工作。华在处理他的申请问题上很谨慎。于是，邓又一次给华写信，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力量势不可挡。1977年，华国锋除了让邓复职外已别无选择。……

邓小平是怎样得到这个唯一的领导职位的呢？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第一，这是个命运问题，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经历和地位，较之后来被清洗的政治家如前北京市市长彭真、前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等都要丰富和优越；第二，他属于参加过长征的老一辈，他的年纪却不大，这就使他具备了作为又年轻又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家的条件，因而最能博得比他小的人的忠诚与尊敬；第三，由于邓是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并因此遭到清洗，刘少奇那时是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但刘死得太早；第四，邓小平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莫须有罪名打倒的同志恢复了名誉，为他们恢复和安排了以前的或新的职务，因此，他受到高度的拥护。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因为好几百万领导干部正等待着恢复名誉和职务。他用赔偿现金的办法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侮辱人格和毁坏财产的做法，这种做法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作为纠正政府错误做法的结果，邓小平的政治威信在公众的欢呼声中树立起来；第五，邓小平和党、政、军内的极左派及其影响作斗争，赢得了许多像他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个人及团体的感激。否定“文化大革命”，其结果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的开始；最后，邓小平为最终有利于实现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革命目标，他采取了发展经济、造福人民及加强共产党政权的新政策，这是他作为一位老革命家，赢得名望和政治才能的一个源泉。

邓小平的领导特征，可能来自这样的背景，他是20年代以来唯一到国外广泛旅行过的中央领导人。他有在民主、自由的法国生活几年的经历；1949年以后，他经常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在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1974年，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1978年中美两国外交大门正式打开后，作为中国的“铁腕人物”，邓小平立即作为美国政府的国宾访问美国。这样，邓像周恩来一样，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情况。这些独特的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作用。1975年1月，周恩来对全国人民代表宣布了四个现代化，这代表了邓小平的纲领，同时也得到了党内稳健派的支持。1975年，周恩来住院的最后期间，极左派发动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反对周一邓“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又一次说明邓小平

是一个为了改革和国家利益而情愿付出一切政治代价的对抗主义者。另一方面，也说明周恩来作为中国危急时刻的管家，是一个为了使党和政府内部各派之间意见一致而准备付出任何个人代价的协调者。

当代中国的革命领袖们如果能以他们在自由、平等、民主、物质进步、和平及政治稳定方面的成绩作为标准进行衡量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成就，仅在华国锋解职后的几年中，就非常引人注目。他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的进步上，还表现在人民的精神面貌上。很多方面表明，邓小平是唯一能经受各种挑战的领袖人物。虽然在1978年以前，邓小平还不能与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相媲美，但在最近的5年中，他在物质进步、社会安定、自由民主以及贯彻四个现代化政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了他前面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以前，他就因为这一点而出名。他过去的政策观点很有名。大约30年前，他当党的总书记时，在一篇报告中说：

“我国是一个有6亿人口的国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而团结这么多的人是一项光荣而且艰巨的任务，要实现这个团结，我们必须同所有的人协商共事。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那时，他正反对毛泽东大办农村公社的“大跃进”的建议。很久以前，邓小平就认识到，中国幅员辽阔，一个遥远的中央政府全盘控制是不行的。应该允许人民群众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这恰恰是近8年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农民们在中央政府尚未制订正式政策之前就分了公社的地。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区别在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一点是绝对明智的，同时也是观念方面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为了做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邓小平认真考虑并采纳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邓小平把纪律与自由相结合，是为了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如果把他看作一个带有传统色彩和务实主义色彩的革命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将更容易被看成是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真正代表。

邓小平领导特征的另一面是偏爱组织处理，他自己就是一个按制度办事的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党务工作者，他经常在八路军中的各部门代理党的领导工作。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也仍然如此。在这样的职位上，他必须作出不仅能代表上级党组织而且又能得到同级军事指挥官支持的决策。中层机关里的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工作经验，使他养成了决策制度化的习惯，同时，他也了解和熟悉军事指挥员。1947—1950年期间，情况更是如此。当时他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和野战军指挥员一起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上海地区，以后又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直至在这一地区取得彻底胜利为止，他实际上行使了最高权力。国内战争这几年，有助于他在军队中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也有助于密切他和野战军将领的私人关系。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后，这些将领曾支持他重返党政部门工作。对他作为今日中国的“舵手”来说，这些独特的历史背景特别有用。

邓小平领导的第三十特征是，他从不在党、政、军任何部门搞自己的小宗派。这一点为党的领导集团所公认。邓像周恩来一样，十分尊重各级政府官员。他到处都有忠实的朋友和下级，但不是小集团联盟。毛泽东去世后，

在他争取复职的斗争中，他几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因为他在党内的影响，他的才华和他的主张所形成的。他比周恩来更具有地方和中央各级政府机关的实际工作经验。50年代初，他刚从西南调到中央，在周恩来手下担任财政部长，并担任党的总书记。自那时起，他就以头脑敏捷、口才出众、具有管理天才而著称。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免职为止，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有20余年（原文如此——译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人有他这样丰富的经验。即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地方工作经验也没他丰富，同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同样比不上他。如果不是因为“四人帮”怂恿毛泽东解除了邓的职务，以邓小平的丰富经验和管理才能，无疑是周恩来理想的接班人。毛的这一做法，在全国引起了愤怒，1976年4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要求为周和邓昭雪的暴力事件。

邓小平领导特征的第四个方面，是他取得对华国锋斗争的胜利后，牢牢地把握住了领导集团。自那以来的新政治环境，使得邓小平第一次能对所有重要决策作最后的仲裁。和毛泽东一样，他是所有事情的决策者，但他身上没有个人崇拜。实际上，他更愿意依照部下不同的组织能力，将决策权交给他们，从而为自己留出大部分时间来考虑战略、人事、改革目标和机构调整等问题。总之，他处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顶峰，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决策环境，毛泽东还未曾有过。另一方面，周恩来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地作出过主要的和独立的决策，他仅仅是巧妙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并认真负责地贯彻已作出的决定。相形之下，邓小平却能否决已经作出的决定，并公之于众。出于他的意志和政治需要，邓小平显然不愿意在党和政府中任职，这样，在权力交接时，就可以使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退休。他始终关注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进行集体决策。这样，洛德·阿克顿的名言“绝对的权力和极权都导致腐败”，就不一定适用于邓小平，至少邓以前不适合这一名言。非常明显的一点是，邓小平不会让自己成为第二个毛泽东。

[匈牙利]代内什：

邓小平的改革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受益

巴拉奇·代内什是匈牙利著名的记者和作家，是中国人民熟悉的国外名记者之一。他较长时间在中国从事采访和报道，对我国情况比较熟悉。自 1973 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目睹了邓小平复出与再次被打倒，接着又再次复出的过程，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从而对邓小平产生了高度的敬意，对研究邓小平实践和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多方积累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邓小平》一书，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邓小平的光辉生平和一些主要思想。该中译本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

下面的文字是从中译本中节录的。

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那是在 1973 年 4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独自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 7 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边就坐。这于是 1973 年 4 月 12 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当宴会接近结束时（大概是上第 7、第 8 道菜的时候），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是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当读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可是，4 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对于记者们的

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任务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10年后我重访北京。那时，人们已经知道，邓小平1976年的再次倒台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戏剧性的插曲。其间，这位四川出生的政治家经历了他漫长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政策制定人。简而言之，他成了这个国家的领袖。

有人曾经这样写道，邓小平的真正作用始于他69岁时那一次4月举行的宴会。事情自然并非如此，当时开始的事不过是他漫长的人生经历的逻辑性的延续。他的经历早在1966年前就已经使他成了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虽然“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的总书记职务，在等级体制中只是第6、第7个位子，但是，在数亿中国人中，或者说在当时1000多万党员中，居于第6位的也决非常人。然而，上述论断也不无一点道理，因为，正是从那时候起，邓小平成了国家生活的中心人物，一条政治路线的突出代表。同他过去的经历相仿的事，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不少领导人都遇到过。而此后发生的一切却是独一无二，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些在毛泽东之后改造中国的强大力量，以不可抗拒之势，把邓小平推到了政治生活的中心。由于这是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五个核大国之一，由于以邓小平名字为标志的改革方案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可以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中汲取教益，由于这一新的政策直接产生在“文化革命”的骇人风暴之后，从一般意义上说，它又为缓和以中国和发达的工业社会相遇为起点的150年文明矛盾提供了机遇、人们来了解这位新阶段最主要的建筑师，无论如何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否有可能呢？迄今为止，邓小平总是不同意在国内发表他的传略。他在1986年9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道：“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指的是例如没有反对“大跃进”等，因此，错误中也有他的份。他还说：“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这当然是他个人特有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嘲讽精神。……

自从邓小平16岁那年参加中国革命活动起，他的名字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不断出现在各个历史性事件的中心。……那些经历了革命全过程的人——其问他们成了掌权的人物，虽然也曾一度失去过权力——把邓小平推上了今天的地位。他们认为，邓小平最明白无误地为当代总结了这段旅程的教训，邓小平积累了最广泛的经验，并且有能力最好地运用这些经验。……

我写的既非干使，也不是魔鬼，我在这里向读者介绍的是政治家，那些过去和今天仍在为人类五分之一人口寻找道路的政治家。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成功地创造了几乎无法完成的事业，但是，当他急于实现一个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时，他失败了。也有人在那震撼天地的梦想破灭之后宣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值得一提的是，这句话正是从前者借用来的，借以唤醒全国），用日常的政治语言说得更通俗一点，这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在中国，过去好多年来把宣传这一口号当作邓小平的罪状，今天则成了

他的功绩。至于笔者，在北京度过的岁月告诉我，说出这样的话，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胆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提倡现实主义的并非邓小平一人，但只有他成功地使大家接受了这一观点。

第一次裂痕

在党内，高岗、饶漱石事件无疑是 1949 年全国胜利后出现的第一次较严重的裂痕。这两个领导人的地位的上升，与毛泽东没有多大关系。满洲是苏军全歼日本关东军的地方，1955 年前是拥有自治政府的人民中国东北部的特区。1952 年前以高岗为首的领导人同驻扎在那里的苏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高岗是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热情的拥护者。解放后，饶漱石在华东区和上海担任领导要职，1954 年 2 月，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对这两个人及其集团进行批判，这意味着，在五大行政区中，有两个区的领导人受到了批判。……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邓小平在 1955 年 3 月党代表会议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决议谴责“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邓的报告当时没有公布。25 年后，在关于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位中国领导人又重新提起这件事。3 年后，即 1983 年公布了他的这个讲话。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毛泽东准备让刘少奇作他的接班人，而高岗和饶漱石在林彪的支持下，用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极力阻止这个计划的实现；他们还试图拉拢邓小平，但遭到邓的拒绝。邓小平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政治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反映了篡权的野心。

在 1983 年公布的一篇文章中，邓小平是这样说的：“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 1953 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时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和邓小平拒绝了高岗的建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反映了要拱倒刘少奇的“阴谋诡计”，1980 年的一些讲话重新提到高饶事件，但是也提出了新的问题。邓讲话中提到支持高饶的林彪，在事件中不仅没有受到打击，相反就在 1955 年 3 月党的代表会议后却成了政治局委员。在 4 月中央全会上选进政治局的另一个人就是邓小平。邓同林之间的矛盾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6 年论个人崇拜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一些党的工作者“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事”。邓把这些称之为“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工作作风”。医治这种痼疾的药方就是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用“群众路线”的精神接受党内和党外群众的“民主监督”。本身看起来十分民主、十分确切的毛泽

东的原则，不料几年以后，在执行时却完全不像八大报告人所想象的那样了：红卫兵以独特的方式对党实行“监督”，连邓小平也没能得到饶恕。……

邓小平当时还说，很显然，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是何等正确）。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是的，邓小平在提出这个原则性论断的同时还指出，重大问题由集体做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老传统。“某些人”虽然口头承认，但又经常破坏集体领导原则。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做法”。

这些话是指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工作，当然也包括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工作。在谈到党的领导人时，邓小平说，他们“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后来，他还说：“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他的报告援引了党在1949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做出的决议。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他还说，中央委员会历来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作为社会现象，有很长的历史。这种现象也会反映到党和社会的生活中。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执行党关于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加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得到贯彻执行。

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好说明这些论述是值得重视的。假如党的八大会上由党的全部领导人通过的这些原则能够坚持下来的话，那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毛泽东自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就连当时最详细地论述这一问题的邓小平，也是很谨慎地回避直接谈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甚至论证过去称为“集体”领导的做法是正确的。党的自我批评只能是间接的，比如只是在不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的情况下做自我批评。发言人继续援引党的主席的语录，最多是加引号，不再标明作者的姓名。尽管邓小平声称：“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没有缺点。”但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看来永远是正确的，任何人也不会怀疑他的决定性作用。但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很快地重新以个人决定来代替全党的方针路线。1956年党的八大制定的目标和方法，在中国的以后实践中很快就被抛弃了。

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选进最高领导班子。在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中，邓小平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居第6位。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保持了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他1954年的职务“秘书长”一词，主要突出行政工作性质；新的职务“总书记”，则强调其政治分量。

与邓小平的名字有联系的党章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职务，是出于这样的设想，即党的领导人荣膺这个职务就可以摆脱直接的领导，以便于让贤，把领导权交给年轻的一代。

但是这个职务一直虚悬着，从来无人担任。

少说空话

1977年8月召开的以7月中央全会决议为基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

上，邓小平只作了十分简短的发言，……报告是华国锋作的，但主要内容是抨击“四人帮”，未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是宣告其“胜利”。华国锋仍试图既要让羊吃饱，又能保住白菜。他宣扬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赞同毛泽东和“四人帮”还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华国锋的报告长达4小时。而邓小平随后在大会讲台上宣称：中国“需要的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这大概不完全没有一点针对性。

大会巧妙地修改了十大通过的“左”的组织章程中关于党员“要敢于反潮流”，即提倡闹派性的提法，按照新的提法，要坚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三大原则。邓小平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委员未进入新的领导机构，其中大部分人是同“四人帮”一起垮台的。他们的位置首先是由“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职、后来被平反的老干部填补的。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1966年被撤职的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后来在试图逃脱红卫兵的批斗时两腿被摔断）。政治局常委中，除华国锋和邓小平外，还有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他们3人都曾支持华国锋反对“四人帮”。

十一大是个妥协，邓小平之所以接受，是为下一步斗争，继续进行平反和逐步改变党内舆论争取更有利的地位。经济建设提到首要位置（1978年2月通过了80年代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国家机构改革也更显突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8年3月5日通过了新宪法），重新需要大批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和专家。为前几年，甚至为前20年受迫害的人平反的工作加快了步伐。恢复严格的教育准则（如从1977年秋起重新严格大学招生工作），要求重新审查过去的教育方针。邓小平根据这些任务更加大胆地阐述了他的新的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他在这年9月指出，“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他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强调，“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自动化的生产，就是整天站在那里看仪表。这也算是劳动。这种劳动同样是费力的，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他多次指出，要让知识分子工作，让他们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而不是背政治教材。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们这样做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在当时还是危险的观点。10年来，“红”的人才吃香，真正的专家不吃香。埋头搞科研和生产的人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专家”。

在那些岁月里，就需要这样重新发现世界，发现辩证唯物的世界。

[美]洛乌：

邓小平约束“北极熊”

A·D·洛乌教授是美国研究中苏关系的著名学者。198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力作《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该书不仅论述了二次大战以来，中苏两国关系从友好同盟转为论战、对抗又逐步走向正常化的过程，而且向人们展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胡耀邦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政坛风云人物在中苏关系演变中的足迹和作用，特别是以一定的笔墨论述了邓小平在中苏关系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无疑会有所帮助。

当然，洛乌教授作为美国的一位政治分析家，他的某些观点和立场不能不反映美国政府的态度和意向，有些观点和提法是错误的，同时，由于他论述的是历史，成书也在几年之前，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不能不带有历史局限性。

下面的几段文字是从《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公开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共产党就已接受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坚持这一理论，用这一理论来抗击苏联的观点，因为中国已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扩张主义相提并论。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时，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考虑到后来中国国内事务的发展，这一理论具有特别的意义。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上公开阐述了三个世界的概念。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时提到了这一理论。这一受到苏联猛烈攻击的理论在中国特别受到温和派的拥护。197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指出，“四人帮”这些极“左”分子，“公然反对”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1977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华国锋主席在几次报告中重申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核心就是：苏联既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一理论使中国同美国和西欧的亲密关系合法化，并且把中国摆在第三世界当中，突出她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1977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最详细地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文章说，“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正是在60年代，苏联变成了“威胁世界和平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就像美帝国主义所做的那样，但是，美国的地位正在下降。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更凶恶、更狂妄，是世界大战最危险的策源地”。当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伸出谋求恢复正常关系的手，要求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华国锋在1978年2月在全国人大所作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并不友好的反应。……1978年，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把反对霸权主义这一针对苏联的内容写入了条约。这在苏联引起了新的愤怒。……尽管苏联在反驳时宣称，正是中国自己在谋求“霸权主义”，但是，在1978年底，两国关系的改善还是出现了一点点迹象，苏联政府任命斯杰巴科夫接替托尔斯季科夫担任驻中国大使，后者自1970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邓小平领导“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中国国内兴起了“思想解放运动”，这同邓小平的名字是联在一起的。随着对“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受到“四人帮”支持的政策实行拨乱反正，继续坚持毛泽东政策的华国锋所担任的总理职务于1980年9月被支持邓小平政策的赵紫阳所接替。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了党的主席职务，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者接替了他这一职务。官方仍旧给予毛泽东思想以崇高的地位，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毛泽东以前具有的特殊地位已经降低了。毛泽东在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公开进行批判，承认这些错误，为邓小平对十年文革期间的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为思想解放，现代化，“开放”政策，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合资经营，特别是在华南、华东的经济特区开展经营创造了条件。苏联认为，这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极“左”路线转向“修正主义”的“右倾政策”。……

北京自己已信奉“修正主义”，如果继续谴责她的对手苏联是“离经叛道”，对北京领导人来说，难免显得有点滑稽。毛泽东作为北京制定政策时的思想路线的指导思想者，占有中心的地位，同时，他作为苏联政策和实践的反对者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他在这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都已下降了，因而，重新评价中国对苏政策的一个主要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同样，中国一开始曾反对苏联提出的东方社会主义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但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抛弃了以前特有的东西方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现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信奉与自己原来的看法相反的观点，并且主张同西方，包括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甚至一度赞同建立全球反苏联盟使西方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起来的观点。……

1980年4月2日，《人民日报》不承认在1963年至1964年7月14日期间，中共9篇攻击苏联的系列文章有什么错误。但现在承认，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然后加以攻击是不适当的。在作出这一让步的同一个月里，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座落的那条街恢复了它以前的非政治性的街道名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这条街被易名为“反修街”。尽管作了这些调整，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仍像以前一样坚定，虽然这种敌视态度是针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它的国内政策，这一点可以从1980年4月胡耀邦和邓小平本人对苏联外交政策所作的严厉的批评中看出来。

自卫反击战前，邓小平曾访问美国

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时，人们引用他的说法，即中美互相敌视已30年了，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终于结束了。虽然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两国共同的利益，要求我们洞观国际局势并用长期的战略眼光来检查我们的双边关系，两国不但要自己不谋求霸权，而且要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的企图。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在世界还不平静……我们不愿意打仗，除非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邓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官方从来就不是失败主义者，当然，中国为之担忧的是——这正是邓小平求

助于美国的目的所在——建立反苏的大联盟。与此同时，任何有关中国可能蜕变为侵略者的恐惧完全可以消除。

邓小平驳斥了中国“好战”以及中国是全球灾难的潜在根源的滥言：在现代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侵略的牺牲品，即使今天仍然处于侵略的威胁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也没有资格这样做。“战争的危險首先来自那些天天散布和平与缓和烟雾的战争狂，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明智的美国公众逐渐意识到这种危险。”和美国记者共进午餐的时候，邓小平特别注意到1963、1972、1974年美苏所达成的三个协定。即使美国公众也承认两国军事力量大体相当。中国反对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邓小平警告说，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不能仅仅通过谈判和协议就能受到抑制或者削减，我们中国人民认为战争的危險来自苏联，所以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尽力阻止和消除他们所做的，并且粉碎他们想做的一切。

在邓小平看来，日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也是苏联威胁的主要目标。在回答瓦尔特·克朗凯特和《时代》周刊记者提到的关于邓小平对日本、美国和中国缔结条约的建议时，邓承认，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这是邓小平后来对《时代》周刊记者阐述的）应该团结起来，认真对待战争危险的挑战，我们不需要任何条约和联盟，我们需要的是对局势的共同理解和一致努力。当美国记者克朗凯特进一步问邓小平对苏联威胁的真正性质的了解是否比对美国领导人更多时，邓闪烁其词他说，中国政府希望美国采取更有效和更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霸权主义带来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即将对越南采取一场军事行动，反对“地区霸权主义”，尽管它是由苏联支持的。

邓小平说，要给北极熊“安上笼套”

对于邓小平在1979年2月访问美国时的讲话，彼得洛夫在《真理报》分析说：它“充满了彻底的反对和敌视苏联的偏见”。邓小平同意70名退休美国军官的意见，这些军官对任何在裁军领域里达成协议的想法都持反对态度。邓小平宣称，即使签订了一个裁军协议，军备竞赛仍将持续下去。

彼得洛夫接着说：从邓小平访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北京对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作了如此的翻新，帝国主义完全消失，甚至美国也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盟友。北京发现它现在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示要充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领袖，要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和其它国际力量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即使是空洞的承诺它也难以启齿了。而不久前，它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坚决忠于这两个信念。

随后不久的日子里，《真理报》又提到邓小平，说他在华盛顿曾经宣布：“苏联是人类和平的威胁”，并且他号召“一致坚定地联合起来反对苏联”，该报还引证说，邓希望“把华盛顿拉入反苏队伍”，他放弃了缓和紧张对抗的政策，指责各种控制军备竞赛的努力，并且呼吁建立一条反苏的统一战线。《真理报》宣布北京领导人是“东方的战争根源，霸权主义”，指责他压制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各国。还指责邓小平访美是为发动反苏“煽惑游说的一星期”。在会见《时代》周刊记者时，邓小平说：“要给北极熊安上笼套。”与此同时，在“反苏骨干集团”中十分卖力的卡特政府迫切希望打出“中国牌”来压莫斯科单方面让步。

2月10日，《消息报》推出了一篇题为《危险的道路》的文章，其中说道：邓小平富有侵略性的声音，在东京就引起了日本的严重关注，日本害怕莫斯科进行反击。在邓小平会见大平正芳首相时，邓小平要求日本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予以制裁。

[美]德莱耶：

邓小平代表了外交政策中的温和路线

朱恩·丢弗尔·德莱耶是美国研究中国国防和外交事务的知名专家。1989年，他在纽约派拉门出版社出版了题为《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的专著，受到外交界、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德莱耶先生从外交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改革前后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肯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推进中多关系正常化中所作出的贡献。

下面的文字是从德莱耶先生《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摘译的。

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邓小平的领导地位经历了3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他首次建立起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但仍在继续为赢得全面的领导地位而斗争的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奉行谨慎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是他首次巩固了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而处于权力顶峰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利用自己已巩固了的地位，在外交上千取了几个大的主动行动。这些主动行动与他的个人政策取向和政治形势是一致的。第三阶段开始于彼此竞斗的政治联盟重新出现之时，这限制了邓小平在使用外交策略上的自由，其结果是，使中国的外交政策更为谨慎。

从1973年到1975年间，邓小平清楚地表明了他在外交政策上会作何种取舍。作为周恩来信任的出掌政府大权的人选，他代表了外交政策中的温和路线，注重与华盛顿结成不言而喻的战略联盟，以抵销苏联的力量。1974年，他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说，与美国相比，“在欺侮他国上，那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超级大国更为凶恶。”与此相似，邓小平向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保证说，正常化“最终”将实现。“更力重要的问题”是抵制苏联的野心。邓小平的现代化计划为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增加了更大的动力，因为他谋求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以获得先进技术。

因而，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已经准备好至少维持美中安全关系的现状，并寻求在适当的条件下发展这种关系的良机。所需要的只是合适的国内国际条件。

华国锋在后毛泽东时代对政治、经济领域里的事务逐渐不再负责，并把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责任很快移交给了邓小平。与经济领域相比，毛泽东、周恩来也确实造成了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人才空缺，华国锋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李先念副总理虽说在毛泽东去世后一直负责接待外宾，但他的作用仅限于他资格老，而不是因为他有经验。因此，邓小平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缺，50年代里，他在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活动就很活跃，1975年，他又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并经周恩来同意，负责制定外交政策。

1977年8月，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塞勒斯·万斯，这时他的权威已显而易见，当时，邓小平刚刚正式恢复他1976年4月被解职前所担负的领导职务。对美国代表团来说，事情很清楚，他对制定外交政策负有根本的责任。1978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一年邓小平负责两次使命：引导中国绕过柬越冲突，然后反击河内对越南华人的政策和它对柬埔寨的占领。

邓小平负责掌管外交事务以后，面临着华国锋先前所面临的战略僵局，

苏联人利用华盛顿竭力远离东南亚大陆冲突的心理，在中国边境扩张。1978年，莫斯科成功地把河内拉进了苏联阵营，而越南正准备以自己扶植的领导人取代金边的波尔布特。问题日益尖锐化了。中国的后院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事实上，河内11月份与莫斯科签订了安全条约，12月份即入侵柬埔寨。越军入侵柬埔寨一年之后，苏军入侵阿富汗。

这样的国际环境使中国的对苏政策没有变化的余地，但可能使中国努力谋求中美关系能更为友好地发展。然而，无论怎么说，1977年邓小平在对美政策上和华国锋一样很容易受到责难。虽然他已经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并负责制定外交政策，但他必须考虑巩固自己对政治官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地位。因此，尽管邓小平的权力在不断增大，但他对可能削弱自己未来领导地位的批评仍很敏感。在万斯访问北京期间以及访问之后，邓小平地位的这种不稳固性和由此产生的保守态度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在与万斯的谈判中，他几乎不愿意去谈台湾问题，明显地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后来，白宫发表的报告指出，会谈就美中关系正常化取得了进展，并说中国领导人对正常化的条件表现出灵活性，这时邓小平尖刻地反驳说，万斯的正常化建议从福特政府立场上后退了，万斯的访问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倒退。……

但不管怎么说，从1978年年中开始，中美关系开始改善。5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此时邓小平的权力已经扩大，他表示中国愿意谈判正常化问题。这股势头一直持续到12月，北京同意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随后的两年中，双方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制度化了，并向军事合作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促进了中国对美政策中这一新潮流的发展，……正常化谈判的速效催化剂来自美国和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华盛顿第一次接受了从台湾撤军、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和毁约3项要求，虽然它继续保留向台北出售武器的权利。中苏关系也对中国的反应有影响。在苏越条约签约一个月之内，也就是越南向柬埔寨发动预期的进攻之前，邓小平个人对正常化谈判产生了兴趣。苏越进行安全合作和中国准备以军事行动作出反应这两点联系起来，促使邓小平接受了美国的正常化提议并访问了美国，以此强调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结果，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为卡特政府在后几年中美中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巩固创造了条件。

不过，第二阶段中，邓小平国内声望的提高对这一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作出反应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正当华国锋利用其声望压过“四人帮”的短暂时期在外交政策上平取有限步骤时，邓小平的声望又超过了华国锋，而力自己创造了一个类似的时机，他利用自己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取得了外交上的一个很大的成功——按中国的条件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明显地显示了他与美国打交道的能力和对苏越将在即将到来的旱季在柬埔寨问题上进行安全合作的预见力。正常化步伐和特点既反映了这些发展，也反映了邓小平的领导权威，后者使他得以把这种关系发展到不仅仅是达成一个正常化协议的地步。正是这个时候，美国抓住这个吉利的时刻做好“吃螃蟹”的准备，由于中国国际国内发生的变化汇聚到一起了，这使北京特别容易接受美国的提议。

在正常化实现的过程中，邓小平把跷跷板上亲美的一头置于上风。在访问华盛顿和漫游美国期间，邓小平引人注目地把自己扮成一位美国的朋友。他在记者面前戴上一顶牛仔帽，也非常欣赏得克萨斯州的烤牛肉。实际上，

据报道，他在接受罗伯特·诺福克采访时争辩说，中国和美国应该结成“同盟”。类似的是，邓小平的反苏言论几乎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苏联的攻击同样激烈。最后，整个1979年，随着美中之间贸易关系、学者交流和文化交流的正规化和不断拓展，这种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1979年，中国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问北京，由此开始了美中军事关系的发展。

.....1978年底，邓小平不仅建立了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地位，而且成了反对华国锋领导和同意清除激进派影响的温和派政治家们的领袖。由于华国锋暴露出不会管理经济的弱点，邓小平又取得了一个胜利。1978年11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接受了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作为制定政策的原则。

取得胜利之后，邓小平领导地位的第三个阶段开始了。反华国锋阵线出现了裂缝，抵制邓小平的势力也有了发展。曾支持过邓小平复出的保守派和“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过清洗的领导人不再全力支持他的路线和政策。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亲美立场处于下风。从卡罗尔·哈莫林对邓小平的采访已能看出，邓小平不愿意重新制定一个偏离反苏方向的政策，但来自其他政治家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说中国对美国太友好了，而对苏联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因而，邓小平在集中精力抓国内建设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明显的亲美立场，并执行较为温和的对苏政策。这一出乎意料的变化使华盛顿处于难堪的境地，它要求结成反苏统一战线的请求被搁在一边。

但是，邓小平的后退并没有使中国像以前那样对美帝国主义

口诛笔伐，而是对双边冲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作低调处理，以集中力量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相反、不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而是因为北京对美台关系的忍耐超过了限度，一个根本的政策转变出现了。1980年，这种转变的第一个迹象出现。里根政府前期，由于总统就美台关系发表了引起争议的讲话，这一转变进一步发展。1981年中国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甚至威胁说，如果华盛顿不同意中国的要求，就要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的级别。.....

1982年8月17日的美中公报虽然正式解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争吵，但作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国继续公开与美国拉开距离。

[日]竹内实：

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号人物

竹内实是日本著名的学者，被誉为“毛泽东研究权威”，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政治研究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立命馆大学教授。1923年生于中国山东省。1949年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1951年赴中国。1954年与新岛淳良一起进行“中国群众文艺活动”的专题调查，1955年在中国研究所工作。1955年至1958年，他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工作。1960年6月21日，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访华时，在上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67年至1968年任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讲师，1968年任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1973年转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任副教授，1975年任教授，进入80年代以来，曾多次访问中国。由于他在鲁迅研究和毛泽东研究上的贡献，1992年9月荣获“福冈亚洲文化奖”。主要著作有：《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其诗与人生》、《鲁迅与现代》、《人民公社史》、《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谈哲学问题》、《毛泽东笔记》、《毛泽东》，并主编《毛泽东集》（10卷本），和《毛泽东集补卷》（10卷本）等。

1978年中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竹内实教授十分关注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与研究。他在1992年11月号《外交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4号人物。此前，他曾就这一观点进行过多次阐述。他的这种大视角、高起点的研究成果，恐怕在国内外的邓小平研究中是不多见的。竹内实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应选秦始皇，因为他统一了天下，在世界这块辽阔的大地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秦帝国”。第二人要称孔子，由于他的存在，中华世界才具有“中华文明”的“面貌”。他没有权力却至今不朽。如果把秦始皇作为政治权力方面的代表，把孔子看作是精神权威方面的代表，那么毛泽东就是使这两个人合为一体的第三人，他把自己塑造成了既拥有权力又拥有思想的这类人物，他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状态。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竹内实认为，中国历史的第四人是邓小平。他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各项政治制度以及不成文的规定和思维方式，明显地而且牢固地存在着。要想突破这些框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人们虽然厌恶这些东西，但是惰性和懦弱却在蔓延，而且从这些框框中的受益者和阶层并不希望发生变化。

“邓小平让‘文化大革命’中丧失地位的人复出了，给已僵化的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风。

“说句公道话，我觉得不能无视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业绩。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当然是邓小平。虽然周恩来提出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在周逝世后为了改变政治潮流而一步步地采取措施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是邓小平，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国家这部车子前进的道路土挖开了一个大坑，而且他就那样地离开了人间的话，那么填埋这个大坑使车子 and 人们能够顺利通过的是邓小平，不仅如此，他让中国这部车子跑起来了。这部车子不是沿着锁国的方向，而是沿着开国的方向疾驰着。可以说邓小平是在于前无古人的事业。”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会见了日本天皇、皇后，日本首相福田纠夫，日本政界元老、前首相田中角荣等人，与日方交换了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批准书，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页。邓小平访日，受到了日本朝野举国一致的热烈欢迎，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邓台风”。竹内实教授以学人的敏锐眼光，对邓小平访日期间的谈话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邓小平的访问获得了成功，这次访问证明邓小平“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精力充沛的、勤奋的现实主义者”。

竹内实教授在 1980 年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披露了邓小平访日期间会见日本天皇、皇后，会见企业界代表，会见记者们时谈话的细节，并对邓的谈话作了认真的分析。下面的文字是从竹内实教授《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在日本掀起“邓旋风”

宛如台风经过一样，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日程安排显示了他的精力十分充沛。

台风过后，我们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仰望那爽朗、万里无云的晴空，品味出秋天到了。这场邓台风，究竟给我们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

正如一家周刊杂志在归纳邓小平八日行（1978 年 10 月 22 日至 29 日）的文章里使用的标题《尽管没有信口讲》那样，虽然不是期望的那种“信口讲”，但是他发表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邓小平语录”的坦率谈话，使我们感触到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

访日期间，邓小平反复讲“四个现代化”，从这种不寻常的热心来看，他并非说说而已。

由于中国没有“近代”，自然需要“近代化”。可是，中国的努力目标是“现代”世界的先进国水平，所以，与其故意拿出大家不大熟悉的“近代”，不如用“现代”在语感上更为贴切。我想这就是中国使用“现代化”这一用语的理由。

“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日，也是为了得到它。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10 月 24 日，邓小平在日本众参两院议长举行欢迎宴会前，同在野党首脑们的谈话）

“参观了现代化的工厂后，我知道了现代化是什么。我们中国制定了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希望日本产业界的请位给予协助。”（24 日，邓小平同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制造工厂干部的谈话）

“中国制定了自己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更确切地说，就是指接近那个时候的水

“世界在迅猛前进。那个时候的水平，我想贵国也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到那个时候达到现在的日本、欧洲、美国的水平，我认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2 年后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很难的。我们清楚这些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制定了这个大目标。”（25 日，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答记者问）

“本来长得很丑，却按美人那样打扮是不行的。丑陋是不能掩盖的，老老实实地承认落后才有希望。”（同上）

“有一种被人从后面鞭打，被人追赶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快跑。”（26 日，邓小平在东京至京都的新干线列车上发表的感想。）

看到中国要搞“现代化”的这种焦躁感，我们日本人不是没有担心。尽管如此，中国迫不得已发出的奔向“现代化”的信号，是可以理解的。不过

我认为在这种理解的背后，我们日本人感到内心有愧。

这就是战争责任，是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欠债。

日本损害中国的规模，如果按照中国声明的说法，人命 1000 万人以上，财产 500 亿美元。这仅限定在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八年间的“日中战争”期间的数字。

人命无法用金钱换算。但如果按一个人一万美元计算的话，那么人的损失就是 35 兆日元，物资损失是 17 兆日元，合计 52 兆日元。这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前一年的计算，当时 1 美元合 360 日元。而且，国家预算是 9 兆 4000 亿日元。

现在，1 美元相当于 190 日元，从国家预算为 34 兆日元的日本经济水平看，假如支付 52 兆日元的赔款，也许并不那么困难，根据我当时的估算，可以将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强分 20 年付清赔款。

1965 年，中国虽然还保留着要求暗尝的权利，但显然已经没有要求赔偿的意图。那时，中国要人的谈话要点如下：

1. 中国不想利用外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2. 一般来讲，让战败国支付巨大的战争赔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和平有害。

3. 战争赔偿是让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支付，所以是不合理的。

以上就是中国对赔偿的基本态度。

这个谈话是通过当时负责日本问题的赵安博转述的，廖承志又详细说明了上述意思：“中国没说不让赔偿，但也没说让赔偿。我们不想用日本的赔偿来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过，作为一般的气氛，我们不接受那种因没有请求赔偿权的蒋介石放弃了赔偿，就认为中国也没有请求权的论调。”

在中国方面有了这种见解之后，似乎可以说，赔偿问题是 1972 年作为正式文件在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得到“解决”的。第五次论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他具有随机应变的谈判技巧

既然国家间的关系已由此开始，那么作为国家间的礼仪，就应该与天皇会见，这是中国的想法，大概也是邓小平的想法吧。

邓小平会见天皇时，恐怕没有联想抗日试争期间的战斗经历，也没有联想中国遭受的苦难。不过，既然中国不想回到“革命外交”，不想回到文化上的锁国主义上，我想他必然下决心使会见天皇这一国家性的礼仪圆满结束。

关于邓小平与天皇的交谈，日本方面和中国方面发表的内容略有不同。从日本方面发表的内容（参加会见的汤川盛夫宫廷仪式官发表的会见内容概要）看，天皇首先致欢迎词说：“百忙中特意光临，十分感谢。尤其是今天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交换完毕，感到非常高兴。”对此，邓小平说：“这次的条约比想象的要好，意义十分深远。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今后我们要向前看，建立两国的和平关系。”

听到这些活后，天皇说，“日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虽然一时有过不幸的事情，我希望今后加深两国的亲善，长期维护和平。”

邓小平说：“正如陛下所说，我也有同感。”

将上述对话中邓小平发言的主要部分按中国方面发表的内容（新华社东京 23 日电）译出如下，如已报道的那样，与日本方面发表的内容不同，成了承认天皇所说的“不幸的事情”的讲话。

“我们也认为这项条约具有深远的意义。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这项条约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项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23 日，邓小平在官中与天皇、皇后会见时的讲话）

中国方面把上述讲话放在天皇讲话之后，依然是针对天皇所说的“日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虽然有过不幸的事情，但已经成为过去”（据新华社电）的一种回答，我认为这是考虑到前后呼应。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非常宽容。如果邓小平发表的上述讲话，引出了天皇的“不幸的事情”这一没有预定的发言的话，那么不知道是因为他的人品，还是他的表演能力，我想，人的本领是不可小视的。

日本有一部分人指责天皇的这个讲话不彻底，与历史事实不符。我也认为这种指责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如果与事先协商根本就不谈相比，我以为还是谈出来好，即使说上千言万语，是否就说明对历史事实承担责任了呢？那时可能进而要求落实。不过，中国是来寻求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不是寻求天皇退位和在日本搞革命。邓小平只不过是来为了交换批准书才来日本的。

“这次我们受到天皇和皇后两陛下的热情款待，对此十分感谢，与天皇会见，加上午餐，共之个小时，时间不短。我们都谈到了过去。然而我们注意到，比起过去，天皇更放眼于未来。天皇对条约的签约很关心。这一点，我们非常满意。”（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的讲话）

关于尖阁群岛问题，他也给予了明快的解答。

对于邓小平的这种态度，并不是没有人反对。

在美国，好像有人攻击说北京把尖阁群岛（他们的叫法是钓鱼岛）出卖给日本了，并支持“四人帮”。似乎他们自称是“美国革命共产党”。

香港的北京系统报纸《新晚报》也介绍了上述情况，并反驳说，据日本的园田外相讲，邓小平说这个问题二三十年后再解决也可以，但没有承认是日本领土。既然没有承认，怎么能说是出卖呢？

结果，尖阁群岛是不是日本的领土，别说二三十年后，就是在这个《条约》有效期 10 年后，问题怕是会再次提出来。

邓小平选择的是，与其强调尖阁群岛的所有权，使《条约》的签订难于进行，不如把所有权问题暂时搁置，好实现《条约》的签订。如果中国共产党将来出现严重对立的话，那么正如我们在“美国革命共产党”的主张里看到的那样，这带有给他的政敌提供有力借口的性质。

然而，他以随机应变的谈判技巧，回避了这个问题。

“尖阁群岛，我们叫钓鱼岛，名称叫法不同。关于这一点，双方确实有分歧。我想这个问题暂且放一放好，放它 10 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智力不够。我们没有达成协议，下一代人可能比我们更聪明吧。”（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答记者问）

迎接他访日归来，十分热烈。我认为，这种欢迎不仅是为《条约》的批准而高兴，而且也是冲着邓小平本人的。他应该感觉到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许一下子想起政治上处于逆境时的孤独与寂寞，他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日本记者的言论，没有感到无聊吧。特别是那些经常访问中国的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人，曾与“四人帮”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他理应是知道的。

他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精力充沛的、勤奋的现实主义者。

“我们损失了12年。在这期间，日本等国家进步了，所以合起来我们落后了20年。因为落后，就必须学习。”（25日，邓小平在经济团体联合举办的午餐会上，对经济团体联合会士光会长等人的谈话）

在造成12年损失的“文革”期间，他被遣送到农村。拜访田中角荣时，邓小平说：“你来到北京时，我正在北京郊外的农村。”而田中角荣似乎没有理会这句话的含意，只是高兴得一个劲儿地喊着：“干杯！”

据说在田中角荣宅邸，邓小平偶尔显得面部无表情，那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吧。

他大概对来日本之前那些针对自己的非难和批判感到厌烦吧。

“无论什么事，都有反对者。在国内也是这样。一年半以前，就有“四人帮，这伙人。”（23日，邓小平在拜访福田首相时，针对首相说“除极少数国民外，都赞成日中条约”所作的回答。）

“落后的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需要日本帮助的事情很多，科学技术和资金等，就是这样。我认为，中日贸易规模也应该增加到长期协定的二倍三倍。只要我们中国发展了，合作的道路就会越来越宽广。”（同前，在会见记者时的谈话）

公平地讲，他的这次访日是成功的。

[日]国分良成：

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

国分良成先生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革命史，特别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曾有多种著作行世。

国分良成教授在《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一文中，用比较的方法，对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观点。他认为，“1935年以来，毛泽东身居最高领袖的地位，领导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国家，直到他逝世，与其说他是建设家，不如说他一直是革命家。”他特别指出，“1978年的三中全会确实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邓小平时代是改革的时代”。作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邓小平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所发生的积极的变化作了充分的肯定。当然，也必须指出，作为外国学者，国分良成教授对中国问题的一些分析，他的一些提法、甲语、结论，难免有不妥之处，相信我们的读者能够判断。

本文是从日本同时代出版会1992年4月出版的《中国政治与民主化》一书中摘译的。

一般认为，毛泽东以后的新时代，是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是经常被称作“历史性转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转变呢？这次会议作出了以下几点决定：1.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作为工作中心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要实现现代化；3.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同时，在“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口号下，给过去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路线打上了中止符，开始推行现实主义的路线。

似乎可以认为，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执掌大权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三中全会的意义，其真正意图就在于说明这一点。从这点考虑，可以说1978年的三中全会确实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

1978年以来的中国，确实以“现代化路线”和“改革开放”为特点。一方面，这可以说是由于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的出现带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邓小平时代”与过去的“毛泽东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事实。然而，这两位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奠基人。另外，从历史发展的现实看，领导人的变更并不意味着一举改变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和机能。如果是这样，那么，在1978年以前和以后，哪些发生了变化？哪些没有发生变化呢？

两个时代的不同点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到目前为止，毛里和子作了最概括的论述。她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特征概括为（1）党在一切领域实施排他性的一无化领导；（2）中央集权的制度；（3）自上的感化和动员的“大民主”式的政治文化；（4）毛泽东具有凌驾于组织之上的超凡的领袖魅力和权威。

一进入邓小平时代，就离开了毛泽东时代的危机管理体制，过渡到面向经济发展，维持稳定的政治体制。（1）允许“有限的多元主义”；（2）不

依靠意识形态，而依靠智力；（3）政治动员在逐步减少和淡化；（4）预测行使权力的可能性增大等。邓小平时代的政治体制的性质是“权威主义体制式的”。

的确，这恰当地概括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各自基本性质及其背景。不过，关于党的代行主义，即使进入邓小平时代，也没有改变基本性质，虽然不具备像毛泽东那样的超凡魅力和权威，但依存于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权力机构基本上没有变化。就是说，我们不能忘记，而应该注意到政治权力的不变的结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支持一元化领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动。

我想把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哪些发生了变化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专门放在政治社会结构上试作概括。邓小平时代是改革的时代，但如果从更长远的观点看，也许应该把它当作产生新的现代化政治社会体系的一个过渡时期来认识。在此意义上，如果将80年代以来的邓小平时代同毛泽东时代作一个对比评价，也许和预测今后的中国政治不无联系。

随着由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渡，第一，可以看到从“革命”向“建设”的全面战略重点转移。换句话说，这也是从“政治”向“经济”的工作重点转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毛泽东时代是继续革命论的时代，其结果，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被优先，现实的经济建设实际上被推迟了。然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国内经济的现代化成为高于一切的课题，继续革命基本上宣告结束。

第二，毛泽东时代在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点上，虽有程度差别，但却是一贯的。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便转到改革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方向上。结果，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最重要意义几乎不复存在。换句话说，这是由“教条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普遍的真理，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出现了一种动向，即积极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不符合现实的侧面和由于教条式地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以致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停滞。当然，这不是直接否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和毛泽东时代在这一点上却有天壤之别。

第三，如果把毛泽东说成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的话，那么可以把邓小平评价为有组织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是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领袖，在某种意义上，他身居党的最高地位，但却常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监督之外。不论是在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时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其说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断发出指示，还不如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超凡魅力，置身于群众中发动和领导运动。然而，邓小平尚未具有像毛泽东那样的超凡魅力。他主要依靠的是共产党的组织。为此，他注意不断整顿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素质。

从50年代起，邓小平就是党中央的总书记，他确实是与“组织上的人”这一称呼相适应的领导人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讲，邓是比毛更有组织基础的处在权力顶峰上的人物。似乎可以说，他反复强调“党的领导”的意义就在于此。

第四，虽然毛泽东时代确实有过部分地承认地方分权的时期，但基本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中央集权式的。进入邓小平时代后，由于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和企业管理自主权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体系分权化了。毛泽东时代的集权式结构不利于搞活经济和社会，有鉴于这一反思，进

入邓小平时代后，便将轨道修正为承认地方和各企业的自主性的方向。如果毛泽东在世的话，针对 80 年代以后的体制改革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也并非完全不可思议。

从 80 年代以后的政治经济现实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生前一直警惕“资本主义复辟”，这未必不中肯。……在今天的中国，各地区和各企业自作主张以及各地区间差别扩大，这些已成为普遍现象。

第五，正像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所集中体现的那样，毛泽东时代反复开展群众动员；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动员”的情况几乎没有再出现。不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没有来自群众方面自发参与的因素，但从总体来看，那显然是由于毛泽东从上面动员的结果。进入邓小平时代后，不仅这种动员式的政治运动没有了，就连对权力提出异议那种自发参与也不见了……

第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同外国的关系上，一直维持着极为封闭式的体系，可是在邓小平时代，开始改变为开放的体系。毛泽东时代对信息控制很严，且政治教育也很普遍，一般群众几乎没有将中国与外国进行横向比较的观点。可是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国外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传来。

信息的扩大导致意识的多样化。80 年代的中国社会，由于信息的扩大和耐用消费品的普及，被你为大众社会那样的状况确实在以城市为中心开始出现。

两个时代的共同点

下面，我想着重联系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阐述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连续性。

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个共同点是不断扩大并且承认个人的权力。两人都是第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小平则具有组织性的权威。虽有这点不同，但在决定重要政策时，他们都是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从职务上看，邓小平虽然并没有达到顶点，但没有人怀疑他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第二，两个时代均以党的代行主义维持政治统治，在这一点上基本相同。当然，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产生了社会上的多元主义，以至于在党内外也出现了多种意见。然而，正像 80 年代的现实政治状况所显示的那样，好像与社会的多元化毫无关系似的，对一党专政的权力机构并没有做任何修改。

第三，无论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邓小平时代，都缺少党内民主，政治透明度差，在毛泽东时代也有多种意见存在，但结局都成了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成了一方打倒另一方这一弱肉强食的历史反复。

进入邓小平时代后，这种构图基本没有改变。的确，党内存在多种主张，如果不实行公开化，就不可能发展党内民主，使民主制度化。

第四，‘依靠’人治’胜过‘依靠’法治’的政治结构在整个时代一直存在。……在中国，被称为“关系学”的人的关系网，常常超越制度和法律。……人控制制度和组织的倾向在中国很严重。

第五，关于政治权力依赖于军队和公安等专政机关的政治结构，基本没有变化。从政治发展的理论上说，军队的作用和与平民百姓的关系状况成为

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本身原来就是军队，所以军队的作用比较突出，军队与平民百姓的区别极为暧昧。在老一辈革命家占大部分的毛泽东时代，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到了邓小平时代，革命的一代人相对减少了，而且由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军队的作用降低了，军队的职业化、专业化加快了，这也是事实。

[美]鲍大可：

邓小平后的中国

鲍大可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发表过多种著作。本文摘译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外交政策研究所系列论著《新世界——新方向》，是鲍大可有影响的论文之一。

鲍大可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进程，并对此作了详尽的研究。他认为，1949年至1976年为“毛泽东时代”，1978年后为“邓小平时代”。他赞扬自1978年以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这10年中走上了令人瞩目的改革道路。”他认为，正是因为改革，才使中国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鲍大可有感于1989年后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巨变，运用他多年来观察、研究所积累的知识 and 经验，来回答普遍存在于西方人心理上的两个问题。中国是否也将重蹈苏联覆辙？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会不会改变改革的进程？鲍大可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中国不可能走苏联同样的路，因为不论从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方式，还是国内民族关系来看，中国社会的构架都不会随同苏联东欧国家那场“雪崩”而陷于坍塌；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策连续性大于变动性，即使有某些变动，中国也不可逆转地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分析家们关注邓小平引退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历史学家们称1949年至1976年为“毛泽东时代”，他们也一定会把从1978年开始的历史时期看作是“邓小平时代”。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这10年中走上了一条令人瞩目的改革道路。然而，随着10年的快速增长，它也面临着不断累积起来的一些问题。

由于87岁高龄的邓小平自70年代末以来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他在将来最终退出政治舞台的那个时候就会成为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许多分析家在他们估价继承问题的过程和可能结果时，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邓小平自己的引退上面。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专注会使中国当前形势和继承问题的性质的复杂性模糊起来。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代与代之之间的接替”，在很短的时期内，那些“老革命家”中的大多数将因病弱或去世而退出政治舞台。这些老革命家的年纪都已在80岁以上。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这一“滚动式的接班”将需要多长时间，但它最多不会超过几年。

当所有老一代领导人引退之后，中共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动态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各自支持者的离去，继任者们将不得不明确自己的立场，建立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寻找自己正统性的依据，建立起他们彼此之间的新关系。与此同时，在“滚动式的接班”的过程中，当某一位党内老一代领导人引退之后，领导层内部的平衡就将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偏转——虽然并不一定都很明显——或倾向于更保守的方向，或倾向于更积极进行改革的一边，这取决于老一代领导人中谁先离去，谁后离去。

很可能在整个继承过程中，或在进入邓小平之后时期的最新阶段，中共最高领导层仍将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它包含着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并受到矛盾冲突的冲击。毫无疑问，政治平衡将会出现倾斜，从而带来政策的改变，但在领导层出现重大变更之前，这些政策的变动只能是部分的和有限度

的调整，而不可能是采用任何意义上的全面的新战略。要采用全新的战略，只有到更强有力的一致性出现时才有可能。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会出现逆转吗？

10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进程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会出现长期的根本性逆转吗？没有人能断言这不可能。但是，从我们对中国当今和未来领导人的了解而言，这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的。任何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观点加以归类的作法，都难免要流于简单化。当然，如果人们希望对中共领导人在未来时期内可能发生变化的因素作一估价的话，那么对他们加以划分的想法又是合乎情理的。

事实上，中国所有的最高领导人对于国家奉行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口号都是赞同的，虽然笼统地来说，各人在赞同的方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因而，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可以看作是某种经济改革家。不过，如果作非常粗略的划分，他们可以分成经济改革大范畴中的三种力量：谨慎的改革派、稳健的改革派和大胆的改革派。要确定高级领导人中谁属于经济改革的反对派或主要的保守派是困难的，因为，那意味着谁主张要退回到斯大林式的统制经济中去，实行高度集权和无所不包的计划。或者要复苏毛泽东主义的民粹式政策，或者干脆希望改革进程就在现阶段停止不前。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试图公开确定任何全面意义上的保守性的经济计划。

谨慎的改革者在朝向市场化和私有化发展的问题上将赞同仅仅采取非常渐进的方式，他们将试图坚持国家计划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继续占主导地位。

稳健的改革派将推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他们也主张实行渐进主义。尽管稳健改革派认同于计划与市场的混合经济，要求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看来他们也不主张过快的改革，其原因在于担心过快的改革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大胆的改革派试图推动最为迅速和更深远意义上的经济转体，其中包括实行全面的价格改革，大幅度削减国家的计划，变直接的计划指令为间接的宏观调控，建立起市场的主导地位，并鼓励更大程度上的企业私有化。这一批从领导人继承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改革家，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将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最终结果几乎也可洞见，但在最近的未来，很可能是稳健的改革派先领风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立自己的影响。不过，大胆的改革派在稍后的阶段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领导权交替，产生出新的一代领导人后是这样。

出现极端反对改革的倾向是难以完全排除的，特别是如果中国遭受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从而出现极大的社会动荡局面之后。鉴于中国领导集团有能力避免这类难以控制的局面发生，因而出现这种倾向的可能性很小。

邓小平后的中国不可能抛弃对外开放政策

当中国实行国内改革时，它也正在广泛的范围内变革着它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变革是在1978年实行了“开放政策”。但差不多同样重要的是，中

国在 1981 ~ 1982 年提出了“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宣称不与任何国外大国结成紧密的战略盟友。

实行开放政策是基于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一种认识，即在经济上，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主要的工业国家，而且也落后于许多较小的邻国。在放弃毛泽东时代追求的自给自足和孤立主义政策的同时，邓小平宣布，要加速中国的发展，就必须放眼世界，成为国际经济和国际社会的名符其实的成员，并尽快扩大引进外资、技术、商品和知识。这样做的成果是辉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国外贷款以及外国投资的增长，其速率比外部世界所可能想象的要快得多。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已经牢固地同建立起来的对外经济纽带连在了一起。对外贸易的增长已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正在稳步上升，特别是中国的沿海省份已相当深入地融入亚太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邓小平和中国的大多数领导人对他们信奉的对外开放政策从未发生过动摇。这在邓小平以后的时期也不可能出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抛弃对外开放政策，就不得不重新提出一套全新的发展中国的战略，而中国还没有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人提出过任何可信的替代性方案。此外，任何试图重新实行内向性经济的作法，都会造成经济滑坡，从而带来新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转向对外开放上来。因此，在邓小平之后的时期，中国的前景将必定是继续同世界经济相连接，并且，外部的影响可能继续增大，推动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实行改革。

没有人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某种非预期性的发展会导致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但是在目前，事情很明确，那就是政策连续的可能性将大于变动性。

中国不会重蹈苏联覆辙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初始的问题上：中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吗？可以说答案大约是否定的了。那么，中国是否会成为保守的共产主义的最后营垒呢？答案同样是：更没有这种可能性。变革之风已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它的改革，但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并非穷途末路。70年代末开始的发展，中国的改革进程虽然在1989年遭到严重挫折，但它必定在不久的将来，即如果不是在年轻一代领导人掌权之前，也是在这之后重新向前迈进。如果保守势力试图从根本上扭转改革进程，那他们势必招致如同目前正席卷苏联的那种破坏性飓风。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尽管道路曲折，中国都将继续沿着崎岖山路摸索前进，继续改革的事业。在前进的征途上，中国会不断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

但这却是以它自己的速度进行的，并且，它会始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美]杨力宇：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

杨力宇先生是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1983年6月，杨教授访问中国，邓小平于该月26日会见了她，并同她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以《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为题编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会见杨力宇教授时的谈话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主要原因是邓小平在这次谈话时第一次详尽阐释了“一国两制”这一概念。同年8月，杨教授在香港《广角镜》8月号上发表题为《中国，台湾与香港》的文章，披露了邓小平与他谈话的要点和一些细节，谈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下面的文字摘自于他的上述文章。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指邓小平）特别提到“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他说，在这个大原则下，其他一切建议和方案均可考虑、讨论及采用。但他强烈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因此，他说，中国的许多行为是针对着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而非针对台湾，中国更无意孤立和打击台湾。

因此，他希望国民党与中共合作，进行两党“对等谈判”，努力完成中华民族大统一的任务，对民族作出贡献。……

在谈到具体的台湾问题时，邓小平提出；港台回归是中国的重大任务之一。在收回香港的主权后，中国将作适当的安排来保持香港的稳定及繁荣。我的印象是，中国对未来香港的构思保持以下各点：

一、香港可以有立法权。在不违背中国宪法的原则下，香港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作为“港人治港”及“港法治港”的基础。

二、香港可以有其司法权，适当的司法机构，及最终审判权。

三、香港可以有适当的外事权，维持适当的对外关系，并可以签证及发出护照。

四、香港可以维护其独特的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生活水准，及独立的对外经济关系。

五、香港将可使用代表香港的旗帜及“中国香港”的称号。

在谈到解决台湾问题时，邓小平作了深入的说明。我发现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构想，基本上是相同的。统一后台湾和香港均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中国不干涉台湾的“内政”。所以，统一后，台湾亦将有独立的司法权、立法权、适当的外事权及国际地位。台湾将使用特有之旗帜及“中国台湾”这一称号。台湾亦将维持原有的制度、生活方式及生活水准。但中国对台湾之构想有一明显不同之处：香港不能保持原有武装力量（英军），更不能继续向外国购买武器。邓小平并指出另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对香港强调“港人治港”，但对台湾则不能提出“台人治台”的方案，因“台人治台”似有“台独”的涵义。台湾一旦搞独立，就有沦为外国殖民地之危险，这是中国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说，中国正积极朝向和平统一的方向走去，但却不能公开承诺和平统一是唯一的统一方式。因为这样的声明将使中国永远不能统一。

在解决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中国将重视历史及现实，极有弹性，并将合情合理，充分考虑到台湾能接受的条款。他说，台湾及大陆将分别维

持其经济及社会制度，并和平共存。这些原则大致地适用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

台湾不可能永久坚拒和平统一的要求，也许不久的将来，台湾可以同意一切初步的交流（如交换条件）。双方因此可逐步增加了解，降低敌意。终有一日，双方可以开始接触；也许90年代，中国统一的任务可以完成。

然而，在完成此一艰巨的任务以前，还有无数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只有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的共同努力下，此一任务才有完成的可能。

[澳门]杨鹏翔：

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

杨鹏翔先生是居住在澳门的海外华人作家。1988年7月，他出版了有影响的长篇著作《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在海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国内也受到普遍好评。他的书，以一个海外华人作家特有的感受和洞察力，描述了邓小平在指导、推动社会主义中国改革中的伟大思想与实践，阐释了十年改革给国家和民族生活各个层面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杨鹏翔先生以前是个反共的作家，曾写过不少反共的作品。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杨先生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自己这样说：

“过去的冤家可以改，历史上的‘英德世仇’‘法德世仇’早改好了。现在的台湾海峡两岸的对立，不正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吗？”

“改革在全世界蔚然成风，并不出奇，它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时代的脉搏，出奇的是这改革的火炬是在东方的中国首先擎起。

“我自己也在改革，四十年前的反共作家，觉得同室操戈毫无意味，在思想上不再偏颇而采取中立态度，这也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改正与革新嘛。

“我不怕千千万万昔日知我的读者，和过去共同工作的朋友批评我，我是从人类的前途和民族前途来认识问题的。”

可以看出，杨鹏翔先生在写作中尽可能采取客观态度，把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溶化到实事求是的描述之中，使人读后产生全方位的感受，从而体会到邓小平作为伟大改革家的形象与业绩。

耐人寻味的是，杨鹏翔先生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前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在1988年5月分别说的对邓小平的评论置于他的著作的卷首。基辛格的评论是：

“我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上看，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都比苏联走得远得多。”

“中国做了一些甚至在苏联还不曾谈到的事。”

洛克菲勒的评论是：

“他（邓小平）言谈举止非同寻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极为坦率和富有远见地谈了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证实了我和其他许多人的看法：他是本世纪的伟人之一。”

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表侄、担任过大元帅府少将卫士长、当时已108岁的老人郑卓老先生读了杨鹏翔先生这一著作的部分初稿，他深为中国改革以来的巨大变化所鼓舞，深感邓小平的政策确实顺乎民心，顺应潮流，因而欣然为《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一书作序。

杨鹏翔先生的这本关于邓小平的评传，共有27章，下面的文字选录了该书的导言、第26章和第27章的一部分，有些题目作了改动。

在历史的天平上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东方发生一件重大事件，十亿多人口的中国，政策和路线有了明显的转变。地球上近四分之一人口在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的积极好转，很自然地吸引着全世界人的关注。

群众中有很多英雄，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亿万平凡人所创造的。但历史学家不排除领袖在群众中产生的作用。政策

和路线，是领袖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毅力、实践的经验的结晶。它在关键时刻发生旋转乾坤力挽狂澜的巨大威力，在世界历史上就发生过许多次。中国的邓小平正是这样的人物。

古今中外许多历史人物，在失败之后很难重登历史舞台，创业不易，守成更难，成功人物的暮年，往往是不能重振雄风的。

拿破仑是人类史上蹶而再起的人物，他失败被囚后能逃出牢笼，振臂一呼，重组雄狮，与英德联军相对抗，不幸再度被俘，郁郁以终，但法兰西人民至今犹视他为法兰西民族的骄傲。

人类历史上能三蹶三起的人物，是中国的邓小平，因此，当他第三次在政治舞台上大显雄风的时候，关于他的事迹，成为西方作家的热门题材，有些为了赶时间，粗制滥造，抢先上市。

由于以往中国对高级干部的历史采取保密制度，使西方作家难以从中国找到第一手的真实资料，只能从港澳的旧资料中去撷取一鳞半爪，甚至引用了错误的资料。……

美国《时代周刊》选出邓小平作 1985 年的新闻人物，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和启发，美国《时代周刊》编辑部原来是考虑过以苏联新领袖戈尔巴乔夫，以及当代若干知名人士，作为 1985 年的新闻人物的。但经过研究分析，在最公正的天平上衡量过，最后认为邓小平才是最适当的人选。

事先，《时代周刊》派出了庞大的新闻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访问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素材。他们又接触了美国其他报馆长期驻华记者，更听取了美国研究中间问题的专家们的意见，博采周谘，绞尽脑汁，他们这种一丝不苟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作风，是全世界历史学家学习的榜样。不到一万字的文章，竟动用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世界上是罕见的。

《时代周刊》对封面设计也深具匠心，他们请了艺术家罗伯特·卢森堡精心设计。《时代周刊》编辑部介绍说：“罗伯特去过中国，在北京和西藏举行过他的作品展览，他在日本与艺术指导路德·霍克兰相遇，霍克兰说：我们认为他能将邓的像设计得富有新意，并反映出革命的传统，这位艺术家通过亲身感触，以及他手头的一些照片，创作出一个肖像似的艺术拼贴画面，画面左上方一把剪刀剪开红绸带，表示中国迈向一个新时期。1982 年也曾去过中国的卢森堡说：今天出现了新的精神面貌和新的奇迹，那是三年前不曾有过的（指 1982 年前），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艺术家卢森堡这句话引起我的深思。

《时代周刊》上《东山再起的同志》这篇文章，更激起我心底的共鸣。也引发了我创作《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这本书的动机。

历史学家对人物的评价，着重点是评价他对自己的国家以及对世界的影响。他的人民过去生活得怎样？现在生活得怎样？今后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至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活动，以及他迈向成功之路的坎坷和曲折的历程，则是次要的。

因此，我以较多的篇幅来写几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牵涉面比较宽广，而对邓小平本人则着墨不多。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分不开的，他以高度智慧来指引人民前进的方向，十亿多人就能走上宽广的道路。

世人把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称力“第二次革命”，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因为十年前中国的处境，比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大衰退时期，更为严重，

更为复杂。

30年代，罗斯福总统面对美国经济大衰退的浪涛，用铁腕推行新政，扭转了美国经济大衰退，使美国的经济获得复苏，全面繁荣，这也是一种改革，只有经济的繁荣，才能促进政治的修明。当时的和现在的美国反对党，电部承认这个事实。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影响着当时的美国人，今天的美国人，以及尔后若干年美国人的命运，这已成为人类历史不可抹煞的功绩。

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未到十年，成绩斐然，实践证明，这是造福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一个方案，一场革命。所以，全国景从，奇迹迭现，全世界都欣赏和喝采，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也竞相效仿；它将影响着当代中国人，以及若干年后的中国人的命运。因此，将《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这本书，当作历史的见证也未尝不可。美国《时代周刊》两度把邓小平选为封面人物，介绍给全世界的读者，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领导第二次革命

由于闭关锁国，思想僵化，政策摇摆不定，再加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红卫兵的胡作非为，中国的经济也遭到沉重的打击，诚如中国的舆论所公开承认，70年代的末期，中国的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的命运向何处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日思夜虑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有识之士关心的课题，在海外的华裔同胞，亦寄予深切之关注。

中华民族要昂首挺立于世界国家之林，不是靠口号和空想来获得光荣，而是靠事实来表现，人，当然要有精神，人也离不开物资。要解决十亿多人民的温饱，在温饱的状态下摆脱穷困落后而进入小康，再由小康而到达繁荣富强，这是一条艰苦曲折的道路。在思想僵化的情况下要解放思想，在生产力量萎缩的阶段要解除一切束缚生产力的障碍，是关系到10亿多人民及整个民族前途的大事。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拥戴，几年的苦干实干，给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奇迹般地呈现了生机蓬勃的喜人现象。9年来的实践，已具体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这成果还将影响着今天和明天的中国历史。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的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也为全世界经济停滞、生产落后的国家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实行经济改革开放，在今天的地球上已形成一股新风气，开创了第三世界国家摆脱穷困落后的新途径。谈改革，说开放，是今日世界有识之士的时髦课题，干改革，干开放，更是时代的新任务、新目标。大势所趋，潮流所向，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历史，是人类在前人思想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的改革、改革、再改革的过程中的文字的积累。基于此，现代的历史学家确定：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改革家是发展历史创新历史的先行者！对中国来说，改革就是光明和幸福，就是中国的希望。

邓小平不是个神，是个现代人。作为中国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他能吸收前人的智慧与精华，扬弃其愚昧与糟粕，迎合世界潮流，

洞察人民意向，大胆创新，排除障碍，发扬民族精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他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正鼓舞着和带领着中国人民，把历史推向前进，这就是结论。

“马克思在天之灵很有威严，他看到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不满意，所以他惩罚我，罚我变成聋子。”（注：意译 1985 年邓小平讲话）

这当然是 10 亿中国人民的领袖人物的玩笑话。还在作出有魄力的行动，使一个世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旧貌换新颜以前，邓一只耳朵听力就不好。但是，在这位身材矮小但拥有铁腕的领导人看来，这句玩笑话意味深长。如果在大显身手搞改革的当中，邓还打算用共产主义革命的祖师爷卡尔·马克思的名义来证明他常常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的正确性，他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中国推行的政策是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所乐于接受的金科玉律有所不同或者相抵触的。照中国阴阳平衡的思想来看，邓的第二次革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尝试，把表面上看来势不两立的两种东西融合到一块，如国家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中央计划和市场竞争，政治专政和有限的经济、文化自由。的的确确，对在西方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怀疑论者来说，这是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到一起的一种尝试。

东山再起的同志

在四川省西北部的茂盛竹林和稻田之间，有一幢带有当地典型风格的 U 字型农宅（即两厢伸出），木架结构，灰浆墙，灰色瓦屋顶。10 户人家住在有百年之久的 16 间房间里，每间房约 32 平方米面积。

庭院里摆放着一束束干辣椒和谷穗。在这拥挤的公共住宅中间，有三间未住人的房间，每天都有不少人到此来参观，这儿就是邓小平的故居。尽管农宅的“文化中心”只有少量的照片和旧的家具，但也足以使人产生对往事的回忆。当有人问邓小平他为什么把祖上有牌坊的住宅让人使用，他回答说：“让房子保持原样，让农民住进去吧。”

看来，邓不爱自己拔高自己是有其原因的。邓近来告诉《时代》组织的新闻旅行团说：“人们想要我当党主席，我告诉他们我老了，当不了。人们要我做国家主席，我说不行，我不想那么做。”中国的新闻媒介一般称他为最高领导人。邓的谦让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资本不够或是阅历没有已故的领袖人物那么丰富。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身居“最高领导人”职务也好，还是被别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好，他所度过的一生都是充满意义的。

邓的长期革命生涯令传记作者们感到不可思议。一生历经轰轰烈烈的战争与革命，有过了不起的政治上的胜利，当然也有羞辱的下台，有个人的成就，也有家庭的不幸。运用保存实力的手法和计谋多端的恢复能力，这位意志坚强的政治家不仅在忍耐中渡过了难关，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今天，在他将近 90 高龄之际，他站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权力巅峰上，成为他骄傲地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的发动者。

邓的关于中国的全面看法最为突出的是没有华而不实之处，邓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是学者和理论家，他也不像另一个久经考验的战友——已故的周恩来总理那样，学识丰富，风度翩翩。但这并不影响邓的敏捷的思维能力和世界观。他一贯寻求的是宁愿逐渐地而不是突然地变革以及实用主义胜过教条清规。在最近论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时，邓说：“如果能使人民的生活得

到改善，那么，我认为这项政策本身就是对改革能顺利继续进行的一个有力保证。”

在采用后退战术上，没有谁能与邓相匹敌。他有时甚至公开承认错误，尽管他不相信自己错了。然而，他却是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他相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理论也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毛在 1958 年搞的“大跃进”运动，当时在全国农村强行搞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鼓励人民群众在后院炉子里炼钢铁。这一运动被证明是场灾难。邓和刘少奇主席在 1961 年意识到了这次失策造成的巨大后果，他们开始着手加以改正。在一次气氛紧张的党的全会上（毛未出席，以便让邓、刘和其他人在毛逝世前得到领导经验），他们宣布采取一些措施，如恢复个人的自留地，发展养猪等副业，搞更多的自由市场。在工业方面，把经营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从党的官僚桎梏中解放出来。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计划措施是邓的第二次革命所采取的方针政策的雏形。

为了给那种开明做法的必要性作辩护，邓笃信抓经济效益的路线，这已成为他的简洁信条：不论白猫和黑猫，抓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他也开始提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人价值的问题，即不仅仅是看他“红”的方面（即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尽管邓本人过早地结束了正规教育，但他还是多次强调指出，他对于建设新中国的看法是牢牢地扎根于教育和科学研究这方面的。……

对于邓和其他政治上的温和派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场恶梦。邓和妻子卓琳被一同下放到江西省南部，他被迫到一个拖拉机工厂去工作。在肮脏的厂房里，他守候在工作台前干些手工活儿，邓的家庭成员也因他的政治罪而受到牵连。他的弟弟邓书平（音译），贵阳的一个城市干部，受到一些自封力红卫兵头头的人的不断残酷迫害，在绝望之中于 1967 年自杀身亡。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一名 22 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在与红卫兵暴徒们对抗中掉下楼去，摔断了两条腿，由于未得到及时医治，造成终身残疾。他的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下放到陕北农村。尽管自己并未受到非人的待遇，邓很想保护家人的安全。他最终被允许将子女带到身边来一同生活。他们住在安排给邓的一幢两层楼的住宅里。邓利用闲暇时间听广播。读书和锻炼身体。

1973 年，邓在北京的宴会上露面，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他还是挂的副总理的头衔。人们后来才知道，他重新复出是来接替周恩来处理日常的政府工作的。周后来死于癌症。邓还担负了处理党和军队事务的任务。他起初小心翼翼地继而果敢地协助周恩来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宏图，在 1975 的 1 月加以宣布。

但是，江青和另外三十忠实于毛的左翼分子，即所谓的“四人帮”进行了报复。1976 年 4 月，他们罢免了邓的一切职务。这在他的生涯中是第三次置身于政治的荒原中。这次他身体有段时间受到折磨。邓的老朋友、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他救出来，在广东某地为他提供了庇护所。

1976 年 9 月，毛去世。一个月后，“四人帮”被逮捕。邓再次被要求承认错误。为了自己的需要，他干脆地同意了（注：听说，这次是华国锋要邓承认错误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政治科学的教授张帕里说：“邓是个很会审时度势的人。”

对于一个大半辈子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来说，邓与家人保持着不同寻

常的密切关系。自从他父亲在 1938 年去世以后，他把继母夏伯根接到家来。他分别负担了一个伯母和一个叔伯的生活，他们如今是 80 多岁的人了，还住在四川老家。“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把儿子邓朴方送到美国去治疗。邓朴方现在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负责人，邓质方，34 岁，是纽约罗彻斯特大学的毕业生，从事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邓的三个女儿已结了婚。大女儿邓林，是个有才华的艺术家，她在纽约市展出过自己的绘画作品。邓榕和她丈夫都是中国的外事官员，1979 年至 1983 年他们在华盛顿供职。邓至少有两个孙儿女，据说他很疼爱他们。

邓通过游泳和痛痛快快地打上一通桥牌来使自己紧张的生活松弛一下。他和夫人在北京西山自己家里定期举办周末桥牌比赛。常来的客人当中有副总理万里和党的总书记胡耀邦。邓很喜欢吃四川出产的柚子。他有时还特地叫人去弄些柚子来。他也是一个世界有名的吸烟者。在开会时，不论是他发言，还是听人家发言，他抽熊猫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邓最近对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我奉行不干涉的政策，放手让别人去干。”显而易见，这恰恰是邓的又一深谋远虑、让人猜不透的说法。

[香港]李国强：

邓小平得出教训：“老人政治”搞不得

李国强是香港知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镜报》杂志社总编。他注重对中国当代政治的研究，特别是对邓小平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有不少著作问世。下面的文字是从他的《邓小平引退曲折内情》、《邓小平不愿垂帘听政》两文中摘录的。原文载香港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 1988 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录》第 3 集。

邓小平引退曲折内情

曾经提出这样的理由，邓小平健康状况良好，还可以于几年。邓小平回答说：我 83 了，看来身体是不错，脑子也还不糊涂。不过，毕竟已经 83 了。谁知道哪一天身体会出问题呢！

也曾提出这样的理由，新班子接班要有个过程，需要邓小平留下来传帮带。邓小平回答说：老的不退下，新的起不来。椅子只有那么几把，我们坐着，他们就得站着。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很危险。如果我们一旦不行了，年轻一些的上来，经验不够怎么办？我们在还健康的时候退，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这比较好。

还曾提出不少理由。邓小平坚持说，是我首先提出在党内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要建立退休制度。我自己不带头做，岂不是言而无信了吗？终身制还废得了吗？退休制度还能建立起来吗？

……笔者获悉，邓小平已明确表示到下一次党代表会议，他

一定会全面交班。这肯定将促成中共领导机构又一次大更新。邓小平这种明智而果断的做法，表明他确实是高瞻远瞩，具有过人的智慧和不凡的气度。他带头坚持退厂中共最高层岗位，将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一个好榜样，并且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不愿垂帘听政

非洲突尼斯的布尔吉巴给中共元老上课！这种说法也许会使人迷惑不解，突尼斯独立运动的这位老资格领导人最近什么时候去了北京？又怎么会给中共元老们讲起课来了呢？

当然，布尔吉巴并没有到北京去，走上讲坛给中共元者们讲了些什么。但是，邓小平正研究着他的遭遇。

中共“十三大”结束不久，传来突尼斯政局变化的消息，1987年11月7日，突尼斯总理兼内政部长本·阿里宣布解除终身总统布尔吉巴的职务，并由自己担任共和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在北非这个穆斯林国家发生这次“和平政变”，受到了邓小平的特别重视。

据北京一位熟悉高层情况的人士透露，邓小平十分注意他，并极其认真地研究了最近突尼斯政局的变化。他从布尔吉巴的遭遇中总结出一条教训：“老人政治”搞不得！最近，邓小平还用布尔吉巴这个实例一再向中共高层讲述这个道理，并且表示自己一定要很快地完全退下来。

……这次突尼斯政局变化也使邓小平思想很不平静。据熟悉情况的人向

笔者透露，邓小平在那几天密切注视着各方对布尔吉巴下台的反映，并且同人议论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在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感慨万千地说：“突尼斯发生了布尔吉巴事件。布尔吉巴是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长期在突尼斯威望很高，他比我大一岁，今年84岁，但是他一直不安排好身后事，结果让人安排了他的后事。中国是个大国，不解决后事的安排，要出乱子就是大乱子，而且要收拾很不容易。”

邓小平接着说到了他自己：……我已经83岁了，不知哪一天就会倒下，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就是不倒下，总有一天会像布尔吉巴那样胡里胡涂，结果犯了错误或者被人清理掉。因此，我的半退是一种过渡方法，力求减少过问具体工作。

[香港] 陆铿：

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

陆铿是香港著名记者，曾多次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会见。1988年，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和好评。

香港学人胡菊人为陆铿的《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撰写了题为《写出“邓小平时代”》的专文。专文中说：“‘邓小平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关键性时代。可以这样说。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如果失败，则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了。如果邓小平政策成功，则中国在21世纪或者真的可以一洗百年来的耻辱，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因此，就某一程度上说，了解邓小平的时代，了解他的政策及问题之所在，亦可以说是了解中国前途及中国人命运的一把钥匙”。

陆铿先生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由于他（指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允许大批青年人出国留学，和外面的世界接触，改变过去长期闭目塞听的状态，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有了一点振兴的生机。毫无疑问，邓小平为中國大陸开创了邓小平时代，历史将给予公正的评价”。

下面的段落，摘自陆铿先生的《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一书。

争千秋不争一时

他是在全世界对中国大陆都表示失望的情况下，给10亿人带来了希望。他是在强大的反对他复出的压力下站了出来，很快地扭转乾坤，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而且，明明可以做党主席、国家主席而不做，表现出争千秋不争一时的气派。了不起！

我这种认识，是通过感性而到理性的。第一，邓小平此人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比如，我批评共产党的话，他一直耐心听完，不中途打断我的话，而且反应不急不徐。第二，邓本人说话，不绕山绕水，而是开门见山，一句是一句，而且有一定的幽默感。比如，当我和他谈起香港问题时，他就说，到期收回，不是单收回九龙，而是像广东人说的“冚办烂”，并向在座的邓颖超和方毅解释，“冚办烂”就是统统收回的意思。而且说，收回之后，制度不变，可以告诉在香港的亲戚朋友放心，不仅现有制度不变，甚至他们要回到封建制度也可以，话讲到这里，好了吧？表现得很干脆。第三，邓为人豁达，看得开。比如，我和他谈话时见他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便告诉他，美国医药总监已经确认香烟有害于身体健康，因此美国香烟广告都要同时刊出有害的声明。邓很诚恳地表示，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其他的嗜好，只是抽抽香烟。而且年纪这么大了，何必再戒除呢？如果因抽烟而缩短寿命，也只好认了。说得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最后，邓使我佩服的是他做事认真的精神。就以“中国实验大学”的计划来说，我当时交给他，他表示说，要好好研究一下。从1982年秋到今年春，石沉大海。我想大概是此计划连同共产党改名的建议，一起被丢进字纸篓里去了。想不到，他今年2月视察深圳时，竟亲自把这个计划带到深圳交给梁湘，并告诉梁湘，这个计划经教育部研究过认为可行，叫他们再商议一下。今年3月我收到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和副省长兼深圳市长梁湘两人具名的信，邀请我今年6月访问深圳，就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事签署协议书。说明

邓小平是一心求治的。只要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益的建议，他都会嘉纳的。

等着小平哩！

1976年，人们在大街上看批邓的大字报，毫不隐讳自己的真实感情：“哼！要是这次不批邓，还不知道邓小平是好人哩！”“四人帮”垮台后，群众对邓小平的复出，翘首盼望。有如大旱中望云霓，每逢开会间隙的耳语，或私下共语，都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当时人们为了表达对邓小平复出的迫切心情，只是在天安门旁的墙上贴了一个斗大的“等”字，在“等”字下面用一根红线挂上一个小瓶子。最初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才发现其真意：等着小平哩！大陆有一部叙述甲午海战的电影《甲午风云》，主战派中有一个刚正不阿、爱国爱民的将领邓世昌，人称邓大人。自这部电影上映后，“邓大人”也就成了邓小平的代称。这不是拥戴邓小平个人，而是反映了人民切盼中国大陆改弦更张，走向富强的一片热忱。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革”期间倒台的老干部，……当他们被赶下台，削职为民以后，长时间地“靠边站”，使他们有了“旁观者清”的方便。在插队落户或“五七干校”养猪、种菜、犁地、耕田之时，自然使这些长期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中央首长和各省负责高干们，重新和一般群众或是乡下老百姓有所接触，亲耳听到人民的呼声，亲眼看到人民的疾苦，呵，原来事情并不像中南海想象的那么简单，从而对中共统治大陆多年来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警觉，结合青少年时期培养的爱国激情和革命理想，于一旦东山再起时，也就决心将自己有生之年贡献出来，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奠定基础，以免像周恩来那样含恨九泉。因此，在1977年、1978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践派”复出时，确是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那时，老百姓也闻讯而喜，奔走相告，尤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形成了空前热烈的政治局面。

他表现出一股“顽固”劲

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3年的做法，是要把毛泽东留下的……摊子，彻底整顿一番，把毛泽东定下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动乱彻底结束，把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四化”为中心的建设事业上来，让百姓喘一口气。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头脑一直比较清醒。这在1956年中共八大一次会议时，他和刘少奇对于中国大陆主要矛盾的估计，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过了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的弯路，现在邓小平回头论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针对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论点，邓小平提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总路线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而且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是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

横下心来，反映了邓小平的“顽固”劲。他之所以能三起三落，也就是靠这点“顽固”劲。1974年在毛泽东“绵里藏针，人才难得”的批示下复出，1975年掌握中共中央工作时，接见各省市大员就表现了这股“顽固”劲。

毛泽东：

邓小平人才难得

毛泽东和邓小平无疑是当代中国两位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生于 1893 年，邓小平生于 1904 年，邓小平比毛泽东小 11 岁，但他们却几乎同时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相识在 1927 年大革命危急关头武汉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上。但毛泽东真正认识、了解邓小平则是由 1933 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邓、毛、谢、古”事件。当时，毛泽东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邓小平因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被撤销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统帅，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则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第二野战军政委等一方将领，驰骋疆场，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卓著功勋。建国后，毛泽东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长期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周恩来总理病重后，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全面主持中央的工作。几十年来，他们有过密切合作、信任和友谊，但也发生过分歧和矛盾，关系十分不平常，邓小平一直对毛泽东非常尊敬，甚至在毛泽东死后，还曾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曾是毛泽东的助手，但对毛泽东并不崇拜、盲从，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抵制。毛泽东十分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多次委以重任，多次赞誉邓小平人才难得。但他又抱怨邓小平有时不听话，甚至在“文革”中两次将他“打倒”。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晚年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没有一个人像邓小平那样得到毛泽东如此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方面的评价，也没有一个人像邓小平那样被毛泽东“打倒”又启用，启用又“打倒”。但即使“打倒”的时候，也都留有余地，“以观后效”。这也许正是因为毛泽东始终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的缘故吧。

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毛泽东对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进行评论，最早恐怕还是 1951 年 9 月 3 日与梁漱溟先生的谈话。梁漱溟于该年对四川进行了近 4 个月的土地改革考察。回京后，毛泽东约他谈谈对四川的印象和土改情况。其间，梁漱溟谈到邓小平年轻、能干、治政有方，深得人心。毛泽东听后，脱口而称赞：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邓小平自 1949 年 11 月起至 1952 年 7 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作为主政西南的领导，邓小平处理党务、剿灭土匪、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清理鸦片烟窑等等各项工作都进行得有条不紊。他还妥善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对农民进行思想文化宣传，倡导重视教育、尊重人才……西南局党、政、军各方面工作成绩显著。对此，毛泽东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说梁漱溟看得蛮准。但得出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的结论，恐怕除了四川这一段外，还纵观了邓小平此前各个时期所表现出的杰出才华。邓小平 24 岁时就担任了中央秘书长，在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那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处在非常危险的时候。在江西中央苏区时，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顶住“左”倾错误作法，因而受到撤职处分。这是邓小平政治上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当时 28 岁，但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品格。这是毛泽东永远不能忘记的，乃至在 1973 年再度启用邓小平时，还特意强调这一点。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刘伯承师长一起率部

挺进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太行、太岳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刘邓大军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特别是1948年11月，邓小平作为前委书记，和刘伯承、陈毅等一道组织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毛泽东夸奖邓小平等人：“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在指挥作战的同时，邓小平还善于总结经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后，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建立有33个县的大别山新解放区。当时，如何在新解放区开展工作，遇到许多新问题。毛泽东正收集各方面意见。邓小平及时总结大别山新解放区的经验，于1948年2月8日写了《复毛主席征询新区斗争策略与群众组织形式》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许。2月17日，毛泽东向全党批转了邓小平的报告：“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淮海战役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又率第二、第三野战军跨过长江，直捣南京、上海，迅速解放了苏皖浙赣等省。1949年10月1日，邓小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又和刘伯承、贺龙等马不停蹄，率部进军大西南。因此，毛泽东脱口称赞邓小平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是很自然的。

办事公道、稳当，看问题有眼光

建国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极为器重。1952年7月，邓小平调北京，担任重要的职务——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等职。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总书记，成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组成的党和国家领导核心中的一员。此后，邓小平一直处在一线，协助毛泽东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在他推荐邓小平同志担任总书记时说的。在讨论党的八大的组织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提议设总书记并推荐邓小平担任这一职务。1956年9月13日，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这个安排作了说明。邓小平同志表示，他还是比较安于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自己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赞成就顺了。接着就夸邓小平的优点。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毛泽东又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过不少肯定的评价，但得到他这样的评价的大概不多。

这个人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个评价是1957年访苏时同赫鲁晓夫说的。邓小平刚

到中央不久，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这时高岗和饶漱石及林彪等人搞阴谋活动，拉拢邓小平，想拱倒刘少奇。邓小平明确向高岗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又找陈云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陈云和邓小平的警觉，他们将这些情况如实报告毛泽东，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很快揭露并挫败了高饶反党集团的夺权阴谋。邓小平在负责处理高饶事件中，以及后来在 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邓小平随同前往。在莫斯科，毛泽东在一次和赫鲁晓夫谈话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参加学习，1921 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很有发展前途。

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加以区别

随着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发生发展，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他的分歧和矛盾也不断发生发展。特别是 1962 年 9 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推行越来越“左”的政策和作法，邓小平不予以支持配合。在那特定的历史情况下，邓小平采取的是一种沉默或者回避的态度。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小平大多与周恩来坐在一起，或坐在彭真旁边，有时挨着贺龙和刘少奇坐，总是坐在离毛泽东稍远的地方，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说：“邓小平耳聋，他总是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敬而远之，不听我的话。”

对这事，后来邓小平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位样的情况。”“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

1964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丰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终于当作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打倒。但是毛泽东对待邓小平还是留有余地的。在 196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林彪、江青一伙鼓噪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因而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后来，林彪、江青一伙曾想谋害邓小平，被毛泽东发觉后，挫败了他们的计划，邓小平得以幸免于难。后来在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被下政到江西接受劳动改造。

1971 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以往的政策作了调整。从 1971 年 10 月起，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平反，重新担任党、政、军职务。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邓小平。

1972 年 1 月，陈毅元帅逝世，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大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见面时，毛泽东不仅称赞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而且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把邓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

起。显然，毛泽东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毛泽东欲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第一个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

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事件始末的传达，也得知了毛泽东关于他的讲话。他十分激动，于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3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邓小平在1972年8月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了他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实事求是地揭露了林彪和陈伯达的一些问题和事实。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愿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在信中写道：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6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江西省委转中共中央办公厅再转到毛泽东手里。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重要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注，指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的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是基于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事实，因而是错误的。对邓小平的有些评价也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功绩。在当时，毛泽东能说出这样的评价是很难得的。这个批示成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转机。此后，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说邓小平“行方思圆”，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他是个好战士，懂得同俄国人斗。

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了返京通知。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同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决定八大军区对调。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宣布：“现在请了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们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接着又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做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

请回来的。”毛泽东还转身对旁边的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12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通知称：“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你开了个钢铁公司，我赞成你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一方面开始“解放”和启用了一批老干部；另一方面继续任用“文革”中青云直上的新贵们，王洪文这样造反起家的人物居然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仍是政治局委员。“十大”之后，王、张、江、姚结成小帮派，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更高的权力。这样，党的高层中形成了两种力量的对抗，一方是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为代表们的正确力量，他们为纠正“左”的错误而殚精竭虑；另一方则以王、张、江、姚等阴谋家、野心家为代表，他们总是兴风作浪、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加紧了夺权活动。1974年初，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以为时机到来，处心积虑地把这场运动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对此，毛泽东表示不满，7月17日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且自6月以后，毛泽东会见外宾已不再要王洪文陪同，而改由邓小平陪同。毛泽东的这种作法和以往形成极大的反差，“四人帮”顿时感到孤立和紧张。

1974年4月，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受到热烈欢迎。邓小平讲话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邓小平的发言，扩大了毛泽东和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敏感的外国评论家，记者们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邓小平，毫无疑问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张春桥看到这些报道，气得七窍生烟。当时，周恩来总理已经病重，而邓小平的地位和威望日益上升，接替周恩来是完全自然的事。1974年10月，周恩来住院治疗。10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告诉他，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

作。预料与担心的事果真发生了，毛泽东的这一决心，使“四人帮”更加恐慌，他们决定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7日，江青借口“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崇洋媚外，逼邓小平表态，企图一箭双雕。邓小平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他针锋相对地批驳江青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江青大为恼火，在会上胡搅蛮缠，会议无法进行，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当天深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17号楼紧急密谋。因为丹麦首相偕夫人定于翌日抵京访问，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将由邓小平陪同外宾到长沙拜晤毛泽东。他们害怕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说明事实真相，决定派王洪文赶在邓小平之前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以混淆是非，使毛泽东改

变主意。

10月18日，王洪文飞抵长沙。下午2点，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九所6号楼接见了王洪文。在对毛泽东的汇报中，王洪文故弄玄虚，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蔑邓小平为了“风庆轮”这件事，与江青吵得很厉害，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王洪文利用汇报四届人大会议筹备情况，诬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部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污蔑周恩来、邓小平的同时，却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似乎明白了这位副主席此行长沙的真正目的。他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王洪文批评道：“商量工作嘛！有意见当面提，这么搞不好。”还告诉王洪文：小平同志会打仗。言外之意，邓小平比你们经验多，能力强。还提醒王洪文，你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用加重的语气，告诫王洪文，“你回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接见王洪文时，张玉凤始终在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张玉凤回忆当时谈话的情景，写了这样的证词：

“‘四人帮’早在四届人大之前就阴谋篡党夺权。四届人大前夕，他们感到形势不妙，很孤立，便企图先发制人，把周总理、叶剑英同志等搞掉，把权夺到手。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地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事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地（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恩来，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王洪文告状不成，反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于当晚快快回到北在王洪文来长沙告状的同一天中午，江青还召见将要陪同外宾去长沙的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想请她们也在毛泽东面前替他们奏周恩来、邓小平一本。

10月20日，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埃尔塞贝特·哈特林一行在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部长助理唐闻生、新闻司副司长章含之陪同下，来长沙拜晤毛泽东。

当天，王、唐陪同外宾会见毛泽东后，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对江青十分恼火，气愤地说：“‘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同志已经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联系18日王洪文来告状，毛泽东明白，江青是想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必要提醒江青等人注意。因此，他明确对王、唐两人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停了一下，他又一字一句地说：“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

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要王、唐两人回北京后将他的意见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

“四人帮”万万没有想到，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竟触怒毛泽东，并促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更加重用。

11月12日，邓小平再次陪外宾来到长沙拜晤毛泽东。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和邓小平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一开始便以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个钢铁公司！”“我赞成你。”毛泽东指的是“风庆轮”一事，邓小平同江青的斗争。

邓小平则很平静地回答：“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他们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又指着王、唐两人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谈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这个好！”

邓小平在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时，表示：“责任太重了点。”

毛泽东劝邓小平：“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了啰。”

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和鼓励，使邓小平信心更加坚定。

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的时候，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十分热情，两位老战友互致问候和关照。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在硬挺，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你还可以到外面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对王洪文，毛泽东则比较冷落。据有关记录，这一天毛泽东就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主要讨论了人事安排问题。

关于邓小平，毛泽东称赞道：“他政治思想强。”边说边用手指了指脑袋。并指着在坐的王洪文说：“politics（政治）比他强”。

只有小学文化的王洪文听不懂politics是什么意思，十分尴尬。

毛泽东又接着明说：“他没有邓小平强。”

还边说边用手中的铅笔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脸都涨红了。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当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插话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给邓小平加了一个职务，并称赞他“人才难得”，边说边在纸上写下了这几个字。

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在十届二中全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的：毛主席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在次日的谈话中，王洪文又一次透露了他们一伙要权的野心。毛泽东当

即严厉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告诫他，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并举党内斗争力例，对王洪文进行教育。毛泽东还责令王洪文就这段时间所犯错误写一份检讨交他。王洪文不得已于第二天写了一份检讨，但并没有交给毛泽东，把它带回了北京。直到1976年10月被捕后，这份检讨才从他的住处搜出来。

由于周恩来的积极支持，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任职提议迅速得到落实。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3日到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说不翻案，靠不住啊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不顾困难重重的处境，以力挽狂澜的勇气和魄力，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强调各方面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的老领导的同心协力配合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并取得显著成绩。

邓小平的整顿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的顽固抵制。他们把整顿中提出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打“土围子”。借批《水浒》，诬蔑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特别是1975年9月，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后，受“四人帮”指使，多次向毛泽东作歪曲事实的汇报，攻击邓小平。如：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我感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一些。”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虽然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但不容许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四人帮”借批“经验主义”、批《水浒》，诬陷、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的险恶用心，曾有所觉察，提出了批评，在不同场合还说过“邓小平是实干家”，“邓小平是邓水平嘛，他有能力”之类的话。但由于“四人帮”一伙的诬告，谰言，毛泽东最终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1975年11月开始停止了他的部分工作，“专管外事”。不久，又以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的两封信（信上反“四人帮”的两个亲信人物）为借口，说邓小平偏袒和支持刘冰，而刘冰的信的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这样，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2月，党中央陆续传达了毛泽东有关这次运动的多次谈话。这些谈话中，毛泽东错误地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总是黑

猫白猫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说不翻案，靠不住呀！”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以目乱纲，再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些谈话公布后，全国开始公开批判邓小平。4月清明节前后，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为内容的天安门事件遭到镇压。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被打倒。但毛泽东并没有将邓小平打死：依然“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使得邓小平能第三次东山再起。

历史证明，毛泽东听信“四人帮”谗言，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错误的；邓小平复出后，“翻案”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将邓小平打倒之后再次重用他，邓小平第三次站起来后仍然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充分展示了两位伟人的博大胸怀和优秀品质。

周恩来：

你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生于江苏淮安。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军事部部长。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同年8月1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他自1927年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1936年12月，他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赴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战胜利后，又率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共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1933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邓小平；那么，周恩来比毛泽东则要提前了大约10年。他们于20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即在一起了。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对他与周恩来不同寻常的交往有一段深情的道念。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导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最尊敬的人。”

邓小年的女儿毛毛在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接着她写道：“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可以接替毛泽东来“掌舵”

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总是在众人（包括外国人，如赫鲁晓夫）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另一方面，的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小平太了解了。是周恩来介绍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是周恩来特地把他从蒙达尼区调到巴黎，与陈延年共同负责编辑《赤

光》，邓小平具体负责油印工作，“油印博士”的绰号就是周恩来给起的。1927年周恩来与邓小平同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局长，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他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由于环境的险恶，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

居住地点和姓名。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之间也都互不知道住处，而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则掌握这些绝密情况。他将各项工作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从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而邓小平当时年仅 24 岁。建国后，邓小平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处于中央工作的第一线，协助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工作。

在军事上，邓小平 25 岁就领导了百色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配合刘伯承作战，刘伯承主军，邓小平主政，刘、邓大军成为一个震撼历史的名字。周恩来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刘伯承是举轻落重，邓小平是举重落轻，二者相得益彰。所以无论是党务、政务、军务，邓小平都表现出了特殊的才华，对此，周恩来当然是心中有数，也许在他看来，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周恩来的这种选择在他病重期间再次表现出来。在毛泽东暮年和他自己病重的时候，推出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接班人的地位是很自然的了。

他下去到农村是锻炼

1969 年，在林彪的“一号通令”驱使下，邓小平被疏散转移到江西，同时去江西的还有陈云、王震。在这个风浪中，周恩来伸出了援助的巨手，为了邓小平、陈云、王震等人免遭迫害打击，1969 年 10 月 3 日，在他们去江西之前就给江西省委打了电话。周恩来在电话里向有关领导指出：“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接触一下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么？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周总理又问江西有无暖气，他说：“因为从北方一下到南方不习惯，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当然吃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花自己的钱，房费不要太贵了。他们住到你们那儿要很好地帮助他们，向群众解释一下。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 60 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些。我还告诉他们也可以到工厂学习，看看，接触一下群众，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要帮助他们。”

然后，周总理特别交待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 60 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

周恩来再三强调，这些人下去，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并且对下去的地方，都做了具体安排。

10 月 18、19 日，周恩来又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他否定了江西省革委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太远，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较差，故不妥。随后，周恩来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二层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的住宅，称“将军楼”。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

厂，也离住处不远。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才放心。

副总理已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了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陆续解放一些老干部。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休息室里接见陈毅的夫人张茜时，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功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和时任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这年8月中旬，毛泽东作了对邓小平同志问题的重要批语后，周恩来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抓紧促成邓小平的复出。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关于让谭震林从桂林回北京而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着重提及：“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复出，复职。1973年2月邓小平也突然接到了中央要他返回北京的通知。自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但党中央最终于1973年3月10日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就在决定发出的当天，周恩来即向中央政治局告假，要求“病体”两周，中央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自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告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持忘我工作。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目中的特殊重要位置。

1973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邓小平在同年8月召开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大后，毛泽东同意

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12月22日，病情沉重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一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1971年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使“四人帮”深感不安，认为夺权时机已到。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意在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坚决地顶了他们。江青一伙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偷偷赶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10月19日，特意找到邓小平等同志了解事情经过。然后，把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找到医院，向他们明确提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还表示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两人主持，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两次手术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毅然再度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10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委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1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力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医院经过紧张的工作，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及候选人名单等方案基本确定。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5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批评了江青、王洪文。由于周恩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一伙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而委邓小平以重任。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追认邓小平

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随后举行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四届人大之后，2月2日，周恩来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文件。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样，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实际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9月7日，病情严重恶化的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幽默而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请客人转告齐奥塞斯库，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陪见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四届人大之后，由于劳累过度，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常住医院，在医院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则由邓小平主持。

1975年9月，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4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不得不进行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不已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治疗。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寿命。”

就在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各部门。10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靠近手推车时，他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说的“这一年”是指1975年。

1975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第9个年头。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再次造成了全国形势的严重混乱。“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但是，由于党和人民的斗争，也由于毛泽东态度的某种变化，在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四人帮”“反周组阁”的阴谋遭到了失败。这次大会不仅选出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而且在时隔10年之后重新提出了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四届人大之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等同志挺身而出，对铁路、工交、军队、科技、农业、教育、文艺以及党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整顿，通过邓小平等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的整顿，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当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生产严重下降的钢、原煤、棉纱及铁路货运量等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科学、教育、文艺等

领域开始打破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气象。整顿中，各级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和武斗受到抑制，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全国的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等实行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使人民看到了希望。重病在身而极力支持邓小平的周恩来，看到一年来的变化，怎么不感到欣慰呢？他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这是对邓小平工作的肯定，更主要的是对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这在当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四人帮”一伙的攻击诬陷，也由于全面整顿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使毛泽东不能容忍，于11月底又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整顿被迫中断，邓小平再次被错误打倒。而此时的周恩来已再也无能为力了。

江泽民：

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江泽民，江苏扬州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1962年调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1980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1985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1990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对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思想及其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理解得更加深刻。江泽民同志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都做过论述。下面是部分摘录。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充分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很不容易

1991年3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故居韶山参观考察时特别谈到邓小平对坚持毛泽东思想所做的贡献。他说：“毛泽东晚年曾出现过一些失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党内一些同志力排众议，领导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现在看起来好像很自然，但是从当时历史条件下看是很不容易的。我那时是副部长级干部，听了传达后，感到我们的小平同志真正了不起。”

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对于正确评价我们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对于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中国各族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邓小平同志是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是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

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下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and 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论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论述，关于国际战略格局和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论述，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将永远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不管是否在位，其理论和思想始终具有指导作用

1992年4月1日上午，江泽民同志在钓鱼台芳菲苑接受日本驻华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及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时，江泽民强调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一直关心着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发展前途。不管是否在位，邓小平同志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许多高瞻远瞩的决策思想，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始终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指导作用。他不久前视察我国南方时的重要谈话，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我们政治局进行了认真讨论，完全赞同，正组织全党同志全面、深刻地领会，紧密联系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其精神。

对社会主义科学认识的新飞跃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推向前进。这也是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的思想。

江泽民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引导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他为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建立的新的历史功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能够经得起严峻考验，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的原因。完全可以这样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及其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实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科学的新的飞跃。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14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江泽民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全面阐述后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对两个历史课题做了科学回答

1993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就邓小平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作了论述。他指出：在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对这两个历史课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

江泽民说：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们党和国家摆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中，用极大的精力来解决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率先抵制和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领导全党冲破“左”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同志坚决地批评了借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他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观点，成为由他亲自主持起草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思想。

江泽民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正确解决评价毛泽东同志和维护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这一重大课题的同时，着手解决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另一重大课题，这就是继续探索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阶段，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标志着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在成功地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国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之后，又一次实现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展现出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广阔道路和光辉前景。

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在 70 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现在又写上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理论上的成熟和发展，有力地保证着我们的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江泽民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是指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精神支柱和科学指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热情地支持群众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创新，不断地概括群众创造的新经验，据以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和政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实行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江泽民说：事实说明，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上，充分表现出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他不愧为毛泽东同志的忠诚战友，不愧为毛泽东思想的最杰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也表明我们党领导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十多年来，在邓小平同志这个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伟大的祖国大踏步地前进了。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全面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一整套发展战略

1993 年 11 月 2 日，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重要内容和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重大意义作了深刻阐述。

江泽民说：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不仅领导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面前，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他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他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进行艰辛的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鲜明的革命风格。他尊重实践，思想敏锐，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寻找新路子。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意志坚强，行动果断，总是要求全党“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他在关键的时刻做出重大决策，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他文风朴实，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善于从全局着眼来观字和处理问题，并且总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都要着眼大局，顾全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大力发扬这样的革命风格，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创造力。

江泽民指出：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深刻理解和把握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开创全新事业中积累的基本经验、创造的基本理论、形成的基本路线，一定会使我们全党同志更加充满信心，更好地完成 90 年代的任务，胜利地迈向 21 世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尾的两句话是：“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同志这两句后，语重心长，催人奋进，凝结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和谆谆嘱托。

李鹏：

他的智慧和经验仍是宝贵的

李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四川成都人。1941~1946年，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延安中学，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1946~1948年，任晋察套电业公司技术员，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党支部书记。1948~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动手学习并担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1955~1966年，任丰满友动厂副厂长、总工程师，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调度局局长、阜新发电厂党委副书记、厂长。1966~1979年，任北京供电局党委代理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1979~1983年，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华北电业管理局党组书记，电力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水力电力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3~1987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代总理、总理，1988~1990年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是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5月25日，李鹏总理在会见尼日利亚等三国新任大使时强调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他说：1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还作出了《关于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

198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回答联邦德国《世界报》主编谢尔的专访时，谈到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问题，他指出：邓小平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60多年，这次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他最后一个职务。他之所以退下来，就是要在我国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他提出了废除终身制，现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这种制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同时他也看到现代中国政局的稳定。作为一个有威望的、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政治家，他的智慧和经验对我们仍然是宝贵的。

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993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外交部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上阐述了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他说：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开展外交工作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邓小平同志深刻而全面地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系列的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比如：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关于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关于实行对外开放；关于“一国两制”；关于

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等。这一系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极强的针对性的思想和论断，是我们在新时期从事外交工作必须认真学习并加以切实贯彻的。

李鹏还认为：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他希望外交战线的同志们，认真学好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胆开拓，有所作为。

关心年轻干部

在接见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摄制组人员时，李鹏满怀深情地谈到邓小平对年轻干部的关怀。他说：我 1981 年担任电力部部长，当时可以说在中国的政坛上引起了一番轰动。因为算是最年轻的吧，当时我们原来的老部长刘澜波推荐我，当时我才 51 岁，算是相对年轻了。小平同志在一次宣布这件事情的会议上，他曾经表扬了刘澜波同志是开明人士，党内的开明人士，因为当时在我们党内风气还是排资论辈的，比我资格老的还有根多，他们是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同志，当时电力部还有好几位，如果说是论资排辈，排不上我。所以小平同志在干部大会上，我记不得了，好像是庆祝“七一”的大会上，或者在这前后，他公开表扬了刘澜波同志为开明人士，是我们党内的开明人士。

胡耀邦：

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人民最爱戴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胡耀邦，湖南浏阳人，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成长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 15 岁离家直奔中央苏区参加革命，18 岁即担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长征到陕北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抗战爆发后，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抗大第一大队政委，后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中，先后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第三纵队政委，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1950 年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1952 年起调中央，长期任团中央书记，1965 年兼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受迫害，1975 年恢复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79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纪委第三书记，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1980 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2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 年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总书记。1987 年 1 月辞去总书记职务，1987 年 11 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 年 4 月逝世。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可追溯到 1937 年。当时胡耀邦是延安抗大学生，邓小平在抗大讲课。所以人们说他们有师生关系。邓小平夫人卓琳当时便是胡耀邦重点培养发展入党的对象之一。1938 年初，邓小平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不久胡耀邦也派去作统战工作了。1949 年 3 月，胡耀邦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年底，十八兵团入川作战不久，便正式编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二野。1950 年初，胡耀邦担任川北党政全权负责人。胡管理川北有方，对于负责西南局的邓小平来说，胡耀邦是一个出色的帮手。这也是邓小平赏识胡耀邦的开始。

1952 年，邓小平与胡耀邦一起调北京。1956 年，邓小平任党中央总书记，而胡耀邦则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各自负责党、团工作。胡成为邓的得力助手。据胡耀邦回忆说，1956 年初邓小平就对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说过：“你们工作得努力，取得了成绩。你们的错误并没有党的错误那么严重，即使你们犯有错误，你们仍然在努力工作。”因此，胡耀邦说：“总书记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我们的话。”

胡耀邦和邓小平都爱好打桥牌，60 年代，他们经常与万里、吴晗等人一起去北京的干部俱乐部打桥牌。“文革”中，红卫兵认为邓小平和胡耀邦常去干部俱乐部打桥牌是为了组织“裴多菲俱乐部”，严厉批判胡耀邦是邓小平桥牌俱乐部的一员“黑干将”。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积极协助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如果说，邓小平是个伟大的统帅，他制定了挫败“凡是”派路线的战略，那么胡耀邦则是一名率军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无与伦比的指挥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推举胡耀邦为党的总书记。然后，胡耀邦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如果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胡耀邦就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

作为邓小平的老部下、老战友，胡耀邦对邓小平是非常尊敬和佩服的。这从下面的三段评论可以看出。

应该由邓小平同志来担任这个职务

1981 年 6 月 27 日到 29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在当选中央主席的 6 月 29 日下午，

胡耀邦向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原来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应该由邓小平同志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主席，我觉得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一个问题：“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

他还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总结历史经验。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历史性的决议。……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冤假错案问题，从领导层来看，可以说已经解决了。我希望同志们特别注意一下全会公报中的这句话：“这次全会完成了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性任务。……今天，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花在研究如何提高国民经济的实力，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力。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些决策的绝大多数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做出的

1982年6月，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胜利闭幕，这是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会，在闭幕会上，胡耀邦发表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讲到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几年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时，胡耀邦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等几位老革命家的作用。他说：

5年前，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志们，把我们这些人推上了中国历史活动的前台。5年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工作和活动，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功过是非，已经载入了党和国家的历史记录，印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心坎之中。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坚信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坚信党和人民是以社会实践作为检验一切事物的标准的。人民将对我们这个领导集体，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

作为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一分子，我在这里想说几句话。

第一，几年来我们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是因为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正确的，这些决策的绝大多数，首先是由我们党的几位老革命家作出的，这就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还有徐帅、聂帅、彭真、颖超等几位老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也出过许多的主意，作了重大的贡献。我深深感到，他们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对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确实起了卓越的带领作用。老革命家健在，并且能够在领导集体中发生这样重大的影响，实在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幸运，是我们大家的幸运。现在，让我们大家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祝他们长春再长寿！

第二，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三百多位同志，除了极个别之外，几年来也都以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作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这中间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有些同志特别努力，工作特别出色。有些同志一度跟不上形势，但是虚心接受了教训，跟上来了，表现得很好。还有些同志，几年来曾经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后来严格要求自己，将功补过，也作出了新的贡献。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些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努力，党是看见了的，广大党员和人民也都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这样坚持党性原则，公道正派地看待每一个同志，并且以这样的立

场和态度来维护党的团结，就一定能够很好地团结自己，团结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战胜一切困难，促进我们伟大事业的兴旺发达。

我的经验和智慧有限，不可能像邓小平同志那样有独特的贡献

1986年9月23日下午，胡耀邦总书记同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长、美国新闻界负有盛名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女士一行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晤谈，坦率开朗而独具风格和见解地回答了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

当谈到中国领导人接班问题时，格雷厄姆一行问：虽然邓小平主任希望自己能早日告退公职，但党和人民却希望他继续留任，这是不是意味着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胡耀邦回答说：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中国人民最爱戴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他会受到中国人民如此强烈的爱戴呢？我看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人民从几十年实际生活中了解到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忠诚和智慧是超群的；二是因为人民从“四人帮”倒台到今天这十年的经历中，亲身体会到小平同志提出的治理国家的主张和政策是最为正确的。他是起核心作用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条比第一条更重要。因为这两条，所以中国人民希望他仍然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这是很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从这一点出发，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班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不完全赞成阁下的意见，即我们中国领导人的接班问题没有解决。

其实，关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班问题，几年前就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在方向和方针问题上已经得到了解决。首先，我们已经明确规定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终身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利。第二，我们辽明确规定了党和国家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以避免过分突出一个人的权力。第三，不久前我们党商定将在一年之内制定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有了上面三条，我相信，在明年我们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班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完善的解决。

来访的美国客人紧接着问：你作为中国今后的最高领导，可以提供什么样的领导素质呢？

胡耀邦谦虚而又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实行的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制度。在这个集体里，有起核心作用的人，但不存在有法定地位的最高领导者。我是这个集体领导中的一员，我自己认为尽了我的一份力量。但我

的经验和智慧有限，不可能像邓小平同志那样有什么独特的贡献。在我看来，现今中国领导人的素质，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上来。这样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才有真正的希望。二是要要求其他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办到的事情，首先应要求自己能率先办到。

叶剑英：

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叶剑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广东梅县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创建黄埔军校并任该校教授部副主任。参加东征与北伐，曾任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底参加广州起义，之后赴苏联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后曾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长征中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期间，任八路军参谋长、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常委。1941年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45年7月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参加重庆谈判，后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1947年回延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中共后方委员会书记。1949年任北平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66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1975年任国防部长。是中共八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叶剑英为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奋斗，但经历却不一样。建国前，他们几乎没有直接共事。1952年邓小平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10月，叶剑英调军委，从此，他们一起供职中央，部长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两位老战友共同携手，把握中国过艘巨大的航船。

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党面临的严重任务是拨乱反正，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必须清除林彪、“四人帮”帮派与残余，平反冤、假、错案，尽快让受“四人帮”迫害和打击的邓小平等同志出来工作，以建立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

“四人帮”被粉碎后，叶剑英立即派人将这一喜讯通报给邓小平等其他老同志。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喜悦。当时，邓小平正在生病，叶剑英把他安置到医院治疗，及时派秘书给他送文件，报告情况，与此同时，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治军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称赞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强烈地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然而，叶剑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坚持“两个凡是”，压制和拖延邓小平出来工作。

但是，叶剑英和陈云、王震等党内许多同志，继续坚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也继续强烈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终于再度出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77年7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你是我们老师中领班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个年头，即1977年5月4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80寿辰，聂荣臻、徐向前、王震、余秋里等几位军界领导都赶来祝贺。正要进餐的时候，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赶到了。邓小平一进门，看到这么热闹的局面，高兴得脱口而出：“啊！老师们都在这里了！”叶剑英见邓小平夫妇进来了，连忙迎上去，高兴地说：“小平同志，你也是老师嘛，你是我们老师中领班的！”

邓小平一生战功卓著，由于种种原因，未授军衔，但他在军队的地位很高，把他和元帅一样看待。叶剑英对邓小平一直是很尊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的无理要求，明确指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照片，保留邓小平在各个革命时期的照片。1975年1月，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同月举行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病重住院后，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国民经济、科学教育、文艺等战线整顿的同时，叶剑英同邓小平一起，根据毛泽东指示，对军队也进行了整顿。

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所采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坚决反对，借机攻击。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说邓小平上台后就翻案。掀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在邓小平处于再次被打倒的困境下，叶剑英不顾风险还到住处看望邓小平。有一次，张春桥打电话给叶剑英，诬蔑邓小平，叶剑英驳斥张春桥，“你们不是存心要害人吗？”说完，“啪”就将电话挂了。邓小平“打倒”后，叶剑英也被以所谓“生病”原因，剥夺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权力。

邓小平恢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以后，在指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1980年底，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陈云：

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

陈云，上海人，早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并参加革命。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从事农运，任青浦县委书记、江苏省农委主任等职。后又回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2 年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 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 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长征途中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遵义会议后不久，被派回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后又去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 年冬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44 年任西北财政办事处副主任。1945 年 8 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南海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后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1948 年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之后，长期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50 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6 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62 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虽保留中央委员，但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1975 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1982 年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第一书记。1987 年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陈云和邓小平同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粉碎“四人帮”后，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积极支持邓小平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开放。

1977 年 3 月 13 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书面发言中谈到“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时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1978 年 11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再次谈到“天安门事件”，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杨尚昆：

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回答了许多重大问题

杨尚昆，四川潼南人，早年在四川、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在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历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长征北上途中，任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1937年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书记，协助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1945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47年兼任中央警卫司令员，后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1948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新中国建立后，继续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后兼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前夕，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长期监禁。1978年复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等职，1979年调中央，1980年9月增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1年7月后，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是中共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尚昆与邓小平是四川老乡，又长期在一起工作，关系十分亲密。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杨尚昆同志特意赶到深圳去与邓小平同志相会，两位老战友在一起，邓小平同志十分感慨地说：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

1992年十四大会议期间，10月13日，杨尚昆在参加解放军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表谈话时说：十四大报告通篇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年初视察南方谈话精神，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

杨尚昆说，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对这14年的改革作了科学的总结，鲜明地回答了这些年来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报告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精神，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杨尚昆还谈到，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杨尚昆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要大胆探索，敢于试验，及时总结经验。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王震：

邓小平使国家日益强盛

王震，湖南浏阳人。铁路工人出身，曾任粤汉铁路长岳段纠察队队长，湘鄂赣边区赤卫队支队政委。1930年后任湘东独立一师政委、湘赣独立一师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参与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1934年8月后任红六军团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纵军一二九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卫戍区司令员，领导开辟了著名的南泥湾，1944年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一野二军军长政委：第一兵团司令兼政委。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85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副主任，1988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王震从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起就认识邓小平，在以后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们关系密切，友情非同寻常。

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遭到批斗和软禁，子女们都下放劳动和插队而各奔东西。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通令”，邓小平被遣送到江西，软禁在原南昌步兵学校院内。同时王震也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改造。

1971年9月，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一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恢复工作。不久，王震就回到了北京，但邓小平却依然没被解放。

王震以英勇善战、威震敌胆著称，也以铁骨铮铮、不畏权势、仗义直言而有口皆碑。“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林彪横眉冷对，绝不趋炎附势。对被迫害的老战友却充满感情，不顾自己的危难处境，尽一切可能提供保护和奔走呼号。

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一家的处境有所好转，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儿女们允许探望了。1972年4月，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到江西探望父母，在回陕途中顺便送哥哥邓朴方到北京治病。到北京后，毛毛借住在一个同学家里。五一节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她，王震要见她。在朋友的引导下，毛毛来到北太平庄王震家里。王震一把握住毛毛的手，十分热情地问：“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一听这话，毛毛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多少年，她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的言语了！王震详细地问了邓小平及全家人的情况，然后对毛毛说：“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王震顿了顿又说：“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毛毛饱含深情地回忆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

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而出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其实，毛泽东也正在考虑重新启用邓小平，当得知中央已经调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后，王震非常高兴。

为什么昧着良心批邓小平？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由他主持中央工作后，毫不畏惧地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进行了整顿，并且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他的大胆作为，迅速扭转了形势，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1975年12月，终于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实际停止了大部分工作。王震气愤万分。他把李强、王诤和叶飞等老战友叫到家里，向他们倾诉自己心中的愤怒。

由于气极，王震病倒了，住进了医院。那时，所有的部委都有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简报。他要身边工作人员天天向他汇报：多少个部批了邓，哪个部没有批？多少部点了邓的名，多少个部只批不点名？点名当中，在小平名字后西带“同志”二字的多少、不写“同志”二字的多少？有一次，国务院办公厅的简报上把“同志”二字抹掉了，他十分愤怒，吼叫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办公室的人叫来。后来国务院派了值班室的主任来，王震在病床上说：“别的部门不了解情况，难道你们也不了解？！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国务院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你们不清楚？为什么你们也昧着良心来批邓小平？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带到上面去！”

他看到中央“批邓”的文件，就拿起笔，在文件上针锋相对地写下“人才难得”等话。可是这些文件按规定是要交回去的：等到要收文件的时候，工作人员急了，给国务院有关同志打电话请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橡皮把王震写在上面的话全部擦掉。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再一次受到隔离软禁。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王震一直因病住院，一是为失去他极其尊重的周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为“四人帮”一伙的反动行径而怒气积心，而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义愤至极。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要喊、要叫，还骂娘！他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他问一些老将军：“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可见他已到了何等悲愤的地步！

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震将军流下了悲痛的泪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向何处去，当时形势非常严峻。王震第一个在叶剑英、陈三等同志之间“穿梭”，商讨抓“四人帮”的方案。打倒“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他非常着急，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甚至在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的情况下，到西山住地看望邓小平，作长时间密谈。同时，他又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到

李先念副总理那里，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奔走疾呼，要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王震在会上又直言不讳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发言中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他也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的强烈呼吁下，1977年7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顺应民心的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尊重邓主席的命令

邓小平恢复领导工作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推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是开创特区的急先锋，他带领国务院十多位部长去深圳。以当年屯边的精神，亲自选项目，亲自下命令。1984年初，他随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为特区正名，为特区呐喊。

1991年，王震不慎摔伤，骨折，卧床半年之久。1992年，王震病重，需要切开气管，他不干，医生和家人都没办法，只好求助邓小平家。邓小平夫人带着女儿毛毛去医院劝慰，说：“小平同志很关心你，问候你，让你一定要服从医生。”王震说不出话，甲颤抖的手，一笔一画，郑重地写下几个字：“尊重邓主席的命令！”结果，他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1993年2月，王震逝世前不久，在广东休养时，还同正在广东的杨尚昆同志一起盛赞邓小平同志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宏伟蓝图，使国家日益强盛，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

陶铸：

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湖南祁阳人，黄埔军校毕业，1927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书记，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福建中心市委书记。1933年被捕。发动著名的厦门劫狱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后被派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40年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四野政治部副主任，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南局常委、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省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0年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因一屁股坐到“刘邓”一边，而被诬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刘邓陶”。1969年11月含冤逝世。1978年12月，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谈及陶铸与小平同志的关系，陶铸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8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和邓小平，没有很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刘邓陶”是连在一起的，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中南局调来北京中央，是邓小平提名，毛泽东首肯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字报上登了毛泽东的一段讲话，说，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党中央的，我说陶铸不老实，他说还可以。曾志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是将“不老成”误写成“不老实”？为此，还写信问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三十字下面画了一横杠，并且打上了“？”然后将原信迟给曾志。

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很猖狂，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推荐擅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中央，是很有用意的。“中央文革”小组那班人对陶铸起初也是欢迎的，因为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没有历史渊源。再说，陶铸是个直性子，敢放炮，可以用来炮打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时陶铸失望了。陶铸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刘邓一边。陶铸来京，先是住钓鱼台，不久即搬出，因江青想拉他带头向邓小平同志发难，被他拒绝了。因为保一些干部，陶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厉害，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特别是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江青会前私下找陶铸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成炮。我没

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陶铸不仅自己没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

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邓的围攻。尽管刘、邓还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实际上被“拉下马”了。但陶铸依然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做为国家领导人来看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毛、刘两位主席在一起的照片，陶铸依然照办。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补救？新华社的同志说可以做技术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一伙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1966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文化大革命”扫除阻力，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把矛头直指刘、邓，指名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煽动群众，学生起来喊打倒，贴大字报。陶铸则仍认为刘、邓是犯错误，不是敌人，不能喊打倒，不同意学生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毛泽东在会上也对西南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毛泽东在同李先念谈话时，还将目光转向全体说：“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当林彪于10月25日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反革命的路线”时，毛泽东松弛地摆一下手，语气平和地说：“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我的责任分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万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

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里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泽东紧接着纠正道：“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叫他们两个负责。”他吮吮下唇，又强调：“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讲话后，虽然还有些人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甚至言词尖厉，但毛泽东对刘、邓所采取的谅解态度是再明白不过了。

陶铸回到家里，痛痛快快地对妻子曾志说：“毛主席讲话了，对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保护的。”“保刘邓，我是对的。”

然而，正直、豪爽而又十分天真的陶铸哪里想到，更加残酷的斗争正在展开。由于陶铸始终不能遵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站到反刘邓立场上去，相反地，作为中央文革顾问，他总是与“文革”小组那帮人格格不入，越来越对立，以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经历过“文革”的人，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刘华清：

邓小平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

刘华清，湖北大悟人，老红军，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师组织部政治处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六旅政委，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新中国建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第六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副主席。1992年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从任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起，长期在邓小平部下工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华清作为中央军委主要成员之一，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所以他对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直接和深刻的领会。

1991年11月，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共司举办“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刘华清作为军委副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比较全面地谈了他对邓小平军事理论的认识和体会。

刘华清认为：邓小平同志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军的主要领导和创始人之一。长期革命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活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从新时期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和回答了新形势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实现国防现代化，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

早在1975年，邓小平精辟分析国际新形势后指出，大仗5年打不起来，应当集中精力整顿军队和国防军工企业。1985年，又进一步指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如果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刘华清认为，这个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大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判断，我们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我军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了现代化为中心的相对和平时期的建军轨道。

刘华清认为，十多年来，在邓小平正确理论指导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伟大成绩。如裁军百万，在精兵合成方面迈进了一大步；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干部四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和法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等等。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得到了调整，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邓小平在1978年就提出了国防工业要军转民的正确方针，在这一点上，比某些国家早十几年。实践证明，邓小平新时期的军事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纲领，是我军各项工作的指南。

刘华清还分析了邓小平军事理论的特点。他认为坚定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邓小平军事理论最重要的特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一再强调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针对我国国情提出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和一系列方针原则，都是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典范。善于从战略高度观察和判断问题，是邓小平的重要思想方法。无论国际国内风云如何变化，他总是以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指出事物的本质，他针对国际形势变化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政策，对把教育训练、科技、人才置于战略地位的论述，都表现出远见卓识的才华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刘伯承：

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早年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去苏联学习军事。1930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征中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率部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为总前委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4年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66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共同指挥了著名的刘邓大军，开创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先后共事13年，两人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双方相互支持、信任和理解，相处极为融洽，彼此了解甚深。

1976年，正当已默默地在病榻上度过了多年的老元帅刘伯承在为老战友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担忧时，全国一些大城市里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传闻，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这则传闻的真实如何，有待考证。但它是一种当时政治斗争的折射，是一种民意和民心，也说明了刘邓关系非同一般。人们信赖刘帅的预见力，如同刘帅打仗时的预料性一样（当时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古有知上下500年的刘伯温，令有刘伯承），既然刘伯承认定要邓小平为其料理后事，也就是暗喻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只有邓小平才能担当起治理中国的重任，只有邓小平才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整整10年之后，刘帅与世长辞，真的是邓小平为其主持追悼会。他最先来到灵堂，向刘伯承深深地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搭档，想起了在太行山的岁月，大别山的奋战，逐鹿中原，鏖兵淮海，渡江作战，进军大西南……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刘伯承的遗孀汪荣华抱头痛哭。邓朴方摇着轮椅，驻足长辈灵前。邓小平的儿孙辈能来的都来了，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只有世交情份的家族，才能享有这份崇高的礼遇，在中国，也只有这位死者能独享这份礼遇。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进程中，常常把一些本不相干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组合成新的“名字”，如马恩、朱毛，刘邓……刘邓的结合真可谓珠联璧合，“刘邓不可分”，一直是一二九师、二野部队广为流传的佳话。

按邓政委讲的办

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既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即使因为斗争需要，他们两人暂时分开，各为一个指挥所，所发出的报告、命令和指示，仍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签署文件的落款都是“刘邓”。

他们虽为一军一政，各有所长，但都不是偏才而是文武双全。因此，他们能在军政工作中，长期口径一致，一唱一和相互支持。在许多关键时刻的

关键问题的决策上，往往是惊人的不谋而合。

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是邓小平同志表过态的事，假若你去问刘师长，他必定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要是刘伯承同志表过态的，而你去问邓政委，他也必定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所以在他们领导下的同志，可以放手大胆工作，而绝不用担心因为按一个首长的指示办事另一个首长会不高兴的问题。

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刘邓大军神速地强渡了黄河，涉过了黄泛区。接着准备徒步渡淮河的当晚，司令部驻扎在淮河北岸的息县、临河一带。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司令员和张际春副政委先行使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大家一致同意政委的意见。刘司令员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刘伯承尊重党在军队的领导和信任政治委员是发自内心的，他说：“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我死后，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

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有句名言：“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刘邓大军之所以能使敌人闻风丧胆，所向披靡，最大的也是最公开的秘密就在于这“人和”二字。刘邓大军中确实实是政通人和。曾经在第二野担任过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前线特派记者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很难放进一个‘，’号的。”

其实，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性格、爱好并不相同，邓小平同志业余喜欢在“黑机”“方块”：中斗法，在麻将城中摆方阵；捧读各种文史哲书籍。刘伯承同志则在业余时间里主要是编写、翻译军事著作，茶余饭后喜欢谈谈天，说说笑话，在军中他有“口头娱乐家”之称。所以，刘伯承平时总是不失时机地收集各种军事材料。1938年10月，邓小平在延安开会，刘伯承在发往延安的电报中，还请邓小平同志在后方给他买这方面的书籍。邓小平也是乐意千方百计地给他买。

在平时的工作中，许多的具体事邓小平同志总是抢着去干，他常吩咐下属：一般的事不要找刘师长，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只有大事才去找他。

常言说：“难中好看人，难中好救人。”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关系有许许多多的感人例子。最突出的是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事件。那一年不仅是全国“创高产”、“放卫星”、办“大食堂”、“吃大锅饭”、“大炼钢铁”的火红岁月，也是我国军界飘浮阴云的年代。当时军内大肆掀起了“反教条主义”，军界元老之一刘伯承首当其冲。一纸电令，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从病床上爬起来，带着39度体温和血压很高的病体，进京去军委召开的大会上作检讨。作为一者军人，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任何命令，从来就是坚决地执行的。

刘伯承来到北京，汽车在怀仁堂前停住。元帅的老战友邓小平迎上来，紧紧握住元帅的手，默默无语。在讨论这项议程之前，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伯承同志是位组织性很强的老党员，他的身体不好，只要表个态就行了，不必上台检讨了。”当时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同志也表明了相同的意见。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难以摆脱惯性运动的规律，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公开检讨，有的意见甚至还相当尖锐。

元帅走进会场，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他，他竟老泪纵横！元帅作检讨，台上声泪俱下，台下鸦雀无声，元帅讲完，全场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作检

讨还赢得如此热烈的掌声，历史上罕见的现象。这里面交织着多少复杂的情感！邓小平再一次站出来，为老战友说话：“伯承同志对党的领导是十分尊重的，对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我和他相处多年，深知他的党性观念之强，组织纪律性之强。”陈毅元帅等也仗义执言，历史匆匆地走过了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也迎来了光明。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6年，他又专门撰文再次说：“1958年批判他（伯承）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刘邓相互关心

刘伯承一生朴实，他对于老战友邓小平同志的深情厚谊，千万感慨就汇集在他平时多次对部下所说的一句话：“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真是“无声胜有声”，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敬佩，多少情意、多少理解和支持！

刘邓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佳配合，而且在生活中也是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甚至两家的关系都融洽如一家了。

1945年平汉战役前夕，刘伯承、邓小平两家住在涉县赤岸村的一家院子里。当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7岁，叫刘太行。邓小平的大儿子2岁，还没有取名，因为长得胖，就叫他“胖胖”。一天，两家坐在院子里聊天。卓琳说：“咱们孩子都2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吧！要是长得瘦，就总叫瘦瘦？该取个名了。”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他取‘太行’吧。叫‘邓太行’。”但又一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关系，”邓小平说：“准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取个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应说：“那么，”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来，“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4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个‘朴方，好不好？”大家一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卓琳拉住胖胖说：“快，快谢谢伯伯。”从此，邓朴方的名字便叫开了。

1942年，刘伯承诞辰50周年，中共中央为表彰他的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士气，决定在太行山举行庆祝活动。这天贺文、贺电如雪片飞来，其中包括朱德、叶剑英、陈毅、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的。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极富特色的贺文。文中除了赞颂刘伯承的优秀品质和革命功绩外，还指出了他的“缺点”：“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刘邓相互关心的许多事例是很令人感动的。1942年，邓小平去中条山，刘伯承留在太行。他们分手后，刘伯承极为关心邓小平的安全，老是到作战科和机要科去问邓政委过了白晋线敌占区没有。一天，机要科收到陈赓的电报，说是当晚将通过白晋线。那天夜里，刘伯承一夜未睡，守在作战科等消息，直到快天亮时，陈赓来了电报，刘伯承就站在译电员旁边，译一个字看一个字，还不时地猜一个字，电报还没译完。他知道邓小平已完全过了白晋线，就回去睡觉了。

在大别山，为反敌人围剿，刘伯承去外线指挥。邓小平留在大别山，分

手的那天，邓小平冒着风雪给刘伯承送行。他们并肩步行，过了一坡又一坡，走了一程又一程，像有说不完的话。刘伯承知道，一旦敌人发现我军转向了外线，邓小平身边的斗争形势将会更险恶。于是，刘伯承执意要把警卫团留下，说：“我带一个排去就足够了。”并叮嘱李达参谋长，一定要注意邓政委的安全。邓小平则要刘伯承保护“心灵的窗户”，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嘱咐管理处，给刘司令准备一盏美孚灯。他们分手后，刘伯承立即吩咐各部：“如果我们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找我们的邓政委。”他还反复交待：电台要按时与邓政委联络。此后，每天早晨起来，刘伯承的第一句话总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中深情而又沉重地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聂荣臻：

按邓小平的思想搞下去，中国就会有更大发展

聂荣臻，四川江津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北伐战争，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区执委军事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南昌起义中任前敌军委书记、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12月参与广州起义。1928年后，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1931年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长征中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一二五师副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后，任中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代总参谋长。“1954年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同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兼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国家军委副主席。是中共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聂荣臻与邓小平是四川老乡，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他们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一起走过长征。1952年邓小平调中央后，他们两家住隔壁，加之都是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来往更加频繁。后来不住在一起，但仍亲如一家，即使逆境中也不变。1975年冬，周恩来病重，“四人帮”猖獗，全国掀起“反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处境很困难，有的人不敢去见他。聂帅知道后批评说，小平同志还兼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为什么不向他请示报告工作？周总理逝世后，聂帅在去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后，还特意转到东交民巷看望住在那里的小平同志。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聂荣臻十分担忧，时刻关心着邓小平。

1976年9月21日，聂荣臻对前来看他的杨成武将军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并要杨成武立即将此转告叶帅。正是老师们的支持，才顺利地抓获了“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聂荣臻极力支持邓小平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1988年，邓小平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聂荣臻元帅得知，便与彭真同志交换意见，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暂不能退，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领导大家再于几年，这是革命利益的需要，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期望。

1990年10月，86岁的邓小平还登门探望91岁的老兄聂荣臻。而是荣臻，即使在病榻上也时常不忘问候邓小平，临终前不久还高度评价邓小平。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聂荣臻让秘书先后读了三遍，没听清的地方，他都要再仔细询问一遍。他边听边深有感触地说：小平同志了不起！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因为坚持了小平同志的思想。按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荣毅仁：

中信公司的成绩归功于邓小平

荣毅仁，江苏无锡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国乃至世界著名人物。1986年，美国著名大型经济刊物《幸福》半月刊组织评选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荣毅仁赫然榜上，1992年12月，又获美国加州荣誉公民称号。荣毅仁出身于中国工商界有名的荣氏家族，1937年在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也投身于实业，并很快显露头角，成为年轻有为的实业家。1949年初，中国大陆面临全部解放，不少富豪大亨离土而去，荣氏父子却留了下来。然后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有“红色资本家”之称。1957年，荣毅仁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调任纺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地成了“专政”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又重返中国政治与经济舞台。1979年，邓小平找到荣毅仁，希望他在引进外资方面多出谋划策。荣毅仁拿出了“走国际惯例，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方案。这一建议马上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说：事情归你管，人员由你选。

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从50万元资金，十几个人，租房办公起家，现已发展成拥有510多亿元人民币资产，海内外企业数百家，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相结合的综合性企业，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中信公司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受到社会普遍公认。在中信公司建立5周年之际，邓小平为之写了8个期望与赞誉的大字：勇于创新，多做贡献。

在1992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辞去了中信公司董事长职务。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荣毅仁十分感慨，并联系中信公司发展的历史，在《人民日报》撰写文章，畅谈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荣毅仁说：1992年是具有不平凡意义的一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反复学习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愈加觉得谈话阐述的理论如高屋建瓴，剖析问题切中肯綮，充满真知的见。它对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对此，荣毅仁深表赞同，并做了深刻阐述。他说：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就会理解，实事求是其思想出发点，也是小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大贡献。40多年来，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过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的时候，也有过艰难困苦、曲折反复的时候。失误的教训，归结起来不外乎是脱离我们的国情和实际，照搬本本，搞形式主义。1978年，小平同志十分英明地倡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左”的僵化思想的藩篱，为把中国推上改革开放航程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正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出发，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以后，在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根据这条基本路线，全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荣毅仁认为，就经济工作而言，实事求是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只要符合经济规律，行之有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是科学，就可以利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中信公司正是在小平同志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创立的。荣毅仁说：回顾小平同志关怀下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走过的十余年历程，感触良多。中信公司筹建之初，小平同志即指示，公司要为对外开放服务，按经济规律办事，排除官僚主义干扰，并给予公司以经营和人事自主权。按照小平同志指示，在公司章程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经济规律办事，实现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十余年来，中信公司努力开拓创新，按国际惯例办事，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中行之有效的作法，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走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阻力中前进的。如果说中信公司十余年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一些成绩的话，那完全是由于公司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遵循邓小平同志“勇于创新、多做贡献”的指示，实事求是，努力按经济规律办事而取得的。

谭震林：

邓小平代表着我们党的正确领导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早年参加革命，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区特委书记。1929年后，任红军纵队党代表、司令员、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政委、司令员兼政委。1934年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第四大队副司令员，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第二师师长、政委兼苏南区党委书记，淮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副政委，内线兵团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七兵团司令员。淮海、渡江战役总前委委员，1949年后历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农村办主任，“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1974年恢复工作后，历任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届、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谭震林与邓小平曾在淮海、渡江战役中同在总前委共事指挥，1956年又与邓小平同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苏参加苏共二十大。“文革”中谭邓共同站在反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前列，均受到了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谭震林坚决拥护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坚决支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他们共同战斗，彼此交往多年，谭震林对邓小平的思想体系有较深的研究。

邓小平决策艺术高超

1948年我军发动了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央指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指挥战役的总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当时邓小平是中原野战军政委，谭震林是华东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后来回忆说：“总前委在战役中合作默契，共同指挥”，才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胜利。直到1982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淮海千秋》时，谭震林与当时还健在的粟裕一起，欣然接受了采访。在采访时，谭震林穿起草绿色军装，手执“教鞭”，站在淮海战役指挥地图前，讲述当年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讲述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委的作战部署，帮助人们重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这个重大战役的宏伟场面。

淮海战役硝烟未尽，1949年中央决定进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渡江战役。当时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副政委；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邓小平任政委。按照中央指示，渡江作战仍由淮海战役时组成的总前委领导。邓小平、陈毅坐镇指挥第二、三野战军。解放后谭震林还多次回忆说：在渡江战役中邓小平同志表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决策才能。在这次战役中，谭震林是奉命最先率部打过长江去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当时他指挥的是三野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由于这些参战的指战员大多来自北方，不习惯水战，谭震林就把部队拉到巢湖开展水上练兵。陈毅称赞“巢湖练水军是解放战争史上重要的一页”。4月20日晚，谭震林指

挥的 30 万人奉命从芜湖对岸强渡长江天堑，万炮齐轰，于帆竟发，最快的船只仅用 15 分钟就抵达南岸。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就被我军突破。渡江后，中突击集团向内突击，把敌人注意力吸引到长江中段，为我东西集团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国共和谈的进行，在西柏坡开会的邓小平、陈毅商定，推迟原定的渡江时间，并报中央批准。正在训练部队的谭震林接到命令后，马上理解了中央军委及邓、陈的意图。他要求部队指战员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武装头脑，认真贯彻执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示，同时又要求大家切实防止在敌人的“和平”阴谋面前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把立脚点放在谈判破裂，继续做好渡江战斗的准备上，中突击集团大部渡江后，4 月 22 日晚，谭震林等率领七兵团指挥部，乘坐木帆从北岸起渡过江。当指挥船行至江心时，突遇从安庆向南京顺流而下的国民党军舰。敌舰发现我渡江部队，立即枪炮齐发，情况万分险急。谭震林一方面指挥船只避开敌舰，一方面组织火力还击。当时正在肥东总前委指挥所的邓小平、陈毅获悉这一险情后，十分担心谭震林等人的安全，接连不断地来电询问，直到确知谭震林等已经顺利抵达江南坝埂头，未受任何损伤时，才放下心来。多年后，当时与谭震林同船过江的老同志回忆起这次险情时，还激动他说：“总前委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相互关心，真是情同手足，胜似兄弟啊！”23 日我军解放南京，当时谭震林遵照邓小平的“部队渡江后，英勇顽强就主要表现在两条腿上”的指示精神，命令各部要不顾疲劳，继续猛力向前推进，歼灭逃敌。

邓小平是中央领导人，不能随意点名批判

1956 年 2 月，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邓小平、谭震林均为代表团成员。他们再度共事。代表团在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邓小平、谭震林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都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邓小平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谭震林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他说：这虽然是苏共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但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己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中，素以心直口快被称为“大炮”的谭震林，与林彪、“四人帮”展开激烈、针锋相对的斗争已是众所周知。谭震林对于当时全国一片混乱的局势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说：“‘革命’总不能不吃饭啊！这是个最起码的道理。我们这样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把农村搞乱了，把农业这个基础摧垮了，地里不长庄稼，不收粮食，怎么得了！”当造反派冲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邓小平时，他气愤地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江青他们这伙人目无党纪国法，如此无法无天，真是不能容忍！”谭震林还对林彪在讲话中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压制群众，反对革命路线”，以及陈伯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大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是反感。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人，不能随意点名批判，搞“文化大革命”“光有群众，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正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使谭震林思考了许多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痛切地感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要实事求是的难度。在“文革”中，他对每一点国家形势向好的方面的转变格外珍惜。1973 年谭震林从桂林回到北京，他常去叶帅家，还与邓小平、彭真等老

同志交往，并参加了由邓颖超任组长的学习小组。他只想与老同志沟通思想，交换看法，特别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全国形势好转，给了他很大鼓舞。

《邓小平文选》要大书特书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谭震林兴奋得彻夜未眠，那晚直到天亮他才睡着，因此睡得很香，甚至掉到了地板上都还没醒来。这是他自“文革”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失态。从此以后，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精神，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与对于“两个凡是”的批判和真理标准的讨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前夕，《红旗》杂志社约谭震林写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他立即着手写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文中回顾了党的革命历史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还着重批判“两个凡是”，直接表明自己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观点，但文章拿去后，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以“《红旗》不能介入这种争论，文章要重新修改”的理由扣发。谭震林坚持原则说：“文字上可以改，但基本观点不能动。”稿子转到邓小平那里，他看后指示：“这篇文章很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送《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卷入？可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看后也指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就已经被动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震林由衷地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他坚决拥护并积极宣传邓小平在1979年1月理论务虚会议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高度评价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不止一次地说：“小平同志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全党要认真学习 and 加深理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地贯彻执行。”

《邓小平文选》出版后，谭震林非常高兴，他认真研读，提出应该“大书特书”。1982年9月，80高龄的谭震林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这些人迟早是要去见马克思的，但舍不得去。因为‘四化’重任在肩，前景迷人啊！”谭震林临终前，尽管呼吸困难躺在病床上，仍在口授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文章，并结合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再次赞扬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他病危弥留之际，他还对身边的亲属说：10月1日。“我要上天安门和群众见面，支持党中央选出的新的领导班子”。谭震林纪念毛泽东90诞辰的文章《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他逝世后作为遗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谈《邓小平文选》，可见他对《邓小平文选》的观点和精神的赞赏。这些体会也可以说是谭震林用他一生的切身感受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切实的最客观的评价。他说：“《邓小平文选》的出版，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回顾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地健康发展的喜人情景，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发展，打破了多年来思想界、理论界沉闷无生气的局面。出现了思想活跃，各方面工作不断创新的动人情景。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但始终没有实现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

一种政治局面’，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是最可贵的。”

“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完整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和推进我国的四化建设等方面，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代表着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他还说，《邓小平文选》的内容极为丰富。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有这样几点应该大书特书：

第一，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他说，“邓小平同志强调这个问题，正是抓住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抓住了它，其他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第二，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他说，“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主要是抓住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这个根本。”

第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认为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项极有远见的战略决策”。

第四，大力解决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干部培训制度，老干部退休制度以及各级组织领导成员的任期制度”，以及“接班人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己坚决退居第二线，让德才兼备的比较年轻的同志早接班，担负起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无论在我党历史上还是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创举。为我们党和国家树立了一种新的极为宝贵的典范。”

薄一波：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探索有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创新和发展

薄一波，山西定襄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领导了工人和学生运动。后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被捕入狱，即“文化大革命”期间著名的所谓“六十一人案件”成员之一。1936年出狱后，到山西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指导山西新军粉碎了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后所部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曾任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政委，中共太岳区委书记。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中央从事经济领导工作，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经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二、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建国后，薄一波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共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薄一波积极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1993年10月20日，薄一波同志就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答中央党校《党校论坛》记者问时，谈到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薄一波认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当然有继承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创新、发展。

接着，薄一波同志做了进一步的论述。薄一波同志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如何正确地评价毛主席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个非常重大而又复杂、敏感的问题，有的过于褒，把毛泽东说得完美无缺，搞“两个凡是”；有的过于贬，把毛主席正确的东西说成是“左”，小平同志既充分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和改正毛主席晚年所犯的 error，以此来统一全党思想，意义非常深远，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出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里，既谈到了“继承”，又谈到了“扬弃”，还讲到了“发展”，恰当地说清了两者的关系。这是一。

二是，薄一波同志认为，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同志的新贡献，他在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明确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提出了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新方针、新政策，并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终于找到了毛泽东当年要找而没有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路。党的十四大把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十四年来的构想，命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坚走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按照“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战略部署，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使我国逐步地走入发达国家之列。

晚年，薄一波同志致力于党的历史研究，著有《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在这部书中，薄一波同志特别注重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邓小平如何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做了许多论述。现摘录以下几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薄一波在谈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时，充分肯定了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同时认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甚至遭到严重违反。”薄一波指出，“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在经历了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22年的曲折反复之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拨乱反正，终于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不仅平反了党的历史上的一批冤假错案，正确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近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遵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又恰当地处理了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维护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关于党的基本路线。

在回顾和论述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时，薄一波认为：根据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我们国家的现实，并纵观世界的现状和发展的总趋势，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处理了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处理好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的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一心一意地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这不仅是我们几十年来的根本历史经验，也是我们今后长期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根据小平同志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精神，党中央明确提出，“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这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加速发展的战略。

在论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时，薄一波认为：“毛主席的本意是想找到一个搞得又快又好的办法，但没有找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拨乱反正、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方针新政策，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经济的活力，使国民经济在1984~1988年间上了一个大台阶。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新的实践经验，在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深刻指出：“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个台阶”，“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能力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据此，党的十四大作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大决策。小平同志关于

加速发展的战略决策是科学的。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精心组织，慎重从事，及时处理出现的重大问题，是完全可以经济建设搞得快一点的。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意义太大了。

关于改革道路问题。

薄一波分析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后认为：很长时间内，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因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倾向，使经济建设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特别是小平同志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了改革开放、利用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手段搞活经济的方针，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使我国的经济不断增强生机与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的新功绩。1992年，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加快了发展步伐。党的十四大通过总结十四年来改革和建设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明确地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肖劲光：

我钦佩邓小平同志的勇气、胆略和魄力

肖劲光，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湖南长沙人。1921年赴苏联学习。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师党代表。参加红军和长征，历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红五军团参谋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委、红三军团参谋长，中革军委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四野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湖南军区司令员。新中国建立后，长期担任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是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肖劲光先后遭到林彪一伙和“四人帮”的打击迫害，只是由于毛泽东讲过，肖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的话，才得以保留职位，但一度被剥夺实权，甚至被诬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而受到批判。直到1979年5月，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关怀下才彻底平反。肖劲光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特别是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极力支持邓小平。

暗暗为邓小平捏一把汗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后，主持党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长达八年之久的动乱，国家深受其害，人民深受其害，毛泽东发出了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人心思定，人心思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的口号，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但却遭到“四人帮”的极力反对。肖劲光认为：“邓小平真正人才难得，敢想敢干，不负众望，在短短几十月时间里，首先卓有成效地整顿了铁路，接着又进行了工业、农业战线的整顿，并提出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也要整顿……邓小平同志‘整顿，的方针，实际上是在着手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整顿”。在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革除“肿、散、骄、奢、惰”，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肖劲光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他说：“对于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主张，我举双手赞成。我钦佩邓小平同志的勇气，胆略和魄力。但我又暗暗地为邓小平同志捏一把汗，我预感一场新的较量不可避免，因为‘四人帮’是不会让邓小平同志这样下去的，”

还是1973年春，邓小平同志从江西回到北京，先在北京医院住院，肖劲光去医院看望邓小平，向他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向即将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暗示，一定要提防那两个戴眼镜的（指江青和张春桥）。邓小平同志立即明白了肖的意思，会意地点头笑了。肖劲光因为在解放干部问题上触犯了张春桥、江青等人而被打棍子，戴帽子，吃过这两个戴眼镜的人的亏。肖劲光认为：“此时，邓小平同志做的这一切，非常明显地与江青、张春桥搞的‘左’的一套对着干。二者之间的斗争，已是随时可见的了。”

果然不久，这场预料之中的较量就展开了。

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没有证据

由于“四人帮”一伙的反对和诬告，也由于全面整顿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毛泽东所不允许，于是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愤恨，1976年4月初，终于爆发了为悼念周恩来总理，抗议“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但这场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肖劲光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央召集的会议。会上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诬蔑邓小平是“总后台”；宣布了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肖劲光没有鼓掌。他说：“宣布完毕，人们鼓掌，我没有鼓掌，将手中的文件翻过一页，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看文件的样子。我认为说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没有证据，我不能同意后一项决议。”

为解放思想开辟了一条通道

打倒“四人帮”之后，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提出了“两个凡是”，按“两个凡是”的观点，当时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都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肖劲光表示不赞成，和陈云、王震、王诤、耿飫等同志都谈过。他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邓小平同志1975年整顿是正确的，工作有魄力、有成绩，应尽早恢复工作。”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意见，肖劲光、陈云、王震等同志唱了反调。

5月份，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新观点。肖劲光回忆说：这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使我茅塞顿开，耳目一新。多少年来，“左”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不就是把毛泽东同志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毛泽东思想，奉若神明的错误概念吗？人们恪守着这个信条，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林彪、“四人帮”却利用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同志晚年一些错误的东西也奉若神明，甚至伪造毛泽东同志临终嘱咐，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点不破除，就无法继续前进，而怎样破除，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首先要有理论的准备，这一理论要战胜多年来肆行无忌的、成为体系的“左”的理论，不仅需要勇气，而且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底，有高人一筹的远见卓识，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正是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辟了一条通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实际上是为党找到了从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枢纽，抓住了扭转时局的关键。前进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了。

胡绳：

毛泽东的探索在邓小平手里开花结果

胡绳，江苏苏州人，30年代即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在武汉、重庆等地出版的《全民周报》、《全民抗战》等刊物当编辑，1941年在香港任《大众生活》编辑，1942年至1945年在重庆任《新华日报》社编委。1946年至194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新中国建立后，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1975年后，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泽东生前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与蒋介石和日本人斗了几十年，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件是“文化大革命”。1993年12月17日，胡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述了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胡绳认为：毛泽东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件大事，在于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敢于抵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影响，不搬别国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第二件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1956年毛泽东就明确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不要照抄苏联模式，不要重复苏联的错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外来的强大影响和压力，坚持这种探索，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乃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毛泽东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在自己手里达到应达到的目的，他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邓小平手里，能够抗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胡绳认为：如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社会主义时期从错误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1976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20年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左”倾错误的经验，纠正了这些错误，终于弄清楚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方针政策。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立即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育出来的。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物邓小平同志，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

展。从 1979 年起的十几年里的实践仍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他的愿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和国际上的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调动起来。80 年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刘忠德：

邓小平对开好“十四大”起着重要作用

刘忠德，吉林集安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62年调南京工学院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研组长、教务处副处长、处长、院党委副书记。书记。1985年6月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兼秘书长，1988年5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90年6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2年9月兼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1月任文化部党组书记、代理部长兼中宣部副部长。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作为中共十四大新闻发言人，刘忠德在1992年10月11日下午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谈了邓小平同志对开好十四大所起的重要作用。有记者问：邓小平是否参加党的十四大，他对这次大会有什么影响？

刘忠德说：邓小平同志德高望重，他是这次大会的特邀代表。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杰出领导人，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过突出贡献，他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今年年初南巡的重要谈话，为这次大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邓小平同志对开好这次大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刘复之：

“严打”决策表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品格

刘复之，广东梅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新中国建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副部长，1977年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公安部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1982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1988年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从1938年冬至1941年，刘复之先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身边工作。从那时起，刘复之就亲聆刘、邓首长的教诲，后调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工作，邓小平亲自担任一二九师锄奸委员会书记。建国后，刘复之长期在公安部工作，邓小平一向重视和关心公安、政法工作。多次主持讨论公安工作，对公安和整个政法工作有过大量指示。

1983年七、八月开始，全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这次“严打”，是邓小平同时任公安部长的刘复之的一次谈话决定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留下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清理。因而，犯罪活动一时越来越猖獗。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及时作出“严打”的战略决策。1983年7月16日公安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3天后，即7月19日，邓小平同志看完报告后，即在北戴河约刘复之谈话。并约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参加。3天前，邓小平同志还同胡耀邦、赵紫阳同志谈过。他指出：现在刑事犯罪，恶性案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的担心，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

邓小平同刘复之谈话时开门见山他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紫阳同志谈，就是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川是下不了手！”小平同志翻开报告，念了有关段落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搞得不痛下痒的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他强调指出：“严就能治住”，“不能让犯罪的人无所畏惧”，“这就是加强力量，这就是专政”，“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在谈话中，彭真十分高兴，一再说，小平同志这个决心下得好，全党下决心，坚决贯彻这个决策，问题就好解决了。

谈话后，公安部立即传达了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的指示。并在彭真同志的主持下，很快作出了“严打”的具体部署。

十年后，刘复之饱含激情地写下了这次谈话，小平同志思维敏捷，洞察

入微，言语明晰，记忆力强，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小平同志在党中央工作几十年间，多次主持讨论公安工作，对公安保卫和整个政法工作有过大量的指示。对我个人来说，1983年7月这次谈话和随后的实践是自己一生中受到的最生动最深刻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

邓小平同志对这次“严打”的战略决策，结束了几年来打击刑事犯罪徘徊不前的局面。“严打”的结果非常显著，治安形势迅速改观。刘复之在文章中认为，“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同他1982年提出依法从重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一样，都贯穿着‘两手抓’的指导思想，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在‘严打’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的坚强意志。没有他的伟大决心，要把‘严打’战役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是不能设想的。”“小平同志对‘严打’战役的决策，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典范。”

刘复之同志在文章中辽深有感慨他说：“凡十年来，小平同志从指挥百万大军作战到领导党中央工作，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向以冷静观察，深思熟虑，精明判断，果敢决策著称。我回想1980年审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由于复杂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工作过程中，对犯路线错误和犯反革命罪要不要严格分开？对那几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犯开下开杀戒，这两大问题，党内党外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在充分发扬民主中，小平同志倾听多种反映，集中正确意见，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国家司法程序，作出了只审判犯罪行为，犯罪和错误分开，不开杀戒的重大决策。事情过去十年了，回头看一看，想一想，这多么英明，多么正确！小平同志1983年的‘严打’战略决策，同1980年对‘两案’审判和1982年对打击经济犯罪的决策一样，充分显现了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品格，高瞻远瞩，明睿智慧，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汪云松：

邓小平不忘故旧

汪云松，字德薰，四川爱国知名人士。曾经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合，重庆商会会长。他具有维新思想，曾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前任会长，后又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从筹组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先生都是亲身所为，极尽热心，邓小平就是从他筹办的这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后赴法国的。如果说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那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则当属汪云松。

1949年重庆解放后，一天，西南军区派了几个人到汪云松家，汪不知凶吉，没敢见，第二天，又来了辆吉普车，把汪云松接到军区。原来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学生、现在的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请他作客吃饭。汪云松回来后很高兴，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

当年汪云松先生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只是出于爱国热情，要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路子，也许并没有想到培养了一批共产党人。汪先生那种办学的热忱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做了共产党大宫的学生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他，1950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先生应邀前去北京列席，他回来后讲，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宴会，头一桌的主人是毛主席，第二桌有小平同志，他也坐在第二桌。小平和陈毅分了工，小平同志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招待所。50年代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途经四川时，还特意会见了汪先生。

汪老先生爱国，解放后也爱共产党，他把自己多年珍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汪老先生有一对心爱的古瓷瓶，他把装瓶子的楠木盒子刻上“东方红”三字，送给毛主席作为祝寿之用。按我们党的规矩，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祝寿，不收礼的。当时在重庆统战部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说，小平同志知道了这件事，跟统战部的人说：“要了解汪云松。”于是，作为特例，统战部收下了这份礼物。统战部的这位同志说，后来小平同志还说过，汪云松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指小平同志和聂荣臻同志。

黄玠然：

邓秘书长不但管事多，而且责任大

黄瑜然，浙江浦江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早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第二战区牺牲救国同盟总会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后任上川企业公司总务处长、办事处主任，1945年至1949年，任上川企业公司协理，建国后，任华东纺织管理局秘书处长、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后，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常委，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顾问，是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迁上海，黄玠然与邓小平同在中央机关工作。1929年邓小平被派到广西后，黄玠然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黄玠然十分清楚当时的情况，尤其是有关邓小平的情况。他说：第一次认识邓小平是1928年，那时在上海同罕路柏德里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于，那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当时由彭述之夫妻、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内部交通科主任张宝泉和白戴昆等同志以房客的关系住在里面。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周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部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中央和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入、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等等，周恩来同志能解决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和重大的问题，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恩来同志实际相当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我当时在党刊工作，也是去请示工作，在那里头一次见到恩来和小平同志。他们非常忙，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在外面等。

1929年小平同志要调往广西以前，我准备接他的工作，因此也参加一些政治局在熊老板（注：指熊瑾玎）那个机关的会议，有两三十月的时间，这时接触的时间就多了。政治局开会，由总书记向忠发主持。会议的内容都是事先定好的，都是讨论专门的问题，如工人运动，国际形势，经济问题，全国和局部地区的形势、策略、对策、方针，工作方法和斗争方法等等，都是大的问题。每次讨论的问题都由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作中心发言，其他同志围绕中心发言谈看法和意见。发言不能时间太长，不能长篇大论。向忠发有时也很能发挥一通，但没有水平。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了解的问题多，管的工作多，准备又充分，还常常写好发言提纲，特别是关于苏区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他发言最多。小平同志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但他也发言，因为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涉及到中央的安危。小平同志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份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有些人很能说，但常常说得不知所以然。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的的工作，可以说，秘书处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我们开完政治局会，有时在熊老板家吃饭，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又说又笑。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黄玠然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秘书处的组成和工作。自然，他是最了解邓小平在上海工作期间这段历史的了。他回忆，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除了列席和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要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由于上海处于敌人的严密统治之下，环境非常险恶，因此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居住地点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重要而又出名的人物，更需要注意隐蔽，住处有时一月半月一换，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住处，而邓小平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他熟悉所有中央机关的地点和秘密接头地点，对于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弄，他都相当熟悉。为了掩护，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据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纪恩回忆，中央在五马路的清河坊机关楼下的一杂货铺，就是邓小平开的，卖香烟、肥皂、火柴等。可见当时环境的危险，开展工作之艰难。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劣，敌人利用外国巡捕镇压。特务监视、叛徒告密等各种手段，破坏党的地下组织和捕杀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3年内，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尽管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成立特科，除掉了一些奸贼，但终因叛徒出卖，机关遭严重破坏，在上海站下住脚而于1931年下半年陆续转往中央苏区。

朱端绶：

邓小平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朱端绶，湖南长沙人，1925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入党后，她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湖南农村，对当地阶级状况开展调查，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1928年至1931年，她和熊瑾玎同志一道在上海党中央政治局机关工作，并结为夫妻。1938年以后，历任汉日、重庆新华日报社会会计主任，党组织委员会支部书记，晋绥日报会计科副科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计秘书组副组长、审校组组长、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副司长等职。

1965年，鉴于朱端绶同志在长期艰苦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组织上安排她休养，她仍尽自己的能力为党工作，报答党的关怀，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真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上海时，熊瑾玎和朱端绶都直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

在上海繁华的闹市中心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有一个天蟾舞台，舞台后面有一栋楼，曾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

这栋楼下曾经是一家“生黎医院”，在楼上，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租有三间房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熊瑾玎扮成一个湖南来的经营土布土纱的商人，门上挂个“福兴字

庄”的牌子，当时人们都称为熊老板。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

4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在这里召开。对此，李维汉有一个回忆：1928年党的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驻守。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1952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当时仍每天上午9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部主任和其他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熊瑾玎当时在中央秘书处任会计。据当年担任过秘书处长的黄玠然老人介绍：“会计科就是熊老板一个人，他住的那个地方最保密也最安全，只有政治局同意的人才能去，他的那个机关由秘书长直接管理，熊老板负责管理党的经费，政治局决定后由熊老板去发送，政治局派入检查财务的支出情况。中央苏区送来的黄金、手饰都要去兑换，怕暴露，于是就利用章乃器的关系。章乃器那时是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的副董事长，他与陈云同志关系很好，但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陈云同志和我找他去玩，顺便叫他帮忙换点银票，他还很高兴，因为银行可以拿点手续费。”

朱端绶当时在中央机关当交通。她是由湖南党组织介绍到上海的。由周恩来介绍，她和熊老板一起“坐机关”，先是假扮夫妻，然后是假戏真做，于1928年8月结了婚。熊瑾玎比朱端绶年长20多岁。党中央撤离上海后，他们俩夫妇到湘鄂西苏区工作，曾双双被捕。这对革命夫妻为中国革命做出很大贡献，尤其是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功劳很大。解放后，熊瑾玎生病住北京医院时，邓小平还去看过他。熊瑾玎于1973年去世，朱端绶于1994年1月24日才逝世，终年86岁。前凡年，依然精神抖擞，步态稳健，回忆起当时有关邓小平的情况，记忆仍十分清晰。她告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是在1928年夏天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就认识你父亲了。那时他才24岁。我们的机关在公共租界，我们这个机关一直没有被破坏，直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我和熊老板才撤离。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上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当时的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都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朱端绶老人还告诉毛毛：“我是专门在中央机关当交通，直接在你爸爸的领导下工作。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由我洗出来，用明矾水洗，然后誊抄好。我抄的文件都是最绝密的，不出政治局的门。熊老板在秘书处搞特会（特别会计），也归你爸爸领导。政治局这个机关归我管，我除了抄写文件和当交通外，还给来机关工作和开会的同志烧开水、做饭。中央的同志们都爱吃我做的几样菜，周恩来同志爱吃我做的狮子头，你爸爸爱吃辣椒。你爸爸性格挺好，平易近人，他比我大四岁，叫我小妹妹。你爸爸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当时做地下工作，装的是有钱人，所以要穿长袍，戴礼帽。你爸爸也是这样的打扮。”

袁任远：

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袁任远，湖南慈利县人，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后出走南洋，又回国投身革命，在家乡发展党组织，1928年发动石门南乡起义。1929年6月到广西，参加了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广西百色起义，任红七军政治部总务处长、教导大队政委、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起义部队转战湘赣后，加入红六军团，参加了长征。抗战期间任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绥德专区专员。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永吉地委书记、吉林分省委书记、军调部第三十四组少将组长、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吉林省政府副主席等职。1949年南下湖南，任省政府副主席，1953年调任内务部副部长。1958年调任青海省省长。1962年底调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979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书记，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我和小平同坐一条汽船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失败，倒戈拥蒋的桂系将领李明瑞当上了广西省绥靖司令，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俞都曾受共产党影响，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派一部分干部到李明瑞部队工作，为建立武装和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6月份起，从中央和广东省委陆续派出了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即龚楚）、袁任远、李谦、叶季壮、袁也烈等几十名同志到广西。派邓小平（化名邓斌）作为中央代表到南宁负责领导。

共产党首先通过俞作柏弟弟、共产党员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了教导总队，为李部培训干部，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干部，大部分进了教导队，张云逸担任了教导队的副总队长，还兼任警备四大队长，李明瑞委托他帮助改造这支旧部队。

1929年9月底，俞作柏、李明瑞在汪精卫拉拢下，决定联合张发奎武装讨蒋。但还没有走出广西的大门，因所部叛变而失败。俞、李只带了几个随从仓皇逃脱。其时，在邓小平领导下，起义工作正抓紧进行。在俞、李发动讨蒋时，邓小平、张云逸等已做好应付时局的准备，预备了十多条汽船和民船停在邕江待用，一旦局势有变，立即把军械库的武器、弹药装上船只，运往右江。袁任远回忆：“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来后，我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将军械库的武器、弹药等物资装上船只，由邓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驶往百色；教导队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则由张云逸同志指挥由陆路开赴右江。有一部分干部乘船从水路去百色。很巧，我和小平同志同坐一条汽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他当时化名为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同志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

关于这次乘汽船，参与当年兵变的许凤翔也有过相同的回忆：“10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晨雾迷茫，在南宁海关的码头上，同志们紧张而有秩序地把枪械弹药等军用物资搬上大小船只，然后上船出发。我乘坐的是一艘汽船，最后上船的一位同志，身材不高，体态结实，二十多岁年纪，精力充沛。他一边登船，一边微笑着和先上船的同志们问好。我不认识这位同志，忙向别

人打听，正在这时，有人开玩笑地说：‘秘书来了，咱们把铺位让出来吧！’原来，他就是我们行动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

据袁任远回忆，他们到百色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把政权掌握过来，在我们力量所及的地方，撤换一些反动的县长，换上我们自己的人；第三，整顿军队，扩大武装。我们的部队是从李明瑞的旧部队拉过来的，成分复杂。为了把这支白部队改造成革命的军队，我们首先清洗了一些反动的军官，对他们不抓、不杀，发给路费，‘礼送出境’，然后在部队中实行民主革命，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在政治上、生活上一律平等，禁止打骂，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同时，消灭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根据地；第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第五，加强干部教育。邓小平同志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亲自给干部讲课。党的“六大”决议、“十大纲领”、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就是他亲自讲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

许凤翔也回忆，在百色，“我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当时，我们不断接到派往右江各地的同志给‘邓秘书’的信函、电文，反映旧政权的压迫和上豪劣绅的胡作非为，以及人民群众对我军的热烈欢迎，每当我把这些信函、电文送给邓小平同志时，小平同志都很重视这些由各地传回的消息。为了准备起义，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仍布置工作。晚上则与张云逸等首长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不久，我军就消灭了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进一步发动工农群众，继续整顿改造部队。”

1929年11月初，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意在左右江举行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并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番号，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为红八军军长。邓小平兼任两军政委，起义并于广州起义两周年之际举行。

李明瑞欣然接受劝告

据袁任远回忆：邓小平同志把右江起义工作部署好以后，于11月中旬，带领他和余惠到左江地区布署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作准备。2月初，邓小平同志又率何世昌等去龙州，部署起义。然后由龙州经越南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在途中碰上李明瑞。

原来，李明瑞、俞作豫到了龙州后，一方面筹集军饷，一方面整理部队。而俞作柏则去了香港，11月末，李明瑞欲乘粤桂两军对峙、广州政局混乱、南宁空虚之际，发动攻势反攻南宁，他已命令俞作豫率领左江部队开进崇善待命，并亲自过右江与右江的部队商议联合攻取南宁。正在他去右江的途中，遇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和李明瑞，相互都闻名已久，而这次路遇，却是他们第一次的相见。从这一次相识开始，邓小平便和李明瑞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李明瑞后在战争中牺牲。几十年后，广西建立烈士纪念碑，邓小平亲自为烈士题词。

这次相遇后，据袁任远回忆，小平和李明瑞谈了一会，便决定一块返回百色。在百色，经小平和云逸同志作工作，李明瑞参加了革命，随即返回尤州。小平同志则于12月初，再次去尤州，部署尤州起义。

返回百色的原因，是邓小平和李明瑞接触后，发现李明瑞和俞作豫对于是否打红旗，还持犹豫态度，但又感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红八军一纵队司令何家荣也回忆：“当李明瑞到百色时，路遇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和李明瑞又转回百色，做李明瑞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说明党的计划是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准备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至时请他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李明瑞同志欣然接受邓小平同志的劝告，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红七军老战士黄一平也回忆：李明瑞反蒋失败到尤州后，“形势更逼迫他靠近革命。邓小平和张云逸多次亲自找他做思想工作，介绍《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给他看，指出革命前途和出路，启发他打起红旗，参加革命，在政治上给予信任，安排他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李明瑞亲眼看到右江红军力量日益扩大，各族广大群众热情拥护党和红军，使他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参加革命队伍，才是唯一的出路。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多次派心腹特务带着广西省主席、第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巨款到尤州等地，向李明瑞及其亲属拉拢、引诱，但李明瑞不为所诱，断然拒绝。

在邓小平的精心领导下，12月11日，百色起义按计划胜利举行，熊熊革命烈火燃红了左右江两岸。

张云逸：

“哦——你就是邓小平”

张云逸，广东云昌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早年加入同盟会、国民党，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官至旅长。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师参谋长。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军长，长征中任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抗日战争中，任新四军参谋长、副军长，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等职。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作为党中央派往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部的军事骨干，张云逸曾协助邓小平成功地领导了百色起义。

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后，受共产党影响，同情革命的原李宗仁部师长李明瑞当了广西省绥靖司令，俞作柏作了广西省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利用这个时机，派遣了一些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有的到李明瑞部工作，有的分头到左、右江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派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到广西负责领导。张二逸是最早派去的干部之一，他是通过粤军海军司令陈策写信介绍到李明瑞部的。

张云逸等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组织研究，通过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了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张云逸当了副总队长，从广东和广西地方党组织陆续派来的党员，干部安插到了各连队，袁任远等作了政治教员。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张云逸又兼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一支；日部队，李明瑞请张云逸帮助改造。张云逸等采取一系列坚定、果断的措施，迅速改编和掌握了这支旧军队。

1929年9月，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部。由中共党组织掌握的教导队和四大队，留守南宁。张云逸又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在李、俞进攻广东的同时，中共党组织就在部队中作好应变的准备工作，还预备了汽船，停在邕江边等待。

果然，李、俞因部下叛变，还未出广西就失败了，带着几个马弁逃回南宁，接着又逃往左江。中共党组织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即组织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运往右江。

当时右江的条件较好。早在1929年6月，即派了雷经天等同志到右江，建立了党的右江特委，发动群众武装斗争，与韦拔群领导的当地群众武装斗争遥相呼应。

在李明瑞、俞作柏兵败逃回南宁后，邓小平和他们商议，当机立断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李、俞逃往左江之前，邓小平等先两天离开南宁，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张云逸则率教导总队及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到达右江特委所在地田东，此前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因，他们未曾谋面。从此，党组织也由秘密工作转为公开了。

据张云逸回忆：“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见叶

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二十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哦！你就是邓小平！’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夫，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共产党人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广西的党组织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把部队转移到百色和龙州地区。11月初，派往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来中央指示：同意左江、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并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番号，委张云逸为七军军长，俞作豫为八军军长，邓小平兼两军政委。张云逸回忆：“邓小平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

在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百色起义如期举行，正式宣布成立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1930年2月，又在龙州宣布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前敌总指挥。不久。红八军并入红六军，在左右江地区经过艰苦作战后，于1930年秋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桂黔粤湘等省，历时9个月，行程12000多里，于1931年7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实现了与中央红军的汇合。

刘英：

邓小平能干、活跃、乐观

刘英，张闻天夫人，湖南长沙人，老红军，大革命时期即是湖南革命的积极分子，曾任湖南省妇女部长。1933年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福建团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长征途中，任中央队秘书长、中央警卫队指导员。1939年任中央秘书处。1945年先后任合江省委组织部长、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辽宁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常委。

建国初期，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党委书记。1954年至1959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部党组成员。1959年庐山会议后，与丈夫张闻天同受错误处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0年代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刘英就认识邓小平，到了中央苏区后，刘英与邓小平再度相逢，并接替邓小平任中央队秘书长。

很随便的一个人

1928年，湖南省委在白色恐怖中受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也牺牲了。湖南党的组织就派刘英到上海，找中央。刘英千辛万苦地来到上海，找到了周恩来，找到了党中央。

刘英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发展入党的。到了上海后，李维汉就让刘英住在他的家里，假装他的姨妹子。

1989年夏天，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去看望刘英时，刘英对她说：“那时候周恩来经常来找李维汉谈问题，每次都带着小平同志，他们就在李维汉的家里开会，那时候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中央还有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和李维汉。李维汉分管湖南的工作。”而邓小平当时是中央秘书长。

刘英笑着说：“我就是这样认识小平同志的。1928年，他二十四岁，我二十三岁，大家都喜欢开个玩笑，所以一下子就熟了。我连问也没问他干什么的，就小平、小平地叫开了。那时候他很活跃，爱说爱笑。我记得写东西的都是他，很随便的一个人。”

很达观地对待第一次倒霉

1933年，刘英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到达中央苏区，被分配到少共中央局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在这里，他和邓小平两位老友又走到一起了。当时邓小平因“邓、毛、谢、古”事件而受打击，被下放到农村搞巡视员。后因王稼祥坚持，调至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但时间并不长，两三个月后又到总政下瞩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刘英对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1933年我从莫斯科学习回来，在中央苏区看到你的爸爸，那时候他犯了错误，被撤了职，在总政治部编红星报。我被分配在少共（青年团）中央当宣传部长。我们少共离总政治部非常近，中央局一座房子，总政治部一座房子，少共一座房子，都在一个村子里，没几步路，隔得很近。我们那时候是一帮子年轻人，在乡下也没有什么文化

生活，吃完晚饭就窜门子。我们这些人很喜欢到贺昌（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屋里玩，很喜欢和你爸爸天南地北地吹牛，因为他知识多。他是很乐观的。他怎么挨整的，怎么离婚的，都是贺昌告诉我们的。贺昌在总政治部实际上负责，他非常同情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非常能干，受了好多委屈。后来我当扩红队长，超额完成了任务，你爸爸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红星报还登了你呢！”

这里所说的扩红，是指刘英于1934年4月至6月被调任干都县扩红突击队队长，仅一个半月，就完成了任务，扩红3300名，比规定任务2200名超额50%。

刘英还撰文回忆，6月下旬，我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同志。他见到我，就伸着大拇指对我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莫名其妙。他忙解释道：“这是项英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很好，都登报了。”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回到住地跟一位熟人说起来，他瞪大了眼睛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小平正倒霉呢！他的中心县委书记都被撤了，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了。”我说，“看他那模样，一点儿事都没有。”打那以后，我从心里佩服他。

于都扩红的确上了报，以《于都县的破天荒——三个月计划一个半月完成》为题登在6月21日的《红色中华》报的头版头条。

小平同志很能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

据刘英回忆：遵义会议后，大约4月间，刘英接到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当时刘英任中央队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邓小平调红一军团当宣传部长。

刘英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干不了。”

李富春笑哈哈他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刘英性格直爽，平时有什么说什么，分配的工作再难也不推辞，有点湖南辣子的泼辣劲，所以李富春笑她谦。后一句话当然是指张闻天了。李富春和蔡畅两口子觉得刘英跟张闻天合适。

刘英只得拿起等于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泽东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泽东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刘英回答：“李富春呗！”

毛泽东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并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于邓小平调任一军团宣传部长，刘英接替中央队秘书长一

事，刘英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也有过同样的回忆：“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时你爸爸已经走了，我还整理过他留下来的一个铁皮箱子，里面都是一些书籍和文件。我原来在后梯队，是毛主席把我调到

中央纵队工作的，他说后梯队很苦，又没有东西吃，女同志在那里会拖垮的。那时候机关小，凡是精干的同志都送到前方去，充实战斗队伍。王稼祥告诉我，现在中央的工作不重，就把小平同志送到前方去了，我也问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为什么调走。毛主席说，前方需要。你爸爸在中央当秘书长的时候，管中央首长的生活，开会作记录，还要管警卫工作。”邓小平从1935年六、七月间调在红一军团宣传部长，一直到长征结束。

长征路上精神会餐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开始，刘英和邓小平同在中央纵队。长征途中十分艰苦，但他们却很乐观。几十年后，刘英跟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对那段往事有过生动的回忆：“长征刚刚开始时，我和你爸爸他们常常在一起。只要有半天休息，我们大家就常常凑在一起，没事干，就吹牛。大家开玩笑，成立下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你爸爸是副总经理。没有吃的，就吹吃的，精神会餐。你爸爸老说四川菜好吃，到了四川边界，那里穷得要死，我就对他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他就说：‘这里是边区！’反正是四川菜好。你爸爸很开朗，很风趣，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乐乐观观的。”

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刘英在观看电视剧《邓小平》后说：

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从我和他的接触中感到，邓小平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心胸宽阔。在他受打击的时候能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从抗日战争开始，他以极大的魄力实事求是地分析敌情，领导一二九师发展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挺进大别山，指挥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这是很了不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又根据中国国情，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开放中，他到各地视察，深入细致地接触实际，了解情况。他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说到点子上，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改革开放18年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这都是有目共睹的，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靠群众的实践，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李维双：

反“罗明路线”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错误

李维汉，湖南长沙人，曾赴法勤工俭学。建党之初，曾接替毛泽东任湘区委员会书记，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七会议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书记。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等撤职，会后赴莫斯科，1933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后又历任中央党校代理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城市工作部长等职。从1948年起至1964年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建国后还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中央委员。“文革”中受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副主任，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晚年著有《回忆与研究》一书，李维汉同邓小平关系密切。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就曾一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再度共事，李维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邓小平任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也许是由于职务的关系，李维汉参加了反“罗明路线”，专门写文章公开批评邓小平。而且邓小平当时的夫人阿金（金维映）离小平而去，与李维汉结了婚，但这并没有影响李维汉后来与邓小平共事，而且关系亲密，因为那毕竟是时代造成的。对于在江西这段历史，几十年后，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里作了实事求是的认识和检查，下面是摘录。

1932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翌年初，我到上海找党中央，李竹声、康生接见了，他们要我留在白区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又要我到中央苏区。4月，我奉命到达中央苏区。我到达中央苏区时，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长。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那时，我对毛泽东于1931年11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和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红军领导人职务这些事，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搞“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事。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邬）、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2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那、安远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经担任过江西省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抑制“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拼；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

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

这时，张闻天（中央宣传部长）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会、寻、安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区。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却认为失掉了寻邬，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党中央书记）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王稼祥：

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

王稼祥，安徽注县人，曾去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之一，1937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对外联络部部长，是中共第八届、十届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列为“邓、毛、谢、古”之首，被撤职、批斗后，下放到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农村劳动的事情，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王稼祥是从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知道的。王稼祥是一个正直的中央领导干部，他对邓小平是了解的。在莫斯科留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回国后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创立了红七军，卓有政治远见，又育指挥才能。他想：临时中央领导人怎么凭个人意气办事，把这么一个重要的军事干部，不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中央苏区战斗如此频繁，有才能的干部奇缺，这不是浪费人才吗？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

贺昌、罗荣桓同志都认为王稼祥的意见很好，表示赞同。

王稼祥是1931年冬天从上海来瑞金的，开始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后来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年轻有为，善做政治工作，被称为“红军政治工作之父”，他才华横溢，重视人才，关心干部，为红军指战员所称赞。第四次反“围剿”后，他和周恩来在乐安县谷岗村一座大庙里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被敌机炸伤，这时正卧床养病，总政工作由贺昌一人承担。当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工激烈，红军指战员伤亡很大，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到三军团指挥作战去了，后方机关几乎是空的。因此，他提议邓小平任总政代秘书长是深思熟虑的，是十分正确的。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听说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当时以惊奇的口气回答：“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十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大妥，我看邓小平同志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

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应用成功，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王稼祥越说越激动，“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气冲冲地把电话筒一甩，用手捂着伤口，来回踱步，连连说：“埋没人才。”

过了一段时间，王稼祥见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没有答复，眼看当前战事紧张，总政工作十分缺人，十分着急，于是从病床坐起来，吩咐警卫员给驻在瑞金县沙洲坝下霄村的博古同志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接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也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他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一口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平从宁都农村劳动地点调来沙洲坝白屋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李维汉支持博古的意见，王稼祥这才会心地笑了。

李聚奎：

邓小平很早就有烟瘾

李聚奎，1904年生，湖南涟源人。1928年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历任红五军团长、中队长、大队长，红三军团长、师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期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青年扎队政治委员、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委，四野后勤部第二部长。新中国建立后，任四野副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石油工业部部长、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委、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1935年5月初，红军主力从云南准备北渡金沙江入川。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当时，前有急流，后有追兵。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红军想方设法，在皎平渡搜来7只小船，35000人经9于9夜，全部渡过江去。

当时的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率部在龙街渡几番设法渡江不成，遂奉命率部到120里外的皎平渡渡江。据他回忆，他走在队

伍的前头，一到皎平渡，首先见到邓小平同志。邓小平一见到他就问：“队伍来了没有？”李聚奎说：“来是来了，就是走得稀稀拉拉的。”邓小平同志说：“赶快派人去督促，队伍来得快一点，马上过江。”并说：“队伍由刘伯承同志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由我指挥。”

李聚奎他们抵达对岸时，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渡口一十崖洞里倚望渡江部队，部队渡了几天，他们就在这个洞里望了几天，一直到红军全部渡完才离开。

1991年初冬，李聚奎老将军告诉前来探望他的邓小平女儿毛毛说：“我以前只是听说过你的爸爸，知道红七军。这次过金沙江是第一次认识你爸爸，以后仍我们就熟了。我以后在他领导下打了好多年的仗！”

1935年8月，红军长征到了毛儿盖以后，红一方面军开了个联欢会，在会上，李聚奎再次遇见到了邓小平，这回他们可是熟人了。

李聚奎回忆说：“联欢会上，在河坝里搭个台子，请张国斋讲话。我们凡个人在下面讲笑话，其中就有小平同志。那时候，我们一师刚刚得了点烟丝，小平同志对我说，‘你给我烟，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问他：‘什么好消息？’他说：‘你不给我烟，我就不告诉你。’我说：‘那个简单！’就从衣袋里摸出洋铁盒子递给他：‘抽吧！’小平同志笑着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升官了！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那时候，一方面军干部多，四方面军兵多干部少，所以向一方面军要干部。”之后，李聚奎又去问聂荣臻，聂荣臻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聚奎就调任三十一军参谋长。

长征后期，李聚奎参加了西路军。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队伍被打散，李聚奎只身东返，沿途乞讨，终于找到党中央，回到红军队伍中。抗日

战争时期，李聚奎先后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青年纵队政委、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等职，参加指挥了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参与了冀南、鲁西北、大岳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44年赴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党的六大。他说的在邓小平指挥下打了好多年仗就是指的这一段，以后就到东北野战军任职去了。

在《李聚奎回忆录》里记述了两桩感人的事迹，一桩是邓小平政委十分重视统战工作。1938年5月，李聚奎随徐向前副师长率部到冀南开拓工作。李聚奎受命前去改造冀中武强地区武装段海洲部，并任该部政委，通过做工作，段部加入了八路军的光荣行列。不久，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来冀南视察工作，住在威县附近，李聚奎去他那里汇报改编段部情况，并请他与段海洲见面，邓小平同志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邓政委置办了丰盛的午餐招待段海洲，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说话，肯定了他率部参加八路军的明智之举，勉励他不断进步，使段非常感动。

另一件事是1941年春，李聚奎调山西大岳区的决死队第一纵队任副司令员，经太行山一二九师师部时，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就决死第一纵队的建设及工作方法等问题向李聚奎作了详细的指示，邓政委特别叮嘱李聚奎：“决死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同志很谦虚，一再要求我们给他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我们决定调你去。你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后一直领兵作战，还是跟农民打交道。决死队可大不一样喽，大都是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要能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李聚奎回忆说：“邓政委这番直捣心窝子的话，说得我连连点头，我那点老底子都被他抖搂出来了。确实，我这个‘老粗，脾气暴、性子急，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现在要到薄一波同志所领导的队伍中去工作真应该好好注意。”

薄一波在《李聚奎回忆录》序中，对他们一起战斗这段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聚奎同志训练军队有方，作战机智沉着，表现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优良品德和作风。聚奎同志对山西新军的建设是立下了功的。”然而这与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教导也是密不可分的。

林月琴：

邓小平与罗荣桓性格上一个主动，一个被动，非常合得来

林月琴，安徽金寨县人，著名女红军战士，罗荣桓元帅夫人。早年在家乡参加革命，加入红四军，长征途中任女工兵营长。1937年春，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月琴随罗荣桓奔赴山西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期间，林月琴陪罗荣桓从苏联回国后，在哈尔滨创办东北部队子弟学校。建国之初仍办教育，是北京“十一”学校的创始人。林月琴一心一意当好罗帅的助手，有贤内助之称。“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月琴担任总政干部部顾问，1978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与罗荣桓就认识。罗荣桓在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中历任要职，后担任红四军政委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他也受到“左”倾错误的打击，被撤职，直到1935年9月长征途中，才又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从过草地开始，罗荣桓与邓小平一起行军。他们一个是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地方工作部部长，一个是一军团宣传部长，年龄只差两岁，遭遇也相同。因此，长征路上，他们“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

当年一起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罗帅夫人林月琴对前来访问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罗伯伯和你爸爸两个人，一个人一匹马，1935年长征一直在一起。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罗伯伯这个人不爱说话，而你爸爸就经常说笑，哈哈地笑。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精神会餐嘛！那时候他们没有烟抽，就沿线找点破纸，找点干树叶，拿破纸包上树叶当烟抽。你爸爸还说：‘我是香烟厂制烟的！’过草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在河沟里洗澡，四川人、湖南人都爱干净。”

林月琴还说：“你爸爸和罗伯伯，性格上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他们长征时行军在一起，宿营在一起，非常合得来！”

邓小平自己也曾说过：“我们是无话不谈。”

其实，无论是长征，还是以后的战争年代或者解放后，他们都十分合得来。尤其是解放后，他们经常往来。罗荣桓病了，邓小平和夫人常去看望。50年代在北京东交民巷盖了4幢房子，本来分给邓小平一幢，邓小平让给了罗帅。1955年，罗荣桓被授元帅衔，还特意请邓小平等老战友的客。林彪虽长期同罗荣桓共事，但两人私交并不好。60年代，林彪制造顶峰论，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对此，罗荣桓表示反对，邓小平坚决支持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对罗荣桓十分尊敬，评价他为人朴实、诚恳和厚道，在干部中很有威望。1963年罗荣桓逝世，邓小平及全家都很悲痛。现在，这两家人依然十分亲密，卓琳与林月琴两位老太太还时不时相互探望。

梁必业：

邓小平很会做政治工作

梁必业，1916年生，江西吉安人，14岁参加红军，是从“娃娃兵”成长起来的将军。历任红四军政治部干事、十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抗战期间，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总务处处长，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教导团政委。抗战胜利后，任东北野战军一纵队副政委、政委、四野三十八军政委。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长，解放军政治学院教育长兼政治部主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总政副主任、党委第二书记，军事科学院政委，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邓小平在一军团政治部任职，先后任宣传部长、副主任、主任，直至抗战爆发后调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这段时间里，梁必业也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对邓小平了解最多。几十年后的1991年，梁必业将军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谈论起小平同志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

很注意宣传工作

邓小平是1935年六、七月间，由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当宣传部长的。梁必业说：“我们宣传部的作用，行军打仗时，要保证部队吃饱走好，保证不要生病，保证战士不要掉队，保证不要减少战斗人员。我们主要是进行宣传，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思想，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宣传部在长征沿途和长征后，还管编印一份《战士报》，是油印的。宣传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还要经常去师、团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过了草地后，干部们经常下到部队去，那时候队伍不多，早上去，晚上就回来。过了草地以后，宣传工作的内容也多了起来，主要是教育干部战士，讲形势，讲英雄事迹。到了吴起镇后，一军团组织了一个参观团，由李富春、黄克诚带队，去十五军团参观。还组织了一个战士剧社去慰问演出。”据梁必业说，那次慰问演出，小平同志没有去，但对他们交待了注意事项，还专门从中央请了一个艺术家来教他们排演节目。

1936年1月，20岁的梁必业养病归队，到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当队长。

梁必业说：“这以后我就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小平同志很注意宣传队。常说：‘宣传队不只是做宣传工作，还是准备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宣传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做部队工作，还要做敌军工作。那时宣传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干部。在宣传队，我们经常进行政治学习，还要测验考试。东征以后政治教育就更多

了。我们办宣传队需要人，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新兵入伍，有点文化，可年龄较大，有30岁了。邓小平叫警卫员把他分到宣传队。我一看，是个老头儿，就不要。警卫员告诉邓小平。邓就说：‘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邓小平处理问题就是这么简明扼要。结果这个人很不错，演老太太很像，工作勤勤恳恳，宣传队里的小娃娃也全靠他照顾。”

据梁必业介绍，宣传队还编了一首《中央红军长征歌》，歌词是这样的：

“中央红军出发自江西，十二月长征历尽险山和恶水，战胜白军与团匪，行程二万五千里，大小五百余仗，都打垮敌人，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

英勇的、红色的英雄无坚不摧，终于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敌人的‘围剿’，胜利向前进！”

70多岁的梁老将军至今一字不忘，唱起来依然气宇轩昂。

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亲自率领下，实行东征。邓小平带领的政治部宣传部也东渡黄河。梁必业将军说，“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

两次调查研究

邓小平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中央两次直接派邓小平到部队做调查研究、考察干部。第一次是一军团驻陕北雨珠时。当时红军东征回来不久，邓小平刚接替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调红军大学学习。

邓小平是和罗瑞卿一起，受中央直接派遣，在一军团的一些部队做调查研究、考察干部的。据当时在红一军团第四师当团政委的王平将军回忆：中央派中央保卫局长罗瑞卿和邓小平来了解情况，找了大部分干部谈话。王平是第一次认识邓小平，那次他对邓小平的印象是：很冷静，严肃认真，讲话下多，但简明扼要，讲话句子短，好记录，而且观点明确，讲的都是有用的话。调查完以后，罗瑞卿和邓小平二人向中央做了汇报。

第二次是1936年8~9月间、军团政治部驻宁夏的豫旺地区的五里洞。这时中央军委委托邓小平带一个检查团到十五军团检查工作。梁必业将军说：“邓小平带了我、唐亮和蔡元兴三个人，由一个12人组成的精干的警卫班掩护，到驻陕北的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和七十五两个师去检查工作。邓主要是和师团干部谈话，我们是和下面的干部战士谈话。这个任务，是中央和中央军委派邓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回来后，邓向中央做了汇报。

中央两次派邓小平去做调查研究，说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邓小平是十分信任的。

据梁必业说，这个时期，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的社论，都是由邓亲自撰写的。他说：“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也是他的特点。”

特别抓干部教育

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准备对陕甘宁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向陕、甘、宁三省交界之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实行西征。从1936年5月至7月底，红军迅速扩展了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都得到相应发展。

此后一段时间，局势相对稳定，利用这个机会，部队进行了训训和教育工作。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宁夏七营川办了一期学习班。

据梁必业将军回忆：“东征回来以后，我们筹了款，筹了粮，还从山西

带回不少的骡子。西征以后，仗打得少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已开始与我们搞统一战线。这段时间里，小平同志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朱瑞。邓管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教育工作，特别是抓干部教育。我们这些人，从小参军，要讲比较系统地学政治常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习班的课，从政党、领袖、群众讲起，讲社会发展史。我们听课，讨论，还测验、打分数。朱瑞、小平同志都讲课。许多部队的同志在这里把参加革命的朴素的阶级觉悟，逐渐向理性上升，建立了理性觉悟。”

当时在一军团做侦察工作的苏静将军也说：“1936年小平同志组织我们学习，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学世界知识，学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课，给我们发学习资料，出卷子考试，还打分数。有时开讨论会，我们问问题，他解答问题。以前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打仗走路，这次小平同志组织的学习，使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据梁必业将军介绍，政治部除了抓学习教育工作以外，还要管敌军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宁夏是回民居住比较稠密的地区，因此，还要开展对回民的工作。另外当地哥老会的势力很大，也要注意对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邓小平管的。

对干部要求很严

1937年2月22日，红一军团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王家楼。

梁必业将军说：“在王家楼，我们住一个小院子，两个窑洞，小平同志和我住北面的一个，警卫班住南边的一个。周围有一个小围墙，东面有一个小菜园，我们租来修了一个‘克拉克’球场。我们每个人每月发5元钱，邓的钱由我管，他喜欢喝可可粉，我有机会去三原时就给他买点。吃饭政治部一个锅，很简单，有时有肉。我们军团政治部有一个炊事员是从江西来的，会做红烧肉，来军团开会的干部都喜欢来政治部吃红烧肉。邓的生活很简单，但很规律。吃完晚饭后，他常去散散步，然后又看书，疲劳了就打打克拉克球，或者看看战士们打篮球。邓同总部联系多，特别与当时的总政副主任杨尚昆联系多，杨每次来信都是鼓鼓的一大信封。邓几乎每天都要去驻在宫河镇的军团司令部看电报，或者和聂荣臻、左权同志他们去炊事情。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来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浆糊也不想自己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1937年上半年，刘伯承、萧克他们率领的援西军经过宫河镇时，他们都来王家楼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艰巨呀！’西路军失败后，援西军停在庆阳一带，后撤回陕北。中央召开了一十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委托杨尚昆、罗瑞卿和小平同志三个人负责。开会的地点就在我们王家楼。尚昆同志来后，和小平同志、我三个人住一间房子，罗瑞卿个子高，一个人住那间警卫班的房子。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我们政治部负责，要管组织会议、生活和安全保障。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梁必业将军满怀感慨他说：“我们一军团前后一共有过五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两任，时间最长。小平同志两年，在他的那个时期军团政治工作主要

由政治部主任来抓。朱瑞任过一段，李卓然时间最短。我学习做政治工作，第一个是向罗帅学习，第二十是向小平同志学习。小平同志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强，有用不完的精力。”

1937年1月，因朱瑞调任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朱瑞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主管一军团的政训工作。邓接任后军团政治部办了政训班，军团直属机关的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

梁必业将军对那段生活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学习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员们每天早上起来出操、跑步，学军事、武器、运动战，还搞比武活动。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他给我们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给我们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我们一礼拜上一堂课，课堂是自己搭的。在院子里，我们用席子搭了一个棚子作教室，一个黑板，向老乡借了二十几个长条板凳。邓每次都是一到时间就讲课。有一次供给部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小平同志给我们讲的都是基本道理，很朴素的道理。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下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

1937年六、七月时，邓小平接替傅钟，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杨国宇：

他们是一座威严的山

杨国宇，1914年生，四川仪陇人。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员，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四团排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译电员。参加红军长征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译电员、译电组组长、机要科科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中原军区司令部交通队队长，运输司令部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一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基地参谋长，训练基地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杨国宇曾在刘邓大军内工作13年，并主要在司令部工作。与邓小平直接接触较多，对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和邓小平的领导作风与思想发展的轨迹有较深的研究。先后编著了《刘伯承用兵要旨》、《刘邓麾下十三年》、《邓小平二十八年间》（合编）、《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一、二、三编）》（合编）等有关刘邓的书。

陈赓真的只怕邓小平

毛泽东晚年对邓小平说：“人家有点怕你。”杨国宇对此是有体会的，他说：“这个‘怕’字，据我的理解，也是说明小平同志办事果断，很有权威。而要形成这种权威，决不是单纯地依靠发号施令，而是要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多年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党在工作中要有权威。由此，杨国宇想起了战争时期的往事。他说：

“我曾在小平同志统卒的部队里工作多年，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战斗中，我深深体会到，小平同志每当紧要严重关头，总是能正确地维护和运用权威，实行纪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指示去夺取胜利。”这也是与小平同志平时对纪律抓得很紧的缘故分不开的。记得邓小平在《关于部队工作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都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的简单规定，只看成是群众纪律问题。应知道，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次锋是不够格的。”

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谈得上权威，纪律是建立权威的基础；权威是实行纪律的保证，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不可少的保证。

1940年夏天，我军发动了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一二九师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前部分干部产生了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甚至有的人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对抗战失去了信心。邓政委针对这一右倾情绪的表现，专门下达了一个重要文件，要求部队振奋精神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刘邓联名向部队下达了关于作战指导思想的指示。这就为进行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大战役打下了基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权威，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在百团大战中，刘邓部队的纪律强、士气高。

杨国宇回忆道：百团大战后，日寇恼羞成怒，集重兵向我根据地大扫荡。当时的情况很严峻，彭德怀命令我们集中全力消灭敌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于关家垵。发动进攻那天，邓小平指示：“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今晚机要科、

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夜 10 时许，接彭老总电令，规定次日 4 时发起总攻。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位、东庄、中村之敌。从 4 时开始到中午，战斗进行异常激烈，我方的伤亡数字在不断增大。只见刘伯承在指挥所里拿着话筒对陈赓大声说：“……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这时，邓小平拿起话筒，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全局！全局！”几个字重于泰山，陈赓表示坚决服从。这以后，电话一个接一个来往不断。最后有些残敌钻进山洞不肯出来，刘伯承对着活筒怒吼：“把手榴弹从烟筒里扔进去，给我炸！用石灰呛死他！”邓小平接过说：“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可见战况酷烈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指战员正遵照这些威严的命令浴血奋战，真是军令如山倒，义无反顾。这一仗后，在部队传出一种说法，陈赓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其实，这个“怕”并非害怕，而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纪律面前折服。

刘邓的权威还建立在他们的战略思想上。杨国宇回忆说：在刘邓大军强渡汝河，速歼羊山劲敌后，毅然南进，千里跃向大别山。十几万大军，不要后方，直插敌人战略心脏，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作战，并且建立了根据地，扎下根来。这样的战略谋划，使人不能不也不得不服，不能不也不得不“怕”其权威。毛泽东后来在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时说，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的时候，我们不敢开十二月会议，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不敢讲蒋介石可以打倒。毛泽东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对邓小平的鼓励，也是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所起的关键作用的最高评价。

他们是座威严的山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中，刘邓大军使敌人闻风丧胆。敌人害怕刘伯承，在太行，日本特务刺杀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也害怕邓小平，他们曾把邓的相片印发给部队，在相片下面加了“在大岳”三个字。所以，杨国宇说：“当刘邓连结在一起时，就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杨国宇曾在刘邓麾下 13 年，对刘邓的合力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刘邓既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是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于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的特派记者李普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号的。”

刘邓分头指挥而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景，给杨国宇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942 年春夏，为了扭转根据地因敌人“扫荡”而造成的困难局面，邓去中条山，刘留太行山。两人分手后，刘一直担心邓的安全，老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一天晚上收到邓的电报，说是当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当夜刘师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等电报。作战科参谋一下子又到机要科来问电报，问得机要科的人都烦了，就把门关起来不让他进来。天快亮时，刘师长来机要科，适陈赓来电，他就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

个字，看一个，不时猜一个字，猜得还很准。我们还未译完抄好，他就知道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这时他才放心地回去睡觉。

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两人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命令”等，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不叫人敬重！

1947年8月，刘邓突然改变自己原制订、中央已同意了的计划，迅疾抓住有利时机，率领4个纵队12万人涉过黄泛区，强渡汝河，直驱大别山。8月30日，邓小平宣告：“我们已到大别山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立即把高度集中的部队撤开，变成麻雀满天飞地与蜂拥而来的敌人周旋。后来，蒋介石动用4个整编师，33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命令白崇禧坐镇九江指挥，企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刘邓为了调动围困大别山的敌人，决定一方面内线继续作战；一方面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求彻底撕破敌人阵势。在这关键的时刻，刘邓再次分开。分手的那天晚上，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当天夜晚宿营，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直属机关、中原局机关所住的地方与敌人所宿之处相邻。真险，双方疲惫不堪彼此没有发现。直到第二天拂晓一个偶然的时机才知道。于是各机关闪电般集合转移。这时已听到北面担任掩护任务的一纵方向枪声大作，敌机也在我们上空盘旋，只因云低雾大，敌机未发现。刘伯承骑在马上笑着说：“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吴承恩写《西游记》，一有危险，雾就来了，真有他的道理。”此时，邓小平听到枪炮声，估计刘遇敌情，马上命令六纵派部向北策应，以吸引敌人南来。直到不久后，接到报平安的电报，才完全放下下心来。

戎子和：

邓小平的领导方略

戎子和，1907年生，山西灵邱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山西大学。1936年参加组建山西青年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参加领导组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担任决死队三纵队司令员。1941年后，任晋鲁豫边区政府委员会副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1949年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建国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财贸部部长、财政部顾问等职。

他专抓大问题，不管小事

戎子和同志于解放前后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很多年，对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有很深刻的了解。其中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邓小平长期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党政军的关系，其特点就是抓大问题，而不管小事。戎子和同志多年后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小平时说：

“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就谈到，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和监督政策。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他和冀太联办以及后来的边区政府间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他的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他说那时邓小平同志所抓的大事主要一是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二是精兵简政；三是重视财经工作，实行生产救灾。以建设边区民主政权为例，戎子和同志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张，把以往分散的根据地统一起来。”随后北方局开会决定成立冀太联办，党中央根据发动全民族抗战的需要，采取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举措。当时“三三制”规定：“无论行政机关或是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能占1/3或少于1/3。”为了认真彻底地贯彻党中央的决定，邓小平这个时期提议在成立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前，首先成立一个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临时参议会，再由临参会来筹备选举边区政府。“三三制”刚颁布时，一些党内的同志下十分理解其深刻意义，甚至认为这样会削弱我党的领导，1941年5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戎子和同志说：“文章深刻阐述了党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施民主政治，说党对政权发挥指导和监督作用，并就党团在政权中的作用，政府机关中党支部的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对整个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是有指导意义，影响是很大的。文章发表后，冀大联办的中共党团，曾认真地学习过，并按照文章精神，检查改进了工作。据我的回忆，在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程中，三三制政权所包括的各项具体内容，基本上得到了落实。”

但是，作为当时晋冀鲁豫边区党的工作的最高负责人邓小平，并没有在具体的事情上干预。戎子和说：“我在政府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从未见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直接干涉边区政府具体政务的事。从这一具体事实上，证明当时的党委对政府的职能很尊重。应该由政府办的事，党委决不插手，更不包办。”

他不说高言，不发空论

戎子和说：邓小平写文章，作报告，讲话都很实在，从来不说高言，不发空论，实际上就是坚持办实事，对于抓财经工作更是如此。邓小平同志重视财经工作并非今日始，而是早在40年代初的根据地时就开始了的。当时敌人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进攻，并不亚于军事进攻。他们实行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妄图从经济方面瓦解根据地的抗战。再加上连续的旱灾和蝗灾，使根据地一度进入最困难时期。这时小平同志一方面商领导大家精兵简政，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还著文作报告，分析困难，采取措施，增强大家的信心，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戎子和同志对1943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大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深有感触。他说这篇文章对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喜欢看。“小平同志的文章人们之所以喜欢看，最重要的一点是真理与实践相结合，不说高言，不发空论。”这篇文章所叙述的历史事实，是同小平同志对晋冀鲁豫边区工作的领导，同小平同志一贯注意财经工作以及他正确的财经思想分不开的。

解放后，戎子和在财政部工作，邓小平那时也兼任财政部长，抓财政工作更是实在，戎子和同志回忆道：

“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尊重。这主要表现在他善于把毛泽东同志对财政问题的指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出正确的决策。我记得1953年12月财政部开始编制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时，一天，邓小平同志特意找到我，问道：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过什么重要指示。我想了想回答说：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下少指示，财政部还编印了一个小本本。在编制预算方面概括他说主要是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他听后，沉思一下，坚定他说：这三句说得好！打明年的预算，就按这个方针办。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指示，编制了1954年预算收支计划。1954年6月，邓小平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把国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并且执行的结果要力争‘达到收多于支出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同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后来这一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是：“日子过得不错。所谓日子不错，就是人民银行把财政结余贷给工商企业特别是商业，补充了流动资金，缓解了1953年的资金紧张局面。”

他坚持权责分明

邓小平办事果断，既敢抓又敢担担子，但他坚持权责分明，从不含糊。因此，对于他的指示，下属是易于操作的。戎子和对此回忆说：

“那时候，小平同志除了有紧急事情临时找我们党组几个人谈外，平时大体每星期听一次副部长们的汇报。当时正是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以后，财政部大多数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小平同志察觉了这一点。有一次部办公会议，他说了这样两句话：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这两句话在领导与

被领导的关系问题上作了一个准则性的回答。由于权责分明，使得下面同志的工作好做了，也大胆了。自那以后，我们每个副部长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反映情况，都是很谨慎的，很负责的，从不敢随随便便，但心情却是舒畅的。此外，小平同志听汇报时，总是要求反映情况真实、确切，数据明白、清楚，反对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教育。”

他关心下属，使人永生难忘

邓小平同志在全局工作中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当许多“小事”将会影响到“大问题”时，他却是无微不至的。戎子和满怀深情地说了两件事：

“早在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干部的口粮从每天一斤半小米减少到七两，我的体重从 125 斤减到 100 斤。一次小平同志约边府杨秀峰、我和李一清同志谈工作，我和李一清由于精力不足，就打起了瞌睡。小平同志看到眼里，触动心情，就当面告诉杨秀峰同志，边区政府厅一级的干部一个月津贴增加到 10 元。”

“还有一件事，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1953 年夏季财经会议上，我受了批评，情绪消沉。小平同志到财政部后，看出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子和，我看你受批评后，好像有些消极，抬不起头来，这可要不得，要挺起腰来，继续工作，不能垂头丧气，一消极就不好了。小平同志这些劝勉、鼓励的话，语重心长，表现了他对下级干部的爱护之情，使我深受感动，永志不

张香山：

邓小平的讲话艺术与工作作风

张香山，1914年生，浙江宁波人。193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科长、副部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现为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主任委员。译著有《现实与典型》、《战斗着的日子》、《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等。

张香山1937年10月从上海来到晋北八路军前方政治部驻地，与邓小平初次会面。随后8年一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解放后，张香山在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邓小平曾一度主管对外联络部工作。张香山曾先后7次随邓小平赴苏访问，两人关系交往密切。因此，张香山对邓小平有较深的了解。

他讲话新颖，提纲挈领

1937年10月张香山从上海来到晋北，几乎同期到达的还有几个留日学生。他们被安顿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下午，宣传部王科长通知他们说总政副主任邓小平要约见他们。当时张香山还只听到过邓小平这个名字，对于邓小平是怎样一位同志，在他脑海里还是个空白。但是这第一次见面，邓小平就给张香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香山后来回忆道：

“随着王科长走进小平同志的住房，看到王科长向一个约摸30岁左右的同志敬礼，我们也行了礼。……他站起来，向我们回礼。小平同志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显得精明强干，身上穿着一身灰色的洗得有些发白的粗布军装。他的住室收拾得很干净，八仙桌上有几本书和一些薄薄的文件，炕上一条毯子和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薄被，墙上挂了一个皮挎包。他让我们坐下，叫小鬼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白开水。接着就问我们每人的经历，又问我们来此后对八路军的印象。由于是初次和八路军的高级干部谈话，大家都显得有些拘束，回答得不那么踊跃，小平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就微笑着说，大家可以随便地谈谈嘛。于是大家又穿插地谈了阵。”

这是张香山对邓小平同志这个人的初次印象。接着，邓小平同志谈到了八路军正需要知识分子这样的新的血液，所以非常欢迎学生参加八路军。他指出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必须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而不能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当务之急是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群众。华北战场中央军之所以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张香山他们一听邓小平的话，就觉得他的话非常新颖，便很认真地听了下去。张香山回忆道：

小平同志鼓励我们要在部队中接受长期战争的考验，并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最后他叮嘱我们说，八路军里的战士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的，他们文化程度低一些，但政治坚定，作战勇敢，有实际经验。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要做到尊重工农干部，两者要搞好团结。你们遇到有什么不了解的问题或困难，可以同老干部谈，他们会热情地帮助你们的。

张香山听了邓小平的话，很有感触地说：

“我觉得他的讲话，提纲挈领，干脆利落，不讲客套话，有些四川口音。

这次谈话不到两小时，但对我们初到八路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有教益的。同时也使我们感觉到八路军的领导同志没有什么官架子，平易近人。上下级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

当张香山回到宣传部，向王科长问了一些小平同志的情况后，他更觉得小平同志不简单，他说：“听了王科长的一些介绍，好像读了一首史诗，总觉得八路军的领导人都有各自传奇式的光彩耀人的革命经历。”如果说张香山与邓小平的初次会见还只是“印象深刻”的话，那么，后来邓小平的讲话则使张香山同志终生不忘。

他的话似乎平淡，实则内涵千钧之重

1940年一二九师直属队干部为纪念建党19周年举行集会，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使张香山感受特别深。张香山说：“报告中有一段话，似乎平淡，实则内涵有千钧之重的历史份量，因而就一直萦回在我的心头而不忘。”这段话是邓小平在简述了党的历史，讲到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我们党的成就之后，关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所带来后果不同的一段话。邓小平说：

同志们是幸福的，已为大家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工作，不论是准，只要诚诚恳恳地干，都会不断地取得成绩。而在过去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那时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却得不到相应的成果，而且还会不断地受到挫折和损失，这是使人很痛苦的。因此希望大家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尽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邓小平的这段话是有切身感受的。当时由于张香山只经历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所以，“小平同志所讲的在正确路线领导下能够不断地获得胜利的这个论断，通过自己3年来的战斗生活，是易于领会的”。而邓小平则在1933年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而受到批判，并被撤销职务，最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就是邓小平自己所谈到的“三上三下”中的第一次“下”。因此他对正确路线下工作如何幸福，要比张香山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彻。张香山后来深有感触地说：

“在小平同志作了这个报告后的第三年冬季，大行地区的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转入了抢救运动。这时我才亲自看到了错误的政策会给工作带来多大的损失，并使许多干部经受多大的痛苦，不过抢救运动毕竟还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某项工作的政策性错误，所以它是比较容易纠正的。使我真正地体会到错误路线给党造成的危害是如何巨大，深刻地认识到在错误路线下，党员干部是无法为党为人民做出像在正确路线下所能做出的那样的成绩的，并且深深地感到错误路线下，一个正直党员的内心是如何痛苦，毕竟是在1957年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了。这已是后话。不过，在‘文革’这段痛苦的生活中，我就会常常地想起小平同志的那次讲话，并且怀着一种热烈的期望，企盼着错误路线被纠正的这一天终会到来，我们又能享受到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工作的那种幸福。”

早就反对个人崇拜

邓小平早在 50 年代就对反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尝试。那是 1956 年，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意味深长地阐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这个报告中，他讲了下面一些话：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和执行。

张香山由于长期与邓小平同志接触较多，因此对这些论述有深刻的理解。他说：

“实践证明，苏共二十大虽然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实际上并未彻底地解决苏共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共八大，小平同志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也并未被纠正，相反的，却是更加滋长起来，以至发展到了极点。这个事实从反面证明了小平同志在八大当时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真正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也证明了任何正确的理论，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形成为物质的力量，否则是无济于事的；同时还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从带有封建性的社会和国家中诞生出来的共产党，要防止和克服个人崇拜，是如何艰巨而且是要经历长期过程的。”

出国不带秘书

由于解放后张香山在中联部工作，此间邓小平也分管中联部工作，他曾先后 7 次跟随邓小平赴苏。因此，他除了对邓小平的讲话、论断深有体会外，对邓小平的领导作风也极为赞赏。其中之一就是邓小平出国讲究的是免除繁文缛节，轻装出访。张香山对此回忆道：

“小平同志担任团长的场合，他从来不向主持组织代表团出访的单位，提出礼宾上的或生活上的要求。同时对主人在这方面的

一些安排，也无意计较。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政治会谈，关于代表团的团员和随行人员，总是力求做到很精干。小平同志自己一般不带秘书。这方面的工作，依靠代表团的工作班子来做。也不带随身医生或护士，最多带上一个警卫员，但这也仅仅是为了照护一下日常生活而不是名符其实的警卫。因为到了外国，警卫工作只能由邀请方面来负责。作为团长的小平同志是如此安排，其他团员也就随着从简了。这样代表团就减少了很多冗员，同时也就减少了代表团内部事务，而整个代表团集中注意力于对外工作。当然，小平同志率领的都是党的代表团，而不是政府代表团，这样也就易于做到免于

官气或少些官气。但是党的代表团要摆官气，也未尝不能摆一摆的，我是见到过这样的事的。总之，像‘文化大革命’以前小平同志率领的党的代表团那样轻装出国，我认为是一个好的风气。如果能保留下来，该是多么好呢！”

向守志：

邓小平在渡江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

向守志，四川宣汉人，1932年参加红军，曾任区游击队长、副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营长、副团长，太行军区第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支队副队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独立第二旅旅长，中原野战军第五纵队二十六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长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1960年后任炮兵技术学院院长，炮兵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82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向守志多年在刘邓大军中担任一般指挥员，对刘伯承、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有较多了解。

临战受命快刀斩乱麻

1948年底，淮海前线捷报频传。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继11月22日歼灭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之后，12月15日又全歼黄维兵团。紧接着1949年1月10日再全歼杜聿明兵团。淮海战役硝烟未散，党中央毛主席又做出了举行渡江战役的最后战略决策。邓小平为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用中央的指示在指战员中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出了渡江战役的总设想和总要求。经过在商丘召开的总前委会议讨论后，报请中央军委批准。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这个关于渡江战役的总设想总要求。同时明确规定：为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导，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中央还指定刘、邓、张（际春）、陈（赓）4同志参加由陈毅、饶漱石为主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命令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向守志是渡江战役的参加者，他回忆道：“在大战前夜，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邓小平同志的两项命令——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连同已经任命的中原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以及二野前委书记，集五大职务于一身，赋予他领导华东和中原党、政、军、民的大权，表明了中央对邓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和器重，也是对邓小平同志赫赫战功和不凡才华的褒奖。小平同志临战受命，其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他快刀斩乱麻，首先抓的就是让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部队中迅速地贯彻落实。以中央的精神来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以求步调一致。随即两大野战军圆满完成了整编任务，改编为二、三野战军，从组织上保证了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3月底，小平同志在充分听取了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渡江作战的部署，他请陈毅同志草拟作战计划，陈毅遂告张震同志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善于从宏观全局上观察和思考问题的邓小平同志，在审阅了张震起草的作战命令初稿后说：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大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项即可。随后邓小平同志亲自草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作战纲要，即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与

有关同志逐段研讨后上报中央军委。很快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向守志同志说：这个“纲要通观全局，高瞻远瞩。在纷乱的形势中化繁为简，把握事态，是坚定性，科学性、周密性、灵活性和可行性的有机结合”，它“是宏观决策的典范”。在渡江战役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实际槽况把握渡江的时机

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总前委及第二、三野战军首长都十分关注并且多次慎重研究和磋商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什么时间发起渡江战役最适宜。向守志回忆说：“小平同志身为主帅，更是为此操心尽力。早在1948年10月，中央军委提出了于1949年秋举行渡江作战的最初构想，12月中央军委又根据当时的战况，提出大约在1949年五、六月举行渡江作战的构想。1949年1月由于淮海、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我军的急剧变化。这时国民党军损兵折将，士气低落，而我军却正是士气高涨，装备改善，兵力增强之时。而且国民党军政内部矛盾重重，中央军委认为实施渡江战役的基本条件已经接近成熟，因此要求两大野战军准备在三、四月渡江南进。邓小平接到指示后，于2月8日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总前委认为以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因为这时敌人内部在政治上的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上是守江岸、守京沪要点，还是退守浙赣线，犹豫不决；在季节上4月初之前雨水少江水小，有利于我军作战。中央军委迅速同意这一方案。

3月8日，邓小平、陈毅同志正在党中央西柏坡开会，他们得知我党与国民党政府和谈，我军渡江作战必须推迟到4月10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一起研究后，认为4月10日正是阴历十五，月圆通宵，不利我军求得突破江防的突然性，主张推迟到4月15日黄昏渡江。获得了中央军委的赞同。他们立即致电第二、三野首长，阐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军事行动要严格受到和谈进程的制约，决不允许有独立于政治斗争全局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一定要达到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高度统一。4月14日，两党和谈明朗化，中央军委又致电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4月20日最终期限，因此军委决定4月25日后渡江。邓小平同志接电后，立刻听取侦察报告，查阅了近10年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得知长江下游每年5月初江水开始上涨，且水势之大胜过七、八月份，两岸湖区多被水淹，江面增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增加许多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草均渐紧，如果过久推迟渡江时间，势必给部队民工的后方补给带来新的麻烦。于是，小平同志与陈毅同志商量，将渡江时间限定在4月20日夜。这样，一来我政治上主动，战斗渡江是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的结果；二来气候条件有利，4月20日夜是阴历23日，月出于后半夜，且为下弦月，有利于我军渡江的突然性。于是总前委4月17日呈报了我军全线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中央军委、毛主席于18日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当日，邓小平签发了总前委给野战军的电示：“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的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此时此刻，全军上下群情激奋，广大指战员和民兵都抱定一个信念，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向守志深有感触地说：“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对渡江战役全过程

的指挥，始终牢牢地掌握战役主动权，把握关节，有主有从，点面结合，灵活用兵，表现出了战场指挥的果断、巧妙和艺术的高超，使渡江战役获得了迅速、彻底的成功。”

超的指挥艺术

邓小平依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一是对总前委成员进行了科学分工：刘伯承同志由张际春、李达协助，直接指挥西突击集团（含四野一部），由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桐城的一所中学里。粟裕同志由张震协助，直接指挥东突击集团，由张黄港至三江营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泰州东南之白马庙；同时，为了便于协同作战，由粟裕统一指挥和协调东、中突击集团的行动。谭震林同志直接指挥中突击集团，在机阳至裕溪口段渡江。邓小平和陈毅两同志位于安徽肥东县之瑶岗，主持全局，使用华东局电台，统一指挥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二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依据敌军的江防部署——马裆至贵池地区是东线汤恩伯、西线白崇禧的结合部，指挥不统一，战斗力薄弱，因此决定由谭震林直接指挥的中突击集团先于东、西两突击集团一天渡江，以便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于南京以西，掩护直捣沪宁线的东突击集团主力渡江，并便于中突击集团渡江后迅速东进，尽快与东突击集团会合。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总前委还特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伪装成四野主力，向武汉、宜昌、沙市方向突击，引诱白崇禧集团西顾；接着指挥二野第四兵团占领麻城，吸引武汉、九江之敌；同时，指挥四野第十二兵团直取信阳，威逼武汉，造成包抄武汉的态势。如此虚虚实实，造敌错觉，使敌军处处被动挨打，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三是抓住战机，歼灭敌军重兵集团。我军顺利突破长江天险后，敌军慌忙撤退，企图在浙赣线和上海地区重新组织防御。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紧紧抓住有利战机，及时调整战役第二阶段的部署，先后筹划了两个歼敌重心，形成了两个大包围圈。四是敌变我变，灵活用兵。五是以大无畏气概和严密组织，与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总前委的指挥下，我军渡江后三日，就解放了南京。面对此情此景，同邓小平坐镇总前委指挥全局的陈毅怀着喜悦激情，挥毫写下了“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的磅礴诗句。

渡江成功后，我军逼进上海，蒋介石下达命令一方面要死守上海，另一方面又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志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杀害所谓政治犯。同时对部队内部也进行了严密的控制，蒋介石发布了“十杀”令，使得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向守志回忆道：“小平同志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十分紧迫而又艰难的现实，与陈毅、粟裕及华东局领导同志深刻理解党中央关于保全上海，保护爱国民主人士，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管上海的一系列指示。同时，总前委确定了上海战役的指导方针：既要歼灭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军，又要保全上海市，免遭战火的破坏，以利日后建设。正如陈毅所作的形象比喻那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因此，他们对我军攻城作战的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从军事上、政治上、策略上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使上海最终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向守志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总前委书记、华东局书记的岗位上，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其精通马列主义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伟大胸怀，同自己的亲密战友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一起，通观全局，精心策划，继淮海战役之后，又导演了渡江战役这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永载于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武装斗争的史册。”

阴法唐：

邓小平的功勋永远刻在世界屋脊上

阴法唐，山东肥城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历任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政治指导员，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后勤部政治协理员、冀鲁豫八分区濮阳县大队政委、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1940年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五十九团政委，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参加了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等战役。1950年率部进驻西藏。1952年后，任西藏江孜工委书记兼江孜军分区政委，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1971年后，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1980年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1985年任第二炮兵副政委。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阴法唐多年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特别是部队进驻西藏后，阴留藏，邓又特别关心西藏工作，阴多次受到邓的直接教诲，对邓小平有很深刻的印象。

1983年夏天，阴法唐携带着雪域高原的尘土，去北戴河，想看望邓小平，并向他汇报西藏的工作。但中央办公厅有通知，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疗养期间，不要打扰他们。后来因为阴法唐来自西藏，而中央领导又很关心西藏工作，破例接待了他。一天上午小平同志快要下海游泳的时候，在秘书的引领下，阴法唐见到了这位老首长。作为一个30多年前在他麾下战斗过的老兵，阴法唐用最短的时间和最直率的语言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邓小平对一些问题问得很细，一些情况他还记得很清楚。邓小平和阴法唐交谈完之后，就径直游向大海。他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阴法唐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几经沉浮的大政治家，他一生部在奋力搏浪前行，一直都在关注着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30多年前阴法唐作为入藏部队的指挥员之，曾在邓小平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解放西藏的任务，并一直留在西藏工作。对此，他还记忆犹新。

大政治家的胸襟和风范

当全国绝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解放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注大陆上最后一块尚未解放的土地——西藏。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期望。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号召。毛泽东曾经希望由西北局去经营西藏，但彭德怀同志认为从北路入藏困难较大，而且短期内难以克服。毛泽东反复权衡后，于1950年1月2日在莫斯科致电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进军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担任。并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于是，这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就落到了二野肩上。刘邓首长研究后，决定由十八军完成进驻西藏的任务。同时报告中央，并请求“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1月10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措一切。”1月8日，西南局即向中央报告了进藏工作计划和西藏工委组成名单。

当时阴法唐是十八军中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说：“从此，十八军的数万官兵以及他们的后代永远与西藏这片古老神圣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了。”邓政委“是一位非常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考虑问题的人，这种一代大

政治家的胸襟和风范，在跃进大别山，决战淮海，解放大西南等战役中就充分显示出来”。

“兵马未动，粮秣先行。”为了搞好进驻西藏的后勤供应，西南局专门成立了支援司令部。但在邓小平同志心中，进军西藏，不仅要粮秣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先行。1950年1月1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召见了十八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师以上的主要领导。刘伯承十分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邓小平则接着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由于西藏的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有政治方面的，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所以，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在宗教问题上，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他还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阴法唐十分感慨：“这种着眼全局，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远见卓识，在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上得到了高超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

“在当时西藏这块情况复杂，矛盾纵横交错，压迫剥削残酷，僧侣贵族统治黑暗，没有党的组织活动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进军任务，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小平同志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作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第一线指挥员，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了和平的天平上。”

为活佛献花圈

1950年2月25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这一电报具体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还指示西南局、西北局拟定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阴法唐回忆道：

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西南局为了坚决执行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紧紧扭住和平这个根本问题，向中央报告了解放西藏的4条方针政策，作为与西藏当局谈判的基础。后来，小平同志根据

中央的指示精神，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和宽宏的气魄，纵览古今，放眼未来，紧贴西藏社会的现实，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上，深谋远虑地亲自起草了十项政策。这份历史性文件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解决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十条既是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的基础条件，又是进藏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依据和必须遵守的准则。我党后来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签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就是在这十条基础上发展的。

根据中央指示，西北局曾先后派了两批人去拉萨劝和。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离境，一批遭扣押。西南局在物色赴藏代表人选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总司令长征时路过藏区结识的好朋友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主动提出去拉萨劝和，小平同志感到格达活佛的爱

国精神可佳，但鉴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缺乏和平诚意，拉萨形势复杂，因而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暂不要前去拉萨，并将此意见报告朱总司令。总司令也专门电告西南局，对格达活佛深明大义，以西藏民族的利益为重，舍身劝和的精神表示钦佩，但劝他暂不去拉萨。无奈格达活佛决心已定，他要在劝和成功后再进京拜见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西南局只有尊重他的意愿。小平同志专门修书，请格达活佛转送达赖喇嘛，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对和平解决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英明决策和一片诚意。但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惨遭暗害。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族英雄的噩耗传出，藏汉各族人民都悲痛不已。在追悼会上，首长们都送了挽联和花圈，贺龙、邓小平同志的挽词是：“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所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阴法唐说，尽管我党做了各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北局都为表示我们和平的诚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我十八军指战员也始终站在和平的大门前，等待西藏地方政府的醒悟和远见。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怂恿支持下，以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关闭了和平大门。他们调集大量藏军，布防于昌都附近，企图阻止我军和平进藏。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10月6日，我党我军不得已拉开了著名的昌都战役的序幕。昌都战役的全面胜利为最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和平谈判的基础，在我党我军的继续争取和影响下，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的其他官员也两次上书达赖喇嘛力主和谈的情况下，达赖喇嘛终于面对现实，派出了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政府和谈代表团，最后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既要平叛，也要防“左”

1951年4月16日，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后，受到各方面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和贺龙司令员等西南党政军领导于19日接见并宴请了他们。邓小平向他们讲述了我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一再坦诚而又坚定地表示我们是要认真执行的，还说了争取达赖从亚东回来于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他们消除隔阂和猜疑，使谈判成功。并高度评价阿沛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从西藏广大人民利益出发，主张和谈的历史性选择。语重心长地勉励他永远保持爱国本色，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为西藏人民新的事业作出贡献。阴法唐回忆说：“协议签订前，邓政委的心血用在促进和谈上；协议签订后，他的心血又用在协议的贯彻执行上。”

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在西藏“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一再要求部队不要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进藏，不要看不惯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与剥削，就犯急性病，违犯政策。遇到这类问题要睁只眼闭只眼。这使官兵易于理解。宗教在西藏最敏感，在动员令中邓小平同志教导进藏部队一定要切实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藏僧俗民的宗教信仰，用自身的模范行为增进汉藏民族的团结。

然而，我党虽然充分考虑和照顾到了西藏政府不愿改变现状的愿望，进藏后部队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让，一场叛乱仍在50年代后期发生了。西藏反动上层彻底撕毁协议，武装向我发动全面进攻，1959年3月，我军开始进行全面平叛斗争，平叛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指示，到

1962年3月彻底平息了叛乱，解放了农奴，使百万农奴终于重见光明，永远地成了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西藏的平叛和改革旧制度，建设新西藏的过程中，小平同志又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和民族特点，适时地提出了要在平叛中防“左”、防急、要稳的方针，使西藏的平叛及改革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

阴法唐感慨地说：“岁月已经久远，沧桑巨变，许多历史的在事在渐渐的被淡忘。但是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在担任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到总书记任上，为和平解放西藏，平息西藏叛乱，完成民主改革等，所建立的伟大功勋和作出的特殊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世界屋脊上。”

甘惜分：

他一讲话，举座皆惊

甘惜分，1916年生，四川邻水人。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底赴晋西北部队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新华社，历任新华社绥蒙分社、晋绥总分社记者，编辑。1949年后历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采访写作教研室主任、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争论三十年》等。

甘惜分在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时曾被派往专门采坊报道由邓小平领导的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因此，他有幸经常出席邓小平主持的各种会议和亲聆邓小平的讲话及报告。对邓小平的领导才华和演讲艺术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的政委好厉害

1940年第二野战军从湖南打到重庆，参加接管工作。刚从晋西北调往湖南的甘惜分，也随军到达重庆，并且在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扎下根来。随后在重庆的5年里，甘惜分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见到邓小平，邓小平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邓小平的报告和讲话，更是让他惊叹不已，甘惜分回忆道：

在重庆，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小平同志，他的报告往往就是工作指示。因此，与会者都必须十分注意地听他的讲话。有一次，小平同志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大礼堂作大报告，从下午1点到6点多钟，他站在台上，手上不拿讲稿，连发言提纲都没有带。也很少见他喝水，就这样一口气地整整讲了5个多小时。甘惜分说：他的报告“逻辑性很强，条理分明，有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真使我们与会者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作如此长的报告而不停顿的人。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散场出来，大家纷纷议论：“我们的邓政委好厉害！”

还有一次在西南军区大礼堂，他为西南局系统党政军各单位的干部作关于整顿党风问题的大报告，讲话的时间也很长。他号召大家要振作精神，把刚解放的西南地区工作做好。上不负中央重托，下不负人民厚望。由于他讲话击中要害，深得人心，又有独特的见解及演讲艺术，所以没有人觉得其长，也不觉得累。

惊人的领导艺术在会议桌前展现

大约是1950年下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要《新华日报》和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各派一名负责人去列席财委会，以便了解西南的全局，组织好宣传报道。甘惜分有幸担当此任。他每周参加一次财委会的领导干部会议，亲聆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也看到了邓小平同志惊人的领导艺术。当时邓小平兼任西南财经委的主任，而经济工作又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所以，每次财经委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远远不止是财经问题，而且包括了经济、政治、文教、人事等等，涉及到方方面面。财经委实质上成了西南局的重要决策机构之一。

甘惜分说：“我有这样领教小平同志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机会，实在是难得。”当时开会的地点开始是在曾家岩西南分局对面的财经委办事处，后来转移到西南局内邓小平同志的家中。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中间一个长方形办公桌，四周是凳椅。邓小平同志坐一头，两侧和另一端坐着财经委各部委负责人。

甘惜分回忆道：小平同志从不作记录（有专人记录）。会议开始时他总是会不经意地指一位同志：“从你开始吧！”汇报开始后，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活像一尊雕像，有时还闭上眼睛。可以看出，他是在一面听一面思索，思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案。他的座位前摆有铅笔和白纸，但是他很少去动过。那时的西南地区局势很乱，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迷信组织、反动会道门等势力相当猖獗，武装叛乱时有发生，所以面临的问题很多。每次会上，邓小平同志耳边响着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困难、烦恼。这时，邓小平就会背靠椅子，不时地忽然插同一两句，又陷入深深的沉思。会开到一半多，他宣布休息。于是他走进隔壁的台球房打起台球来。打台球大概是在他留法时学会的。片刻休息活动后，邓小平同志精神焕发，重新入座，向大家一一问过讲完了没有，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有补充的，再说，没有了，他的压轴戏开始登场。他不慌不忙，首先是对每个同志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并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办法。斩钉截铁，快刀斩乱麻，从不拖泥带水，不优柔寡断，真是令人惊叹不已。如果会议的前一段，他主要运用的是耳朵，那么后一段，他就主要是用嘴来进行一场说服人的战斗。

甘惜分十分感慨地说：“他头脑中那些不作笔记的‘笔记’，都被整理得有条不紊；他在闭眼似睡非睡之间的苦苦思索，最后都变成他成熟的思想，泉水般地喷放出来。”“这是人间少见的领导艺术，这是他在长期战争中养成的迅速果决，多谋善断的领导才能。他深具民主的涵养，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又在战争中游泳多年，深谙运用集中权力的战术。民主与集中，在他身上达到完美的统一。……我几十次的这样经历领导艺术的沐浴，胜读十年书。”他的这种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人不禁想起《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他纯熟地掌握了领导的规律，真可谓‘游刃有余’矣。”一团团令人揪心的忧虑，一下子化作清澈见底的泉水。大家都是心情不安而来，却高高兴兴而去。邓小平的魅力在一周一次的财委会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共产党人说话算数

邓小平同志的令人惊讶之处，还不仅仅是在会议桌旁，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他往往做出一些令人惊讶的决策与措施。例如修建成渝铁路。四川人民为修建这条铁路，曾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就浴血战斗导致了辛亥革命。现在四川人民眼巴巴地看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没有魄力把它修建起来。甘惜分回忆说：邓小平同志在大西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胜利完成之后，迅速地将经济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这时邓小平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建这条铁路。他不抓则已，一抓到底。这是他和西南局的领导同志为了给中国人民争气，为了加速西南建设而决策的一项重大工程。铁路的修建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在二野及地方党政军群的大力协作下，进度

奇速，前后不到两年，便大功告成。通车时，由重庆开了一列专车去成都，川西平原为之轰动，鞭炮击鼓，数日不绝。成都市郊，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争看铁路，四川人民扬眉吐气，不无感触地说：共产党人，说话算数。

甘惜分感叹道：“1952年小平同志奉命调到中央，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在西南两年多留下的领导艺术的魅力，我终生铭记，学一点，用一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姜思毅：

他对待毛泽东思想始终如一

姜思毅，1920年生，天津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扶轮中学党支部书记。1937年参加八路军。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支队政治处宣传股股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鲁西军区旅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晋冀鲁豫野战军旅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师副政委、政委。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大学五分校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和宣传部长，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副院长。1985年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主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等。从抗日战争期间起至建国后，长时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

对整风运动作出重要贡献

1942年到1945年，我党开展了一次规模甚大的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在全党全军内开展的普遍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全党全军开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空前团结。整风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在晋冀鲁豫地区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对运动的进行抓得很紧很具体，他的总的指导思想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姜思毅说：“小平同志对这次整风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为此回忆道：

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所做的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旨的党中央周围，一心一意地完成中国的革命事业。”他还说，我们党2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党长期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对于根据地正确组织和领导冀鲁豫地区的整风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各级党组织向党内党外抓紧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作为整风运动的首要任务。所以，一时间在冀鲁豫边区的党员干部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在整风运动中，由于一些人对于审干政策理解不够深，曾经一度出现了某些过“左”或右的倾向，发生过不好的事情。小平同志就针对冀鲁豫边区的“湖西肃托事件”指出：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警惕个人野心家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钻营进行的暗害活动。对于人的处理我们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严禁逼供信。

姜思毅说：“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在区党委和军区机关，集中时间整风，与此同时，组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改造我们学风的重要方法和衡量每个同志整风学习成绩的一个标准尺度。”

反对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要正确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全面完整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姜思毅说：“1956年到1966年，小平同志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在此期间，我们得到小平同志的教导更多了。其中，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围绕着如何正确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与林彪进行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邓小平同志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曾多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他还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

林彪上台后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并为此而打击主张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庸俗化、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肆意歪曲毛泽东思想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产生了很坏的影响。1960年3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开的天津会议上作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他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化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邓小平同志还要求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了，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姜思毅回忆道：

在谭政遭受林彪的打击和排挤后，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仍然在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继续与林彪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这一切又都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罗荣桓说：“‘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该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如果“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这场斗争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军委常委第26次会议上。会上罗荣桓坦率地表示对林彪的“带着问题学”的异议。他说：“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林彪没有等罗荣桓把话说完，就粗暴地宣布散会，拂袖而去。在这种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面前，林彪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罗荣桓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他当即拿起电话，向邓小平总书记作了汇报。邓小平同志感到问题十分重要，就把这个问题拿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结果大家都一致赞成罗荣桓同志的意见。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还说到：“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1977年邓小平同志再次提起这件事：“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

我和罗荣桓同志曾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姜思毅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小平同志关于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等的一系列讲话，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始终如一的。”

陈野苹：

邓小平善于高度概括

陈野苹，1915年生，四川冕宁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中共党的组织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处长、副局长、局长、副部长、部长。1983年任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陈野苹说：小平同志平时说话不多，概括性极强，点到为止，但很能抓住要害。他回忆了他在解放前后所经历的几件事。

1948年2月，四川干部队从晋绥临县三支出发南下，5月份到达中共中央中原局和豫西区党委驻地——鲁山。在那时，邓小平同志接见了川干队的负责人江震、杨超、程占彪等，传达了中央指示，并要川干队暂时留在鄂陕边区工作待命。江震同志在传达小平同志指示时，讲了一句话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邓小平在要江震去陕南后当县委书记时说：县一级建制既是战略单位又是战术单位，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就可以当好省委书记。陈野苹说：“这真是理论利实践的高度概括。是下放锻炼，培养干部的一种好方法，是一句至理名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川干队抵达陕南后，对所有的干部都按工作的需要进行了分配。为了使队员多受一些实际锻炼，按照当时“两头往中间挤，一律提任副职”的原则分配工作。多数县以上领导骨干，都没有按原级别职务进行安排。

1949年8月，江震奉邓小平同志电令赴南京接受任务，陈野苹也随同前往，但9月份他们到达南京时，邓小平已去北京。江震和陈野苹又赶去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邓小平。江震汇报时开头就说：“我到陕南后没有实现小平同志的指示，没有做县委书记，而是先做了地委副书记，以后又做了地委书记。”江震的活似是检讨，又非检讨，因为他的工作是由组织上安排决定的。邓小平听了他的话立即干脆明确地说：“那个不算，不入党表。”这是陈野苹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他的话言简意赅，极富回味。意思是说，你在那里的工作是临时性的下放锻炼，今后的工作分配不以那里的工作职务为依据。陈野苹感叹地说：“一句话八个字，就让人感受到了小平同志的性格和胸怀。”

1949年12月初，重庆解放不久。一天邓小平召集西南局组织部部长、副部长和干部处负责人及有关同志开会，讨论干部工作问题。当时重庆市才接管，各系统、部门、单位都要进行整顿，需要一些得力的干部。陈野苹当时是干部处长，他在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后，张际春部长和江震副部长又做了补充。最后邓小平讲话，他分析了当时重庆的情况后，对于当前的干部工作的急切任务只讲了9个字：“挂牌子、搭架子、摆摊子。”陈野苹很有感触说：这9个字真是“语言通俗，含义明确，而且回味无穷”。

后来江反对组织部的人说，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心情非常愉快。他交待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非常明确，原则非常坚定。具体方法他并不多讲，给你留下广阔的用武之地，让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后，陈野苹也逐渐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特点有所感受。他感到“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之一就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而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上面讲的那句话9个字，就可以体

现这种精神。”

1950年上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亦即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在大会闭幕后，邓小平又召集了一次党组全体会议，是由他主持作总结讲话。他整个讲话没有用稿子（这是他的习惯），仅仅讲了9分钟，就宣布散会，与会同志都出乎意外，又惊又喜，觉得他的讲话既总结了经验，提出了方针任务，还很有份量。陈野苹感慨他说，“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短的一次重要会议，恐怕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如果没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和高超的讲话艺术，是办不到的。我当时还年轻，作了记录，基本不差，可惜遗失了，甚以为憾！可见小平同志多次批评冗长空洞、形式主义的会风，讲求办实事的作风，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中央经常提倡开短会，说短话，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会议，堪称典范。”

廖盖隆：

他一分为二，善用辩证法

廖盖隆，1918年生，广东信宜人。1938年起，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曾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朱德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党史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等。

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山工作时有过一句名言：要按照辩证法办事。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的总结发言中，对这句话作了高度肯定。他说：总而言之，就是如同太行山的同志所说的那样，要按辩证法办事。周恩来同志也在50年代的一次讲话中，说到邓小平是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廖盖隆同志怀着敬意地说：“邓小平是开创了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伟大领导人。他以懂得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而闻名于党内外。”他接着说：“正因为邓小平坚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所以，他总是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和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而不是随波逐流。他丝毫没有教条气，从不墨守成规。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有幸和这位伟大领导人有过一些接触，对于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所知道的苏共二十大时的邓小平。”

辩证地看待苏联给予我国的援助

1956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团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谭震林、刘晓（中国驻苏大使）。当时，廖盖隆作为朱德的秘书，随朱德从1955年12月起访问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5国后，先期到达苏联。几天后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莫斯科会合。因此，廖盖隆对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较为了解。他回忆道：

在苏联，代表团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苏共二十大开幕前，苏方邀请朱德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周年前夕，作一次电视讲话。讲话稿由朱德的秘书们写好后，朱德就请邓小平审阅斟酌。邓小平看得很快，也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他看完后提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援和援助，支援和援助应该是相互的。因此，还要讲中苏条约签订后6年来中苏两国的互相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持，二是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例如，他把原讲话稿中写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自己国家经济的努力给了“巨大的，全面的、系统的和无私的援助”中的“巨大的”3个字删去了。廖盖隆感慨地说：“他提出的这两点意见就是他告诉我们要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看问题的一个最生动的实例。”

辩证地看待苏共二十大的报告

苏共二十大开幕后，代表团遇到的另一个更大问题，就是怎样看待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报告。当时我国还正是强调学习苏联，从不讲中苏两党间

的矛盾和分歧的时候。所以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并未看出这个报告中的重大错误。廖盖隆说：这“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自己没有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去看问题”。

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存在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问题；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对前两个问题没有异议，但在对于第三十问题即“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上与报告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廖盖隆回忆说：邓小平对此就有明显的不同意见，他和代表团成员都认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问题提出来，是否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

苏共二十大闭幕时，朱德又应邀出席当天下午一个工厂为庆祝二十大胜利闭幕而举行的群众大会。秘书们也事先为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邓小平在审阅时，明确指出，讲话稿中对苏共二十大评价过高，要修改。后来，在2月19日的《人民日报》评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社论《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中，也有意地没有提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廖盖隆深有感触地说：“23日，我看到了19日的《人民日报》，所以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人民日报》关于赫鲁晓夫报告的评论，有些地方（关于和平过渡一点）颇为模糊不清，也可能是特别慎重的原故。”这就说明，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错误。因为《人民日报》不提‘和平过渡’，并不仅仅是‘由于特别慎重的原故’。”由此可见，邓小平当时的看法与党中央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对苏共二十大报告清醒地采取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态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平过渡’的提法，是正确的。”

1957年以毛泽东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一次由邓小平主持的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邓小平又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严肃地批评了苏共“和平过渡”的片面提法的错误和危害。随后，他还向苏共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辩证地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中苏两党的另一个重大分歧，就是对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共不同意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这个报告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随即召开了一次有苏共二十大全体代表参加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的。作这个报告的第二天，苏共召集了一次有各国党的代表团参加的座谈会，把报告内容的要点通知了各国党。随后，又将报告的复印件（即苏方接待人员所说的“红皮本”）送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在波兰找到了一份这样的“红皮本”，并且公开发表，轰动了全世界。由此，各国反动派趁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苏反共高潮。为此，我党中央、毛泽东、邓小平等在肯定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有“揭开盖子”，“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了严肃的批判意见。当时的意见归纳在3点上：一是苏联采取这一严重地关系到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行动，事先根本不同各国共产党商量，这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次突然袭击；二是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肃反扩大

化和破坏法制等严重错误时，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给社会主义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抹了黑，造成各国人民的严重思想混乱，长了反动派的志气，灭了各国革命人民的威风；三是事实上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领导集体一起所犯的各种严重错误，赫鲁晓夫没有作丝毫的自我批评，而把一切错误的责任推给斯大林，并且把它看成是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造成的。这不仅违背了事实，更重要的是因此而没有对产生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及个人高度集权等因素进行分析批判，从而排除了为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而必须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

廖盖隆在回忆这件事时说：

对于这件事，虽然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但是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不是代表团的组成成员，当时没有听到邓小平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对秘密报告的分析批判。然而，作为向来坚持以唯物辩证法看待问题的邓小平，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我们从 60 年代由邓小平直接参与而进行的中苏论战中完全可以看出，在《九评》中他有一篇专门讲斯大林问题的文章，完全代表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联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系列讲话，更可以看出正确全面、辩证地看待领袖人物是邓小平一贯的态度。这些讲话说明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也没有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指出中共中央集体、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负有责任，并进而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指出导致这些错误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体制上存在着个人高度集权的弊端，并且指出这是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和中国自己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造成的。这样，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就找到了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正确方法。廖盖隆深有体会地说：“正因为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所作的自我批评是郑重的、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进行自我批评而丧失威信和瓦解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相反党的威信更加提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这样做，是完全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进行认真严肃的自我批评的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贯彻执行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路线 10 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逢先知：

邓小平对马列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逢先知，1929年生，山东胶县（今胶州）人。1950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见习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著作研究组副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编审，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第二届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

逢先知说，在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使之得以巩固和发展，这一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无法预料的。列宁领导俄国革命胜利后，由于时间很短，他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有系统的理论；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曾使一个落后的俄国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其作用不能否定，但最终证明是不成功的。毛泽东对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因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错误，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损失。

逢先知认为，邓小平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这一国际共运一百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十四大报告中所阐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在这一领域有四大新贡献。

一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本质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这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界定更为完善。

二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认识。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也是一场革命。说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改革，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把人的积极性从旧体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社会主义更加充满活力。逢先知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提法，比起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的力量，有着鲜明的不同，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命题。

三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提出的这一主张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逢先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消灭商品和货币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部先后提及过商品生产，他们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在理论上有所前进。但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确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邓小平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在这一点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

四是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中共十二大把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提出来，体现了邓小平一贯主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思想。逢先知说，马克思和列宁也提过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中共和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强调这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逢先知说，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已成为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共识。作为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贡献将是不可磨灭的。逢先知还专门撰文论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特点。他认为有许多鲜明的特点，最重要、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实事求是为思想基础。逢先知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历 70 余年而一直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年代到建设年代，始终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冲破各种阻力，恢复并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对形势的估量和判断，在关键时候作出的重大决策，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以是正确的，他的革命胆略，政治上理论上的勇气和果断精神，所以是过人的，固然同他的智慧、丰富的经验以及在长期的艰苦奋斗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性格分不开，但归根到底是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条。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在概括和提炼群众的实践和历史创造活动中产生的。

第二，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逢先知认为，这是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开始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就十分专注地思考、研究、规划怎样尽快地把我国国民经济搞上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国变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到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到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科学界定，始终贯穿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个唯物观的基本原理，并且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这个原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第三，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方针。逢先知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整套的理论、方针、步骤和措施，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说，提供了许多全新的东西。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之后，紧接着同时提出来的两大战略决策。

第四，坚持“两手抓”。逢先知认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是个辩证法的两点论，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法的一个十分精到的特点。邓小平同志还用辩证法的另一突出特点，善于抓主要矛盾，善于抓要点。他所具有的这种驾驭全局的大战略家的品格，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他领导一个战略区，统帅一个方面军的时候，早已显露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十多年的历史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式过程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面对纷坛复杂的局面，总是从战略上着眼，高瞻远瞩，统筹全局，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加以解决，从而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第五，设计了中国通向未来的现实之路。逢先知认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实际，根据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总结和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的冷静分析作出的，达到理想的道路又非常实际、现实，如分三步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后达到共同富裕；“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等等，从理论到战略方针、战略步骤、具体政策以至工作方法，可以说都达到理想与现实比较完满的结合。

逢先知说，从 1935 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到 1945 年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其间经历 10 年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到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共经过 14 年时间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把中国由下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龚育之：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龚育之，湖南长沙人。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副组长，北京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科学会和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科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兼自然辩证法部分主编、《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副主编。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常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龚育之早年致力于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出版有《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科学、哲学、社会》等著作，后来从事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研究和当前党的政策理论的研究。在这方面的著作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解放的新起点》、《在历史的转折中》、《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合著）等书，并主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

在纪念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的时候，龚育之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高路采访时，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之间的思想理论上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特摘录如下：

两位伟人及其共同点

龚育之认为：20 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集中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说，那么就有两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

如果说，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可以分为上下两篇，那么，上篇是毛泽东领唱的，下篇是邓小平领唱的。上、下两篇之间发生了一个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到批判和纠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他要求我们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决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现在国外有些人就是整个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潮的影响。有些人不光否认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不光否定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否定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也摆在了这“一代人”之中。

如果对这两位伟人作一番比较研究，龚育之认为，强调“实事求是”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够分别成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两次革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分别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首先是基于思想路线上的这个共同点。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和邓小平很大的共同点在于：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从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入手，来解决中国的革命和改革问题。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所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是一条新路子，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从战略上讲，从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来讲，也是首先把目光放在农村的。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和推广，然后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动了市场经济的酝酿和发展。我看，在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改革战略中，抓住了农村和农民，就抓住了中国特色。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握住了这个战略基点。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很重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邓小平也很重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也是孙中山同他们的共同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个共同点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第一代领导集体

龚育之认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是就那代中央领导的成熟性而言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先后有过几届中央领导。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前几届中央领导虽然取得过开拓性的重大成果，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但是，在革命理论上和革命实践斗争中都还没有成熟。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在总结过去成功和挫折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革命事业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正确理论、方针和政策。革命的胜利和理论的成熟，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崇高威望。这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达数十年之久。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是这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的伟大丰碑。

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是就其成熟性而言的，因为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不成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性，证明了它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

龚育之认为：从理论和实践来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

体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只讲一条不行，只讲两条也不行，必须讲三条。

继承和发展这两条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方面。但从历史转折的契机来说，第一条当然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们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难。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帮”，开始了历史的转折。但是，最初两年，历史转折的进程遇到了困难，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勇气、魄力和本领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处理好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魄力和本领就显示出来了。小平同志敢于明确地指出和坚决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只有纠正这些错误，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旗帜。当然，讲错误，什么时候讲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情况。一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片言只语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后来才讲“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上是错误的，这就不只是片言只语的问题了。这里既有认识的过程，也有引导的艺术。新时期从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始，从“拨乱”开始。小平同志给“拨乱反正”下的定义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要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未竟之业，包括改正其错误。

第二条，就是继承。“反正”就是继承。拨乱，纠正错误，决不是全盘推翻过去，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须继承和坚持，没有这个继承的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基本的立足点，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两位伟人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目的是要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革命，这是十四大对党的70多年历史的一个新概括。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命题的提出，从思路来看，可以追溯

得更早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已经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其中也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那次全会前夕，他在全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可

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小平同志，我们党中央，就从现代化和改革相统一的视角，提出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问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起点。

虽然小平同志过去多次讲到这个命题，但是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1992年初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进一步作了新的发挥。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这就深刻他说明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道理，因而就引起注意了。后来就写进了十四大文件。

“两次革命”的概括，提供了一个纵览历史的大视角。这样，就可以从更高更大的跨度上来概括我们70多年的历史：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为核心，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代历史性飞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即为了实现现代化而进行深刻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代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两次伟大革命”是从实践上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是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讲的。两个提法的思路是一致的。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两次飞跃”体现在“两大理论成果”上，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就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来讲，那就是纠正、继承和发展。纠正，就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继承、发展，这三条，头两条的组合，“就是拨乱反正，后两条的组合就是继往开来，全面改革，就是开来，就是开拓，创新，发展。只有拨乱、反正这两条，还是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之内，根据实践检验，将其中的错误的东西改过来，正确的东西坚持下来。新时期还要创新。新时期遇到许多新问题。

所谓新问题，就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面对过的新形势所产生的许多问题，或是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但是没有解决好问题。从内政到外交，改革开放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去加以解决。开拓、创新的问题，远远不只是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内分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就能实现。正确地认识和创造性地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需要使毛泽东思想得到新发展。

1989年5月，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我们今天也不能躺在前人的书本上，而要以前人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面对新的实际去进行新的创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确有了新的发展。如实地了解和继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它既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继承，同时又在新时期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有了新发展。对这个理论新成果，在十多年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决议》，十二大报告，十三大报告，十四大报告，逐步深入和展开地进行了阐发。十三大概括了几个科学理论观点，十四大又概括了9个重要方面。当然还可以有其他不同的归纳和概括的方式。

至于用个什么概念语言来概括，这要中央下决断。十三大使用的提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我看到的党中央的文献，有的提“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有的提“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突出了小平同志在这个理论的创立中的地位。十四大的提法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单独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它？就是因为它不只是在毛泽东同志已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增加了几点枝节的东西，而是有相当重大的前进，有一系列新的探索、新的开拓，开始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理论，所以要有新的概括。

梁漱溟：

邓小平年轻、能干，深得人心

梁漱溟，北京人，祖辈几代在清朝为官，父亲梁巨川主张维新，辛亥革命后殉清自杀。18岁加入京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当《民国报》记者，与沈钧儒一起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尔后在北京大学任教。20年代末，他走出大学之门，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应蒋介石之邀，成为国民参政会一员，又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做彻夜长谈，其中又到鲁豫苏敌后游击区巡视，为团结一致抗日而奔走各方。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又出任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继续推动国共合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全国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梁漱溟除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乡村建设，民众教育之外，还长期潜心研究儒家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24岁登上北大讲坛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27岁出版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后有《儒家哲学》、《印度哲学》、《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文录》、《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问世，进入90岁高龄，还撰写出版了20万言的力作《人心与人生》。

梁漱溟一生可谓才华横溢，政论滔滔。但生就一副硬脾气。他曾狂言：如果我死了，天地定将为之色变，历史或为之改辙。他敢蔑视蒋介石，敢顶撞毛泽东，林彪当道，他反对林彪上宪法。他是个很傲气的人，但却推崇邓小平。

1951年春，中央组织赴西南工作团，梁漱溟自动向中央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梁漱溟随团出发，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近4个月。刚到重庆，梁漱溟就听邓小平作报告，介绍情况。那时刘（伯承）、邓主管西南和四川。结束时做总结，邓小平又参加会议，讲了话。邓小平年轻、能干，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月3日，即梁漱溟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晚上，毛泽东就约梁漱溟谈话，派车把梁从住地颐和园接到中南海颐年堂。梁漱溟到时，章乃器刚刚告退，他主要也是来报告到西南参加土改情况的。毛泽东说，土改工作团的情况，章乃器刚才已讲过，不必多谈，先开饭。饭后，毛泽东即要梁漱溟随便聊聊对土改、对四川的印象。

梁漱溟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时，满怀感慨和敬意地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那么快，是没有料想到的。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政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梁漱溟特别讲到“邓小平年轻、能干，深得人心”。还以解决四川的袍哥问题为例，说：“袍哥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件事办得好，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明白人看得清清楚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毛泽东听了梁漱溟的话，竟笑出声来，然后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30多年后，梁漱溟先生回忆起来，往事仍历历在目，他说：“我一直记

着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久大区撤销，毛主席调邓小平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走上总书记的重要岗位。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仍不时说邓‘人才难得’，因而几起几落，还能留在党内，以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掌航向，使国家走上稳步发展的康庄大道，此乃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郭沫若：

邓小平“天外人归”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曾留学日本。五四时期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出版新诗集《女神》，并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流亡日本。30年代加入“左联”。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救亡日报》杜社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从事民主运动。1949年8月，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新中国大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著有《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等。

1963年7月5日，邓小平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谈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21日，代表团回国，郭沫若随毛主席、周总理到机场欢迎。机场上，郭沫若目睹毛泽东亲往迎接的热烈场景，赋《满江红》以志其感。全诗如下：

天外人归
满江红

天外人归，
机场上，欢呼声壮。
遥望去，
红旗卷海，
翻波涌浪。
半月长谈争正谊，
四方公论明真相。
枉心劳
颠倒是和非，
狂哉妄。

白为黑，
谁受诳？
纸包火，
何能挡！
笑蠢才，
自掘墓坑营葬。
高树铭旌三叩首，
跪参导弹孤哀样。
有人民
历史转车轮，
宣判状。

诗人以浪漫的手法、炽热的感情，称颂了邓小平。

马识途：

邓小平扶大厦之将倾

马识途，现代著名作家。1915年生，四川忠县人，曾在南京上大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入鄂豫皖边区党训班学习，先后任汉口职工区委委员，鄂北特委委员，枣阳县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并开始给《新华月报》等报刊撰稿，和胡绳一起主办《大公报》。1941年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和外文系学习，办过文艺刊物。1949年后，历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四川省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组书记，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科院成都分院副院长。还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短篇小说《老三姐》，短篇集《找红军》，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两个第一》、《挑女婿》以及《夜潭记》、《巴蜀女杰》、《三战华园》等。

四川广安县邓小平旧居门前，挂着一幅长联，这幅长联用金色的字迹镌刻在门的两边。

这联上写道：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
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
治山秀水，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这联是四川著名作家马识途写的。作于公元1983年秋天。

广安，地处四川省南部，距重庆100多公里，而邓小平的旧居协兴乡牌坊村离广安城又有20余里。邓小平的旧居是一座农村四合院，青瓦屋顶，黄色粉墙，木栏窗户，泥土地面，典型的农村古朴风格。邓小平就诞生在这座普通的农舍院里。

据说，邓小平的祖先是前清翰林，为褒扬其学绩功名，当地人曾在村头立牌坊为记，牌坊村因此而得名。据说千余年来，广安出了不少名士重臣，传诵下来的位居元、明、清三代庙堂大官的名字有好几十个。自然，邓小平是广安人更是牌坊村最值得骄傲的。

广安地处成都平原的边缘，属丘陵地带，一条渠道浩浩荡荡川流而下，纵贯全县，但交通不是很发达，这里至今不通铁路，经济并不富裕。但物产丰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安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所以马识途先生撰写的对联，可算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了。

广安现已闻名中国，闻名世界了。但据介绍，到广安的外地人并不多。但凡到广安的外地人，都要到邓小平旧居看看，也还有些外国人来参观访问。

1994年新年前夕，邓小平旧居又挂了一幅长联，长达500字，且上下联句嵌“小平”二字。不妨也恭录如下：

小事宏观，大事微观，成事纵横观，败事主客观，牢树英雄宇宙观。卓与壮哉！深谋善断，手理万机，争朝夕，筹议唯勤。忆往昔峥嵘岁月，旅法留苏，备尝艰险话长征，桂岭打狼，中原逐鹿，淮海缚龙，巴川捉鳖。为解放鸿基，屡建殊勋。抗群魔，枉重灾，竟落得抄家削籍，悉抱初衷勿悔；耿耿兮，积愤索怀，笃信马列志弥坚。十年浩劫，几度沉浮，不减英雄本色。九州思治，回挽狂澜，净扫红羊甘受命。昭雪顺民情，错冤假案全甄，洗余

污，消余悸，废墟拨乱，弘扬务实精神。无那鼙鼓乍喧，仰赖才通韬略，赫赫军威震障陲，还我金瓯。推贤荐智，古崇舜让尧禅；夺位抢班，近斥江欺林篡。高风亮节，彪炳千秋，举世尊称当代伟人。堂堂仪貌，秩秩德音，岱岳登峰天下小；

平时剑气，战时勇气，穷时傲骨气，达时豪迈气，素标俊彦凌霄气。多且好也！灼见真知，身兼数任，辨是非，指挥若定。看今朝锦绣河山，翔鸾集凤，犹记忧欢国永固，农渔包产，厂矿扩权，税盈同课，党政分工，对共和绪业，常抒构想。统一国，存两制，已会签复港收澳，喜传夙愿将酬；拳拳者，至诚置腹，早合台澎心更切。甘纪嘉猷，双番增值，倍钦俊彦襟灵。亿户脱贫，振兴华夏，紧催赤骥欲腾骧。律科孚众望，残陋陈规尽破，开自铜，启自封，肃弊纠偏，控占攻尖领域。漫谓特区刚辟，敬蒙斗盖研桑，频频捷报拓琼岛，琢斯玉璞。革故鼎新，外引欧资美技；择优蕴粹，内联私贾公商。裕庶强邦，晖荣百族，环球盛赞亚洲奇迹。奕奕神功，皇皇正道，乾坤转斗泰阶平。

这幅新联是由成都楹联学会集体撰就的，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幅楹联。

聂卫平：

邓小平的关怀像座雄伟的高山

聂卫平，1952年生，河北深县人。自幼学棋。多次在国内外重大围棋比赛中获得冠军，是战胜日本围棋高手最多的中国棋手，被誉为“聂旋风”。曾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并被国家体委授予“棋圣”称号。是中国围棋协会会员，围棋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围棋队总教练。著有《我的围棋之路》、《聂卫平谈围棋》等。

也许是因为共同爱好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小平同志对围棋赛的关心，聂卫平有幸成为小平同志的座上客，有机会和小平同志打桥牌、喝酒，因而得到了小平同志特有的关怀。

1994年1月12日，聂卫平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充满感情和敬意地记述了邓小平同志对他的关怀。

聂卫平在文章开头就满怀感激地写道：“在我的围棋生涯中，每至关键时刻，我心中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对我的关怀和激励则像一座雄伟的高山，矗立在我背后，顿时使我产生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还有任谁也摧毁不了的顽强和自信。”

据聂卫平介绍，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在中日双方各阶层的人士都认为日本必胜的情况下，中国反而赢了。日本围棋界脸上总有些下下来，所以第二届擂台赛他们请出了当时成为九段以后未和中国棋手交过锋的超一流棋手武官正树、大竹英雄作为日本队的双保险，以必定获胜的决心和中国队再赛一场。赛前《新体育》杂志进行了预测，在9955封中国读者的来信中，仍有占

56%的5460人认为是日本队获胜。后来，当中国队赛得只剩下聂卫平一个人的时候，日本队损失的人马还不到半数，主力阵容还根本没有轮到上场。聂卫平即将接战的是刚刚战胜了马晓春的日本年青八段新秀片岗聪。形势十分严峻，对聂卫平来讲每一盘都是决赛，而日本棋手却有五次夺得最后胜利的机会。压力之大不敢再想。

决赛之前的一个休息日，邓小平同志邀请聂卫平几个国家体委的人打桥牌。吃饭的时候，小平同志举起酒杯要和聂卫平干一杯。因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比赛聂卫平临时戒了酒，就没有举杯，并马上解释说：“我戒酒了”。小平同志脸上出现了疑问。因为以前聂卫平和小平同志碰过几次杯，都是一饮而尽，酒量少说七、八两。说完缘故，就请围棋队的另外一个同志代聂卫平饮了这杯酒。小平同志关心地问起了比赛的形势，聂卫平详细地作了汇报，当汇报到中国队只剩下聂卫平一个人，而日本队还有五位八，九段高手时，小平同志沉思了片刻，用那注重的四川口音只说了两个字“哀兵”。谈话就此便结束了。聂卫平原想他可能要鼓励几句，或者指示些什么，但是他什么都不再讲，只有“哀兵”两字的声音在聂卫平耳边回荡。

聂卫平说：当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邓小平同志作为前委书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英名传遍全世界。现在他又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成为全世界都敬仰的伟人。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不可能赢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却高屋建瓴地指出：在擂台赛这个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中国队不但可能赢而且必然赢的结果。“必胜”是紧随着“哀兵”的，

但是邓小平同志却不讲出来，后来揣摩他的深意，可能是将这两个字留下让我用事实来讲。想到这时，我心中马上涌上了一股热流，全世界公认的伟人都认为我能赢，还不大获全胜？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勇气。这是我取得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五连胜的非常重要的精神因素。围棋是一项长时间的竟智对抗比赛，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因素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的比赛结果恰如小平同志的预料，尽管这五盘棋没有一盘没风险，但是最终聂卫平取得了胜利——“哀兵”必胜嘛！

聂卫平还说：“在生活中还和小平同志有过几次接触，使我感受到了他人格的其他侧面。凡是初次见过小平同志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就是伟人。都会感觉到一种在常人身上见不到的恢宏大度的气概，都会对他沉稳的举止、深邃的思想、敏捷的头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话不多，却自然就有一种威严。接触多了，我又感到他是一位非常爽快、慈祥的前辈。”

聂卫平回忆：“一次在北戴河，小平同志在那儿休假。国家体委在秦皇岛有个训练基地，那年轮到围棋队去那里训练和避暑，有天我就去看望他。聊完天，我感到他这段时间可能不太忙，就悄悄和他秘书商量，能不能让围棋队其他人也来看望他，因为大家都非常敬仰他，都十分羡慕我能有机会和小平同志在一起打打桥牌。我把这一意思刚说完，马上又有些后悔，心想小平同志对党、政、军的方方面面都要管，这要求未免太唐突了吧！没想他的秘书很快就请示回来，告诉我可以。不久，围棋队的人就荣幸地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接见。我一把国内的围棋名手介绍给小平同志，当介绍到刘小光在擂台赛中有四连胜的战绩时，小平同志说：‘来，干一杯。’于是刘小光成了国家围棋队第三个有幸和小平同志碰过杯的人。本来大家都有些紧张和拘束，这一碰杯，一下子打消了普通百姓和国家领袖之间的距离感。在原本十分敬仰的感情中又添了亲切的成分。”

文章最后，聂卫平充满感慨地写道：“以前我认为，身居高位的邓小平同志每天头脑中装满了国家大事，一般市民所关心的中日擂台赛，他可能无暇顾及。后来在北戴河，我曾见到小平同志指点他的孙儿们下围棋，方知道小平同志在围棋方面颇有造诣，并十分关心擂台赛的胜负，观看了所有中央电视台擂台赛的实况转播。第二届擂台赛我和日本队的副帅武宫正树那盘棋，小平同志就是从转播中得知我获胜消息的，他让秘书打电话到我家里向我表示祝贺，遗憾的是我赛完以后忙着和武宫进行局后研究，没能直接接到这电话，但是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常常感慨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有雄才大略，而且在很微小的事情上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百姓们喜闻乐见的事，他也同样高兴。我想：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幸福，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

厉以宁：

邓小平在经济理论中的创新

厉以宁，1930年生，江苏仪征人。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从事资料编译工作，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在大学时代即与人合译了《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以后又译有《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罗马帝国主义经济史》。1985年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教授。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编著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教育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中国经济政策的思路》、《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等。

1993年10月，厉以宁作为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的第一期学员，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接受《大地》记者瞿启运采访，畅谈了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创新。

厉以宁说，当代中国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一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如何使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国家。但是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还没有系统的、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同以往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比，厉以宁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造性突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地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通常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三者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长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上，科学地得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结论，简明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科学界定，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厉以宁认为，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可以使清楚地认识到这样几点：

1.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得以实现的体制；计划经济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是发展经济中的一种手段。

2. 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前人不曾论述或不曾考虑过的。邓小平抓住“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论点，使其他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答。例如，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强调解放思想？因为旧的习惯势力阻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的目的尾什么？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走向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为同步富

裕不切实际，人为地拉平收入差距反而限制了生产力发展，先富帮后富，生产力才能迅速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3. 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是非判断根据是生产力标准。邓小平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充分突出了生产力是区分是与非的标准，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阐明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

厉以宁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的理论，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重大突破。

厉以宁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论述，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革命是指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但是，革命胜利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详细的论述。在一段时间内，包括苏联和中国，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损失。邓小平同志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定论。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论断所得到的启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定要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原理，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如果下改革，墨守陈规，那就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失去活力。如果不改革，或者不抓紧时机进行改革，那么最后将丢掉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东欧的血的教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厉以宁在谈到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大创新。

厉以宁介绍说，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划上等号、把资本主义同市场经济画上等号的。因此，如果要谈经济体制改革，那就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内作某些修改或进行某些调整。因而，经济体制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大创新，就是明确地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成是两种经济手段，指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这一论断，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代替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

厉以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结合使用计划或市场两种经济手段或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主要用中央计划进行配置，市场只不过是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市场的资源配置的调节是基础性调节，而政府则起着高层次的宏观调控作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计划和市场的兼用，既可以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来配置资源和重新组合资源，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还可以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使社会主义经济在持续、稳定、协调中发展。厉以宁说，邓小平对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的突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其意义是非常重大而又极其深远的。中国的经

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必将取得越来越显著的成就。

厉以宁最后说，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创新，是邓小平同志创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证明它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的实践，改变现实世界，推动历史前进。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经济改革步伐和经济更快的发展。

陈昊苏：

应该承认邓小平是伟大领袖

陈昊苏，1942年生，四川乐县人，陈毅元帅的儿子，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历任七机部某研究室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研究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丰台区常务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诗集《红军之歌》、《继志集》，论文集《我心中的太阳》、《辉煌的日出》。

1989年7月15日和17日，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陈昊苏同志在故事片《百色起义》新闻发布会和首映式上两次讲话，谈论《百色起义》和邓小平同志。

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陈昊苏同志说：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大家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五四运动开始，70年来始终活跃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发生的影响，在时间跨度方面是创造了最高的记录。他从20年代末就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参加过缔造红军的伟大斗争，并为苏维埃区域的建设和红军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大战略区的主要指挥员，在淮海、渡江战役中担任过总前委书记，为战略决战的胜利立了大功，并表现出是非常来越的统帅人才。建国后，他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成员，为50年代和60年代的发展建设作出过贡献。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他重新受命，成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主要决策人。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总设计师。在他85岁高龄的时候，还在为国家的进步事业掌舵，领导平息了一场危及国家安全及前途的反革命暴乱，使共和国的航船保持了正确的航向，并继续前进。

陈昊苏同志认为、假如客观公正地从历史前进的角度来观察，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切偏见之上，那就应该承认邓小平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伟大统帅，是无愧于“中国人民的儿子”这一光荣称号的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百色起义》出色地塑造了他的光辉形象

陈昊苏同志认为《百色起义》集中地对起义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秘书、中共中央代表、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的邓小平的出色指挥和才华，作了艺术上高水平的再现。邓小平作为在全世界有着重大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广阔舞台上跨越70多年的复杂斗争的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百色起义》只是选取了他在60年前的一段半年左右时间的革命经历。银幕上的邓小平，是一个25岁的青年革命家，受党的委托全面领导了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斗争，表现出非凡的革命胆略，同时处处表现出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的风格和情趣。陈昊苏认为这部影片出色地塑造了邓小平同志的形象，再现了60年前红军初创时期的斗争，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因而在中国电影反映重大革

命历史的系列性创作中占了一个光荣的位置。《百色起义》的重要意义就是对邓小平同志的革命经历作了一次银幕上的出色的曝光。

献给邓小平的诗

1989年11月，邓小平同志辞去一切领导职务，当得到党中央批准的时候，陈昊苏同志激动与崇敬难抑，写了一首献给邓小平同志的诗，因邓小平同志年轻时在法国办过刊物《赤光》，因此，诗题叫《赤光颂》。

赤光颂 ——献给邓小平同志

在草创的年代，
先驱筚路蓝缕，以启蛮荒，
你是最年轻的开拓者，
向黑暗高擎起赤色的光。
在长征的岁月。
红军团履险奋进，艰苦备尝，
你是忠贞不二的战士，
把抗日的大旗插上了太行。
在决战的日子，
老百姓欢呼解放，箪食壶浆，
你是指挥若定的主将，
把胜利的捷报传到四方。

四九年建国之初，
亿万人民踏上艰难的远征，
你雨辛劳为祖国赢得进步，
坚定从容，把工业化的大厦支撑。
七八年拨乱反正，
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的复兴，你用智慧为人民指示方向，
高瞻远瞩，规划出改革开放的前程。八九年风波骤起，
社会主义经历了生死的斗争，你的果敢为大局带来稳定，
赤色的光，依旧象征着神州的光明！面对新的世纪，
还有三千六百个风雨鸡鸣，
你虽然已经功成身退，
全世界还在倾听你的声音。
你的思想属于时代，
你的事业属于人民，
你的光荣属于历史，
你的光荣也属于我们年轻的心。

章含之：

邓小平率团参加特别联大会议

章含之，湖南人，著名政治活动家、知名学者章士钊先生之女，北京外交学院毕业，长期在外交部工作，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当翻译，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等职。1973年12月，与才华横溢的著名外交家、时任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结婚。这以后一投时期，正值邓小平同志复出并分管外事工作。章含之、乔冠华夫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时期。下面是章含之的回忆摘录。

1974年的早春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周总理。接着，什么电影《中国》事件，江青给外交部信件等等层出不穷的风波把个外交部搞得一团糟。那时，本应是我们度蜜月的佳期，我们却天天应付这层出不穷的风云变幻。一天下来真正是精疲力尽。但这时，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机。在周总理决定住院手术之后，毛主席断然决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际出现了希望的光亮。4月，主席点名建议邓小平同志率团参加特别联大会议，并指定冠华协助。主席的决定来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欢欣，压在人们的心头将近一年的疑云消失了。在为周总理病情无限焦虑的同时，小平同志的掌政总算给人们一线希望之光。冠华情绪大振，仅用了三天时间协助邓小平同志写出了特别联大的报告，其中根据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观点，在联合国大会上激起了会员国强烈的反应。这是一次极其愉快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团长，引起世界的注目。冠华作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极好。那时邓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习惯。可是冠华却恰恰是晚睡晚起。不过他却信誓旦旦地保证七点钟能起来吃早饭，结果当然常常起不来。有好几次邓小平同志到了七点钟就从十层长走廊他卧室的一头散步到另一头我们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冠华常大笑却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开会时，冠华说他那个“乔老爷”的外号是60年代时邓小平同志开始叫的，后来几乎变成乔冠华的代名词。我觉得除了周总理，冠华最为依赖的领导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对他也了解。所以当1975年底那场政治灾难来临，小平同志处境困难时，冠华彻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记得到1976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冠华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焦急地等他回来，但冠华一回来就神情沮丧，我们急问怎样。他说，“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增添困难呢！”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于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平同志，但他对他患难之时得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那次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的英语翻译。出发前，小平同志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要大一点。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说没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谈。

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完全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是一般难得的平静。虽然部内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通天人物”的传达，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乌杰：

邓小平思想是“第二次飞跃”的最高理论成果

乌杰，蒙古族人，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之子。曾任山西省副省长等职，现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著有《系统辩证论》、《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整体管理论》和《邓小平思想论》，尤以后者影响最大，第一次明确提出“邓小平思想”这一概念。

乌杰认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长期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概念，本身就意味着第二次飞跃具有相对独立于第一次飞跃的理论价值。毛泽东思想作为第一次飞跃的最高理论成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全党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目的运用和发展。那么，第二次飞跃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全党智慧的结晶，其最高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思想。邓小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借鉴和融合了现代世界文明的丰富营养，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新突破、新创造。一句话，邓小平思想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历史潮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它的产生，反映了实践的选择，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邓小平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乌杰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实际上就是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过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思想也不断地得到了检验、丰富和完善。十多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邓小平思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最直接、最现实、最富成果的指导思想。从邓小平思想中，可以领悟到富于创造性、充满生气。简明朴实和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言简意赅，这给研究带来较大的困难，其内在价值很容易被低估。坦率地说，不承认“邓小平思想”这个科学概念，把邓小平思想只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因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是中国第一次革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而邓小平思想则是第二次革命的伟大结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和飞跃。

乌杰认为，邓小平思想，首先是基于邓小平同志伟大革命家的品格。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规律和现时代的要求出发提出命题，再将这些命题及其思想体系用于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这是邓小平思想最突出的特征。而邓小平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同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当代公认的第二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在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决策中，邓小平同志担当了英明的总

设计师。尤其是每当我们处于思想混乱时，邓小平同志总是以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为中国社会的航行拨正方向。

邓小平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乌杰认为邓小平思想是一个具有科学内涵与外延的完整的体系，具有独创性和思想价值。乌杰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对邓小平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以下是他的主要观点：

——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邓小平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虽然邓小平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当代的思想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系统理论思想结合起来，构筑起邓小平思想的哲学基础。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一个是“一分为多，合多而一”的系统辩证法。这是邓小平思想体系的基石。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主张实事求是，但后者比前者有重大突破和创新。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实事求是是从解决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出发，偏重于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而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出发，突出了现代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思想，包括实践标准理论和生产力标准理论等等，表现出彻底性的品格和时代意识。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初步实现了唯物辩证法同现代系统理论的整体结合，特别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统一性，其集中体现就是“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一国两制”构想、处理国际关系的“合作共进”主张，各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富裕等等，都门耀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光辉。

把实事求是观贯彻到社会领域，突出强调生产力标准，强调和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又一鲜明特色。

邓小平哲学思想吸收、借鉴和融合现代化科学的最新成果，以系统辩证思维实现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辩证思想的革命性变革，体现了20世纪后半期时代的“精华”和“活的灵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思想的基本纲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于邓小平思想，即如科学社会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终结”和“落脚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邓小平思想的“核心”，也是邓小平哲学思想、世界发展趋势思想、社会制度选择思想的“理论终结”和“落脚点”，邓小平思想的整个科学体系，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所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思想的基本纲领。

正确认识国情是邓小平思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初级阶段”是邓小平思想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而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发展、新飞跃；多种模式论则是邓小平选择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思想；勇于探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导方式。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实现基本纲领的基本路线。如果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思想的基本纲领。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则是实施这一纲领的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高度概括，它文字精练，但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但高度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治国思想的核心与要义，而且对于中心的经济建设，作为基本点的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表述得科学明了。把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整体特征，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改革理论在邓小平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对改革的目标、基本内容，对改革的战略与策略，以及改革成效的检验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广泛、全面和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充满智慧之光的思想。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经济体制，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并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的主体，大体具有以下三十方面的内容和特征。

一是依据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划清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左”倾思潮的界限，具有浓重的务实精神和时代性。二是正视现实，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大无畏的精神和伟大气魄，对相延数十年的传统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病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明确提出了全面改革这一传统体制的任务，三是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经济体制的探索。在长期的探索中，邓小平及其战友们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已经探索出了这种新型社会体制的基本框架，其论述十分丰富。

从1980年起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基本内容和具体措施的一系列论述，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它含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民主理论，二是对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途径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框架的确定和规划。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社会制度选择思想的集中表现。面对世界进入80年代后的新的国际形势，邓小平以纯熟驾驭中国现实的睿智，雄视整个世界历史和未来的高超能力，提出了“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的问题，即在“和平共处”基础上走“合作共进”的道路。和平共处原则过去主要用于处理两种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原则，邓小平把它扩大用于处理一切国家的双边关系，甚至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发展了列宁主义、毛泽东的理论，且成为填平人类历史鸿沟、跨越新时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是对传统理论——从暴力革命到两大阵营、三大世界理论的划时代突破。“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选择思想，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当代世界格局的发展前途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人类未来社会进程具有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铺平了道路。“一国两制”在国际社会引伸为“一球两制”、“一区两制”、“一球多制”，这就突破了两大阵营各自追求的

“一球一制”模式，同时也力填平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领土纷争等各方面的历史鸿沟提出了理论依据，有利于国家社会持久和平与协调发展。而再造“几个香港”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未来前途的超级战略构想。邓小平关于特区开发呈“内地开放区—准特区—特区—准自由港—香港模式—台湾模式”的战略布局，中心开花，内外辐射，体现了邓小平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经济到政治全方位系统开放的战略思想，也就是“一体多制”的思想。

邓小平一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强国富民政策，提出一国两制、维护世界和平等一系列政治举措，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努力提高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这是邓小平作为当代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历史抱负。

邓小平思想的总体特征和科学价值

乌杰认为，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以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第二次革命”，同邓小平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就邓小平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作出最普遍或者是整体的表述，那么，这种贡献就是邓小平思想。

邓小平思想的表现形式与纯粹的理论家不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思想主要通过政治的形式，决策的形式，制定政策的形式，以及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分析和看法等方式表达的。简洁、明确、包容性大、针对性强、内涵丰富是其表达方式的特点，这与邓小平的政治风格是一致的。如果我们通过这种表达方式透视邓小平思想的总体特征，可以用求实精神、时代性、革命性、探索性来加以概括。而其深刻性则在于紧紧把握住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脉搏，为中国未来现代化树立了一个总体理论构架。

乌杰还认为，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思想不仅着眼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其宽广的思想视野回答了一系列当今世界的国际性的长远的全局的战略问题，其中包括当今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发展与稳定、“南南合作”、“南北合作”、“一国两制”等重大国际性问题。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显示了他个人、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高度责任感和恢宏的气度，在这一当代世界思想领域中的伟大对话中，邓小平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世界性的老资格政治活动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因此而具有一种新的形象。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最具创造性的思想与实践，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航向，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成功。邓小平由此为中外人士公认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领导的伟大实践，也有力地影响了世界大格局。

社会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末遭受严重挫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邓小平同志的高明之处正在于经过认真的反思，认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我们自己成功与失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把中国引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开辟了新的希望。

乌杰认为，邓小平思想是顺应世界大趋势和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尽管形成的时间不太长，但它在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已经显示并更加显示日益巨大的威力。随着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其科学价值、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必然愈来愈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深刻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接受的指导思想。为了保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党的基本路线百年不变，就应当把邓小平思想明确地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要学，列宁主义要学，毛泽东思想要学，用以作为理论基础，而我们直接遵循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邓小平思想！

毛毛：

父亲一生，经历太丰富了，故事太多了

毛毛，现名萧榕，曾用名邓榕，邓小平的小女儿。1950年生于四川重庆，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8年，任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多年从事研究工件，曾经组织撰写《中国社会主义四十年》、《向新科技革命进军》等文章，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

向往已久的一个心愿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一书的前言后语中，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做了说明，从中也可以看出女儿眼中的父亲。她饱含深情地写道：“我要写我的父亲，因为这是我向往已久的一个心愿。我要写我的父亲，因为我常常在我父亲的身边，我认为我了解他。我要写我的父亲，因为我崇敬他。”

毛毛说，父亲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愿宣传自己，也从不向人讲述他的经历，就连我们这些身边的亲人也很少谈及往事。因此，许多人对他都只知其现在而不知其过去，只知其表面，而不知其究里，对于他的经历，甚至还有许多的误传谬说。父亲说过，他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传记。但是作为他的女儿，如果我不把我所知道的记述下来，我将愧对历史。今生今世也许我一无所成，但如不完成这一夙愿，我便会遗憾终生。

毛毛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找资料，采访人，熟悉历史，终于写出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写了邓小平的前半生。毛毛感慨地说：“父亲的一生，经历太丰富了，故事太多了，时间的距离也的确拉得太长了。”“以我一个人如此单薄的力量，要把父亲那丰富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描绘出来，哪怕轻轻描绘一个轮廓，都是何其难哉”。

因此，毛毛声明：“我的本心，是要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大家。”“我没有资格写他的传记”。

毛毛现正着手写邓小平的后半生。她认为：“父亲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篇章，还在后面”，且对于父亲的后半生，“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深。”因此，她相信，“下一本，一定会比这一本更好”，“将父亲那绚丽多彩的整个的一生，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1904年农历7月12日，即公历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毛毛说，生了个男孩，对邓家来说，一定是件最为喜庆的事，但在广安，在四川，在全国来说，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那年诞生的千千万万个婴儿中的一个。因为父亲现在出名了，所以我们家的一些亲戚和乡里的人便传说父亲出生时曾经出现过什么吉兆，其实都是一些无稽的编造。

退休了，仍时刻关注改革开放大业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了邓小平辞去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毛说：他退休了，目的是让中国废除封建的终身制，让年轻人来接班换代。他退休了却时刻关注着改革开放大业，在他88岁高龄，还在为中国的进一步腾飞而奔走疾呼。他还有一个未了心愿，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他要踏上这块祖国的土地。他说，就是坐在轮椅上也要去，哪怕是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到那时，已是93岁了，我们全家人都相信，也要全力以赴地努力，确保他实现这一愿望。

与此同时，尽管邓小平同志退休了，但人们仍然十分关心他。毛毛说：人们对他的健康状况十分关注，常常询问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人们对他的的一生的功过得夫饶有兴味，国内外对他的功绩和思想的评论研究已经很多。人们对他丰富而又曲折的经历更是颇感兴趣。德国的、匈牙利的、香港的和一些国内作家相继撰写了他的传记和评传。

1994年3月，毛毛应日本德间书店邀请，参加《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发行的庆祝活动，在东京赤坂王子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毛毛应记者要求谈了父亲的情况。

毛毛在谈到邓小平对中国现状与前途的看法时说，父亲认为，中国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奠定了一定基础，目前，中国面临新的机遇，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毛毛再次重申了邓小平在香港回归祖国那天踏上这片土地的心愿。她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去一次香港。他说：‘1997年我93岁了，可能不能走路了，哪怕坐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停留一分钟，我也高兴。’”

毛毛还介绍，江泽民等领导人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到家里来征求父亲的意见，他总要说：“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是否可以，由你们定。”他总是把现在的中央领导人摆在前面。

在回答日本记者所提关于邓小平同志的日常生活状况的问题时，毛毛说：“父亲虽然快90高龄了，与几年前相比明显老了，但身体没病。仍坚持锻炼，每天坚持散步三公里。”毛毛说：“我父亲长寿的秘诀是生活有规律。他每天早晨7时起床，然后做简单的体操，早饭后看报纸或政治文件，晚上或打桥牌，或带孙子玩。她说：“我的父亲非常爱看报纸。他订了十几份报纸，每天部看完。他不看外文报纸，因为看不懂。但是，我们中国有份《参考消息》，上面登的都是有关外国人的文章，其中包括很多日本的新闻。这份报纸是我父亲非常喜爱的，而且看得非常仔细，这就弥补了他不懂外文的缺陷。”

重版后记

《中外名人看邓小平》出版后，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广大读者纷纷来信，要求重印。

编著（译）这么一本书并不容易，涉及的人多面广，资料搜集比较困难。我们力争广征博采，精心筛选，做到内容丰富、准确、生动，既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又具有资料性和可读性。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条件的限制，深感未能完全如意，有些名人的有关评论也许并没有收进来，有些人的评论也许收进的并不是最主要的。对此，我们有力不从心之感。此次重版，我们增加了一些内容，并改正了一些错误，但并不是完美无缺了。希望广大读者以后提供资料，并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本书越出越好。

本书的海外人士部分由袁南生同志编译，伍国用同志编写了国内大陆人士部分。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湖南出版社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编写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图书报刊资料，对有关作者和出版者，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著（译）者
1997年2月

主要参考资料

-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 宗峻：《总设计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毛泽东回湖南纪实》，湖南出版社出版
-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 《风云七十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 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二、三），华夏出版社出版
- 杨国宇、陈斐琴等：《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一、二、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 《星火燎原》（一），战士出版社出版
- 《中共党史资料》（九、十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 《中共党史人物传》（四十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乌杰：《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出版
- 路海江、贺明洲：《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
-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 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
- 杨中美：《胡耀邦传略》，新华出版社出版
- 《胡耀邦》，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 陈石平：《中国元帅刘伯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谭震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 袁任远：《征途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 《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人名词典》，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名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词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中国当代名人大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人民日报》（1992~1994）
- 《光明日报》（1994）
- 《经济日报》（1993）
- 《人物》1994.1

